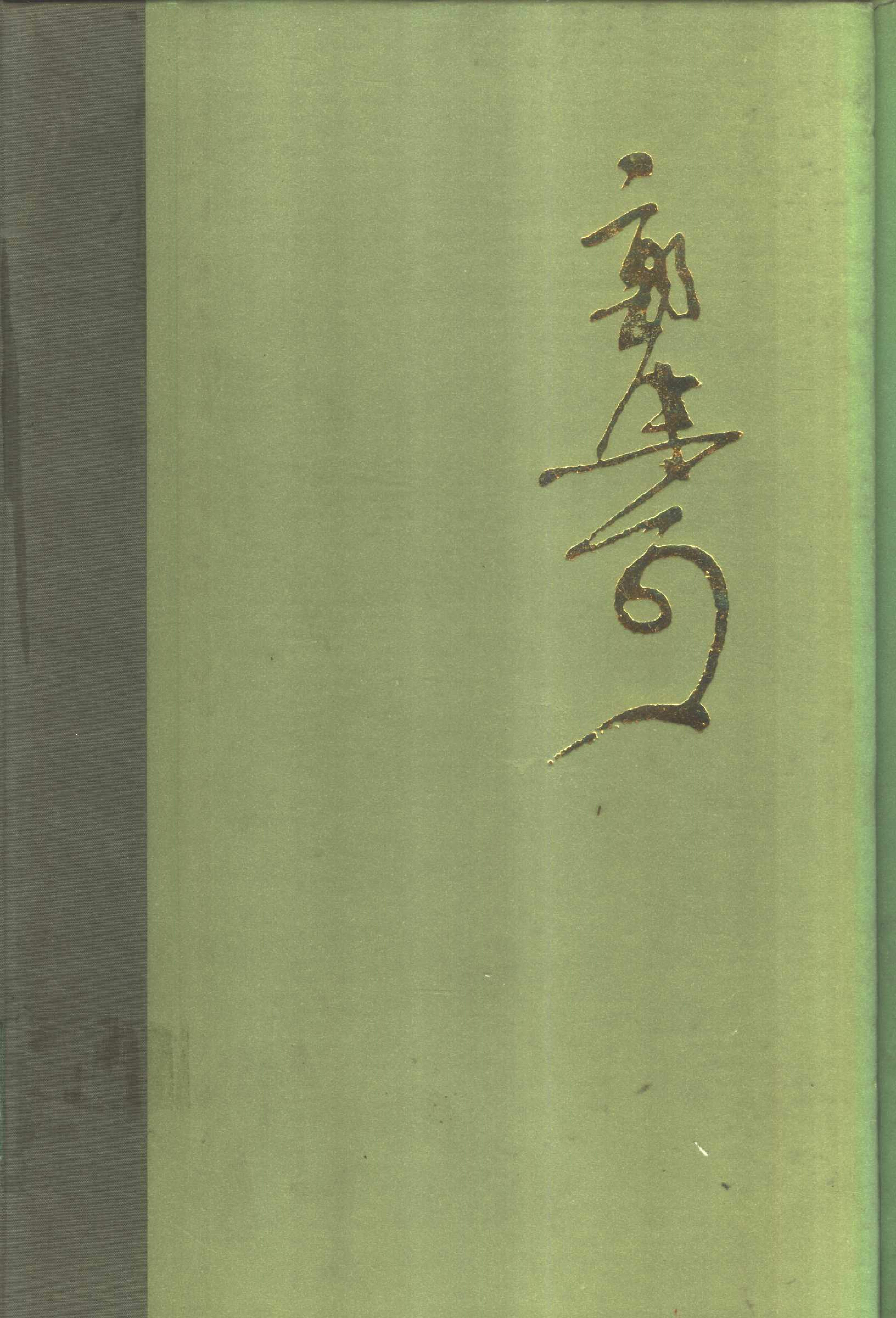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十三卷

沫若自传第三卷——革命春秋

北伐途次　　海涛集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归去来
脱离蒋介石以后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十三卷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frac{9}{16}$ 插页5
字数300,000 印数0,001—3,500
1992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02-001436-4 Z·74
定价 12.60 元



一九二七年春在南昌（前右一为李富春、左二为作者，后左二为李一氓、右三为林伯渠）



一九三三年偕家人与日本京华堂主人小原荣次郎(后右一)的合影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后与夏衍、田汉及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成员们的合影

第十三卷说明

本卷收入《沫若自传·第三卷》——《革命春秋》。

《北伐途次》作于一九三六年，最初收入一九三七年六月上海北雁出版社出版的《北伐》。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和续篇《脱离蒋介石以后》作于一九二七年。

《海涛集》中的《离沪之前》，是一九二八年一、二月间的日记，一九三六年五月由上海今代书店初版单行本。其余六篇写于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以上七篇，一九五一年八月合编为《海涛》，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归去来》中的《浪花十日》写于一九三四年，《东平的眉目》写于一九三五年，其余八篇均写于一九三七年。上述各篇与《鸡之归去来》等三篇辑为《归去来》，一九四六年五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鸡之归去来》等三篇今收入本编第十卷，本卷不再收录。

以上五集合编为《沫若自传·第三卷》——《革命春秋》，一九五八年九月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八卷，现据此版本编入。



曲 江 河 畔

〔作者原识〕

曲江河畔

北伐时代的照片，我手里所存着的只有零星的几张，都是我的内子替我保存下来的。那时她被留在后方的广州，我偶尔寄了些照片和信回去，她都替我保存了下来。这儿所插入的一张也就是其中之一。

这照片的前列，左侧是俄顾问铁罗尼，中间是邓择生，右侧的便是我。后列立在我背后只露出一顶帽子的，不记得是谁。中间拿着一把芭蕉扇的是我的勤务兵薛绍三，另一个是择生的护兵杨昇。可惜纪德甫没有被收在这里面，他的照片，我手里一张也没有。

原片背后写有两行说明，是："广州出发后，搭乘火车至韶关，此乃翌朝在韶关曲江河畔待舟时。七月二十五日。"大约是北伐第二年的一九二七年在武昌写的。那时纪德甫早已阵亡，邓择生也跟着铁罗尼跑向俄国去了。

由广州出发时是在七月尾间，日期记不清爽了。照片是艺术股的股员摄的。

1937 年 4 月 29 日

第十三卷目录

革命春秋（沫若自传·第三卷）

革命春秋

沫若自传·第三卷

郭十三 田

北伐途次

(1926—1927)

本篇最初连载于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二月上海《宇宙风》半月刊第二十至三十四期。最初发表时，篇首有《序白》，写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说明本篇原题《武昌城下》，曾应日本某杂志之约用日文缩写，发表在该刊上。《序白》手迹载于《宇宙风》第二十期扉页，出版单行本时删去，增加《后记》。

小　　引

在这儿所要叙述的是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攻武昌时的事情。

回顾起来已经六七年了，所有的材料大抵归了消灭，即使还有被保存着的，在我目前的环境之下也搜集不起来。我现在只能够根据着我所参加过的一部分写出，而且是根据着我的日渐稀薄下去的记忆。因此我这篇文章只能够采取回想录的形式，记忆比较明确的地方写得自然会详，记忆比较淡薄的地方写得自然会简略。这样，文章便会流为是断片的，但也只好听其断片。我本也可以加些想象进去，把全部的事件客观化起来，写成一部小说，但那样反会减少事实的真实性，同时是会发生出许多错误的。我将来假如有更适当的环境，能够搜集得丰富的材料——我希望凡是参加过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的那次革命的人能够提供出些材料来，就象我现在一样写出回想录，便是最好的方法——我到那时候一定可以写出那样的一部小说或者历史。要写出这部著作我觉得我自己是最适当的人：因为从广东到广东的那个巨大的波动，我是整个地参加了的。

这儿要从那年的八月二十四日离开长沙时写起。要从这

儿写起的是因为从长沙到武昌在北伐期中是自然成一段落的。在这一段落中我特别要纪念我的一位阵亡了的朋友。这位朋友虽然阵亡了，就和其他在武昌城下阵亡了的将士一样，除少数接近的个人之外，连他的名字都是没人知道的。他的名字我现在要大书特书地写在我这篇回想录里。我相信总不会是象写在水上的一样吧。但这不是说我的文章可以不朽，是说他那不朽的英勇由我这易朽的记忆中离析了出来，让读者替我分担了去，就好象一簇地丁花的种子随着风飞散到人间。

一

政治部到了长沙，驻扎在旧时的省议会。主任邓择生①要经常住在总司令部里面参预军事工作，因此政治工作大体上是由我在代理。

八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在准备着第二天办祝捷会，庆祝岳州的克服。在那天晚上要举行提灯行列。下午四点钟光景，大家正忙得来有了一个段落的时候，邓主任突然下了一道命令来，叫把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分为先遣队和留守部，先遣队于当晚八时由长沙车站出发前进，留守部暂时留守在长沙。

从那连工作人员和夫役一道约一千人左右的政治部，分出了三分之一来组成了先遣队，把所当需要的物品通统指配停当了；在六点钟的时候便指定了统率的人把全部的人员领向车站。

我和秘书李德谟②也是属于先遣队的。因离开开车还有两个钟头的余暇，便偷了这个余暇到附近的澡堂里去洗澡。在

① 邓择生(1895—1931)，名演达，广东惠阳人。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等职。大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一九三〇年春回国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策划反蒋军事行动。一九三一年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

② 即李一氓。

那样三伏天气，到了长沙将近一个礼拜了，我们没有洗过一次澡，自己身上的臭气怎么也不能忍耐了。洗了一个澡真是异常的舒服。走出街头来正打算坐人力车赶到火车站上去，但是人力车夫已经罢了工了。因为已经七点钟，提灯行列开始了，车夫工会的工友都是要参加的。街面上的人也逐渐拥挤了起来，即使有人力车，也到了碍难通行的地步了。到这时只好在街上找了一位向导，拚命地向火车站上跑去。

跑到了火车站门口的时候，俄顾问的翻译纪德甫① 和几位部员向着我们簇拥上来，异口同声地叫着：

——"啊，你们到那里去了？邓主任在大发雷霆——说要枪毙你们呢！……"

看表也只到七点半钟的光景，离开车的时刻还有半个钟头，这发怒的原因使我一时摸不准确。

纪德甫是要时常跟着俄顾问的，他也常住在总司令部里面。他们——邓主任、俄顾问和他——是七点钟到的车站，看见先遣队的人员都已经上了车，以为我和德谟一定会立刻到的，便把开车的时间提前了半点钟。这个情形我们自然无从知道，而我们在洗澡，他们也无从知道。就这样在时间上便不免稍稍生出了一点龃龉。

匆忙地赶上月台，在昏蒙的电灯光中看见在最后一架车厢的门口立着那位昂藏的邓主任，他的颈子是硬擎着的，头是照常微微偏在右边。

---

① 纪德甫（？—1926），山东人。早年留学苏联，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翻译，一九二六年九月在武昌宾阳门外牺牲。

——“到了吗，唉？”他含着怒气的声音远远地在向着我们这一群人发问。

——“到了，到了，”别的人替我们答应着。

接着也就走到了他的面前，把去洗澡和没有人力车的话向他说了一遍。他只是哼了几声，把硬着的颈子微微地点了几下。最后是说出：“好啦，我们开车啦。”

车是普通的三等客车，因为车上的电灯设备被北军破坏了还没有复元，车厢中只点着几盏马灯，光度自然是很暗淡的。俄顾问铁罗尼①坐在后面的一个车角上，他看见我们上了车，便跑来拉着了我的手，很亲蔼地用德国话向我叫着：

——“Genossen K! Wie sind sie?”②

我也免不得用我的“不落肯”的德国话来和他说了一些。他们都退到一个车角上去坐下了，我自己觉得很有点没趣，就象做错了什么事的小孩子一样，只好远远地退在另一边的车角上去默坐起来。

不一会火车也就开动了。在昏暗中把驻扎得还不上一个礼拜的长沙留在了我们的后面。

---

① 铁罗尼，高加索人。北伐期间受苏联政府委派任广东革命政府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顾问。

② 作者原注：K 同志，你是怎么了的？

二

车厢中的光景很暗淡，我自己的心境也同样暗淡。夜以继日地工作了好几天，不求有功只想无过地工作了好几天，不想要偷闲去洗个澡，竟闹出了这样大的笨事。洗了澡后的舒服已经被赶向车站时所跑出的汗水冲洗干净了，而在精神上还遭受了一次“枪毙”。一些没趣的只想向自己发怒的简单的念头在脑中回旋着，回旋着，自己不想向别人说话，别人也没有人来向自己说话。

火车跑了大约两个钟头的光景停止着了，已经到了目的地的汨罗。

在昏暗中又下了车，车站的情形是怎样，并且是在那一个方向，都摸不准确。天上没有月光，连星星也都没有一个。主要的几个人借着马灯的光，聚集在一座路旁的坟台上，坟台是石板面就的。在那儿规定了第二天走路的方向，把命令传出去了。当晚就地露营，明天清早六时向目的地出发。

铁道旁边不一会便生起了几堆火来，是准备夜饭的，部队忙着出发，连夜饭都还没有用。

邓主任的怒气似乎还没有解息，他依然没有向我说话。平时他对我比较是开心见肠的人，这回却好象成了木雕的哼将一样。突然的出发究竟为的是什么？岳州已经克服了，火车

不日便可以开到岳州，为什么我们要赶着走路？路向又不是沿着铁路而是指向东北，并且也不当大道，连普通的地图上都没有路线。我们最后的目的地究竟是在那儿？我们的使命究竟是什么？……这些他对我全没有说明，也没有对我说明的意思。我觉得他对我没有这样严守秘密的必要。就是在车站上略略误了一下钟点（其实离开车前还有几分钟），也不应该有那样长久不解息的怒气。我自己私自怨艾的念头也掉过来在对着他表示不满了。

胡乱地在露天中用了夜饭，因为天黑，又因为明朝一早便要动身，各人用的行军床都来不及取出。铁罗尼顾问和邓主任和着衣裳便倒在那石板面的坟台上睡了下去。我很惊异，同时也很佩服，怎么在那样硬的地方便可以睡？纪德甫、李德谟和我，在这时从他们的身边走开了，自然是要去找睡觉的地方。我们有不约而同的心事，是想找一个柔软的地方来睡。

一处有深草的地方，上面有几株树子罩着，在马灯光中照明出来，显得异常幽雅。我们便把这儿选定了。德甫把自己背着的雨衣解了下来铺在草上，德谟也从邓主任的护兵手里找了一床广大的龙须草席来铺陈着。我首先向那草席上坐下去，就象是坐上了钢丝床的一样，坐起了一个深窝。不一会大家把图囊来做了枕头，睡下去了。

德甫对于这次出发的动机和目的是很明白的，他睡着把情形告诉了我们。

原来就在那天午后，在总司令部开了一次秘密的军事会

议。我们的突然出发，便是在会议上决定的。因为平江、通城方面的第四军接连地得到了决定的胜利，敌人全线总退却，岳州是不攻而下的。敌人最后的殊死战大约是在汀泗桥、贺胜桥一带。这最后的抵抗如被冲破，武昌城便指日可下。但就在这样情势之下，我们在军事上要和吴佩孚争取武昌，而在政治上是要和新附的第八军争取武昌。湖北的政权不好落在唐生智① 的手里。我们现在所取的路线便是要去抄截唐生智，从弦线上去追踪第四军。因而我们的目的地总是在通城以北，武昌以南。

这样一得到了说明，我才好象见了天日的一样，在这次的出发中顿然感觉了无限的趣味。因为这儿包含着一个赛跑的竞争心，而我们自己是这赛跑的选手。

说了一阵，因为疲倦，又因为草地的软和，不知不觉也就睡熟了。第二天清早由喇叭的声音唤醒起来的时候，睡在地面上的半身衣裳都是湿透了的。草席不用说也和在水里浸过的一样。这个哑谜的解释自然是不用费力的。因为草多的地方，地面太松，由那儿所发的浓重的蒸气，在下半夜退了凉后，通统结成了露水。到这时才明白那本是骑兵将校出身、在革命战役中受过好几次伤的俄顾问，那保定军官学校出身、在第四军做过团长的邓主任，为什么要选择着在坚硬的石板上去

---

① 唐生智(1889—1970)，字孟潇，湖南东安人。原为湖南军阀赵恒惕所部第四师师长。一九二六年三月任湖南省代省长，六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前敌总指挥，率第四、七、八军攻克武汉、南昌。次年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在河南与奉军作战。

睡觉的原故。没有军事经验的人，连睡觉都要迂阔得闹出笑话来。不过还好，从广东出发以来也算经过了一月以上的锻炼，虽然在那夜露里湿睡了一夜，身上却也没有睡出什么毛病。

三

过汨罗江是二十五日的清早。江面并不宽，水也很浅。疑心到屈原何以会在这儿淹死。清早的太阳灿烂地照在江面上，在江岸的浅山中，骑在马上，做出了这样的一首旧诗：

屈子行吟处，今余跨马过；
晨曦映江渚，朝气涤胸科。
揽辔忧天下，投鞭问汨罗：
楚犹有三户，怀石理则那？①

政治部从广东出发仅仅备了两匹马，是邓主任和俄顾问的代步。到了长沙又添购了两匹，于是乎我和纪德甫便也有骑马的份了。我骑的是一匹老白马，是从长沙那一座面坊里买来的。那马老先生异常驯善，循规蹈矩地总不肯走前头，只接在别的马屁股上"夫子步亦步，趋亦趋"。但我那时还没把马骑会，就坐在那样的马上，忧的与其是天下，倒宁是马下。我最怕的是那骑兵顾问和团长主任，他们骑的马既比较优秀，而他们一高兴起来总爱放点小跑。这样的情形便逼着我不能不采取人道主义的方向，我的马多是让给别人骑，或者用去驮行李。但是做起诗来，却不免把自己夸张成为了英雄。

① 此诗后以《过汨罗江感怀》为题，收入《潮汐集·汐集》。

渡过汨罗以后的情形便不大记忆了，每天都是在山里面走，走的都是一些很狭隘的小路。特别在入了湖北境界之后，山多是一些童山。路过的村庄都异常凋敗。天气热，人多，又没有军队式的组织，行动异常缓慢。就那样在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的三天中，每天都在从新编制先遣队，把赶不上的人和沉重的行李都留在后面，尽能跑路的和比较重要的人挑选着往前走。说也奇怪，我的体力，尤其是脚力，在那时候不知怎的，真是特别的旺盛。我多是跑路，但我每天都在打前站，每到一个站口，总是我先到，便去替大家找宿营和中休的地点，有时还要为大家烧菜煮饭。因为从广东带来的火夫们，扛着几口大铁锅和食具，在汨罗车站出发后的头一天，便已经掉队了。

二十八日的下午四点钟，赶到了离崇阳不远的石城矶，跟上了的只有二三十个人了。一方面在加紧赶路，但另一方面却又踌躇了起来。在山里跑了几天，和左右两翼的军队都没有联络；不知道军事上的情形是怎样了。逐渐和前线接近，几时和敌人偶然相遇都不可测度。天色还早，本来还可以赶路，但就因为这样的形势，我们的领导者邓主任便叫我们暂时在石城矶宿营。他和俄顾问两人骑马赶向崇阳去，待有他的命令来时，我们再定行止。

邓主任和俄顾问骑着马去了。在我的幻想里面，他们两位就象是两名勇敢的斥候。

我们便在石城矶宿营。那是小小的一个村落，只有二十来户人家。村子是东西横亘的，南面流着一条清浅的溪水，人

家都面着溪水立在北岸上。我们几个人，德甫、德谟、宣传科的副科长朱代杰① 和我，住在东头的一家铁匠店里。店里有铁砧和废了的炉灶，看那情形是已经好久没有打铁了。但那村子并没有经过兵火，铁业的废止当然是另有原因。问那店主人，他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但我想到在日本势力支配之下的大冶铁厂是相去不远的，这明白是手工业被机械工业破坏了的一个小小角度里的现象。

铁匠店的第二进有一个小小的横长方形的天井，上面一座敞厅，放着些极旧的桌椅，靠壁有一架颓败的神龛。

我的一位很忠实的勤务兵把我的行军床陈在天井的南沿，和店面紧接着。——说起我那位勤务兵，我现在费了好一阵的追忆才把他的名字记起来了，他名叫薛绍三，是福建人，在韶关的时候便开始跟着我，后来还跟着我到过南昌，足足跟过我一年。从长沙出发赶到这石城矶来的途中，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夫役都掉了队，连邓主任的几位护兵也一个都没有跟上，他却是始终跟着我的。我的一架行军床和一口小小的镔铁衣箱，找不着夫役的时候，他就自己替我挑。我赶到了石城矶，还得有行军床睡觉，那是应该感谢他的。

行军床面好了，并且是面在屋顶下面的，这是从长沙出发以来的最舒服的一次。吃了夜饭，把应该办的事情了结了，便把疲倦得就和干鱿鱼一样的身子拉直了起来，很深熟地便睡下去了。

---

① 朱代杰(1902—1966)，四川成都人。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秘书长。

四

——“秘书长！秘书长！”

听着有人在叫，朦胧地从深睡里醒了来。

——“秘书长，邓主任有信来了！”是薛绍三的声音。那声音好象是从远处来的。

周围通是黑暗，薛绍三提着一盏昏花的寡黄的马灯立在我的床头。

我一翻身起来，接过了他递给我的一封信。信封面上是邓主任的笔迹，写着投交给我，还带了一笔是信到后交来人脚资二元。

我把信连忙拆开来，借着昏黄的马灯来看时，大意是邓主任和俄顾问在九点钟的时候到了崇阳，在崇阳得到了前线上的消息：我军已过羊楼司，正在跟着敌人穷追。又说他们两人第二天清早一早由崇阳出发，叫我带着纪翻译和李秘书连夜赶上前去。

信看完了，把手表来看时是一点半钟。我问送信来的人，薛绍三又向外面去引了一个人进来。穿的是长衫，手里打着一个圆纱灯，上面有“崇阳县”的几个扁红字。看那情形大约是崇阳县的差人。我看他的衣裳是湿的，同时在天井中也听见有微微的雨声，才知道是在下夜雨。我叫薛绍三把钱给了

差人，打发他走了。一面又把同宿的几个人叫醒了起来。

把部事交托给代杰，把自己的行李委任给薛绍三，和德甫、德谟两个人动身的时候已经是两点过钟了。德甫带着两百块钱的现洋，让他坐着轿子——是晚上雇定在那儿的——在前面走着做向导。德谟和我都骑着马。我骑的仍然是那匹极驯善的老白马，走在最后。

夜雨微微地下着，夜景是一团墨黑。唯一的光只是前面走着的轿上所挂着的两盏马灯。马是老马，又是半夜里赶出来走路的，睡眠没有睡足，走得很是不耐烦的光景。它只是把头埋着，一面走，一面向地面上哼着鼻孔。你要把马颈提起来却要费很大的力气，好在慢慢地走也可以跟得上轿子，也就听它去埋头吐气去了。

动身的时候，起初有点兴奋，由屋内的空气转换到露天的雨中的空气里来，睡意是被驱走了。走不一会雨也住了。老马的老汉步却是一服大有效用的催眠药，本来还没睡足的、暂时被驱走了的睡眠，不知几时又飞了转来，袭击着坐在马上的骑士。有时脚擦着岩边或树干，发出些悉率的声音，有时头上挂着树枝，冷的水滴洒在脸上，才突然地惊醒过来；但昏蒙蒙地没几分钟又睡熟了。由人推想到马，想那坐下的马怕有时也是熟睡着的。古人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①，我那时的情形可以说是“睡人骑梦马，夜半赴戎机”。但在事实上倒也并没有什么的危险。马是仍然走着路，人是仍然骑在马上

---

① 语见《世说新语·排调》。

的。那时候的情形大约是潜意识在活动，就和梦游患者在梦中可以行动的一样。所以事实上就真的让盲人骑着瞎马，在月黑的深夜骑到很深的池子边上去，我敢保险，是断不会落进池子里的。以为危险，会落进池子的，只是睁着眼睛的人未曾行过实验的幻想。

在夜里走着的情形自然是很模糊的，但就在天明以后的情形我现在也不记忆了。只记得到了崇阳城内时是早晨八点钟。先是到了邓主任信上所写明着的他们所住宿的旅馆。到了那儿时，他们在清早六点钟的时候已经走了。邓主任还留下了一封信，叫我们向着蒲圻跟踪前进。

用了早饭之后，德甫坐来的轿夫大约是念到了前途的危险，无论怎样都不愿意再走了，只好在崇阳城里另外雇了轿夫，在这儿又很费了些时间。我在那时写了一封信寄给广东的成仿吾，把出发长沙以后的情形告诉了他，信后附带了几行日本文是写给我留在广州的夫人的，这几行信却亏她替我保存着了。我现在把它译录在下边。

二十四日离开长沙；今晨八时顷到达此地。我军以破竹之势进逼武昌，今闻已进展到离武昌城仅中国里百五十里之地；大约在三日内便可以攻进武昌。攻进武昌之后便万事都顺利了。

祝你的健康，并祝孩子们的健康。

我是异常的顽健，连自己都出乎意外。

××，二十九日。

五

崇阳城内的市面并没有什么骚扰，城里没有北军的痕迹，也还没有什么革命军的痕迹：因为由通城进攻的第四军直趋羊楼司，没有经过崇阳。我们从长沙动身所采取的路向不用说是走了好些枉路。我们假如先朝羊楼司走，那定然是早把第四军赶上了的。

由崇阳向蒲圻的道路是平坦的大路，此后的进行可以无须乎用向导了。路因夜来的雨很滑，德甫的轿子走得很慢，我们便各自骑着马向前头走去。在途中的一个大站口上，大约就是地图上的"洪上"，把马休息着等待德甫，聚齐了，吃了一顿中饭又走。

天气异常炎热，坐在马上总是想睡。路过着有树阴的青草平地时，特别有一种很难克服的诱惑，总要使你想跨下马去，倒在草茵上，睡他一个酣足。有时竟直在马上便昼寝起来——在马上昼寝，这个情形，在没有经验的人或许会以为是夸张，但其实这是极寻常的事。有些人闹着神经性的失眠症，以晚上不能睡觉为苦，甚且有因此而自杀的。那种人我劝他去从军或者做苦工，把闲着的筋肉充分地劳瘁一下，他会弄到要想不睡都不能够不睡的那种地步。

沿途风物都呈着太平无事的景象，在路上走着的农人和

行商，都象不知道在邻近的县分上有过、并且有着剧烈的战事的光景。因此走了半天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留在记忆里的东西。

走到了天色渐渐向晚的时候，路上的行人渐渐的稀少了；直到后来在昏黄中只剩着德谟和我，和我们所骑着的两匹马。马走了一天半夜自然也是疲倦了，它们却又知道我们是不会骑的，走到一段田陇上的时候竟至立着不动。没有办法只得都下马来牵着马走。在那田畴中走着，周围的浅山由深蓝的颜色逐渐转化成黑影，灰色的暮气连把自已的情趣都灰色化了。突然生出由广东出发后从来不曾起过的一种恐怖的念头——在那些浅山里面万一有从战线上溃逃了下来的北兵藏着，乘着这昏黑向我们一冲下来；再不然会有什么大股的强盗来趁火打劫？……这种无谓的忧虑执拗地来纠缠着。

德谟也是有点神经质的人，大约也是我的忧虑无形地传染了他：素来是少说话的他愈见沉默着，黑着一个面孔，就和那薄暗中的山影一样。

好容易走到了一个村庄，问起路来，据说离蒲圻还有五里路远。我打算走一段黑路，一直赶到蒲圻，在蒲圻或许可以和邓主任们相会。征求德谟的同意，他黑着一个面孔不置可否。但是要走也还须得等待着德甫一道，我们穿过了村庄，在北头上的一个土地庙前休息着。等了将近半个钟头，两个人交替着跑到村的南头上去望，总不见德甫的轿子来。天色已经完全入了夜景，又微微地下起雨来了。路是完全看不见的。到了这时候只好决心到村上去找个宿处。

拉着马又折进村去，扣了好几家的门都没有回应。有些人家里面有湖南兵的声音，在那儿喝酒。那些自然是第八军的兵士，不知道是几时进了村的。我们在外面打门，他们也一样的不理。最后到村南尽头处的一家门上扣门。里面是漆黑的，起初仍然没有人回应。我们在外边叫着说：

——“我们是南军的官长，只求借宿一夜，决不扰害你们，你们放心把门打开。”

几次放大声音在门外恳求，里面最后公然点起了亮来。有人的声息，并且有出来开门的神气。想那里面的主人大约是听明了我们说是官长，又听见我们的声音也还不甚粗暴，证明了我们的确是官长一类的人。或许也怕是我们那两匹马不耐烦地哼着鼻子，蹴着脚的声音替我们作了证明的。大门结局是开了。一位五十来往的男子点着一盏菜油灯应接我们。我们又把来意说了一遍，他很殷勤地把我们招待进去。我们问他系马的地方，他尤其高兴。他说他家里有马房；接着又把两匹马引进他的马房去了。

房主人看见了我们并不粗暴，他愈见安心起来了。他把我们欢迎着，好象有些得意的神气。屋里很热，蚊子又异常的多，我们劝他把大门打开；他在敞厅正中的土面上烧起了柴火来熏蚊子。

我们还没有吃夜饭，他出门去替我们买了几升米来。他自己有些子鸡，便替我们杀了两只，很殷勤地在厨下准备着；又替我们烧了些水来洗脚。

我们坐在大门口等待着德甫，又等了半个钟头的光景，仍

然不见到来。我刚才替自己怀着的忧虑又为他唤醒起来了。他的身上是带着我们的盘费的，那两名轿夫不会图财害命吗？天色已经黑了，轿夫是两名，他是一个人，两个人要结果他，那不是很容易的吗？这比溃兵和强盗的想法更近情理。我对德谟说着，他也是在作同样的想法。

——“假如是那样，我们真是害了他呢，我们不应该把钱让他一个人带着。”我这样说。

——“不过他是有枪的，”德谟说，“那两名轿夫或许不敢动手。”

——“近在身旁的敌人，有枪也是不行的。”

两人正在谈说着的时候，远处有光亮现出，向着村上走来。唯一的希望发生了，希望那就是德甫轿上的马灯。

我们走向村外去迎接，灯光渐渐近了。

——“是纪德甫吗？”我们叫着。

——“是的。”

那含蓄着欢喜的回应所唤起来的自然是同样的欢喜。

六

轿子到了店门口，德甫拿着一枝开了盒的驳壳枪走下了轿来。

看着他拿着枪的情形，我和德谟相向着笑了一下。

——“我们以为你在路上遇了什么事情呢，等了你一点半钟了。”我对着德甫说。

——“两位轿夫走得太慢。他们说蒲圻在开火，死不肯走快。今晚如在这儿赶不上你们，我还要逼着他们赶到蒲圻的。”德甫说。

——“我也本来是想赶到蒲圻的，因为没有马灯。”

——“那么好了，现在有马灯来了，我们赶到蒲圻去。”

——“好的，好的，”好一会沉默着不肯说话的德谟赞成着，“我们吃了饭就动身。”

德甫也是没有用夜饭的，我们便走进店去。两位轿夫吐着很多的怨言，把轿里的行李搬了出来，又走出去了。我叫店主人也替他们预备饭食。

不一会我们开起饭来，店主人另外开了一桌饭出去招呼两位轿夫的时候，那两位胆怯的夫子已经逃得来没有踪影了。

——“糟糕！”纪德甫叫着，“那两位家伙早就是想跑的，他们在路上已经把轿钱通统要去了。”

这样一来，我们要在当夜动身的计划便很难实现了。店主人也殷勤地留着我们，说路烂很难走，叫我们第二天清早一早动身。我们便决定了在他的家中过宿。

那房子是一列三间的建筑，前后有两栋。第一栋接着街面，中间是一个敞厅，前面接着店门，后面接着一个横的长方形的天井，左右是铺面。那主人有三个小儿女睡在右手一间的地阵板①上，藏在乌黑的被条下面，自从我们进了他们的家，都骇得不敢出来。左手的铺面是空着的，店主人叫我们在那儿下榻，说那里面有床，也还有擀面台。

天井的两侧有过道连接着前后两栋，第二栋的正中是堂屋，靠壁陈列着神龛。但奇妙的是在那堂屋的天井边上塑着一个一连有三口锅的长灶头。左右有耳房，右边的耳房便是马房，左边是关着的，想来怕是面房了。

由那房子的结构看来，那家主人在前怕也是一座大家，后来零落了才开始了开面坊而兼带面馆的生意的。堂屋上的灶头一定是后来塑上去的。马房我进去看过，那从前应该是有地板的房间已经成了土面。马是只有我们自己的两匹。据那店主人说，他家中在年内接连出了两次丧事，死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室，他的马就为经营丧葬卖去了。面坊的生意是停了业的。这位主人又算是经受了第二次的零落，他的前途是只有把剩下的房廊卖掉，成为流氓无产者了。

湖北的天气夜里就到九点钟过后都还不能退凉，又加以

① 作者原注：四川方言，即地板。

在敞厅中烧着火熏蚊子，热得来很令人难耐。德谟跑到门外去，在石面的阶沿上睡下了。我和德甫走进左侧的铺面去。那儿前后有两间房间，前面是纯粹的铺面，在柜台背后靠壁陈着一张很宽大的擀面台，德甫和着衣裳便倒在上面睡下了。我自己又走到那后面的一间小房间里去，那儿放着一架大花格床，照那色彩和褪了金箔的一些赭色的雕刻看来，怕是那店主人的母亲或者祖母结婚时的嫁奁。后手一只角上放着一张方桌，桌上放着一座纸扎的灵堂，那当然是店主人的母亲和妻室死时用过的。那在丧事过后是应该烧毁的东西，而店主人还珍重地保存着，足见他真是穷得有点程度，他似乎是想留来在自己的丧事时使用的一样。桌下放着一架铁火盆。房间怕有两三个月没有人住宿过，也没有人打扫过，灰尘真是“山积”着的。

床上只是平坦的木板，上面没有草，也没有草席。我自己决定就在这儿睡下。把纪德甫的雨衣取了来铺在床上，把马灯吹熄，我也就睡下去了。

突然之间醒了转来，我以为是天亮了，但周围是一片墨黑。把火柴擦燃照看手表时，才十一点过钟，睡了还不上两个钟头。自己还在诧异这突然的睡醒时，颈子上异常的作痒，同时全身都象在发烧的一样。房里的空气闷热得难耐，便索性起床把马灯点燃，想到房外去另外找一个地方来睡。

我把面在床上的雨衣揭起来了，奇异的是床板的木面就象在移动的一样。我起初怀疑是我自己的眼睛发花，待我再过细看时，这第二次受的一惊比我疑床板的移动还要厉害。真

正是见所未见的一个奇景——一床板上都是浮动着的臭虫！那臭虫的大众真好象是战场上的千军万马，我是睡在那儿就和闯入了小人国的葛理维①一样，足足被它们攻击了两个钟头。把我从深熟的睡眠中攻醒了的，就是这臭虫大军。这场仇恨不能不报。我穿着胶皮鞋愤恨地踏上床去，便把那千军万马的臭虫阵践踏了起来。我算是打倒了一个臭虫帝国。同时又感觉着自己的身上还有敌人驰骋着，便提着马灯，抱着雨衣，跑出了敞厅来。

敞厅上烧着熏蚊子的柴火还没有灭尽，把火拨活起来，把自己身上穿的军服和衬衫脱下在火上拌抖。抖下的臭虫丝毫也不夸张地是"势如雨下"。它们受着了炮烙之刑，发出了浓烈的异样的奇臭。

身上的臭虫大约也扫荡干净了，时间还早，便在敞厅上的一个杨妃椅上又胡乱地睡下去了。

---

① 葛理维(J. Swift，1667—1745)，通译格列佛。格列佛游小人国的故事，见英国作家斯威夫特长篇幻想小说《格列佛游记》。

七

店主人起得很早。他替我们把早饭弄好，让我们起来吃了之后，也才六点钟的光景。

要准备动身了，到马房去辔马。我那匹老白马睡在地面上很不容易拉起来，两只眼睛角上也流着眼泪，看那情形它实在是疲倦得不能再走路了。没有马夫跟着的马是很大的麻烦，在自己的饮食起居都顾不周到的时候，对于马的饮食起居却不能不加意地照顾。鞍鞯要自己辔，马到疲倦了的时候得自己牵，那马老先生的用处在我已是消灭了的。我便索性又讲了点子马道主义，把马寄放在面房老板那儿。我留了一封信给政治部后来的人，让他们过身时把马收下。在我的想法是，那经营面坊的主人是把自己的马卖掉了的，那匹老白马他或许会藏匿起来不肯交出，但就那样也乐得做了一番顺水人情。老板或许也可以把面坊恢复起来。本来是在面坊里住惯了的老马又落到面坊里，也算得是适材适所。不过那匹马，后来仍然是拉到了武昌，也见得那面坊主人真是忠厚。可惜他的姓名我忘记了，他住的那村落的名称我也不记得。

夜间住了的雨，清早又微微地下过一会。在赴蒲圻的途中，臭虫的悲喜剧还闹了一幕小小的余波。驮着硬洋的纪德甫骑着唯一的一匹青马，我和李德谟在路上跟着走。德甫把

他的雨衣披着，走不一会他叫起来了。他在自己的颈子上抓下了好几个臭虫来。那自然是昨晚的臭虫潜藏在衣缝深处，在火上没有抖落干净的。惹得德甫在路上又把全身的衣裳脱了下来清扫了一遍。我自己的颈子上也有点罗唣，原来是昨晚在床上放过一下的军帽里面，在那皮沿的内部也藏蓄了好些余孽。

走到八点钟的时候快到蒲圻车站了，愈和前线接近，空气便愈觉得紧张。沿途遇着的都是士兵，从他们口中探听得不少的前线上的消息。据他们说来，汀泗桥的战事是昨晚结束了的，现刻怕在咸宁一带开火。总司令部的火车昨夜已经开到了蒲圻。

在离蒲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道小河，渡过河便是往咸宁的捷道，有好多往前线去的兵士都是从那儿渡河的。德谟和德甫主张渡河走去，我是主张到蒲圻车站去把择生的消息探听明白了再定走法。他们不肯听我的话，我同他们也就分了手，约定在咸宁聚齐。

我一个人走到车站上去，总司令部的车的确是停在那儿的。我走到那主脑部的车厢去，刚好走到车门口，遇着白崇禧①从车里走出。他那时是代行着参谋总长的职务的。他看见了我却是先开了口：

---

① 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原籍南京，生于桂林，回族。国民党桂系首领。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一九二七年三月攻占上海，兼任淞沪警备司令，曾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哦，K 先生（他对我照例是这样的称呼），你也赶到了这儿！”

我问他：“择生是不是在车上？”

他说：“择生是昨晚到的，我们的车子是夜里到的，他到车上来开过会。今早一早他又赶到前线上去了。现在怕在咸宁和贺胜桥一带开火，陆续有伤兵送转来。我们的兵站部准备得太不周到，伤兵拿着没办法。我们这火车是要立刻载着伤兵开回岳州的。”他又问我：“是不是要去见总司令？”

我答应他：“我是要赶到前线上去的，去追赶择生。”

——“那吗你最好是乘火车，停不一会有火车要开到咸宁。”

刚好说了几句话，月台有哨子的声音，开回岳州的火车开动起来。我去找着了站长，问明了开往咸宁的车子是第八军的军用车，还要等一两个钟头才能开，因为军火还没有载好。

乘着还有一些时间，我便在车站上巡视了一下，还有好些没有搭上火车的伤兵被留在车站上，有的把手掌打穿了，有的把脚打断了，有的是头上受了伤已经失掉了意识，呻吟的声音异常的凄楚。有很浓厚的硝烟气和石炭酸水气。但是却没见有人吐出怨言，大约也是因为打了胜仗的原故。一切的情形都很杂乱，而在杂乱上是带着了一层欣喜的彩色。

巡视了一会，我又走去找着站长，叫他替我在车上找一个座位。他说他自己不能够作主，把我引去找着了一位第八军的营长。那营长很矮小，立在月台上在督促着装载军装包子，是新制的革命军的军服和军帽；因为新附的湖南兵大多数还

穿着从前的军装。

我对那营长说：我是总政治部里的人，要赶到前线上去，要搭他们的车子。

那营长带着一个很冷淡的态度，把我的身子上下估量了一下，他没有说可，也没有说不可，只是对着站长说："车子怕不够啦，只空着两个车厢了，连我自己怕都是找不着座位的。"

我看他是把我看得很下贱，以为顶高不过是一名准尉司书。那也是难怪的。因为我身上穿的是一套蓝布的军装，自从由长沙出发以后在山里跑了几天，已经肮脏得很有点程度；脚上一双烂草鞋套在一双绿色帆布胶皮鞋上，两脚都已经被泥浆紧了。

我听到他那样的口气，也没有管他，自己跑上最末尾的一个空着的铁皮车里去了。等到军装包子装到这架空车来的时候，我在车上也很卖了一些气力，替他们搬运。包子高齐车顶地装满了半车，算也装完了。那营长和他的属员们最后也上了车来，他对我倒也没有干涉，我自己也就厚起铁脸皮在车底的铁皮上坐下了。

八

其实我是太客气了。在快要开车的时候从月台上涌进了好些人来，大抵是第四军落了伍的夫役。营长的手下人不要他们上车，但也没法禁止。那些夫役多是广东人，高声地反问着：

——“吊那妈，耐牟害①革命军？耐害反革命的北洋军？……”

空着的半个车厢已经挤满了，车子开动了起来，月台上还有好些人没有挤上。

挤上来的人里面有一位是第四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本是广东大学的学生，他把我认出了。他仍然把我叫着“K院长”②。他说他是在平江得了病，送回了长沙，现在病好了，要赶到前线上去。他虽然穿的是同样的蓝布军服，但比较整齐洁净，没有象我身上的那样狼藉。看那情形，他自然是搭着昨晚的总司令部的火车赶来的。他背着一条毛毡和一顶第四军的特征的铜鼓帽。他看我坐在铁皮的车底上，便把自己的毛毡解开来叠着，请我坐，我却不过他的厚意，便拉长起来让他

---

① 作者原注：你不是。

② K是郭的英文韦氏拼写法的字头。作者一九二六年三月至七月参加北伐前，曾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

和我并坐。

我们的坐处是向着铁皮车的东侧的门道的，和那位营长阁下相隔不远。那位阁下大约是看明白了我比司书的地位要高得一点，他在打开烟匣要吸烟的时候，公然敬了我一枝香烟。后来，在九月间，刘佐龙① 在汉口举行军长就职典礼时，我代表着总政治部出席。在行礼毕后的茶点席上我也还看见过这位营长。他的席次和我离开得很远，他公然走到我面前来特别和我打招呼，就好象我们是十年前的旧交一样。可是那营长的尊姓大名我一直没有攀问过，我揣想他现在怕已经升成了军长了吧？

车内和车外的情形都是很杂乱的，但是，是有光辉的杂乱。一切都好象是浮在了战胜的荣光里。铁道两旁和离铁道稍远的路上，都象潮水一样，涌着本军的队伍。

由于夜间和早晨的微雨，空气是很湿润的，一受着向午的太阳的熏蒸，倍感着燠热。战死了的北洋军队没有收尸，狼藉在铁道沿线的两侧；死后仅仅十几个钟头，已经腐化着，发出异样的奇臭。汀泗桥是最有名的激战地，在那儿附近的两侧的湖沼里面浮着无数的死尸，有的仰着，有的伏着，有的侧着。（在战事告了结束之后，听说从那儿水底捞出了不少的枪械。）那儿的尸臭尤其厉害。

过汀泗桥不远，在东侧的一段疏林里面，有三个裸体的绑在树上的死尸，通是跪着的，一个特别肥，身体异常的皙白而

① 刘佐龙（1875—？），原为吴佩孚部师长，守汉阳。一九二六年九月起义后，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三师师长、第十五军军长。

丰满，头是垂着的，嘴上有长长的八字胡须。在当着心窝的地方有一个拇指大的枪眼，从那儿流出的血液在白皙的肚子上画着一条含着润意的黑线。颈背后插得有一道纸扎的箭标，写着“正法旅长一名×××”。人的名字没有看得清楚。余外的两名死尸也没有看得清楚，火车已经跑过了。那三名军官是由吴佩孚正法了的，吴佩孚亲自到汀泗桥来督战，无如战线仍然溃败了。但可佩服的毕竟是大帅，连他自己都要忙着逃命的时候，他却有那样的闲情来明正典刑。

过了那带疏林，在东侧的湖沼的彼岸，看见纪德甫和李德谟两个人牵着那匹青马，夹在队伍中间走着。他们比我先走得两点多钟，但是瞬息之间火车便已经把他们赶过了。这个比赛恰是我们从汨罗跑路赶到蒲圻来的一个缩影，在山路上跑了五天多，别人的火车只跑了五个钟头。

快到咸宁车站时，在一处空地上看见了邓主任和俄顾问骑的马，又看见了邓主任的一位马弁。那是留在长沙总司令部行营里的人，乘着昨晚的火车赶来了的。我高兴得很，以为这一次终竟把择生赶上了。在咸宁下了车，我便向那马弁和马的所在处跑去。

那马弁远远地看见了我，就象迷了路的小儿看见了娘的一样，欢喜得快要流出眼泪的样子。他告诉我，他是在蒲圻车站上碰着邓主任的，早晨跟着赶到了咸宁来。主任到城内第四军军部里去了，叫他带着马在车站上等着，一直等了两三个钟头都不见来。他自己还没有吃早饭，肚子又饿，又没有一个钱。

我把了钱给他，车站上已经有些卖小食的，便叫他去吃。车站外面的壁上四处都是用粉笔写的留白，是某某团部、某某营部，或某某政治部叫所属的人员在某处集合或者前进。我在进口处的壁上找着了一段空隙，便也用粉笔给纪德甫、李德谟两个人题了壁报。叫他们在车站上等着；我自己便去找第四军军部。

咸宁车站和县城是有池水隔着的。池子中间有一条路，拥挤得不堪。另外又有些渡船在补济着交通，那些船怕是临时拉来使用的。我跳上了一只渡船渡进城去，问到了第四军军部。但到了那儿时，那儿的留守部队正待要出发。据说军部的主要人们都已经前进了，邓主任也跟着前进了，出发后已经有两点钟的光景。

就这样，这一次的追赶又扑了空。我本想跟着第四军军部的留守部队前进，但有德谟和德甫没有跟上，又怕他们在车站上死等，不得已又一个人折回车站去。

九

在车站上遇着了德甫和德谟。两个人都走得很疲乏，德谟尤其带着十分怨望的面孔，就象是我叫他们去吃了苦的一样。他们说路是怎样的泥泞，人是怎样的拥挤，空气是怎样的奇臭。特别是还要服伺着一匹马。但这是不能由我负责的；要走那一截路原是出于他们的本意。不过我到了后来，就是在我写着这篇回想录的现在，都觉得有点失悔，失悔我自己没有去涉历过那一段路。在火车中坐着虽是舒服，但是那有名的汀泗桥的战场的情景在我是很模糊的。

咸宁以上还没有通车。前线在贺胜桥作战，战事还没有结束。铁路上敌人所埋下的地雷也还没有扫清。时而有从路线上抬转来的工人，是因为误踏了地雷受了伤的。赶上前线的队伍大都避开了铁路轨道，拣着小路在走。但是沿着铁路轨道走的人也还是不少：因为路平坦好走，而且比小路捷近。德甫和德谟上过走小路的当，我们便决定冒险沿着铁路轨道走去。马是不能骑的，一匹青马也只好交给邓主任的马弁看管着，叫他在咸宁等候后来的部队。

三个人互相隔着五尺远的光景，在铁路沿线上走，起初是很小心的，路轨中间有石子面的部分自然不敢走，就在所走着的土面上只要稍微有些隆起或新异的地方便要停着脚。但是

走过咸宁车站，过了一两道小桥之后，觉得路轨上并没有什么变异，也就渐渐地胆大了起来，放着脚步不断地追赶过在我们前头走着的人。

沿路两旁都有北军遗弃了的物品，刺刀、马刀、军服、军帽、子弹带、手榴弹、下了机关的步枪、人的尸首、马的尸首。那些尸首还没有腐化，象汀泗桥一带那样的奇臭还没有。

在路上赶过了不少的人，在一处山凹处看见了一处地雷爆发过的地方，地上溅的血还是鲜红的，没有凝集。血迹在地面上滴了一截路，又折向小路上去了。又在一处看见铁路上在微微地冒着烟，当心地走上前去看时，看见了一根枕木在燃，不知道是怎样地燃起来了。我便洒了一番尿在那上面，把火浇熄了。

被我们赶过了的人中有两位是我们认识的人，便是李汉俊和詹大悲①。他们和我是在长沙相识的。大悲穿着一件白色汗衣，打着一把洋伞，脚上是一双泥浆了的哔叽鞋，走路的神情很有点狼狈。汉俊比他要好得一些，但颇有点滑稽的风味：他穿的是在长沙买的一件不甚合身的军服，戴着一顶军帽，手里也撑着一把洋伞。两个人的优养惯了的白嫩的脸和

---

① 李汉俊(1890—1927)，原名书诗，湖北潜江人。早年与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共一大。一九二七年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大革命失败后被桂系军阀杀害。 詹大悲(1887—1927)，原名培翰，字质存，湖北蕲春人。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国民党一大、二大。一九二六年随北伐军往武汉，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次年十二月与李汉俊等遭桂系军阀杀害。

手都已经烘成桃红色了。

和他们擦身过的时候，问他们遇着过择生没有，他们说在蒲圻遇着过，以后便一直分了手。看那光景他们也是昨晚由长沙乘着总司令部的火车到达蒲圻，再由蒲圻一直走路赶上来的。

就这样一直赶到向晚的时候，快要到贺胜桥了。在澄清的空气中，隔着山还听见前面有机关枪的声音。我们踊跃了起来，以为这一次总可以赶到最前线了。但到我们赶到了贺胜桥的时候，战事已经结束了。天色黑了下来，有很多的部队在离市街不远的一个村落里宿营，四处都起着营火。我们去问了好几处，问第四军的司令部，有的说是前进了，有的说是扎在贺胜桥的街上，完全得不到要领。

在咸宁的时候，因为城内的饮食店都把食料卖尽了，我是只在街头买过一些豆腐干来当了午饭吃的。德甫和德谟也只在咸宁车站上吃了一些粉条。三个人没吃中饭地跑了一天，肚子都饿得来不能忍耐了。又是星月都没有的黑夜，要赶路也没有办法，只得到一家农家里去歇脚，托那儿的主人替我们准备一些夜饭。

正在吃夜饭的时候，詹大悲和李汉俊两人也赶上来了。不约而同地也落到我们停留着的农家里。他们是带有一位下人，一来便闯进了那农家的内室，把那家人的寝室占领了。那下人回头又拿了一个空菜匣来，把我们弄好了的饭打了一匣去。我到饭用完后走进那寝室里面去看过他们，他们也正在吃饭，菜匣里面带着不少的干粮。我心里感觉着不大愉快：他们既有

那样多的好菜，为甚么看见我们在吃白眼饭的时候不分出一点给我们，要把饭拿到这儿来藏着吃？为着那样小小的事情怀着大大的不平，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觉得真是孩子气，但当时的实感是那样，我无须乎掩饰。

睡的时候，德甫从农场上拉了两把稻草来，铺在门道外边的一个角落里，蜷曲着便睡下去了。门道内的小小的堂屋里，有一架炕床靠着正中的土壁，德谟便在那上面打横了起来。我自己取下了一扇门来，和炕床平行着，放在两个短竹凳上，那便成了我自己的卧榻。疲倦得不堪的人，一睡下去便睡熟了。大约是在熟睡中略略翻了一下身，我和门扇便一同倒在地上，发出了蛮大的响声。我自己被惊醒了，连睡在炕床上的德谟也被惊醒了，他模糊地问了我一声："炸弹？"

我倒下地时，右脚的小趾碰在了方桌的脚棱上，起初麻木着没有感觉着什么，待把两个短竹凳移开，就尽那门扇陈在地面再把身子睡下去时，小趾疼痛了起来；把火柴擦燃来看时，已经起了一个很大的血泡。

一〇

第二天是八月三十一日，又是一清早起来赶路，连早饭也都没有吃。这一天关于沿途的记忆丝毫也没有，大约是因为始终都在铁路沿线上跑，所接触的情景和前一天的没有变化的原故。现在所记得的只是自己担心着怕不能走路的脚，在路上跑着却也没有怎样吃苦。

在傍晚时分跑到了离武昌城仅仅有十五里路远的纸坊。听说第四军的军部是扎在纸坊车站上的，跑到车站上去问，又已经前进了。据留守的人说："怕现刻已经进了武昌。"

听着这样的消息应该是喜欢，但在我自己却把赶路的兴会失掉了。每天在路上跑的目的是希望早一刻跑上最前线去参加实际的作战，但是从汨罗跑到纸坊来，足足跑了一个礼拜，才不外乎是和从前上京求名的"风餐露宿、星夜登程"的举子一样。德谟和德甫两人也和我抱着同样的感觉，我们决定当晚就在纸坊过夜，等明天清早起来再走。

留守处的人叫我们到车站对面的站长住宅里去，说那儿有空着的房间。我们找了两升米，便拿过站长住宅去。那儿有一个花园，花园中一带房廊东头的确有一间空房，陈着三尊大床也都是空着的。房间的东南两面有临着花园的回廊，回廊边上围绕着栏杆。我们到橱里去找着了一个小火炉和沙锅，

拿到回廊上来准备熬点稀饭。同时德甫在园子外又找了些蔬菜来，准备一同煮在那稀饭里面，沙锅的容量颇大，我们尽量地煮着，打算把第二天清早的早粥都一同煮好。跑了一天没有吃饭，肚子饿得异常，闻着稀饭的香气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诱惑。

稀饭让德甫和德谟两人熬着，我一个又到车站上去打听前方的消息。刚走过车站去便下起了倾盆的大雨来，露天中的杂色队伍都涌进车站来躲避，挤得来真是和新开封的火柴匣一样。就这样暂时把我阻止着了。前方的消息是很模糊的，军用电话似乎受了雨的影响，也打不通。我等雨住了又折回住宅去，看见那儿的回廊上已经纵横地睡着了无数的人。走进房里去，看见德甫和德谟两人睡在近门的一尊床上，里面靠壁的一尊上睡着李汉俊和詹大悲，另一尊上陈着他们被雨打湿的行李。地板上也睡着好几个人。原来詹、李两人也同落在这儿，他们在中途雇了轿子坐来，在路上是淋了雨的。

我问到稀饭上来。

德谟睡在床上说："我们弄好了，等你不来，正在吃的时候他们来了。他们也来吃，连轿夫也来吃。他们说他们有米带着，吃了再煮，一锅饭立地便吃干净了，连我们也都只吃得一碗。"

我问："再煮的稀饭在那儿呢？"

没有人回话。

汉俊在床上叫着他们的下人："你煮的稀饭呢？"

——"我们马马虎虎地可以过去，没有煮啦。"睡在地板上

的他们的用人回答着。

——“糟糕！”我一肚子的饥火化成了一腔的怒火，很难遏抑地想痛骂出来。但只客气着又连说了一声“糟糕！”

——“不要紧的，”詹大悲在床上安慰着我，“明天进武昌城去，我请你们吃大餐。”

——“哼，”我冷笑着，“你担心吃铅弹。”

我对于詹大悲，特别地感觉着一种先天的不满意。我在肚子里面骂了他好几声的“臭官僚”，“投机派”。我知道湖北省政府委员会里面，是有他的名字的，他这一两天来赶路的热心不外是去抢官做而已。“哼，哼，”我自己冷笑着，“国民革命！不外是让几位投机的烂绅士做做新官僚罢了！”——心里尽管怀着怒气，但也没有说出口来。

床上已经没有地方可睡了，地板上也被泥浆的脚践踏得没有睡下去的勇气。我索性负着气从房里跑出来，拣着东面的回廊上空着的地方，和着衣裳睡了下去。睡着和自己肚子里的饥饿交战，起初很不容易煎熬，但隔不一会也什么都不在意识里了。

一一

九月一号的清早又由纸坊向着武昌城出发。早饭是不用说的，连可以充口腹的零碎的什么物什都买不到。

在路上走不好一会，看见田畴间的一段高地上有一座庙宇。我们便避开大路向那庙宇走去，想在那儿找点食物。汉俊也跟着了我们来，詹大悲坐着轿子竟自往前头去了。庙宇的名字我不记得了，走到那儿时才是荒废了的一座，连乞丐的影子都没有一个。

汉俊说："还是熬着一下，我们赶进武昌城去开早饭啦。"

他说着又独自从田塍上走回大路去了。

我们仍然在山地上走，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些人家，我们便向那儿走去。

那儿是小小的一个村落，有好些农家的儿童们站在村外看铁路沿线上过兵，他们非常高兴。他们看见了我们走近身去也毫不畏惧，有的反向着我们走来，问我们要空弹壳。

走进村里去，走向一家起着炊烟的门首，说明了我们要买点食物吃，那家的主人非常的欢迎，请我们进门去。通过小小的厅堂，在厅堂后面的厨房里一张靠壁的方桌上坐下。方桌正对着一道后门。门外是一片敞场。厨房的另一边是一个长灶头，正在煮着豆浆。原来那家人家是做豆腐生意的。据说

平时是送进武昌城里去卖，自战事发生以来已经有好几天没做生意，今天因为“南军”胜利了，他们又才开起火来，准备午饭时挑进武昌城去。

村上的人，看见我们到了，便有好些人围集了来，探听军事上的消息。我们根据着数日来的长驱直入，满相信着先头部队是已经进了武昌。村上的人的相信比我们还要坚决。他们说，昨天下午三点钟吴佩孚、陈嘉谟① 坐着的火车跑过。接着便是崩溃下来的北兵，接着便是追赶上来的南军，和吴佩孚的火车相隔得只有两三个钟头。以后便一直连夜连晚都在过兵，过到了现在还没有过完。村里人就象自己打了胜仗的一样，非常高兴。他们都称我们是“南军”，有的还在“南军”上加上“我们”两个字。他们说：“我们南军怕有好几百万人马啦。”

主人把煮熟了的豆浆和现成的饭、现成的豆腐干来犒享我们。我们一面吃着，一面和他们谈笑。说也奇怪，我们也并没有向他们宣传，事前也不会有人向他们宣传过，他们总口口声声地说：“南军是搭救我们老百姓的，南军胜利了，我们老百姓就有出路了。”受着老百姓这样期待的“南军”自然会打胜仗；但是打了胜仗后的老百姓的出路呢？

突然在后门的敞场上有喧哗的声音起来：“把他捉着！……把他狗娘的打死！……把他吊起来！……”大家涌到后门外去看时，一群村上的人在敞场边上一排杨柳树列下围集着，又在嚷，又在打。我们也走上前去看时，原来他们是

---

① 陈嘉谟（1881—1952），直隶（今河北）任邱人。一九二六年奉吴佩孚命督理湖北军务。北伐军进攻湖北时，仓皇抵抗，退守武昌，城破被俘。

捉着了一位改了装的北兵。

那北兵被众人揪打着，口口声声地说："咱不是北兵，咱是南边人。"但他一口的北方音怎么也不能改变。

——"你这北方拐子！你还在扯谎！你这狗娘养的！——你昨天清早偷了我的鸡。——你这身上的衣裳是偷来的。——打！把他打死！……"

有用拳头的，有用脚蹴的，把那北兵的鼻血打出来了，哀号了起来。

我们把下手的人制止着了，叫大家把那北兵解开。我们对大家说，那位北兵也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他也是被逼得没有出路才来当兵的。他从前就做了些不好的事情，也不是他一个人不好，是他们的官长不好。又对他们说，南军里面也有北边人，北军里面也有南边人，并不是南边人就好，北边人就不好。德甫是山东人，在这儿他自然提出了一个现身说法的实证。

大家都了解了我们的意思，把敌忾和缓了下来。那位北兵欢喜得流着眼泪，一翻身便向我们磕了几个响头。他回答着我们的诘问，说他是河南人，他是参加过南口战事的，从河南调到南口，又从南口调到湖北，他们的军队有两个月没有发饷。

——"你现在要往那儿去？"我问他。

——"咱要回家乡去啦，副爷。"

——"你可有路费吗？"

——"连一个铜板也没啦，副爷。"

我们把了几块钱现洋给他，他接到手里便扑东一声又在地下磕起响头来，向着我们三个人每人磕了一个头。

——“三位青天大老爷，三位救命的活菩萨！咱要赌咒，咱一辈子不再当兵了。”

那人起来向着大家打拱；很狼狈地走了。有的人在他的背后叫着：“老乡，你回去传传名啦，看我们南军的官长是怎样有良心。”

那人把头点着，没有掉过身来。

把剩下的饭吃着，豆腐店的主人对我们说：

——“南军的官长，你老不要着急，队伍是一定进了城的。你老吃完了饭可以不要再走路了。你老打从铁轨路线上去，走不好远便有一道桥，桥下是有船的。你老可以赶船到武昌，可以赶到文昌门进城，比走路来得快，也来得舒服。”

我们听着他的话，着实很愉快，并也决定照着他的指示，赶船。心里还暗暗地在耽心，怕所说的船通被北军拉走了。

把饭吃完了，充分地付了一些饭钱，辞别了店主人出门。他们还把我们送出了村口，远远地向我们指示着那赶船的地方。

精神百倍地走回到铁道路线，杂在一些队伍里面走了不远，果然有一道桥，但是桥下是连船的影子也没有的。我们还以为船是一定被北军拉走了，说不定也怕是被自己的军队拉走了，不得已只好还是走路。

一二

愈朝前走，路线上的本军队伍愈见稠密，走到后来队伍是停止着进行的。我们便一直向前超越过去。在八点过钟的时候，走到了停止着的队伍的最前头。在铁路的正中看见了邓主任和铁罗尼顾问，和另一位背立着的人在那儿在讨论着什么。他们也看见了我们。择生把左手的拳头高举起来，满高兴地向我叫着：

——“呵，你们到了！”

背立着的那个人掉过了头来。是一位中等身材、古铜色面孔的人，面孔的印象是平面的。口里含着一支大雪茄。

铁罗尼照例把两手来握着了我的两手，连连地叫着“Genossen K, Genossen K”①，他那黑色的高加索人的一双眼睛充满着光辉和喜悦。

择生把另一个人为我介绍了，那便是第四军的第一师师长陈铭枢②。我是第一次和他见面的。

——“还没有进城吗？”我问着。

---

① 德语，郭同志。

② 陈铭枢（1889—1965），字真如，广东合浦（今属广西浦北）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一师师长、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与李济深等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反蒋抗日。

——“敌人跑得太快,”陈铭枢说,“我们赶迟了一刻。”

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们是走到了最前线, 一方面高兴着我们还可以参加最后的一战, 一方面笑着向德甫和德谟说:“我们幸好没有赶船, 如果真的由文昌门进了城, 现在是成了俘虏啦。”

周围的风物渐渐映到了稍有余暇的心境里来。空气是异常清澄的,近处的树木戴着青翠而新鲜的叶冠,有的还在点滴着夜来的宿雨。

稍后几步,有一位肥胖而白皙的人, 嘴上有八字胡须, 头上戴着尖顶的京帽,穿着长衫和坎肩,坐在路轨上面。择生把他颐指了一下, 对我说:“那是咸宁县的伪知事。”在那人的旁边还有几位穿长衫的人,想来也是由咸宁带来的。

我注意着看那知事,看他的样子很镇静,但他操在膝前的一双手却掩不着他内心的恐怖, 不住地在发抖。旁边穿长衫的人有一位象是他的跟随人,问他冷不冷,他只把头摇着。

我问择生:“把他带到前线上来是什么意思?”

择生带着一种恶作剧的微笑说:“我们是要骇他一下的。他昨天清早还在替吴大帅办差, 那晓得今天清早便落得了这样的下场。”

择生们还没有吃早饭,不一会有人担了一桶饭来,他们便踞在铁轨路线上吃。附近的农民围集了好些人到我们周围来,他们也异常高兴。有些人特别送来了饭菜。

——“把一枝枪给我们吧,” 其中有一位很勇敢地向着我说,“我们也要跟着你们去打仗啦。”

——“打仗不是好玩的，要经过训练才行。”我对他说着，“我们的战火还很长，将来要打到北京去。把武昌打下了的时候会招兵，你来应募好啦。”

正在这样说着的时候，在那澄清的空气中突然轰的响出了一声大炮。围集在我们周围的农民就象一群鸟雀一样惊散了。

——“哦，开火了！”在后边的队伍中不期然地有好些人叫着。

我特别把那位咸宁县的知事看了一下，看他的脸色骇得碧青，嘴唇变成了紫色，牙关连连地在发战。

作战的计划早已是定了的，第三师长的张发奎①已经先到洪山去了，由洪山的高处炮击宾阳门一带。停留在铁路沿线上的队伍进攻中和门和保安门。陈铭枢的队伍摆在南湖一带作两方的策应。目的是希望敌人出城来应战。

敌人的大炮接着又响了几炮，是正对着铁路沿线上打来的。炮弹来得很高，在我们的头上拉着风远远飞到后边去了。洪山方面也有炮声，似乎我们的炮队也在应战。在铁路沿线上的左翼军采取了散兵线要开始进攻了。陈铭枢带着了一部分队伍从田塍上向南湖走去。咸宁县知事是一同带了去的，那人不知是遭了释放，还是遭了枪毙。

敌炮的间隔愈来愈密促，中间夹着步枪的射击声。择生听着那枪声，他很高兴地说着：“吓，敌人开城应战了！”

---

① 张发奎（1896—1980），字向华，广东始兴人。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军长，后兼第十一军军长。

俄顾问尤其高兴，他的含着笑意的眼睛望着我，照例又用着德国话说："Genossen K, wir wollen in Wuchan Mittag-sessen geben!"①

前进的军号吹起来了，队伍逐次前进。我们是沿着大路走的，铁罗尼走在最前头，其次是择生，其次是我，其次是德甫和德谟。敌人的炮接二连三地从我们头上的空中响过，我每听见一次炮声，心里总要冷一下，头是不知不觉地总要低一下的。但我看到前头的铁罗尼和邓择生时，却不免又惭愧起来。那矮小的铁罗尼，他是骑兵将校，革命战役时右边的膝头上受过伤，因此在固有的骑兵式的步法上更添着一层颠簸的意思，愈见象一只水鸭，但他的头部却丝毫也没有动颤。曾做过团长的邓主任也照常把颈子昂在右边，把胸脯挺着直党党地在走。我自己便也尽力地镇静着，想不让我的颈子动，但到了炮声一响，颈部的筋肉就象是成了不随意筋的一样，又一齐都收缩了起来。自己太不好意思，回头去看看德甫和德谟两人，他们也和我一样在把颈子缩动。我自己暗地叹息着："没有实战的经验究竟是不行的。"

---

① 作者原注：K 同志，我们要进武昌城开午餐会啦！

一三

起初每人相隔得五尺远的光景鱼贯进行着，敌弹来得愈见密接了，铁罗尼和邓主任教我们走下路边去向田塍上散开来。他们说路线来得高，五个穿着官长服的人进行着是容易成为敌人的目标的。我们服从了他们的指挥向左侧的路旁走下去。一离开了路线，斜坡上被昨夜的暴雨打湿了的土是很疏松而泥泞的，异常难走。

走下了坡时看见了詹大悲，他是逼紧着坡脚走的，身上白色的汗衣和小衣已经有好几处被泥染污了，他似乎跌过好几跤。看见了他那样狼狈的情形不免又生出了一番奚落他的心事，我向他嘲笑着说：

——“詹大老，你很有军事上的经验啦。”

——“怎见得？”他问我。

——“你懂得借路塍来抵挡大炮。”

没有等待他有回答的余裕，又是轰的一声飞过，詹大老把杖着的洋伞举起来在头上挡了一下。

下边的田地里是采取着散兵线进行着的我们的军队。人人都带着一个严肃的面孔，进行很迟钝，一些下级的军官叫破嗓子地在督促着。看那情形的确是可怜的一幅图画，要说是和驱着羔羊上屠场一样，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前面并没看见

敌人，但听见有枪声，有些枪声来得也很近。蓦地有冲锋的军号吹奏起来，下级的连、排长高撑起指挥刀呐喊着冲锋，向前面突贯，军队跟着突贯，我们也跟着突贯。

一面喊着，跑着，跑到前面没有遮拦的地方，看见了武昌的城郭了。那连接着的通湘门和中和门上的城楼在惨淡的白光中缥渺着，却没看见一个敌人的影子。在前头领导着的军官不期然地把步武停止着了，士兵们也把步武停止着了。敌人从城墙头上不断地把大炮轰来，但那些炮手们似乎很少经验，也怕是由于接连的大败已经是惊惶失措，一炮二炮地都打从头上飞过，落得很远的后方去了。炮到不能打准，渐渐失掉了它的威严；我自己的头公然也不再为它低下去了。我感觉着一种嘲笑的趣味，觉得敌人是在放花炮。尖锐的步枪声，拍拍拍拍地连响着的机关枪声，也就好象是一些鞭炮。

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次的冲锋真是有点奇异。不知道是什么原故，那些军事上的指挥官在开始冲锋之前竟没有派遣斥候去探伺敌情，只听着枪炮声便往前冲，结果是向着空气冲了一阵。这儿自然有一个心理上的遗算。大家以为敌人一定会要背城借一地出城迎战，但那知敌人是骇怕了的，冲锋的结果，只是明白了城里的敌人是想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

不知道是从那儿传来的消息，又说敌人是由保安门出了城，有一部分队伍又冲向保安门，我们也跟着冲去。

保安门外是有市街掩护着的，街坊上很热闹，卖饮食的店子早已经在开门做生意了。两侧布满着的我们的军队，都停止着没有作战。看那情形知道保安门的敌人也还是没有开

门。我们三个人便一直沿着街侧往前进，有些下级的军官注意我们，叫我们留心着流弹。城上的敌人时时在对着街路上射击，街上的居民和本军不断地有遭受流弹的人。愈朝城边走，街面愈见惨淡，铺口都是掩闭着的。我们一直走到看见了城门口的地方，看见了那严闭着的城门。这一闭关真是有点令人失望，同时也有点令人愤恨。一座封建时代的古城，两扇木制而蒙着铁皮的城门，就和中国的封建余孽一样，到了二十世纪的今天还在发挥着它们的威力。我想到那样的古城，就拿大炮来轰也一定是可以轰破的，但可怜的是在本军的队伍中竟连那样的大炮也没有。有几尊新捕获的野炮已经运到洪山去了。后来才知道那架在洪山上的大炮想要打进武昌城都没有打到。

从城门边上又退转去，在街面的右侧找着了左翼军的司令部，我们走了进去。在里面的一间客厅里看见了铁罗尼和邓择生。他们在一座炕床上对坐着，詹大悲也坐在择生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在和他商量着什么事情。有好些穿长衫的街坊上的绅士们很匆忙地进出着。

“Genossen K, neharasho! Wir können nicht in Wuchan Mittagsessen geben.”①很有点幽默味的铁罗尼假装着一个失望的样子对我说。

“Vielleicht können wir eine Abendgesellschaft geben.”② 我也用我的“不落肯”的德语来和他应答。

---

① 作者原注：K 同志，不好啦！我们不能够在武昌城内开午餐会啦。

② 作者原注：或者我们可以开一次夜会的。

客厅正中的方桌上堆着无数的肉心馒头，我和德甫、德谟三人不期然地都同时伸出手去拿了来吃，自从离开长沙以后，整整一个礼拜，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吃食。

敌人既采取坚壁的办法，白天的战事是没有进展的可能的。大家所期待着的是敌人或许会于夜间出来袭击。择生和俄顾问都要参预军事计划，政治部的事情照例又全盘托付了给我。计算起来比我稍缓一步的由石城矶来的部员们在日内或者会到，政治部不能不找一个临时办公处来集中这一部分人。万一在日内或者夜间攻进了武昌，各种标语和布告丝毫也没有携带，是应该临时写作的。还有附属于各军的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也应该召集起来，讨论一下在城外四乡及入城以后的工作的步骤和范围。政治部的临时办公处决定设在了南湖的文科大学（后来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我和德谟两人便和他们分了手。纪德甫是要跟随着俄顾问作翻译的，自然也就不能和我们再在一道了。

敌人从城墙上时常有枪炮射出，我们退到着弹距离以外迂回着向南湖走去。途中经过一些农家，他们于惊惶之中都带着亲睦的气象，对于我们表示出满腔的欢迎和信赖。他们并没有逃避的情形，有些农家在屋子里的土面上挖了些坑陷来躲避子弹，让孩子们踞在那儿。

一四

在文科大学遇见了李汉俊和几位湖北党部的人，还有在暑假中留在学校里的几位学生，其中有两位是我们四川人，我已经把他们的姓名忘记了。多蒙他们的帮助，在学校后部的一段楼房里，找了几间房间来做办公处。学校的中枢部和楼下的全部已经被军部驻扎着了。

那天又忙了一下午，不外是写标语，做传单，同时利用着大学的学生们向四乡去宣传。

一直到了晚上，我们所期待的朱代杰所带领的一批人还未见到来，反是在长沙留守着的一大部队人和党红会①的一些女同志（是由广东附随着政治部出发的）赶着火车先到了。正在为安置他们忙乱着的时候，择生派了人来把我和德谟找去。

我们被引到了一座小巧的洋房里，那不知道是铁道局的附属物，还是外国宣教师的住家，暂时在做着军司令部。在一间精巧的客厅中，很杂乱地呈现出一些军事上的主要人和俄国顾问，邓择生和铁罗尼都在那儿。兴高彩烈地有好几种声音，好几种言语，在作着军事上的杂谈。淡巴菰②的烟子和气

① 北伐战争中为战地服务的国民党红十字会。

② 英语 tobacco 的音译，即烟草。

味是很浓烈的。

择生看见了我们，他第一声问我们的便是吃了饭没有。由他这一问，才想到午前在保安门外吃了几个肉心馒头之外，还不曾和饭见面。他吩咐了那儿的护兵替我们送了两份来，我们坐在一个角上和大家的谈话不相干地吃着。说也奇怪，在有好些重要的事情都已经忘记了的我，却把那晚吃的菜记得很清楚；我记得是吃的清炖鸡，火候很适宜，味道也很合口。

择生在众人的谈话中是最热心的一个，因为他在前本是军事上的人，第四军的主脑部都是他的旧友。他能讲德国话，能够直接用德国话来应对俄顾问的一部分谈话，或者替他们翻译。在谈笑之中也时而有军事上的报告送来。有一次是第一军的刘峙①师长派人送来的报告，说他的队伍开到了沙湖，他本人是驻扎在铁路工程处。但那报告没有遵守军事上的格式，也没有记明时刻。会集在那儿的军官们便拿来做了讥评的中心，择生讥评的特别露骨。

——“连军事上的ABC都不懂，也在做师长。”

第一军从广东出发时是派了两师人参加的，在未到长沙以前部下的队伍已经逃走了不少，一直没有上过火线。在长沙时其中有一团人成立党部②，我代表着总政治部去出席，那

---

① 刘峙(1892—1971)，字经扶，江西吉安人。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军长，参加武昌、南昌、杭州战役。

② 作者原注：这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孙良臣，是蒋的直属部队。

一团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在长沙新补充的队伍，有好些还穿着长衫。但到北伐军已经兵临武昌城下了，那刘师长却也神速，用火车载着了自己的兵赶到了武昌城下。

——"名将的用兵是'始如处女，后如脱兔'①的。"说这话的是那颇以儒将自命的陈铭枢。

择生又来问了我们一些工作上的情形，我把下半天所做了的一些事情告诉了他。向他说留在长沙的大部分队伍乘火车到了，反是代杰所带领着的一部分先遣队和胡公冕②所带领着的一部分的宣传大队还没有到。

——"他们大约在路上没有赶上火车。还是我们几位的脚跑得快些啦。"择生又很得意地说着，但他却没注意到他的话是有点夸张：因为他忘记了他自己的脚是踏在马镫上的。

他又简单地告诉了我们一些军事上的情形，在那一下半天没有什么进展，只是汉口的刘佐龙派了代表来输诚，交涉还没有办妥。吴佩孚在昨晚崩溃了下来便渡过了江去，大约连夜逃向河南去了。我们这一方面有第八军派了一部分队伍由白沙洲绕道渡江，已经取得了汉阳，早迟要向武胜关进军，以截阻北洋军队的来援。城里的敌人没有什么动静，想来是要

---

① 语出《孙子·九地》："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② 胡公冕（1888—1979），浙江永嘉人。曾参加辛亥革命。一九二一年加入共产党。北伐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长、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等职。一九三〇年组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任军长。

死守着以等待吴佩孚的来援。但当晚自然要提防他们的夜袭，那倒是很值得欢迎的事。

——"他们要出城来夜袭，那是他们自己掘自己的墓坑。"择生用着他爱用的表现法来这样说。

待我们把饭吃完了之后，聚集着的军事上的要人们大都分头去就自己的部署去了。择生和铁罗尼是要留在司令部里的，我便和德谟又回到文科大学。

一五

那一天晚上敌人没有动静，第二天上午也没有动静，军事上的人们有些焦躁起来了。攻城的大炮没有，飞机也没有。(有由俄国朋友驾驶的小飞机还没有到，但也不是军事用机。)对着一座封建时代的古城简直没有办法。

军事上的人们在中午时分开了一次会，决定组织敢死队，在当晚乘着夜阴去爬城。本来是没有工兵队的革命军，政治部在这时候又成了临时的工兵队。好在这时候代杰所领率的一批先遣队和胡公冕所领率的宣传大队都已经到齐了。政治部派了许多人到四乡去征发梯子和麻绳。梯子是两块钱一架，由政治部发出征发券。被征发了的人家可以凭券到政治部来领钱。

征发队一派遣了出去，络续便有好些梯子征发回来，有些是崭新的，有些旧得来怕已经有百年以上的高寿。凡是旧的梯子大概都很短，大约是用久被折断、被锯短了的原故。爬城的地点是选定在宾阳门的东北角上一段小丘上，那儿的城墙比较低，只有一丈五六尺高的光景。长的梯子连着两架，短的连着三架，是可以搭上的。梯子被堆积在南操场上，部里留下的工作人员和勤务兵，便一同在那儿绑扎起来。由我自己的手也绑扎了三四架。绑扎好了，又抬到学校门外去。

在夜半的时候，由各军所挑选出来的敢死队到南操场来齐集。分成了十人一小队，每小队一乘梯子。梯子有四十架，就由四百名的敢死队扛荷起去。

择生是要跟着去督队的，铁罗尼顾问和纪德甫也要同去。我自告奋勇也要求去，择生不允许。他说我也走了，部里没有人主持，主要的工作还是在明天进了城之后。竟连宣传大队长的胡公冕，在东江之役①本是有阵地经验的人，他都不肯让他去，只挑选了十名的宣传员带着一道去了。

由南操场送着敢死队出校门，已经是两点过钟了，看着他们荷着长梯，向黑暗中消逝。天上仍然没有星月，灯火不用说是不能点的。看着这样的光景，不由得不把《易水歌》②在脑里的银幕上浮现出来，不断地起着寒栗。

在敢死队出发后，一方面作着第二天清早进城的准备，一方面静候着前线上的消息，但是消息是很沉寂的，只在天色向明的时候，稀疏地听见了一些枪炮的响声。爬城的计划显然是失败了。在五点钟的时候我叫胡公冕到总司令部去探听消息 结果是不出所料。因为敢死队走到城近处时天已经发白，敌人已经有了准备了。

在前线上虽然没有直接的交绥，但仍然有中了流弹的士兵被送转来，总司令部的卫生处是组织得最不完善的，有多少

---

① 指广东革命政府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十月两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歼灭广东东江军阀部队之战役。

② 据《战国策》，荆轲往刺秦王，燕太子丹在易水边为其饯行，轲作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世称《易水歌》。

伤兵便一直送到了政治部。政治部的卫生股只有一位股长和两位股员，仍然不济事，好在党红会的一些女同志是附属在政治部的，她们也很踊跃地帮着做救护的工作。

但是到了九点钟，邓主任和俄顾问都还不见回来，同他们一道去的十位宣传员也都没有一个影子。我便决心和宣传大队长胡公冕同到前线上去视察，同时也带了一位宣传员同路。那便是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①，是一位很敏活的短小精悍的少年，在那时在做着小队长。

从文科大学向北走去，不远更折向东首时，途中有一段路在小春地里和通湘门以东的城墙平行着，全无掩蔽。城楼和城墙很鲜明地现在左侧，城上的敌兵都隐约地可以看出。路旁有些短梯子抛撇着，自然是昨晚的绑扎不牢，在途中解脱了的。宾阳门一带的附郭居民，为避免前线上的炮火，负荷着家财向乡下逃难。男男女女在田塍上络绎不绝。

走到洪山的宝通寺近处，路上有鲜红的还未凝结的血，过路的士兵对我们说：刚才有一位兄弟在这儿中了流弹。

宝通寺是卫生处驻扎着的，成了临时的野外病院，门前呈着很杂乱的情形。但我们没有工夫进去，又往前走。

走到了关帝庙，那儿是前敌司令部的驻扎处。从那庙门

---

①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一九二四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二六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次年三月，在上海领导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八月，与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　周恩寿（1900—1926），字同宇，黄埔军校四期生。

走过时，陈铭枢含着一枝雪茄刚好从左侧的大门中走出。我那时候很佩服他，觉得他很沉勇，就象是关圣帝君显了神的一样。连那在他的后面跟着的两名护兵，也就象是周仓和关平。

我问我们的关圣帝君："择生是不是也在里面？"

关圣帝君曰："不在，怕还在前面的长春观里面。"

他也是要往前线去的，我们便跟着他一同走出了关帝庙的东辕门。

从那儿走出了之后，左侧是一两家人家的背后，右侧是一段空地。空地尽处，左侧的人家也尽了，接着在道路的右侧又有一排和城墙正对着的人家。那些人家的门户都是掩闭着的，同时怕已经都是逃空了的。前面的道路上有晌午的阳光照着，城墙上明显地可以看出的敌人，不断地向那阳光中放射出啾啾啾的枪声，把那儿的光景渲染得异常惨白。但无论你怎么用力地凝视，那些神秘的子弹你是看不出来的。我们的关圣帝君长叹起来了。

——"顿兵于坚城之下，如何是好呵？"他站在路口上，用着唱京戏的口白这样说，同时又回向着他的两员站将，提着驳壳枪的周仓与关平。

——"你们到这屋后去看看，看有没有背道好走。"

两员护将去探寻了一会，转来报告的是："没路好走。"于是我们的关圣帝君把头摇了几下，又走回关帝庙去了。

一六

我们和关圣帝君分了手，向那惨白没有掩蔽的道路上走去。三个人，我走在最前面，周恩寿走在中间，胡公冕走在最后，每人相隔五六尺远。开始走出四五十步的时候是心惊胆战的，保不定究竟是在那一步上便要和那些啾啾地叫着的神秘的东西相遇。但到走过了那四五十步，觉得退转去也还是一样了，愈朝前走便愈见冷静了起来，是由死心塌地中生出来的冷静。奇妙的是想起了老子的两句话，所谓“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①，颇感觉着一种轻淡的幽默趣味。

就那样恍兮忽兮地走着，眼前用红墙围着的长春观真好象就是长春的天堂。

在那天堂的门首遇着了独立团的团长叶挺②。他也带着了两名护兵由那儿出来。

——“喂，赵子龙，怎样？”我这样简单地向他打招呼。我们当时在对外宣传上是称他为赵子龙，他自己也很得意，但他却不曾知道奉上这个徽号的便是我。

---

① 话见《老子》第二十一章。

② 叶挺(1896—1946)，字希夷，广东归善(今惠阳)人。一九二二年任孙中山警卫团营长。一九二四年秋赴苏联学习，旋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任北伐先遣队，在湖北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中击溃吴佩孚主力。一九二七年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他只是把头摇着。

——“择生是在里面吗?”

——“我也在找他啦,里面连一个鬼影子也没有。”

——“他该不是战死了吗?”

——“不会的,我们今天清早一同踞在这儿,隔着墙和城墙上的敌人对打。他叫我去找陈师长,我找了半天才找到,转来便没看见了他。他是和铁罗尼一道的。”

——“陈师长我们在关帝庙的门口碰着,一同走了一段路,他又退转去了。”

——“糟糕!”神经质的赵子龙愤慨着,失了眠的充着血的眼睛放着异样的光,嘴唇在战颤。

我们又各人离开来,先先后后地退转去,叶挺折进关帝庙去了。

由关帝庙的西辕门退出来的我们,走不好远,在路的左侧一座花园的柴门口遇着了邓择生和铁罗尼。他们两人坐在那门槛上,纪德甫和择生的两名护兵立在他的面前,都带着一个很疲倦的面孔。铁罗尼的眼膛分外的黑,眼仁充着血,向着我微笑。择生却很不高兴地问着我们:

——“你们来干么?”

——“来看看前线上的情形,同时来找你们的,怕你们阵亡了啦。”我回答他。

择生苦笑着。

公冕问那十名宣传员的去向,择生说:“那几位小家伙骇倒了,在关帝庙前面的一家人家里躲着不敢出来。死是不会

死的，你不要担心他们。他们到了晚上会爬出来的。”他又回过来问着我：“你们走到了前面的那儿？”

——“到了长春观，遇着了叶挺。他进关帝庙去了。”

他硬着颈子偏着头点了几下，扁着的嘴边微微泛着矜持的微笑。

——“今天是不会再有战事的，我们回去睡觉去吧。”择生这样说着站了起来，又用德文来向着铁罗尼说了一遍，铁罗尼也站了起来。

大家默默地走着归路。走过了洪山，在一个小小的庄落上遇着上前线来的总司令部的一群人。其中有总司令的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加伦① 将军，勇名啧啧的张发奎——那时候我们是称他为张飞。但这位近代张飞的身子很矮小，脸也很尖削，头上一顶软军帽，俄国式地朝天戴着，身上穿一套洗淡了的青色布军服，裤脚敞着，脚上穿一双绿色的胶皮鞋。这么一个貌不惊人的样子，在不认识他的人看来，一定会把他当成勤务兵。

两来的人一接头，两种国语的会话各自分开来了，各各报告着前线上的情形。立着谈了一刻，择生和铁罗尼又随着总司令部的一团人折向前线去。他们要到前敌司令部去开临时军事会议。我和公冕们便同他们分了手。

---

① 加仑，本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В. К. Блюхер，1889—1938），曾任苏联远东军总司令。一九二四年十月来华担任广东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一九二七年八月回国，曾被授予苏联元帅称号。一九三八年因肃反扩大化罹难。

一七

时候已经过了正午，因为口渴，我们便走到一处人家去求一点茶水。那家人家的前面是一列三间的新修的房子，左手的挂角上有一带耳房，后面还有一排老房子，看那情形大约是中等地主而兼带着自行耕种的农家。我们向那左手的耳房边走去，因为那儿的后面在起着炊烟，表示着是厨房的所在。

耳房里坐着好些女眷，又纵横地放着好些包袱，自然是城墙附近的居民到这儿来避难的。我们说明了来意。厨房里出来了一位中年的农妇替我们捧了一壶茶来，并且请我们往外面最右侧的一间厅堂中去休息。那家里的男主人也出来了，是一位很朴素的中年人，很客气地来陪我们坐了一下。他问明了我们还没有吃中饭，又留着我们吃饭，叫他的女人替我们杀一只鸡。

在饭没有送出之前先送了一壶酒来，有两盘花生和豆腐干做下酒菜。公冕是不喝酒的，恩寿也推说不喝（大约也是因为大队长在面前有点忌惮）。我一个人便自斟自饮起来。酒是黄色而带甜味的，和我们四川乡下酿的荫酒相同。那种酒的酒母是糯米制的甜酒，有时掺些烧酒在里面，又泡些香橼皮和佛手柑片以取香味。那主人所拿出来的酒也有香橼一类的香味，大约泡制的方法是完全一样。这种酒在成分上是一种混

成酒，喝时很可口，喝后却很醉人。

我不客气地把起初送来的一壶酒喝干净了，主人把饭送了来，鸡是红烧的，另外还炒了一盘鸡杂，他看我很能喝酒，便把壶拿了去，又替我换了一壶来。我已经有几分醺醺的醉意，推诿着不再喝了。

——“你老不要客气，”主人说，“你老是军人，军人是能够喝酒的。”

——“他不是军人呢，”公冕对他说，“他本来是大学堂的先生。”

——“哦，怪不得总有几分斯文气象啦，”他说，“这酒是不醉人的，你老，不要紧，你老再喝一壶吧。”

说着便提起壶来替我斟酒，还说了一些菜不好的话，便退下去了。我索性又自斟自饮起来，把第二壶也喝得干干净净，足足怕喝了两斤荫酒，醉意可有七八分的光景。

把饭吃完了，公冕和我把钱包倾倒了出来，凑集了三块钱，把来交给房主人。他推着不受，他说：“你老在替我们老百姓出死力，这点我们是应该孝敬的。”——在这些地方足见得当时的农民对于革命的信赖和欢迎。当时的革命军比较上还有点纪律，而还没有掌握着政权的所谓革命党人在标语上、传单上、乃至宣传员们的口头演说上，发行了无数不兑现的军用票，如象“打倒贪官污吏”、“铲除苛捐杂税”之类，自然也收了莫大的效果。

我们在那一次不用说也卖了一下膏药：“我们革命军是不亏空老百姓的，吃了老百姓的东西总要付钱啦。”

把钱放在桌上，告辞着又走出去。仍然是我走在前头，恩寿走在中间，公冕走在后边。走不好远，走到了那段全无掩蔽的地面来了。从对面有一大队夫役挑着担子走来，是送稀饭到前线去的。那些夫役没有军事上的人指挥，走得异常密接。走到那段地面的中央处和他们接了头，轰充的一声一个大炮打来了。这第一炮没有打拢，离我们有八九尺远的光景，落在了那干燥着的小春地里，起了一阵土烟，没有爆发。

公冕在后面叫着："大家赶快走，把队伍隙开来，每人离过五尺远的光景。"

大家都很忽忽忙忙地抢着往前走，对于他的命令如象马耳东风。他又更加大声地叫出第二次时，话还没有说完，又是轰充的一声飞到了。这第二炮又打过了一些，超过我们有五六尺远的光景，在地里又起了一阵土烟，也没有爆发。

夫役们更加忙乱起来了，我醉醺醺地向公冕叫着："城墙上的炮手打得还不错啦，只可惜那炮弹怕是劣货made in Japan① 的。"

——"这两炮都不错，也怕是地面松的关系，要是爆发了，今天的牺牲是很不小的。"公冕这样说。

夫役的一队人把正中处走过了，我自己的尿意来了，便站在那田地中对着武昌城洒尿。尿正洒在中途的时候，又是轰充的一声。这一炮正落在我背后的路上，爆发了；夫役的队尾子混乱了一下。

① 作者原注：日本造。

——“这一炮大有进步啦，吓！”我一面洒着尿，一面感叹着。

队伍把那段路已经走过了，连公冕和恩寿也一同踉跄地退了转去，只剩我一个人立在地里。

公冕立在后面的一座农家外面的草墩上向着我叫：“有人受了伤，快转来，快转来！”

我退转去走不几步，看见路上倒了一担稀饭，路旁的番薯地里倒了一名夫役，在那儿呻唤。

我问他：“你受了伤吗？”

他指着他的左脚的脚颈：“嗳哟，吊那妈，痛啦。”

公冕又在叫。我叫那受了伤的伕子等着，回头便去替他叫担架来。

待我走到公冕所立着的地方时，看见恩寿睡在那草墩下，也在呻唤，左脚的脚背在流着血。农家的人跑了好些出来围着。

——“恩寿也受了伤吗？那边番薯地里还睡着一个呢。”

——“我已经叫同来的夫役们去叫担架去了。恩寿也是不能走路的，怎么办呢？让我回部去叫人来抬吧。”公冕这样说。

——“用不着回去叫人的，”我说，“我们就在这儿找一扇门来，不可以抬回去吗？”

公冕赞成了我的说法，结果是在农家里找了一张杨妃椅，四脚朝天地翻过来，在底子上敷了好些稻草，便成就了一台担架。

恩寿被移进了那架临时担架里，我和公冕便把他抬回了南湖。

一八

九月三号和四号都没有动作，只是敌人早推察到了南湖文科大学是革命军司令部，时常有大炮对着这个方向打来。因此在夜间是不准点灯的，有点灯的必要时都须得在灯上罩着黑罩子，背着武昌城的一面。

我们所住宿着同时兼带着办公室的房间是在楼上最后的一排，背面的窗口正对着武昌城。在四号的晚上，在两个窗口上罩着黑布，更把军服来罩在马灯上，我和胡公冕、朱代杰、李德谟几个人在拟定派往到湘西新附的某军去的政治工作人员名单。正在这时候，铁罗尼顾问和纪德甫两个人走进了来。他们和邓主任是住在更前一排的一间空出了的讲堂里的。

铁罗尼是很有趣味的一个人。他虽然是骑兵将校，但他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知识是很正确而丰富的，而且还有文艺上的教养。他很喜欢诗，特别喜欢往年自杀了的俄国的薄命诗人约先宁①。在行军途中，他随身带着的一册约先宁的诗集，有时我以纪德甫为介，请他把那清新的歌咏农村的诗，替我们在口头上翻译过。

---

① 约先宁(С.А.Есенин，1895—1925)，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农民家庭出身，十月革命时曾向往革命，后悲观自杀。著有《扫墓日》、《苏维埃俄罗斯》等。

大约因为我也是喜欢文艺，而且也特别喜欢诗的原故，铁罗尼和我很能相得。自从从广东出发以来，一有闲暇，他每爱和我作个人谈话。在那样的时候自然总是靠着纪德甫做中介的。

他等到我们把名单拟定，公冕和代杰拿着出去派人作准备的时候，我们又才谈起话来。

铁罗尼问我进了武昌城以后的工作步骤，我把预计着的梗概告诉了他，他特别注重对学生方面的宣传。他说："武昌的师范大学有不少的学生，那儿听说是国家主义派的根据地，现在虽然是在暑假期中离开了学校，不久便要开学了，他们是又要转来的，你用怎样的理论来破除他们的国家主义?"

这个问题，我在半年以前还没有到广东的时候便曾经思索过的。因为在上海宣传国家主义的人，如象"醒狮派"和"孤军派"，大抵都是我的同学，有过半数和我相识。我知道他们有好些的确是有爱国热诚的，他们是看到中国的积弱，总想用最良的方法来把中国强盛起来。他们所想到的最良的方法便是所谓国家主义。"醒狮派"的人很笼统，他们的国家主义只是一种热情，一种声浪，更具体地说，只是所谓"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两个口号。内的国贼是什么，外的强权是什么，怎样去除，怎样去抗，他们并没有充分的素养来分析。虽然在曾琦口中也曾经提出过飞机潜航艇政策，但是可怜，他老先生却没有想到飞机和潜航艇不会从天飞下来，从海里浮出来的。他们对于经济问题还没有睁开眼睛，极简单、极捷近、极可痛心的

一个实证，每天呈在眼面前，他们都没有见到，那便是他们的机关报《醒狮》用的正是洋纸！

“孤军派”的人比较起“醒狮派”是要“醒”得一点。他们比较上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案，主张恢复约法，主张裁兵，也特别把经济问题提出来讨论过。他们大体的倾向在拥护个人资本主义。这一批人大体上是日本留学生，所以他们更有一个具体的信念，便是要仿效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和中国一样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但自变法维新（便是由封建制度变成资本制度）以来不数十年，一跃而成为了世界第一级的强国。日本正好是中国的指路碑，日本人用那样的方法强盛了，为什么中国不能够？——这个提示正是他们和一切的常识家所共同具有的根本信条，他们是相信中国一定能够。但其实这儿正是一个问题，问题便是：日本人用那样的方法强盛了，为什么中国不能够？

中国人要效法日本——这是中东之战以来的中国的国是。自甲午以来中国送到日本去的留学生，没有详细的统计，我想至少总在三四十万以上，就是我们自己便是由这种国是中所产生出的一个世代。但我们效法的结果是怎样呢？

效法日本其实是间接效法欧美，更具体地说，便是在暗默间想怎样来把中国数千年沉滞着的封建社会转化为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除派遣留日学生之外，派遣到欧美去直接效法的人，我想那个总数和留日学生也会是不相上下的。但那仿效的结果又是怎样呢？

中国人效法欧美，事实上是在日本人效法欧美以前。举出

些简单的例子吧。日本耶教徒的《圣经》是从汉译本重译过去的。日本人在明治时代乃至大正时代的初期，研究英文的人是在用中国邝氏① 著的《英文熟语辞典》！然而这个情形在四五十年后恰恰颠倒了，中国人甚至要采用日本人编著的中国史了。

问题的面貌在这儿更加显明了起来，便是日本人效法欧美成了功，为什么中国不能够？

我的答案很简单：日本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所以成了功，是因为有地大物博的中国替它做了挡箭牌。欧洲的资本主义侵入东方来，日本是同样受着患害的。但那个已经人满为患的几个日本岛子，在欧美人看来，比较起中国自然是没有多么大的殖民价值。因而在资本主义的进军向着中国万箭齐射的时候，日本人便在这短时期内培植成了自己的资本主义。中国要仿效日本，想在今后成为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好是要有比中国更好的殖民地来缓和欧美的以及日本的资本主义的进攻，就如象日本有中国替它做了挡箭牌的一样。然而这个条件已经是无法具备的了。中国今后要想成为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除非是近世的帝国主义者在火星或者别的星球上发现了广大而有价值的殖民地。

我把我这样的意见在那暗淡的一室中，在敌人的炮火轰击之下，对着铁罗尼谈出，他很表示赞成。他说："土耳其近年的国权运动的成功也有同样的意义，便是近东问题已经解化

---

① 指邝富灼（1869—1938），字耀西，广东台山人。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部长。著有《英文法阶梯》等。

成远东问题了。”

——“土耳其的外观上的成功，英法帝国主义的援助不是最大的原因吗？”我多少带着反驳的意思这样说，“意思不是在掣肘苏联吗？”

——“那是自然，”铁罗尼说，“就如日本的成功一部分也是由于英美帝国主义的援助那样，那时又是在掣肘沙皇时代的俄国。日本假如没有日英同盟的掩护，恐怕它的成功也没有那样的快。不过根本还是中国做了乌龟。”

乌龟这个表现我起初没有懂到他的用意，觉得有点奇怪。我又问了一下，才知道他是说的神道碑下的赑屃。那在行军途次他是看见过不少的。我不免笑了起来。不错，我们的背上的确驮着很大的神道碑，碑上刻写着有旧时代的残骸“军阀”和“官僚”，在那上面更狼藉着无数的帝国主义者的商标。

话正谈得高兴，突然有一声大炮落得很近，而且爆发了。室外起了一番哗噪的声音。

代杰走了进来，说：“大炮落在围墙的外边，打破了一只墙角。”

接着又有人来传达严密熄灯的命令。铁罗尼和纪德甫便起身告辞，拿着手电一开一闭地从廊道中间向前面的讲堂里走去了。

一九

五号晚上又决定了要去大规模地爬城。南湖附近农家的梯子因前一次的爬城，已经征发干净了，这次所需要的更多，而且鉴于前一次去迟了，遭了失败，这一次不能不早些动手。在四号下午便已经派人到咸宁附近去征发。主持其事的仍然是总政治部。五号上午已经有梯子络续送来，堆积在南操场上，大家又来从事绑扎。扎好了的便抬到学校门外去停积着。

这一次的梯数比前一次多上四五倍，又是断断续续地送来的，因此绑扎的工事便很拖延。一直到了晚上由各军所挑拔出来的混成敢死队在南操场齐集的时候，还剩下好些梯子没曾绑好。操场上没有可以工作的余地了，大家把那还没有绑好的梯子都抬到校门外去，又在那儿继续着工作。

天已经黑下来了，全靠着几盏马灯的光放在地面上照着。适逢其会有好几盏马灯的洋油都点尽了，灯光幽幽地快要熄的神气。总司令部里面是有灯油施发所的，洋油尽了可以到那儿去取。在场的人们没有人知道那施发所的所在，替他们说出地址来时，但那大学的内部大家也不熟悉。于是我自己便把马灯收集起来，左右两只手各提了三四盏走进施发所去讨油。进去时灯光是很幽晦的，倒没有感觉着什么，出来时因

为油份充足，灯光倍加明亮，左右两手各提着三四盏，自己都觉得好象是成了一位火焰天使，要飞起来的一样。走到校门口恰好碰着一群军事上的将官们迎头走来，有几位俄顾问参在里面。陈铭枢和张发奎在最前头走着，大家都匆匆忙忙地没有打招呼。在那一群人的后部有一位年青的军官，脸色白皙而清秀，身材长而细，他招呼着我：

——“哼，你这家伙，点起那多亮真好玩啦！”

话中含蓄着责备的语气。他没等我的回话说出，又把从扎梯处跑来的邓主任拉着了。

——“喂，择生，这位尊驾一定是你政治部的宝贝吧？”一面说，一面把我指着。

——“怎么？”择生惊讶着回問他。

——“毫没有军事的常识！在敌人面前点着那么多的灯，好做炮靶子啦！”

——“你真神经过敏，”择生回答他，“那一座大学堂在背后挡着，敌人会有千里眼看见这些灯光？”

那军官没再说什么，匆匆跟着前面的人走进去了。择生也跟着进去了。

在混成队出来就道的时候，所有的梯子也刚好绑完，部署是和前次的办法一样，只是人更多，气象更加悲壮。

刚才的那一群军官们又走出来了，择生和铁罗尼也在里面。

刚才责骂过我的那位年青的军官呈着笑容走来向我拉手。

他说："刚才得罪了，我是黄琪翔①。"

黄在那时还是张发奎部下的团长，在军中有美男子的称誉，但我们还不曾见过面。

我也笑着和他拉了手。

择生和我拉了手，铁罗尼和我拉了手，其他相熟的人也和我拉了手，最后是纪德甫走来。

德甫自来是少说话的，从广东出发以来，尤其是自长沙出发以来的这些天，我们虽然时常在一道，他和我竟直可以说没有直接谈过一次话。他的身材高长而瘦削，面孔也瘦削而带黄色，但也不是病态，年纪只有二十五六岁，青春依然还留存在他的一切的态度里。他穿的依然还是从汨罗以来的那件黄色的布军服，到了武昌以来连换洗的时候都还没有。他除背着图囊和皮带之外还背着一杆驳壳枪。

他和我拉手，拉得特别用力。他说："今晚上我们无论怎样是要打进城的，打不进城我不回来见你了！"

他是说得很爽快的，我回答得也很爽快："那要你回来？我们明天赶上来相见。"

在那时候谁都相信当晚一定会打进城的，虽然免不了是有不小的牺牲。混成队中的士兵们有的自然也在吐着怨言，但大多数在沉默之中含蓄着必胜的勇气。他们的路似乎只有两条：不是死在武昌城下，便是活进武昌城内。他们每个人虽

---

① 黄琪翔（1898—1970），字御行，广东梅县人。北伐时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长、师长、军长。一九三〇年后参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然都有金钱上的犒赏(数目我不记得的)，但那不足以污损他们的英勇。因为献身的精神，敢死的气魄，终不是金钱可以买得来的。

我们彼此拉了手之后，指挥敢死队的军事上的人们向那深不可测的、和死境似乎并无区别的黑暗中消去了。

二〇

谁都想到在五号的夜里一定可以攻进城，当晚留守着的人，特别是政治部，要准备第二天进城的工作，大家都没有睡觉。

敢死队出发后有两个钟头的光景，炮火的声音特别地猛烈起来，想见战斗是异常的激烈。炮火的声音一直到天快见亮的时候才渐渐衰竭了。在那时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消息，说是我军已经攻进了武昌，正在城里巷战。进城的门道有的说是宾阳门，有的说是通湘门，有的又说是武胜门。先进城的军队有的说是第四军，有的说是第八军，又有的说是第一军。消息虽然有各种的歧异，但是在已经攻进了城的一点上是一致着的。

每来一次消息，大家都要狂喜一次，但一根究起那消息的来源时又多是渺茫无着的。我们希望着择生从前线上会有什么确实的消息送来，但是始终没有。消息传来得很频繁，盖然性也逐次地增加，我叫胡公冕到前面的总司令部去问过两次。第一次他回来的报告是：会着了白参谋长，讲那攻进了城的消息是有的，但还没有得到前方来的确报。第二次他是见到了总司令，说他正在和前线打电话，说的确是攻进了城，是第一军的第六团，由武胜门攻进的，大约宾阳门在现在也已经攻

破了。

得到了这第二次的报告，自然是再无可怀疑了。政治部的全部是已经把出发的事情准备好了的，便顿时在南操场内整起队来，时候是七点多钟。在要出发的时候，我自己又亲自跑向总司令部去，正待上楼，碰着了已经任命为湖北财政厅长的陈公博①由楼上下来。他先对我说，武昌的确攻破了，他也要立刻进城去。

我听了他的话便也没有再上楼去，折回南操场，让部队出发。

胡公冕骑着他的一匹矮小的青马走在最前头，领率着宣传大队。其次是我和代杰、德谟诸人领率着政治部的全体人员。政治部的两面大旗是由两位宣传员在前头打着的。

走出了文科大学的校门大家都很有点威风。特别是那骑在马上的胡公冕，俨然象是一名凯旋将军一样。

路上不断地有逃难的人挑着家什行李跑来，看见我们威风凛凛地在向着城走，都远远地便把担子放下了。我们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逃难，城已经攻破了。”他们听见我们这样说，有的便立刻又挑起担子转向城一边走。

走到了那要分路的三岔路口上来了。那儿有三条路，向直走是通通湘门，左手是朝保安门走，右手是朝洪山走的。在那儿又遇着了陈公博，他骑在一匹皂骝马上正在踌躇。向直

① 陈公博（1892—1946），祖籍福建上杭，生于广州。曾参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共一大，不久退党。北伐时任湖北省财政厅长、江西省政治会议主席。一九二七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后追随汪精卫，为改组派首领之一。

走自然很捷近，但那儿异常的惨淡，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他决定朝左手走，我们是朝右手，觉得由宾阳门攻进更要可靠一点。

向右手走不好远，便要走到那段全无掩蔽的地面上来。公冕的那匹青马本来是没有经过训练，也没有见过仗火的凡马。但那家伙的神经似乎比人还要敏感，一要走上那段地面时它便罗唣起来。无论怎样鞭策它，它都不肯走，甚且人立了起来。终竟使我们的胡大元帅不能不赶快从马背上跳下。走在最前头的马，让马夫拉在最后头去了。

大家走上了那段土面。

天气是很晴朗的。自从在八月三十一号的晚上下过一次暴雨之后，接连着好几天都是晴天。地面干燥得就和沙漠一样。武昌城远远地在阳炎中横陈着，脚根是看不见的，白蒙蒙地好象是一座蜃气楼。

刚刚走到那段地面的正中处，我正向旁边的德谟指点着说："我们前天捱大炮的地点便是在这儿了。"话还没有十分落脚，忽然地，乓的一声，炮弹刚好落在队伍的中间不及三尺远的光景。地里起了一阵土烟，部队里也起了一阵人烟。炮弹没有爆裂，队伍却是爆裂了。没有经过训练、没有见过仗火的人，无论平常是怎样的热心，怎样的夸口，一到临场便是要露出马脚。政治部的好些勇士们听见了一声大炮，便骇得鸡飞狗跳起来。有的把手里拿着的标语和传单通统抛弃了，有的骇得在地上打了一突坐。有一位四川人姓曾的，骇得当场便吐了一口血，把腰劲骇软了，几乎连路都不能再走了。

接着又来了两声大炮，都打得很准确。但都要感谢那骗钱的帝国主义者，他们把些不中用的废弹卖给了中国的军阀，一个二个都没有开花。而我们总政治部的好些不打便开花的大炮们，要收拾起来走过那段危险地面，真是很费了力气。

走到有掩蔽的地方了。公冕很赞叹地对我说："敌人还不错，城里在巷战，公然还有这样的镇静。"

——"怕有点靠不住吧，"我怀疑了起来，我是不相信敌人会有那样的镇静的。"进城的消息真是老总亲自对你讲的吗？"

——"是的啦，是他亲自对我讲的。"公冕很坚决地肯定着。

——"我怕他也是受了骗。"我这样说，一种诳报军情和冒功图赏的那类卑劣事迹，在我的脑中浮泛了起来。

搬家逃难的人是络续不绝的。从前线上也时而有散兵下来，抓着他们诘问时，都不知道有攻进了城的那么一回事。由种种情形的归纳，觉得那个消息是很可疑的。我便把部队的进行中止了，由我和公冕和几位愿意同行的同志往前线去探听，待把消息探听的确了，再定行止。

二一

我们走到离洪山不远的地方，从对面有一架担架抬来，后面有一位背着驳壳枪的护兵跟随着。

担架愈见抬拢来了，架上的人是用一件雨衣把面孔遮盖着的。在黄色的马裤上裹着黑皮腿套，两脚长伸着没动。我的注意力是完全集中在担架上的，我想到那负伤的一定是一位官长。

当那担架从我们的身旁擦身过的时候，那后面跟随着的一名护兵突然叫着我：

——“秘书长！主任……”

那人原来就是邓主任的护兵杨昇，我大大地吃了一惊，连忙问着：“主任怎样？受了伤吗？”

——“无系，系……①”

我没等他把话说完，由那服装已经唤起了我的记忆和判断。我已经知道了那担架上的人是谁了。连忙跑到担架旁边去，揭开那盖着面孔的雨衣来看，纪德甫的面孔现了出来。两只眼睛睁着，定着，失掉了光彩。黄色的脸色转化成了苍白色。嘴是踪着的。在我们学过医、看惯了死尸的人，一眼便可以知

① 作者原注：不是，是……

道，他是已经死了。眼泪顿时在我眼里鼓荡了起来。

——"主任有信。"杨昇从自己的怀中取出了一封信来给我，是择生写给我的。信是写在抄本的一叶上扯下来的，那诚恳而简单的几行文字至今还一字不易地留在我的脑里。

××同志：

攻城计划仍归水泡，敌人尚在顽强抵抗。德甫同志于今晨正七时阵亡于宾阳门外长春观内，哀痛至极。后事望兄从厚料理。

Yenda Den 七时四十分于长春观

择生的署名是惯爱把自己的名姓用德文字母写成"演达·邓"的，他这几行手书就象一股电气一样，一霎时使当场的同志们都严肃了起来，有好一阵大家都没有声息。

攻进了武昌城的消息不用说完全是假造的。因为谁都相信当晚的夜袭一定可以攻进城，而先攻进城的部队在论功行赏上自会掌握武昌乃至湖北全省的统制权，这便构成了那假造情报的动机和目的。但是为这种小小的阴谋所欺骗了的不愉快，却为纪德甫之战死所唤起的严肃而悲壮的感情，所镇压着了。大家在默默地伫立了一会之后，又只得回到全体的部员们所等待着的地方，叫把旗帜卷了起来，把队伍分散开，三三五五地折回南湖。敌人的炮手，大约也是因为有城墙的保护完全恢复了他们的镇静，在人少的时候他们是不肯开炮的。一些成了惊弓之鸟的部员们，算也诚惶诚恐地、先后把那段危险的地面通过了。

走回南湖的途中，杨昇用他那很难懂的广东话把晚上夜

袭的情形告诉了我。话虽难懂，但也得到了一个梗概。

敢死队有一部分人是到达了城下，而且有少数的人是爬上了城墙的。但是敌人也早有防备。远处的用机关枪扫击，近处的用手榴弹投掷。爬上了城的人因为众寡不敌，都被打下了城来。其中有一位曹连长，爬上了城，也被敌人打下了。他的部下为去抢回他的尸首，死伤的很不少。

邓主任的马也被打死了。他们在前线上督队，一个子弹打来，端正地打中了马的脑壳。那子弹从邓主任的左胁下穿过，军服的袖子打穿了一个洞。人没有受伤，马是顿时倒了。

清早他们退到了长春观。那儿的地方高，和城墙的一角几乎在同一个水平上，和城墙相隔也只有二三十丈远的光景。他们就躲在那土墙背后，用驳壳枪和城上的敌人对打。把头伸出墙头去，打一枪立刻又缩下墙来。敌人也晓得这边是有人埋伏着的，用着机关枪对准扫射，但都没有把墙打穿。打进了园子里的枪弹，真是就和雨点一样。这边不应战，敌人也把枪准掉过了方向，不再对准着这边。但你一伸出头去打得几枪，他们又来向你下一阵子弹雨。就这样来复了好几次。最后一次是纪德甫把头伸出去探看外面的形势，正回过头来报告坐在墙脚下的邓主任和铁罗尼的时候，突然地有枪弹打中了什么的声音：他立地便要朝地下倒。邓主任赶快把他扶着，晓得他是受了伤，顺着势子把他放横在地上。

邓主任和铁罗尼都来关照他，他用很低微的声音说：“我不要紧，请你们留心着敌人。”他就只这样说了这一句话，以后便没有声息了。

毫无虚饰的杨昇断断续续地把这些情形告诉了我。我听着他那木讷而低抑的声音，看着他那劳瘁了一夜而气色很沉闷的相貌，晓得他的内心是虔诚地在替德甫哀悼着的。特别是德甫临终的那句话，很打动了他，他向着我反复了两三遍。一个人临到了死的关头，完全忘却了自我的存在，而顾虑着同在患难中的友人。——在这种精神的面前是谁个也会低头的。更何况杨昇是和他同处在一个死地的人，在他那朴素的心中，和山里的溪泉一样没有什么渣滓和尘埃夹杂着的心中，自然是会有更清澄更透彻的印象。

——“我不要紧，请你们留心着敌人。”

二二

纪德甫的尸首抬回了南湖文科大学，停放在临着南操场的楼上的一间讲堂里。我一方面叫人去替他制办棺木和衣衾，另一方面得着几位部员和勤务兵的帮助，把他身上的军服解开来了，检验他的伤痕。

枪弹是从后头骨的左侧打进去的，从后颈窝下穿出；又从右肩打进胸部，由肩胛骨的右侧穿出；最后又打穿了右侧大腿的右侧的皮部。子弹的余势已尽，笼在军裤里面融断成了三个颗粒，连布制的军裤都没有打穿。

就这样一枪贯穿了三处。头部和胸部的都是致命伤。血流得不多，但那内部的出血不用说是很厉害的。

接着又检查他随身所有的物品。除掉所穿的衣类之外，手上有一只手表，衣包里有一个钱包。那个钱包是皮制的，已经很旧了，当着众人面前我替他打开来。从那里面取出的内容是：——两个铜板和两张当票。当票是广东的当铺所开的，写的是很奇怪的字，不知道那所当的是什么物品。但照我的推想说来，怕只是被条和书籍之类，因为出发时不能随身带走，所以才采取了那样的办法，交给了当铺。

"两个铜板"——这层或者有人要怀疑，以为我是在有意地夸张。其实这倒是不足怪的，自广东出发以后直到武昌城

下，没有正式地发过薪水。（自然，假如有需要，是随时可以向财政股支用的。）每天吃着公家的伙食，在行军中谁也不感觉有什么用费，所以德甫的钱包里也就只有那样的一点财产。不过这也可以表示他的淡泊。我是在努力写着实话，毫无意思做小说。假如我要做小说，在这儿也正好夸张一下，可以替他编出一部日记或者编些信札出来。为投满脸骚疮的年青的男士或女士的嗜好，或者还可以编出儿封恋爱的书信。但那是无聊到万分的，那样只会污辱了我们的德甫。

德甫的钱包我是交给了德谟他们替他保管着，那下落是怎样我不知道。只有那断成了三个颗粒的枪弹，我是把来当成纪念品保存着的。但在第二年的八月，我在江西的德安遇着危难的时候，我的一口皮箱遭了抢劫。那个贵重的纪念品，和着好些重要的资料，一齐遗失了。

在那天的午后，棺木和衣衾都采办了回来，德甫便立即收殓了。我因为工作忙，没有临场。收殓后的棺木是暂时停寄在学校后庭的一个库房里面的。

在那天午后还做了些什么工作，我现在全无记忆了。只记得夜里我睡在床上做过几首哀悼德甫的诗，我现在把它们记录在这儿。

一棺盖定壮图空，身后萧条两板铜。
沉毅如君偏不禄，人间何处吊英雄？

回思夜袭临歧语：不破坚城矢不归！

今日成尸横马革，难禁清泪滴君衣。

患难相随自汨罗，阵中风露饱经过。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到如君总不磨。

一弹穿头复贯胸，成仁心事底从容。
宾阳门外长春观，留待千秋史管彤。

第二天清早七点钟，在要把德甫的灵柩送到邻近的寺院里去停寄之前，政治部全体人员连同勤务兵，都聚集在后庭的那座小库房前面为他展吊。小屋是砖砌的，就和汽车的格纳库①一样，前面的门敞开着。因为天气热，棺材下已经有血水流出，同时也有臭味了。这样的情景尤其是触动哀感。

由胡公冕赞礼，大家在棺前沉默了五分钟之后，组织股长的李鹤龄②报告德甫的履历。大意说他是山东人，在中学毕业后便到苏俄留学，留学期间不长，为中国的革命所迫提前回了国。但他是很努力的，他的俄语程度和理论水平已经可以有把握地作政治上的谈话和翻译了。他是共产党员，是在莫斯科加入的。但他的家世是怎样，他是怎样到的俄国，他是山东那一县的人，我现在都不记得。

接着是邓主任代表政治部全体的人致哀词，报告了他阵

① 作者原注：汽车房。

② 李鹤龄，又名合林，四川人。北伐时任总政治部股长。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登报脱离共产党。

亡时的情况。接着是俄顾问铁罗尼用法国话致哀词，由鹤龄替他翻译。

铁罗尼的确是很悲哀的。他一面演说，一面流着眼泪。他说：革命阵营里失掉了一位很忠勇的同志，同时他也失掉了一位很好的伴侣。他平时对于他太生疏了，对他没有充分的认识，他自己是很失悔的。

他的失悔很明显地有一部分是表现在他的眼泪里的，铁罗尼本是一位富有浪漫性的诗人，他是由于他的浪漫的热情而成为了革命家。他喜欢幽默，喜欢诗歌，喜欢在规律的生活之外作些余兴。但是纪德甫的性格却恰恰和他相反。德甫是很寡默的，平常除必要的谈话之外，连开口的机会都很少。从广东出发以来和他共同了两个月的生活，我是很少看见过他有发笑的机会的。因此他们两人在平时便不很投合，铁罗尼早有换掉他的意思，德甫也很想掉换工作。但是德甫的庄严的一死把铁罗尼对于他的感情完全改变了。

二三

自从纪德甫死后，武昌城下的军事行动没有怎样的进展。爬城的计划失败了两次，牺牲了好些同志，以后便没有再行采用了。在两三天后大家所系望着的飞机由俄国同志的操纵从广东飞了来，但那飞机并不是轰炸机，也没有炸弹，只在武昌城上空把通常的手榴弹投了两次，散了几次传单，结果只是把敌人恐骇了一下。

这儿却有一个小小的插话。

那在武昌城上所投下的手榴弹，有一颗是把武昌美术师范学校打中了的，并且还打中了一位知名的艺术评论家华林①。华林当时在那儿教书，也就在那儿寄宿，那炸弹的破片打伤了他的足趾。他为此受了一些痛苦。后来在他回到了上海之后，对于革命军曾经加以诅咒，而那诅咒的余沫更曾经飞溅到我的身上来过。

我现在把这段插话写在这儿，倒也并不是心存报复地要来奚落华林先生，我是想请他做一个活的证人，证明飞机投过炸弹的事情是实。而且更希望他为我们提供出些资料来，他

---

① 华林（1878—1954），江苏江都（一说无锡）人。早年留法，回国后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教师。时在武昌艺术师范学校任教。

在武昌城里过过四十天的笼城生活，象他那样有文笔的人，最好把那段生活记录出来，写一部“武昌城内”。

飞机的威骇没有用处，继起的便是炸城，由洪山附近有掩护的地方打地道通到武昌城下去。这样的工作不免要旷日持久，武昌城外的革命军便只有采取着待命的形势把武昌包围着。

到了八号，因为汉口方面的政治工作吃紧，又因打地道的材料都要向汉口采办，非得有机关在汉口主持不可，政治部便决定了在汉口设立办事处。起初本是拟定由朱代杰去主持的，但到了一切准备都已经停当了的晚上，择生又来找着我说：汉口的事情还是要我去主持才行。于是预备好了的规模又不能不改变一下，代杰依然做我的助手，在部中挑选了二三十名精悍的同志，带了十名警卫兵，在九号清早向白沙洲出发。这一行人中，代杰、鹤龄、德谟和我，便是核心人物。

到了白沙洲时，暂时驻扎在那儿的武圣庙里，因为所要搭乘的小火轮要载第八军的军火，一时很不容易载齐。中饭是在那儿用的。由白沙洲渡过鹦鹉洲时天色已经黄昏，再从汉阳城外走过时更已经黑下来了，便点起了马灯照着走路。这个情景在武昌城上的敌人自然是看见了，隔着江便不断地有枪炮射来。枪声和炮声在夜气中响得更加透彻，但是却没有一个子弹打中。

汉水上面是搭着浮桥的，由那浮桥渡过宝庆码头时，马灯的光映在水中，水是异常的清浅。渡过汉口后当晚在旅店里过了一夜，和前两天派来的人接了头。在第二天，十号的清

早，才搬进了设在后城马路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里的办事处去。

公司是有四层楼的西式建筑，楼下正中是大门，左侧是公司的门市，右侧是银行式的一个大厅，那儿在前做过银行。在军事期中是做着逆军的军需处的。楼上是旧势力的俱乐部，因此便被认为准逆产，由我们所派来的人把它查封了。在对于公司的营业没有加以妨害的范围内，我们把楼上楼下非公司的部分都占据了起来。楼下银行式的大厅便成为了总政治部的办公厅。左侧前面当门的一隅有一间小室，便作为了主任室，主要的几个人便聚集在这儿。我自己是时常在这间小室中的一尊沙发上过夜的。

当时的汉口还是旧势力潜伏着的巢穴。吴佩孚逃走后还不上十天，一般的人多相信他会卷土重来。因而市街上的大商家都还没有开市，各种报纸也都还是没改换旧时的论调。刘佐龙所领率的鄂军集中在那儿。刘本人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隐隐地以湖北的政治中心自命，对于南北两方都采取着不即不离的态度。此外，还有好些新附的军队，那在名义上虽然是自己的人，而在实质上是形同敌国。我们跳进这样的环境里去，所负的使命便是要扩充革命的认识和革命的气势，来镇压周围的敌人。

我们开始把报界拉在手里，封了两家很反动的报馆。同时组织了一个新闻检查委员会，所有的报纸都要经过我们的检阅才能够发行。民众团体的组织加紧地进行，各种工会有组织的公开强化了起来，无组织的便从新加以组织。甚至如

象省市党部的公开都是在我们的掩护之下成全了的。

就这样聚精会神地干了一个礼拜，各种宣传机关都拉在了手里。有一种美国人办的新闻也被我们把它拉了来。民众团体逐渐地产生，民气高涨了起来，汉口的市面便顿然改了旧观。我们自己在这几天中所过的生活要算是最紧张、最有趣味的生活，晚上睡觉的时间很少，多不过三四个钟头，甚至连熬几个穿夜的事都有。

然而在这样自以为痛快的时候，却于不识不知之间惹出了很不痛快的局面。

二四

在移到了汉口的第五天，码头工会的工友们把一位著名的工贼郭聘伯逮捕了来，这人在一年后的武汉政府时代是枪毙了的。最初送到部里来的时候，部里的同志们便主张就地正法。但在正式的规定上政治部并没有杀人的权柄，我便决定暂时把他扣留起来；一面派人到武昌去向邓主任请示，提出了他以往的罪状和我们主张枪决以镇压反革命势力的意思。

犯人送来时是清早，待到傍晚时分，突然有一营人的队伍开到了政治部的门前，对着政治部阵列着。照那服装看来，知道是刘佐龙部下的队伍。这是犯人的党羽去怂恿了刘佐龙，要他用威骇的手段来把犯人夺回去的。部里的人不免有些惊惶，因为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就只有十名警卫兵，每次派两名在大门外轮流守卫。这十人的力量无论怎样是不能和那一营人抵挡的。我自己也隐隐地怀着不安，但我想到那来的人不会便有胆量动作。他们不过是来向我们示威，我们却也不好向他们示弱。我壮着胆子叫人去传那营长。那营长却很恭顺，他一个人走了进来。我在主任室传见了他。那是一位将近五十的人，瘦削的脸上满脸都带着烟屎，嘴上有点稀疏的八字胡须，身材也不高，穿的是臃肿的北洋军服。

我先开口问他："你们来是什么意思？"

他有点狐疑不定的神气，吃格着说："我们不知道贵台是什么机关。"

——"什么机关？"我反应了一声，"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

——"是，是。"他愈见地恭顺起来。

——"你们来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又逼着问他。

——"听说贵部……唉……逮捕了人。"他嗫嚅着说。

——"逮捕了人怎么样？"我没等他说完又抢着诘问他，"你是来要人的吗？"

——"不，不，不，不是那样，"他连连地把两手举起来摆着，"因为外边有不好的风声，我们是奉了上台的命令来……来……保护贵部的。"

我听他说出了这样的话，几乎忍不住要发出笑来。我也把我的态度渐渐地缓和了。

——"多谢你们的好意。但我们自己有警卫队，就有什么动静，我们自己是能够对付的。你们的军队不好这样轻易地调动，反而要惹出不妥当的风声。我请你从速把你的队伍调回去。"

那营长诚惶诚恐地便告辞了出去，接着是"立正！……向左转——走！"的号令声，那开来的队伍又从原路开回去了。

就好象是串演了一场空城计，在营长的司马懿走了之后，大家都不免笑了一场。

但就在营长退去后不上二十分钟的光景，我派到武昌去请示的人回来了，带来的邓主任的信件是很不以我为然。他说

我们政治部没有捕人杀人之权，在目前革命势力还没有巩固的时分，尤其是不可任性动作。他叫我们把犯人严加看管着，再听候发落。

我得到他的来示自然不很满意；但我也私自庆幸，因为我慎重地请了一番示，要算是很能够先意承旨地体贴了上司的意旨的。一有命令不准杀，谁还敢妄杀呢？一场高兴不用说已经冷去了一半。但是剩下的一半还要冷到零度以下，生出负号来。

第二天清早，武昌方面又派了人来传达邓主任的命令，叫我把郭聘伯立即解过武昌。这个命令是表示着对于我们的绝对的不信任。他在昨晚叫我们严加看管，只隔了一夜又叫我们解过武昌。他怕我们不遵守他的命令，会要任性枪毙的。我自己很不了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捕杀一名罪恶昭著的工贼会有这样的严重。在我的意思，初到汉口来，在革命势力还未巩固的时候，正好雷厉风行地做些行动出来示威，借此也可以收揽民心；然而上司的见解和我们的却是正相反对。

命令自然是只有遵照，但在那时候要把一名要犯由汉口送往武昌却不是轻易的事情。万一路上有了差池，谁好担戴呢？于是又只得把十名警卫兵，留下两名在门外站哨之外，通统派遣去，护送着郭聘伯老爷过江。门卫的换班暂时也只好用勤务兵来假充了。

二五

事实是这样。在我们的请示到达武昌之前，郭聘伯的神通已经先到了彼岸。他的党羽在总司令部告了状，说码头工会的人任意捕人。这个消息把武昌方面的军事中枢歆动了一下，就在第二天便由总司令部出过一张布告，对于民众团体任意捕人的事严加禁止。一有我的请示去，才知道那所捕的人已经移到了政治部，而且我们又主张枪决。这是很把邓主任作难了一下的。他还有更严厉的他的上司。因此，他也比我的请示还要慎重地索性把那犯人要过江去了。

事情只是这样的结束，在我虽是觉得不甚痛快一点，但也没有什么，因为逮捕的下手人并不是我们。我们虽主张枪毙，但仅仅是一个主张，而且是恭而且敬地请了示的。但不料隔了一条江水，邓主任对于我们的误解却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在十八号的晚上那时在总司令部秘书处担任着工作的蒋先云①给朱代杰写了一封信来，就为处理郭聘伯的事责备他

---

① 蒋先云（1902—1927），又名湘耘，湖南新田人。一九二一年加入共产党，为黄埔军校一期生。北伐时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第十一军第七十七团党代表兼团长，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总队队长。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河南与奉系张作霖部作战中牺牲。

们不懂策略，办事太幼稚，同时叙及邓择生向他诉苦，说我是一位感情家。又说是我们几个四川人有点迹近把持，不应该在部中激成了广东派和四川派的对立。

这个非难真是有点象晴空霹雳，而且对于我们几个人也可以说是顶门一针。我们几个——代杰、鹤龄、德谟，和我——太不凑巧地都是四川人，又都占着重要的位置，但我们并不是有意识地团结拢来的。代杰是政治部的元老，他起初担任着庶务科长，后来在要出发的时候因为我加入了宣传科，又兼带了行营秘书长的职务，他便以辅助我的意义，改为了宣传科的副科长。——这个名目都是临时定出的。组织股长的鹤龄本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在出发的前一天才转过政治部来。德谟入政治部比代杰稍后一些，他一直在担任着秘书。我们几个人都是个别地进的部。我在上海时虽和德谟相识，但并没有怎样的深交；代杰和鹤龄更是到了广东后才认识的。就这样完全是偶然集合的我们，在拚命做着工作，连自己的性命都是置诸度外的时候，不料才激起了同人中的党派观念。在代杰、鹤龄诸人都很灰心，而在我自己尤其是愤慨。我自信自广东出发以来是很能遵守纪律而遏制着自己的感情的，不辞劳苦地干了两个月，却落得了一个感情家的评语，我心里真是不舒服。而这个评语不是择生直接向我说出，而是间接的诉苦，尤其是使我难耐。象这样羊头狗肉的革命工作，我决心不再干了。当晚便写就了一封辞职的信，请另简适当的人来负责。在第二天清早的一早便派人送过了江去。

十九号下午择生过江来了。到了政治部时已经是晚上，

我回避着他没有直接和他谈话。他在主任室里和代杰诸人谈论了足足两个钟头，谈话的内容我没有过问。

二十号清早还在六点钟以前，择生派了人来把我请到他留宿着的旅馆里，那是同在后城马路，离烟草公司不远。

我穿着便衣走进他的房间里去，他已经把军服穿好了在等待着我的。我们在一张方桌旁坐下了。

择生带着一个愁蹙而又含着怒气的面孔问我："你是在斗气，还是认真要不干的？"

——"两来都是，"我索性不客气地回答着，"气也要斗，职也要辞。"

在平常我们对他是很客气的，因为他是上司，凡是他所说的话都是绝对的命令，我们是只有唯唯听从的。这一次他看见我的态度反常，他就好象吞了一口热汤，闷了一下，有好一会没有说话。

——"在现在革命的工作异常紧张的时候你要辞职，你这不是反革命吗？"

——"革命不一定要做官，抱着革命的志趣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做什么事情，一样可以革命。"

——"你打算要到什么地方？"

——"打算到上海。"

——"目前在孙传芳统制之下你能够去吗？去了你有什么事情好做呢？我看你走不到上海，你的脑袋子已经不会在颈子上的。"

——"那倒痛快些，象目前这样的半死不活，羊头狗肉的

革命，真是吃不消。”

择生又沉闷着了，他接着又更加缓和地说：“你对于革命的现状究竟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呢？”

——“我最大的不满意便是万事都讲‘策略’。目前革命的胜利只有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上是丝毫也没有表现的。象我们政治部对于民众发出了许多的口号，但是一点也不能兑现。军事上的胜利一半是得到民众的帮助，但是对于民众的迫切要求，我们却万事都讲‘策略’。我们对于旧时代的支配势力太顾忌，太妥协了。结果民众是受了欺骗，我们自己会转化成旧势力的继承者，所谓革命只是一场骗局。”

我这样抽象地说了一遍之后，又举出了些事实来证明，同时也提到郭聘伯的逮捕这件事情来。我说：“为爱全一位著名的工贼，而失掉几万工人群众的信赖，这样的‘策略’我真是不懂。”

择生说：“你的见解是很正确的，但是实际上是旧社会的力量太大，我们的力量太弱。我们革命军的内部便有极大的旧势力磅礴着，我自己是有好多说不出来的苦处的。总之，我们和衷共济地缓缓地做去吧。凡是关于政治部内部的事情一切都可照着你的意思去做，老总不久要向江西出发，他希望着你去，但我们都委婉地谢却了。武汉的工作无论怎样是不能离开你的，我已经派了党务科长季刚去江西。你无论如何应该把你的感情抑制一下，努力干下去。我说你是感情家，并不是骂你的意思，革命家没有强烈的感情是不能够革命的。不过在目前，对内对外的策略都是应该讲的，这是无可如何的事

情。还有部内分出了党派的话，是有少数不良分子的流言，我自己是毫无那样的成见的。我也相信你们决不是那样腐败的封建余孽。”

他诚恳地这样说着，说得快要流出眼泪来的样子，我为他的诚恳却不免打动了，我的感情自然也就缓和了下来。

他最后又严重地下出一个结论：“总之，你在目前是不能够离开这儿的。就是代杰、鹤龄、德谟，都不许有一个人离开！你们离开了，政治部只好垮台。”

他说的话委实也是实际情形。在当时一切工作计划是由代杰经手，一切来往文电是由德谟经手，鹤龄是长于演说的人，并且又通英、法两国的语言，所以对外的宣传和交涉大抵是由他担任的。他们三个人的确是一尊宝鼎的三根柱脚，我不过是代替着择生总成其事而已。他们三个人要走了一个，政治部的事情一定会办不动。又假使我走了，他们的兴趣也是会减少的。我本来有一多半是闹着感情，听了择生的一席话把气平了下来，只好答应他又维持下去。

那一整天择生都留在汉口，我陪着他跑了好些地方，直到晚上他又才过江去了。

但在夜间在主任室的办公桌上我找出了一张写了几行没有写完的信笺，是择生写给广东的留守主任孙炳文①的。信

---

① 孙炳文（1885—1927），字濬明，四川南溪人。一九二二年在柏林参加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长等职，北伐时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被蒋介石杀害于上海龙华。

里有这样的话："革命的苦楚易吃，同志们的气难受，我恨不曾在武昌城下战死。……"

二六

九月下旬，总司令部终竟移到江西方面去了，战事的中心已移到江西。总政治部有一部分人也跟着去了。各地方来归附的军队很多，凡是有来归附的军队，他们最先所请求的便是派遣政治工作人员。所谓政治工作在当时的旧军阀们看来，就好象和打出青天白日旗一样，是成为了革命军的必要的徽章。他们并不知道政治工作的真意，但很知道南军和北军在组织上的重要的不同处便是在这种工作的有无。有了这种组织的南军打了胜仗，就觉得这种东西是使军队强盛的良法，因而政治工作便成了一个时代的宠儿。各方面来归附的军队既多，所派遣到各处去的工作人员也就不少。胡公冕所带领的一个宣传大队，所有的宣传员，不久便被派遣一空。连公冕本人也就不得不被派遣到江西去了。

总司令部移到江西去后，有行营设在汉口，行营主任便是择生。同时湖北省政府也相继在汉口成立了，省政府的主任也是择生。他以一人而身兼三主任，自然很忙，因为工作关系留在汉口的时候多，顿在武昌城下的时候少了。在南湖剩下的少数政治部人员在九月尾上索性通统移到了汉口来。附属着的党红会也分遣到武汉各军的军医处服务去了。最有趣味的，是那由择生所要过江去的工贼郭聘伯又郑郑重重地护送

过了江来，仍然关闭在烟草公司三楼上一间小楼房里。

政治部一搬过了江来，工作人员添多了，同时内部的负责人员也由择生调动了一下。他把编纂委员郭冠杰①改任为总务科长，把属于总务科的财政股长也改换了。

冠杰是择生的同乡，也是陆军小学的同学，后来是改习了法政的，曾经在法国留过学。他因为和我是同姓，时常称我“宗兄”。他是择生最亲信的人，时常肯把择生的私话来传递给我。他初到汉口来的时候对我说：“择生时常说，宗兄很刻苦，革命性很强，择生是十分敬重的。在长沙时宗兄的工作做得很好，到汉口来的工作便杂乱得一点，自然也是局面大了的原故。”

他一接了事之后，照政治部的规定，总务科长本是有批核一切来往公文的权限的，他便把德谟素来担任着的工作一手接过去了。但他对于这层却没有经验，每天几十百件的公文堆积在他的案头不知道怎样处理。过了三天又由邓主任的命令叫把所有的来往公文仍归德谟办理。

湖北省政府在当时真正是一种鱼龙漫衍的模范政府。那个委员会五花八门地是什么人品都有。有的昨天还是罪该万死的旧军阀，而今天便一跃而成为了功高千古的革命元勋。在咸宁以后和我们一同驰驱过两天的詹大悲和李汉俊在其中要算是铮铮佼佼的第一流人物了。省政府的内部组织是分成四

① 郭冠杰(1892—1952)，广东梅县人。曾留学日本、法国，回国后任广东大学等校教授。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纂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与反蒋和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活动。

科，科长秉承委员会的意旨受各委员的指挥以执行政务；其中的教育科，择生要叫我去担任，连委任状都下了，是总司令部第七号的委任状。但这项委任我坚决辞退了。

有一天择生到政治部来，他问我："为什么要辞退教育科长的事？文化工作正应该大干一下，除你而外没有再适当的人。"

我的答话很直率，我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做官的，受你的指挥我可以，要秉承大委员们的意旨我却办不到。"

——"你不干谁个好干？"

——"汉俊正是很适当的人物，你找他，他一定可以承担。他以委员而兼科长，就和詹大悲一样，办事也会顺手。"

在我明确地把意思表示了之后，大悲和汉俊也到政治部来找过我。他们起初以政府委员的资格，说要委屈我，要我一定把教育科的事情担任起来。

我仍然说："我不愿意做官。"

大悲说："革命政府也不能不要官，革命的官和反革命的官是不同的。"

——"不同的只是名目罢了。"我说。我在这儿索性把大悲先生俏皮了一下："譬如你老先生担任着委员而兼任实业科长，还有湖北矿务局的局长，你老先生不和前清时代的道台一样吗？"

大悲先生不动声色地笑着说："这是策略问题啦，你知道我们是兼差不兼薪的。"

这位先生我不知道怎的，对于他总有一种先天的厌恶。我

自从认识了他以来便不高兴他，他的一切派头不外是一个官僚的模范。他老先生是惯爱讲策略的，说不上十句话便会有五个"策略"的字眼。他是湖北人，又是当时的中央委员，自从军事一进展到武汉以后，他俨然就象是邓演达的执掌鹅毛扇的军师。邓对于他也就和刘玄德之于诸葛孔明，如鱼得水了。

——"你不干谁个好干呢？"汉俊说。

——"你正好干啦，我已经向择生推荐了你。"

结果是汉俊说，他暂时为我代替着。又说他打算组织一个教育编制委员会，由省市党部的宣传科长、省政府的教育科长，以及其他适当的人物来构成，要我去做主席，但是我也谢绝了。

二七

江西的战事没有初到武昌城下时那么顺利。旧历的中秋第六军曾经攻进过南昌一次，但受到敌人的反攻。以众寡不敌反遭了一次惨败。战线绵亘着南浔铁路一带，敌人据着南浔铁路，以徐家埠为中心，上下策应，和他应战的有第七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一共好几师人，支持了许久，终不容易把敌人打破。在九月尾上孙传芳的军舰公然有两只开到了黄石港来，竟连武昌围城的兵士都不能不开了大部分去抵御。这个消息是保密的，但城内的敌人和汉口租界的帝国主义者有连络，却早知道了，乘着围城的兵力稀薄时，有一夜公然敢于派遣了一部分人缒城而出。适当其冲的是叶挺的独立团，混战了两个钟头，算把出城的敌人通统歼灭了。独立团也遭了很大的损失。那一团人经过几次的激战，所有的下级官长几乎是阵亡干净了的。

炸城的工事也遭了好几次的顿挫，有时是挖得太深，出了水；有时又挖得太浅，地面凹陷了下去；更有两次挖到了城濠，自己把地道穿破了。每遭一次顿挫，总要使前功尽弃，又来重起炉灶。因此工作便十分迁延，武昌城的攻破遥遥无期。京、沪等地及国外的报纸竟把守城的敌将刘玉春英雄化了，把他称赞得就和田单、张睢阳一样。

但是粮食的封锁是收了很大的效果的。武昌城有二十万人口，围到了三四礼拜上来，城内的粮食估计早已用尽了。城内的人和汉阳、汉口的人大抵非亲即友，因此汉阳、汉口二地水面上的人物们便发起了营救运动，想把城里人救出。这在本军方面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和城内费了种种的交涉，在十月初头，便有开城放出饥民的事。约定了每天上午在一定的时间内由汉口派船去迎接，船上插着白旗为号。

头一次开城似乎是十月三号，饥民为要拥挤出城，在文昌门的城门口竟挤死了两个人。那些出城的人的确是很狼狈的，据说一般没有积蓄的人在头一个礼拜便已经绝了粮。吃草根，吃树皮，吃猫，吃狗，吃老鼠，只是还没有闹到吃人的地步。有人把那饥民吃的土馒头给我看过，外皮是一种黄垢色的粘土和着一些谷糠，内面包着些狗肉和猫肉的心子，然而这恐怕要算是上食了。有储蓄的人自然又不同，但笼城期间过久，他们又有他们的焦愁和恐怖，这在事实上是促进了开城的原动力。

在那开城的前后，敌人已经失掉了斗志。城内的敌兵闹到一天只能吃得一二碗稀饭，城上的人每每有向城下的人打话的时候，他们向城下的兵士要饮食和烟草吃。城下的兵士问他们为什么不开城，他们把手棱在颈子上，表示他们的官长要砍他们的脑袋子。

但他们的官长，刘玉春① 和陈嘉谟，也派过私人到第八军

① 刘玉春(1878—1931)，字铁珊，河北玉田人。一九二六年为吴佩孚第十二师师长兼湖北省省长，守武昌。北伐军攻占武昌时被俘。

去通过款曲。他们要求保全他们的实力回河南去，要南军让他们出城，开出一条路来让他们退走，南军不加以攻击。但这个要求是遭了拒绝。

就在这陈、刘二人想投降而尚存着观望的期中，他们的部下有一位旅长却着了他们的先鞭，首先派了人来投诚，约定了在十月九号的晚上里应外合，把宾阳门打开来迎接我们。这位旅长似乎姓刘①，名字我忘记了。他的一旅人是编配在唐生智部下的。后来在武昌下游的铁路工程处成军的时候，唐、邓和我去监誓，各人作过一般训话。

双十节到了，在武汉要算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盛大的国庆纪念。

会场设在汉口北郊的华商跑马场，开会是在上午九时。参加的群众当得在十万人以上。团体旗、党旗、国旗的飞扬，国际歌、先锋歌、革命歌的合唱，口号的绝叫，万岁的绝叫，讲台上如火如荼的演说，各种音乐队的演奏，把那广大的跑马场化成了一片澎湃的大海。

正在开会中，武昌城攻破的消息传到了。这在我们本来是早已预知了的消息，但在一般的民众是出其不意的。消息当场传布了，民众的热狂真是到了绝顶。十万人以上的群众一时轰动了起来！脱帽，播旗，挥拳，鼓掌，破命的高呼。那宏大的怒涛，就象要卷成海啸，把那十几万的群众都卷到天空里去。

---

① 应为北洋军第三旅旅长吴俊卿。

怒涛一激动了起来，没有可以使它立地静止的力量。庆祝会的预定本来是还有好些人的演说，但都停止了。——演说已经是没有人听了。——于是便照着预定的路线开始游行。这对于汉口租界的帝国主义和在帝国主义掩护下的反动势力真是绝大的示威。

湖北总工会也是在这一天成立的，在汉口公会堂开成立大会。我参加了跑马场的庆祝会后又到这儿来。这儿聚会着的是各种工会的代表以及来庆贺的各机关、各民众团体的代表。这儿是革命的盐，革命的火车头，虽然没有那群众大会那么热闹，但所给与人的是坚实的铁槌般的感觉。

武昌方面在我们的军队进城之后，到了下午，又由第四军把刘玉春活捉着了。这个消息传到汉口来时是快要黄昏的时候，我们顿时印出了传单来散发，利用种种的方法来公布这个消息。有一个方法大约是代杰想到的，他叫人买了白布来用红水写着“刘玉春活捉了”的几个大字，把来围在一驾汽车的周围。让那汽车在汉口全市驰骋，同时又从汽车上散布传单。这一个消息，和公开这个消息的奇妙的手段，把在热狂中还未镇静的民众和市民愈见煽扬了起来。汉口全市都轰动了。汽车走一路，民众便簇拥在它的后面跟随着，到汽车把汉口巡游了一遍折回到后城马路来的时候，群众拥集在政治部门前不肯散，愈集愈多，把后城马路那条很宽阔的街道塞得水泄不通。政治部前面的出入竟开出了一条火巷子来。

这仍然是那驾汽车所生出来的效果。

汽车本是从前吴佩孚坐过的一乘朱红色的轿车，用白布

在三面围着，车窗恰被遮掩了，车的内部是看不出的。大家以为刘玉春便被囚在那驾汽车里面，因此都要等那车门打开，看着刘玉春出来。这完全是出乎意外的一种收获。在晚上邓主任和铁罗尼过江来的时候，他们费了很大的工夫才到达了政治部。铁罗尼大为惊叹，他对我说："这样的群众在莫斯科以外是不能够看见的。"

二八

第二天清早八点钟，邓主任由歆生路的总司令部行营到了后城马路来，因为八点半要开一次部务会议。

部务会议列席的人是各科的科长、股长，以及秘书，主席便是主任。邓主任所主持的会议，名目虽叫会议，照例是一种军事独裁，他是先在自己钞本上写出几条大纲，接着便用命令式宣布。

他这回所宣布出的命令，是要政治部全部迁过武昌，驻扎在旧省议会里面，以后的工作是偏重在农民运动方面。

这个步骤本来是应该有的，但要全部迁徙却是出于意料之外。我的意思是仍然以汉口为本部，而于武昌设立支部。因为汉口无形中已经成为了政治中心，而且也是武汉三镇的社会中心，对内对外的工作都以这儿为方便；而且政治部的工作在这儿已经有了一个月的基础，不应该完全抛弃，搬到那偏僻的在各种工作技术的运用上都不灵便的武昌。注重农民运动的工作在汉口也可以做，武昌设立一个小规模的办事处也就可以呼应了。

我把这层意思表示了出来，择生反对着说："目前的汉口虽然是政治中心，但这是一时的现象。武昌已经攻破了，政治中心是要移到武昌。不久省政府、省党部，都要次第地移过

去。还有是政治工作人员应该过艰苦的生活，久住在汉口是会堕落下去的。”

决议自然是照着了他的意思，等待那做着第四军军部的省议会空出之后便搬过江去，同时汉口的办事处留下几个庶务员看管，只当成一个购置物品的机关。

在会开完后择生过江去了，我在那天下午得到空闲也渡过了江去。城里的情形自然是十分萧索的，商家都闭着店门，居民都瘦削憔悴得象木乃伊。我的去向是往省议会。议会前面的广场中停集着好些北军的棺材，有些是南军进城后才收殓了的。天气还热，棺材都是些菲薄的木匣子，尸臭异常地熏人。

走进省议会时已经是天快黑的时候了，四军军部正在搬家，我叩问了几位负责人，知道第二天上午便可以空出。政治部也就决定了在第二天搬来。

那时被活捉着的刘玉春是关在省议会的楼上的。一位副官把我引到那间房间里去。那是在楼上第一排右侧的第一间小房间，里面是黑洞洞的，只在一张桌上放着一盏马灯。进门在右侧的角上放着一张木板床，刘玉春面着壁蜷卧在上面，有一个跟随的人在服侍着他。引我进去的副官打了招呼。刘玉春起了床来，很客气地请我坐。

刘很白皙而肥胖，足见他在四十天的围城生活中是丝毫也没有受苦的。他是一位中等身材的人。虽然在缧绁之中，大约也是狃于素来的威势吧，态度很能镇静。

我在那时和他谈过一席话，在第二天的《革命军日报》上

发表过。①我开首恭维他，说他能忠于职守，能把一座孤城死守了四十天，是难得的事情。

他也谦逊着，说他只是一介武弁，只晓得服从上官命令，上官要叫他守城，他便守城罢了。

——“但是，”我说，“你所服从的上官，吴大帅，一从贺胜桥溃败了下来，便渡过江跑回河南去了；而你一个人偏偏要来顶着担子坚持，使武昌城内二十万居民，为了你一个人受尽了四十天的水深火热的痛苦。你们又在武胜门外放火，烧毁了无数人家，使多数负郭居民无家可归，这无论怎样怕是该你负责的。”

——“在军事上是出于不得已，军人是只晓得服从命令，只晓得打胜仗的。”他回答着。

——“你这样的话，”我又说，“怕不见得是出于本心。军人的天职是在保卫人民的，所该服从的命令是保卫人民的命令，要打胜仗也是为的人民；不是专为某一个人效奔走犬马之劳，不是为要保全一二人的身家性命而屠民以逞。我敢于替你把本心话说出来，你是相信着吴大帅会卷土重来，吴大帅一时是决不会崩溃。所以你能够多支持一天，你的功劳更大，你会多得一重犒赏的。”

——“我决没有那样的心，我可以对天地神明发誓！”他抢着话头来辩驳。

---

① 《革命军日报》，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主办，潘汉年任总编辑。作者与刘玉春的谈话，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汉口新闻报》亦有报道，题为《革命军总政治部郭沫若科长和刘玉春谈话》。

——“你不用掩饰吧，”我说，“这种想头是谁也应该有的，你、我也并不是圣人。不过就是为了你这一念，武昌城内外的居民，你想，是怎样地受了灾难？”

他沉默了下来，隔了一会又再说时，声音愈见和软了。

——“我们军人的脑筋很简单，”他说，“我们没有深刻的心思。”

照那语气上看来，似乎有悔恨的意思在他的脑中盘旋。我最后又问到他的家族。他说，他最罣念的是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万一“国民军”的长官肯鉴谅他，使他能够保全生命，回家奉养，他以后决不再做军人，他要做一名驯良的老百姓。

和他谈了一席话，觉得他很真率，似乎并没有什么狡诈的地方，在旧军人中的确要算是难得的一个人物。他在我的谈话中似乎也感受了好些慰藉。当我把话说完了，和他拉手告别的时候，他很和蔼地对我说，他希望能够和我再见。他说他自从失掉了自由以来，来和他谈话的人都好象法官拷问囚犯一样，没有人象我这样的和气。

和刘玉春一别之后，在第二年的夏天他终竟恢复了自由。那时张发奎在做第四集团军的总指挥，我在做党代表，我们在旧督军署的总指挥部中还见过一次面。他还记得我，同时也还记得我们那一次的谈话。但他后来的情形是怎样，是不是做了“一名驯良的老百姓”，我不知道。

二九

政治部移到了武昌，驻扎在省议会的右半部，左侧的半部是要让给省党部的。幽囚过刘玉春的那间小房间开放了出来成为了会客室，在那东侧的一间大房间便是主任办公厅，其余的各科各股都分设在各个小房间里去了。

第二天清早，便是开城后的第三天，因为闲着，我自己便带着了一名对于战地的情形比较熟悉的副官和一名勤务兵，向宾阳门走去。那道城门离省议会最近，在那崎岖不平的一条街道上走不上四五分钟便可以看见城楼了。城墙内面的脚部，挖出很多地坑，是北军躲避飞机的工事。

出了城，先走到左手的一段高丘上去，那高丘上的一段城墙比较低，那儿便是九月初旬两次夜袭所选来爬城的地方。阵亡了的人很不少，尸首在城下暴露了足足四十天才得以收殓。我去时，尸首已经是被收殓了，但在那儿压了一个月以上，被压着的草，腐化了，因此在那青草地上狼藉着的手榴弹的残骸中，还纵一个横一个地呈出一些人体的烙印。

在那高坡上立着怅望的时候，有一群日本的新闻记者也走了来，其中有几个是我在汉口认识的。他们见了我，便来和我客气了一下，拍了好些照片。日本人对于中国时事的关心，对于中国情形的侦察，真正的是无微不至。南军占领了武汉

的时候，日本的各个报馆、各个通讯社，都派有专门的访员，勤勉地访查四面的消息；但是上海方面的本国的报馆和通讯社的访员，我却不曾看见过。中国的访员和记者，似乎只消用一瓶浆糊、一把剪刀、几份外国文的报。

城濠对面也耸立着一个丘陵，丘陵顶上有一座庙宇，四围有红色的墙围着，那便是长春观，纪德甫的阵亡处了。我怅望了一会，徐徐地走下了高地，想踱过长春观去凭吊。从那城濠的石桥上踱过，在对岸的右侧现出了一个窟窿，副官指着对我说："那便是最初一个地道，打穿进了城濠来的。"

地道工作的根据地是在长春观下负郭市街最前头的一家茶店里。那家人家几乎被挖出的泥土所堆满了。屋顶、屋壁、和堆积的泥土上的弹痕不计其数。

立在地道工作的洞口上看了好一会，我想上长春观的心事又改变了。我想缓几天等到择生或铁罗尼有了闲暇的时候，再约他们同去，好问明纪德甫阵亡时的地点和情况。因此我便离开了那儿，沿着城濠边，向通湘门方面走去。

走不好远，在城墙顶上呈现出一个缺口，副官指示着对我说："九月下旬敌人出来夜袭的时候，便是从那儿缒城而出的。在那城濠里死了的敌人很不少，从昨天起一样地在收殓，但因为火材匣子不够，尸首还没有收完。"

收了尸的火材匣子有好多还堆积在城濠边上，没有收殓的尸也还东一个西一个地腐化得不成形状。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奇臭。

走到通湘门，城门是闭着的。城门外也还横着好些尸首，

有些是我们自己的人。我冒着那浓烈的尸臭，在一些死尸间向那城门走去，在那城门洞下也横陈着好几个尸首，都是穿着革命军的军服的。尸首大都偃伏着，其中最把我打动了的，是靠着城门洞的左壁坐在地上的一个，两手叉着，头部是折叠在胸上的。这些阵亡了的勇士不用说都是受了重伤，爬到了这城门洞口来暂时躲避敌人的弹雨的；但他们的伤害很重，就要乘着夜阴爬回自己的本营都不能够办到，便睡的睡着，坐的坐着，整整地在那儿饿死了。想到他们的彻骨的疼痛，想到他们的焦灼的饥渴，想到他们的绞心的忧虑，忧虑到自己的生死和留在故乡的家族，禁不住有灼热的眼泪在眼睛里汹涌。但我那时候的感触却是没有流于感伤：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死是光荣的，他们的血是有代价的，他们是死得其所，是死而无憾。……但在七八年后的现在我写到这儿，我对于当年的夸张的感想，只能够自己对着自己冷笑了。

离开通湘门又朝前走了一节，走到了铁路的路线上来，有几架敞车陈列着，车上近城的一侧树立着五六尺高的钢板。那钢板上大孔小洞的弹眼，很象是暴雨落过后的沙面。很想再朝前走，由中和门或者保安门折进城去，但觉得路太走远了，费了已经不少的时间，怕部里有什么事情要找我，又只得从原路折回。

三〇

自从移到武昌以后，很象是已经失掉了弹性的橡皮带子一样，比在汉口时清闲得不可比拟。

在这时又是我烦闷开始的时候，我很想辞掉那时的位置，索性回到上海或广东去做点更称意的工作；要是不能够，便索性再退回书斋。

在武昌究竟做过了些什么事，我现在已经很模糊了。但奇妙的却有一件小小的事情记得异常鲜明。

政治部驻扎在旧省议会，本是在围武昌城以前便预定了的步骤。武昌开城以后，不料湖北省党部也预计着要设在那儿，他们在择生处办了交涉，又只得由我们让出一半来彼此分住。

我们先进去，因为是政府机关，自然便把国旗挂在屋顶正中的旗竿上了。省党部隔了有一个礼拜的光景又才由汉口搬过来，部里的人也很替他们帮了一下忙。

省党部一来，自然是又要升挂党旗的。在要升旗的一天，他们要政治部把国旗下下来，让他们把党旗升上去。开首是在下级人员间有了一番争执，部里的同志走来告诉我，叫我无论怎样不要退让。

接着很兴奋地来了两位省党部的人，他们来会我，说明要

换旗。一个说："'一切权力属于党'啦，党部是在一切政治机关之上。"一个又说："党部是革命力量的中心，我们应该'拥护革命的中心力量'啦。"他们都在把我所编拟的口号来作为大前提，对着我大发议论。

我对他们说："国旗已经挂上了，又要下下来，未免不成体统。省党部的党旗，能够在前庭正中另外立一根旗竿来挂上，是再好也没有的。"

两个人看见我没有退让的意思便退出去了，又搬了一员大将来。

来的是T①，T是湖北省党部的委员，同时又是省政府委员，又是共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我对于他，平常是怀着敬意的。

他很幽默，没有初来的那两位年青人那样地剑拔弩张。他说："党部办事的人总是很迂缓的，没有政治部的人办得敏捷。"他希望我们敏捷地另外树一根旗竿，把那屋顶中央的旗竿让给他们。

这本来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但因为要顾全部内同志的意气，我也不好由他的一幽默便软化下来。

我也带着幽默的意味说着："国旗已经升上了，不好无故地扯下。要说省党部是党部，是在一切政治机关之上，但是总

---

① 指谭平山(1886—1956)，字明谦，广东高明(今高鹤)人。曾任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参与改组国民党，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等职。一九二七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农民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后又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政治部在出发时受了中央党部的委托，是有指导并解散地方党部的权限的。……”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T 把他的态度改严重了。他说：“你要那样说时，那我还是中央委员啦！”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说：“你是路易十四①的新翻译家，路易说‘朕即国家’，你现在把它改成‘我便是党’。”

T 辞去了，结果仍然是在前庭中树了一根旗竿来，把国民党的党旗挂上去了。

这件事情想起来真是无聊，但那时的革命同志们大多数也每每爱闹着这样无聊的意气。三分来是革命，七分来是做官。

和这同样的闲气，初到汉口时也和市党部闹过一次。德谟办了一通公文给市党部，他因为政治部受过中央党部的委托，便把市党部当成了下级机关，公文送了去，由市党部的人附笺退了回来，说“本党部不便接受这样的公文”。结果是把中央的委托文件发表了出来，市党部虽然没有再说话，但是彼此之间的感情便弄得很有隔膜。他们对于德谟的批评特别严格，说他的“官僚气太重，不甘淡泊”。

到武昌来又由换旗这件事情闹得和省党部不和睦了，他们在外边对于我的批评，又是说“书生气太重，不甘寂寞”。

荏苒之间也就到了十一月初旬了。天气逐渐地寒冷了下来，江西的战事还迁延着没有解决。幸好武昌攻破后，把第四

① 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法国国王。初即位时，母摄政，首相掌实权。一六六一年亲政后，宣称“朕即国家”。

军的劲旅抽调了大部分人去应援，在马回岭的一战彻底地给与了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九江在六号的清晨终被南军占领了。这个胜利的消息到达武汉时，是七号的晚上，那天正举办了纪念苏俄革命的庆祝大会，在那大会的兴奋还未平复的时候得到九江克复的消息，和在双十节的庆祝会上得到了武昌攻下的消息一样，把武汉三镇都歆动了。

就在那天晚上，择生由汉口打了电话来，叫我作出发的准备，到九江去。他说："九江攻下了，南昌不日便会攻下，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异常吃紧，非我去主持不可。"

接到了命令，自然风急火速地准备了起来，挑选了六个我认为是能干而必要的同志和我同去。李德谟便是其中的一个。

但那时在九江和武汉之间，象黄石港一带，是还在敌人手里的。我们要往九江，便非改装不可。恰好在八号晚上有一只英国船要开往上海，我们便决定了搭乘那只船。八号清早过江去，在汉口置备了衣履，把装束改了，成了名实相符的便衣队。

因为要避开人的眼目，在晚上上船时只有两位便衣同志送行，都是汉口的负责同志。话头自然是每易回顾到我们初到汉口的当时。那时也是在反动势力还在蠢动的局面下跳进去的，他们都承认我们多少是做了一些垦荒的工作。有一位是市党部的组织部长P，为德谟用上行下的公文和我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略略争执过的，到这时把所有的怨嫌都化除了，他特别恳切地同我和德谟握手，祝我们健康，祝我们前途无恙。

把送我们上船的人送上了岸，立在甲板上看着灯火中的武汉在我们的眼前移动了起来。素来是很沉默的德谟，在这时候立在我的旁边自言自语地说：

——"这回可惜没有德甫和我们同路。"

他这一句话正道破了我那同一瞬间的怅触。

——"德甫停丧的地方你晓得吗？"我问他。

——"S同志是晓得的，我几次想约他去看看，还没有得到机会，S便派到江西去了。"

——"我连要到长春观去看看，都没有去成。"

我们当时对于武昌城的留恋似乎就只有这一点。在半年以后我们虽然也回过一次武昌，但那长春观我至今没有去看过，德甫停丧的地方我至今也不知道。只有那汨罗江畔的露营，崇阳山中的跋涉，咸宁道上的奔波，宾阳门外的流血，就象已经旧了的影片一样，时而在我的脑幕中浮动着。

后　记

这篇回忆录在《宇宙风》①上分期登载了十五次，算登完了。我现在把全部重读了一遍，稍微添改了一些字句。在杂志上发表的本是三十一节，因原先的二十七、二十八两节太短，为保持全体的均衡，我把它们合并成了一节，故今成三十节。就尽它们以这样的形式作为我的定稿吧。这儿有一件事应该附带着提一下。本篇在发表"中途"，上海有一家幽灵出版社，把前二十五节盗取了去，作为《北伐途次——第一集》而"出卖"了。② 那儿公然还标揭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字样。所谓"侯门仁义存"，真正是有趣的一件事。有好些朋友说，中国人不懂幽默，但据这件事情看来，我却感觉着我们中国人是第一等幽默的民族。——

敬录该《第一集》的代序之头一节，以为本《后记》的尾声吧：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三七年六月上海北雁出版社出版的《北伐》。

① 文艺刊物，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创刊于上海，林语堂主编，陶亢德、林憾庐等先后任编辑。初为半月刊，复为旬刊，又改为半月刊。一九四七年八月十日出至第一百五十二期后停刊。

② 幽灵出版社，指上海潮锋出版社。该社于一九三七年一月盗印作者此篇回忆录，书名《北伐途次——第一集》。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途虽然被人出卖了，但不论怎样，它在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历史上的烙印，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1937年2月15日记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本篇写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同年四月作为武汉《中央日报》附刊（单行本）发表。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惨杀民众的大屠场。他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①、张宗昌②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绘的刽子手了。他的罪恶书不胜书，我现在只把他三月二十三日在安庆屠杀党员、屠杀民众的最近的逆迹向我们的同志及各界民众公布。

我们是三月十六离开南昌的，他比我们早一天到达九江。九江的“三·一七”惨杀③已经在我们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一个永远不能磨灭的污点，但我们那时候对于惨杀的暗幕还不曾

---

① 张作霖（1875—1928），字雨亭，奉天海城（今属辽宁）人。奉系军阀首领。曾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职。一九二四年直奉战争后，控制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二七年杀害共产党人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二十余人。次年被蒋介石战败，由北京撤回奉天时，在皇姑屯站被日本人炸死。

② 张宗昌（1881—1932），字效坤，山东掖县人。曾先后投靠山东民军都督胡瑛、直系军阀冯国璋、奉系军阀张作霖。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独霸山东。北伐期间南下援助孙传芳，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后又被迫退回山东。一九二八年所部被蒋冯联军消灭。

③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六、十七日，蒋介石唆使歹徒捣毁南昌和九江的国民党市党部，解散总工会，血腥屠杀民众。

明了，主持这场惨杀的究竟是甚么人我们还不曾知道。我们对于他虽然不免已有几分怀疑，但我们还以为他总不会是主使的人，主使的人一定是段锡朋①、周利生等等背叛民众的党棍和走狗。及到“三·二三”惨案发生，我们才知道了这个阴贼险狠的大叛徒——这个万恶滔天的蒋介石！

“三·一七”惨案发生后，第二天他就命令我们到安庆去。我们是在十九号到达安庆的，他比我们迟到一天。安庆的民众在省、市党部的指导之下所表示的欢迎他的热诚，可以说是空前所未有。安庆在“青天白日”的旗帜（国民党的党旗）之下复活了起来，安徽省党部正在召集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准备组织正式省党部以推行国民党的主张。代表大会本是预定三月十号开幕的，听说蒋介石要移驻安庆，便专为他延期到三月二十二日。安徽省的党员同志对于他所表示的拥戴的热诚，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了。但就是这个过于迁就的表示早伏下了无穷的危机，我早就忧虑到大会的进行恐不能够顺利地闭幕。不料我所怀抱的忧虑竟成了显然的现实——而且是很残酷的现实。

三月二十二日代表大会开幕，就在开幕的那一天，便发生了惨案的痕迹了。

先是安庆城内有四个总工会，一个是在省党部指导之下

---

① 段锡朋（1896—1948），字书诒，江西永新人。“五四”时期曾任全国学联主席。一九二六年由陈果夫引进加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发起组织“AB”团，参与制造江西一系列惨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任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

成立的，其他三个都是投机分子们的非法的组织。三个之中比较纯正的两个，已经由省党部和政治部把他们合并了起来，只剩下鲁班阁的伪总工会，完全是由劣绅土豪收买流氓地痞所组织的。每人出洋四元，入会后不纳会费，并赠送一个银质的徽章。如此重价收买，也才仅仅得了一二百名的会员。这个伪总工会无论怎样是不能够听它存在的，所以党部早就有命令叫他们解散。我们总政治部到后，也就在二十二的那一天，下了一道命令去叫他们停止职权，听候审查。但他们所借口的是说奉了总司令的命令组织的。在当初我们还以为是他们的梦呓，所以我们也就没有顾虑。不料就在二十二的那一天下午二时的光景，刚刚把代表大会的开幕典礼举行完毕，他们伪总工会的暴徒们便簇拥至设在省长公署的总司令行营前面。他们举了代表去要求见蒋介石，蒋介石也出来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说是他们受了压迫，本总司令是要秉公办理的，务要使他们不受压迫，望他们安心。

总政治部是设在第一中学的，那时候我也没有在总司令部，我因为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典礼，弄得一身都是汗，我便偷了一点机会去洗澡。当我洗澡还未完毕，便有人来报告，我便赶到总部行营，看见暴徒们还聚集未散，总司令部特务处的副处长温建刚在那儿指挥。我向他询问一切的情势，他才把蒋介石的一段话告诉了我。我还听说是省党部的常务委员光明甫同志在总部行营前已经受了暴徒的殴打。我没有再事羁延，便一直跑到内里的总司令室里面去。

蒋介石的居屋是平列的两进房间，第一进是会客室，第二

进才是他的寝室。我走进第一进的时候，看见光明甫同志坐在那儿，他把他扯坏了的衣裳和抓破的颈部指示给我看。我看了又走进了第二进去，蒋介石正坐在书案的旁边，他立起来叫我坐，我也就坐了。——这是他对于我的惯用的礼貌，别的部员见了他的时候，总是用立正的姿势来向他对话的。

他说："今天的事情你晓得吗？"

我说："我到总部里面来才晓得的。"

他问我究竟是怎么的一个起因。我便把伪总工会的构成和我们对于它的态度说了。

他说："你以后对于民众团体的态度总要不偏不袒才好。你去调查一下，把他们合并起来，把他们调和起来好了。"

我说："只要有调和的余地，我们当然要替他们调和。不过恐怕事实上很难，总司令是看见的，他们在总部面前便实行用武力打人。"

他说："好啦，好啦，你去调查一下好啦，唵，唵，你去调查一下好啦。"

不得要领地说了一番话，我便退了出来，他也跟着我出来。我们又同光明甫同志会谈。光明甫同志请求他对于当日的暴动要加以相当的制裁。他只口口声声地说："好啦，好啦，调查好啦，让政治部调查好啦。"

明甫同志说："今天的事情可以无须乎调查，他们是在总司令部的面前行凶，总司令是亲眼看见的。我这伤痕，我这衣服，便是真实的证据。总要请总司令立刻查办一下，我们做党的工作的人才能得到一种保障。不然，我们党部同志个人的

生命不足惜，我们的党是永远立不住脚的。”

明甫同志很象是一位直爽的人，他又受了侮辱，他的神气已经有几分激昂，而他的语气更不免带了几分愤意。

蒋介石也不客气地用批评的态度说道："其实你们做指导工作的人没有做好，你们不免有些偏袒，所以才激成了这样的事变。我已经叫总政治部去调查了，我看最好是把两个工会合并起来才好。”

明甫同志说："工会是一回事，暴动是一回事。工会的合并由总政治部去调查，只要认为可以合并就合并起来，只是今日的暴动要请总司令惩办一下。”

我在旁边也帮助明甫说了一遍，逼得他没法，只得信口地说道："好啦，好啦，我警戒他们一下好啦，唵，唵。”

就这样不得要领地又谈了一番话，明甫先走了。蒋介石对我说："安徽的事情是顶难办的，顶扯烂污的是安徽人，在革命党中扯烂污的多是安徽的同志，你不信，你看，他们还要打呢，还要打呢。”

做一个总司令的人，自认为最能够革命，是革命党的领袖的人，竟说出这样无聊的话。他明知道他们还要打，而他全不加以丝毫制裁，这是甚么道理？我当时心里不免有这样的愤恨，我相信读者读到这儿也不免会有这样的愤恨，但是不忙，且看下文便可以知道他的葫芦中卖的是甚么药了。

二十二日的晚上反动团体送了一张请单来。请单的上面是这样写的：

安徽省农民协会

安徽省总工会

安徽省商民协会　各筹备处谨择三月二十三日

安徽省学联会

安徽省妇女协会

休业一天，于上午九时在白日青天开市民欢迎大会。

安庆市民大会敬订

欢迎蒋介石的市民大会已经在二十号举行过一次，由省、市两党部共同召集的。现在又要来举行，他们反动团体的阴谋是很显著的。我预算着他们是定会有一番大规模的暴动，当晚我就派人出去调查，没有得到甚么结果。第二天清早又继续调查，并得着第三十三军政治部的报告，晓得他们组织了一百名的敢死队，是出钱买来的流氓，每人四圆，并且还有一种赏格，便是负轻伤者一百圆，负重伤者五百圆，丧命者一千五百圆。暗中主使的是总司令部的某某人我们也知道了。我当时便派人出去通知市党部及各种合法的民众团体，叫他们先作准备。一方面我又亲自跑去见蒋介石。

二十三日的一天是大雨，我们还以为反动分子的集会或者会延期，但是走到街上，各家铺店多已贴出一种红纸墨字的印刷的标帖，写着"本日欢迎蒋总司令，一体停市一日，安庆市民大会订"等字样，可见他们的阴谋是很有准备、很有组织的了。我走到总部行营门口的时候，看见特务处长杨虎①、副处长温建刚、总部参议刘文明、前总部秘书现充独立第五师党代

① 杨虎(1888—？)，安徽宁国人。江南将弁学堂毕业。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

表姚觉吾、第四十军党代表李因① 等，全身雨衣雨帽，神色匆匆地由总部走出，大有如临大敌的光景。我一直走进总司令室的门前，门是由里面反扣了的。我问侍从副官，说是在会客，我便退入西侧——总参谋长室。该室与总司令室对称，中间隔了一个小小的中堂。室中也分二进，总参谋长朱一民②也在第一进里会客，我便退在一旁。我隔着门帘看见第二进的寝室里有许多长袍短褂的人，在总部里素来是没有看见过的。那些人都站着好象在等待甚么，又好象在开会的光景。少时杨虎和姚觉吾先后进来，和我略略应酬了一下，又走进内室里去了。我坐了一会，又来了一位安庆电报局长，这是一位矮小半胖的人，大概有四十三四岁的光景，脸色是带青灰色的，左眼有点斜视，矮子的姓名我现在已经忘记了。他来和我寒暄，问我认不认识谢慧生（谢持），认不认识杨庶戡，我都答道认识。又问我从前在上海住在甚么地方，我说是环龙路四十四号。他大约相信我是西山会议派的一个分子了吧，便把声音放低，对我说出许多秘密的话来。我把他招到屋隅，两人并坐在一张长藤椅上说话。

他说："我们这一次的工作做得还算不差，我们在三个礼拜以前便把各种行帮的工头买贿好了，我们立刻就把总工会

---

① 李因（1891—？），安徽巢县人。日本振武学校、士官学校毕业。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党代表。

② 朱一民（1890—1963），名绍良，原籍江苏武进，生于福州。一九二六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参谋长，次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昌行营参谋长、总司令部参谋长。

组织了起来。其他农会、妇女协会、商民协会，我们都组织好了，所以我们党部的捣乱分子，走来就插不住脚。”

我称赞了他们一番，又说：“好是好，但只是一个空头的团体，他们捣乱分子依然还是要捣乱的，我们总要有一种武力来制裁他们才好。”

他听见我说，便很得意地说道：“有的，有的，我们昨天打了一次你是晓得的，我们今天还要打呢。”

又另外说了些闲话，我问他安庆的青红帮① 有多少人。他说：“不少，不少。”

我说：“青红帮我们和他们总要有联络才好。”

他说：“是呢，是呢，我们早联络好了，九江、安庆、芜湖、南京、上海一带，我们都和我们的‘老头子’联络好了，我们要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倒赤化分子。”

我说：“我们的杨处长杨大哥，他这一次的功劳很不小。”

——“嗳！就全靠他老哥子！”

你矮胖的斜眼局长！我真多谢你这一句话，所有一切的内幕我已经知道了一半了。在二月初头的时候，蒋介石委任了四个上海的大流氓为驻沪特务员，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他的用意之所在。那时候我和总政治部铁罗尼顾问谈起，铁罗尼顾问问我是何用意，不消说我是没有话来回答，我记得我只回答了一句笑话：“大约这就是他的所谓下层工作吧。”但是现在我明了了，我得到明确的答案了。我们的总司令是勾结青红

① 即青帮和红帮，皆清代以来民间秘密结社组织。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青红帮头子被收买利用，充当破坏革命、残害进步人士的工具。

帮来和我们革命的民众作战的英雄！你看我们国民革命军三色识别带不是变成了青红带了吗？这就是说我们革命军的总司令已经成了青红帮的老头子了。我们是何等的光荣呵，三民主义已经被流氓主义代替了，猗欤休哉！

我和斜眼局长谈话的时候，杨虎、姚觉吾诸人惶惶然如将赴猎的鹰犬，时出时入，并不断注视我，我也不便再行多谈，并且我也恨我的听觉不幸得了慢性的中耳炎，斜眼局长告诉我的秘密，我至多只听到了三成，然而我也算达到目的了。

我推诿着要去见总司令，便把谈话中止，走出室来。总司令室的房门依然是反扣着的。我告诉了侍从副官，说我到交通处去了，请他随后来关照我。

我一直走出来，走向交通处长陆福庭①的房里去。走过第二进的大堂的时候，已经有不少的反动团体的打手鹄立在那儿，有刘文明、李因、温建刚诸位豪杰在那儿指挥。我走过身去见了陆福庭。

福庭他号叫心亘，是从“恒”字拆开的，取的是“人贵有恒”的意思。他是一位忠厚长者，在总部里面我最喜欢他这一个人，他也很能和我要好，但我现在要把他告诉我的一番话实写出来。心亘呵！我知道你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你是具有革命热诚的人，万一我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于你的地位，乃至于你的生命有甚么危险的时候，我请你不要怨恨我。

我见了福庭，他也不免带了几分愁容在他的古铜色的罗

① 陆福庭，别号心亘，安徽灵璧人。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交通处长，后任南京政府陇海铁路管理局局长等职。

汉模样的脸上。他开口便向我说:"安徽的事情弄得这样糟，你是政治部主任，你应该怎样办呢?"

我说:"我能够怎么办呢? 总司令不要我办，你叫我怎样办呢? 我今天就是要去向总司令请示办法的。"

——"你见过他没有呢?"

——"他还在会客。"

——"昨天打架的事情你晓得不晓得?"

——"我怎么不晓得呢，今天还要打呢。"

——"是啊，是啊，要闹得一塌糊涂。"

我说:"你怎么不去向他说呢?"

——"我怎么能够向他说呢?"

我说:"你是安徽人，你又是一位忠厚长者，老总待你也不薄。你看见老总一天一天和民众脱离，你看见安徽的民众一天一天地更要受深厚的痛苦，你应该救救你们的乡梓，应该救救老总才行。你的话老总一定能够相信的，你赶快向他忠告一下吧。"

他抱着手只是摇头。他叹了一口气说:"哎，我敢说一句话，总部里面的安徽人除开我而外那一个不是忘八蛋! 他们只顾自己的升官发财，天天去包围老总，把老总弄得个莫名其妙。我一个人孤掌难鸣，所以我也只好装聋装瞎装哑，看见的当着不看见，听见的当着不听见。假使张治中① 还在这儿，我

---

① 张治中(1890—1969)，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巢县人。曾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北伐时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训练处处长等职。

也没有这样孤单，我也可以说两句话。”

他说的时候，两眼圆睁着分外的发光，全部的面孔都涨红了。这正是他的诚恳的人格的表现，我在他的面前总觉得自己这样不好，我不该假意地做出了许多表情来逗引他说出比我更知道得详细的秘密。

我说：“假使老总不给我一个办法时，我要向他辞职，你看怎么样？”

他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到了南京再说。”

我说：“陆大哥，你要替我想一条出路呢！”

他只是说到了南京的时候再说。他停了一下又说：“到了南京一定是要大流血的，你看吗，你看吗，老总一定是要拿人！”

——“你看他拿人的时候会不会先拿我？”

他略略停顿了一下说：“不会吧！”

我又激励着他说：“你究竟还是应该先向他忠告一下的好。”

他说：“我是不好说的。”

我故意地激昂起来，我说：“你不敢说，那我要去说，我今天是决了心来的。他要枪毙我，我也要向他说。象他这样和民众脱离，我不忍心见他走到绝路。”

福庭沉默了一晌。他说：“你晓得他们打架，在暗中主持的是甚么人？”

我说：“我怎么不晓得呢，就是杨虎他们联络起青红帮干的好事。”

——“对，你晓得了，你还说甚么！”

我说：“唯其是晓得，我定要去说。他们这些人不消说也是忠于老总的，但他们所用的方法只是送葬老总的。我不忍心看见他被他们包围。”

他又叹了一口气说：“哎，我看你还是不去说的好吧。”他把声音放低，又向我的耳边说道：“你晓得吗，杨虎是老总命令他来干的！”

说了，他把眼睛向外放出一段白光看着我，他的面孔还带着一个“你晓得吗？”的神气。

我又沉默了一下，又问他：“你怎么晓得？”

他说：“是小波（杨虎的号）亲口对我说的。”

两人从此沉默了。啊，我已经知道了这场黑幕的全部了。陈赞贤① 的惨案为甚么他批准了对于倪弼② 的免职查办时又叫我不要打电报到赣州去；段锡朋、周利生等为甚么敢那样坚决地解决南昌市党部；九江的“三·一七”惨杀为甚么发生得那样离奇，这一切的背景我是完全知道了。在这儿让我来补叙一下以往的历史吧。

赣州事件的起初是在正月尾间，那时蒋介石在庐山，总部

---

① 陈赞贤（1895—1927），江西南康人。一九二五年加入共产党。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五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后调任赣州总工会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一九二七年三月被蒋介石密令杀害。

② 倪弼（1895—1958），别号公辅，江苏江都人。原为北伐军新编第一师党代表。一九二七年一月奉蒋介石密令捣毁赣州总工会，通缉陈赞贤，制造赣州惨案。

的事情是由张群① 一手包办。他当时接到倪弼捏造的电报，便把新编第一师第二团团党代表段喆人免职查办了。不久蒋介石回了南昌，才将赣州事件的全案交政治部查办。我当时便拟了一个办法呈报给他，请他将倪弼调开，然后赣州的事情才有办法，但他没有批发下来。后来我又当面向他说过两次，两次他都答应了我要把倪弼调开，但总不见他实行。最后倪弼更加刁恶了起来，终竟把陈赞贤杀害了。省政府当时来了一个公函请政治部严办。三月十二日的清早，就是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的那一天，我拿着公函去向他请示。他说："免职查办吧。"我说："那么请总司令亲笔批示。"他说："好的。"便提起笔来想了一下，批了"免职查办"四字。我又问如何查办法，命令如何下？他说："你用我的名字拿去登报好了，但不忙打电报到赣州去。"他这岂不是欺骗的行为，只是略略用些伎俩欺骗民众吗？

就是段锡朋、周利生等的行为我也当面向他说过几次。就在他临走的十五号的晚上，我听说省党部有解决市党部的消息，我又向他说。他当时便写了一封信给段锡朋，说"江西党务以后事事须与总政治部接洽，对于市党部事宜缓和为是"等语。我当时觉得非常的满足，以为可以免去一场纠纷以静待中央的命令。但是当晚他走了，第二天我们也奉命出发了，段锡朋、周利生辈终竟把市党部强制解散了。俟后南昌总部、省

① 张群(1889—1990)，字岳军，四川华阳（今成都）人。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南京政府成立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任军政部政务次长、上海特别市市长、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职。

政府、省党部打成一片，背叛中央，收买流氓伤兵几次想大肆屠杀，幸亏第三军第七师深能负责，保护地方的治安，他们的阴谋也就没有方法暴露出来。最近听说总部已向赣州调新编第一师来南昌，这是显然要把屠杀赣州的手段在南昌重演一次，这些假设没有蒋介石的命令，总部留守的张群，他有这样的狗胆吗？

三月十六我们到了九江，第二天他就命令我上庐山去视察阵亡将士墓的工程。我到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回九江，刚刚遇到暴徒们把九江市党部打完了的时候。暴徒们手拿武器在街上游行，长矛、大刀等等不一，尤有一种特别的武器形如连枷，上面纵横都是尖刀，也有的是竹头的尖钉。我走到总工会门首的时候，看见一位工友被打得头破血流，一身都是血渍，我才知道已经打伤了好几个市党部的执行委员，还打死了好几个。那时街上有些店铺已经罢起市来，我便跑到审判厅的总部行营里面去见蒋介石。门首正簇拥着无数暴徒，参谋长朱一民正在代表蒋介石向暴徒们演说。所说的话刚好和蒋介石向安徽伪总工会所说的一样。

我去见蒋介石，把外边的情形报告给他，请他派兵去赶快把暴徒弹压着，首先要解除他们的武装。不一会朱一民进来，报告他代表答话的情形，说他们送了六个人来，如何处置。蒋问有名单没有，朱一民交出了一张名单。蒋说把他们接受起来。我又催促派兵弹压。我说假使不赶快弹压，九江会要罢市，全体的工人也会要罢工，情势是很严重的。他当时便命令朱一民派兵，我也就退了出来，因为他叫我们十八号出发。但

他派兵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暴徒们暴动后，工友们愤激起来，顿时召集了纠察队来要求解除暴民的武装。他派了他的卫士大队去，一方面弹压工人，一方面掩护暴民出市，同时借保护为名竟把市党部、总工会占领了。工友们愤不欲生，开会讨论对策，全场只是痛哭，那种凄怆的情境真是惨不忍见，惨不忍闻。工友们要求“三·一八”全体总罢工，后来又举出代表向总部请愿，算把六位打得半死的同志搭救了回来，但因为念到军事时期，南京尚未克复，正是输运军队的时候，大家都忍气吞声，没有把罢工的事情实现。但是蒋介石对于罢工的策略，却早已决定好了，他当晚就任命第六军的留守唐蟒①为戒严司令官，叫他要禁止工人罢工，同时又密令初开到九江的警卫团，假如“三·一八”有工人罢工，便立行拘捕。

他对待民众就是这样的态度！一方面雇用流氓地痞来强奸民意，把革命的民众打得一个落花流水了，他又实行用武力来镇压一切。这就是他对于我们民众的态度！他自称是总理的信徒，实则他的手段比袁世凯、段祺瑞还要凶狠。他走一路打一路，真好威风。他之所谓赴前线督师作战就是督流氓地痞之师来和我们民众作战！赣州、南昌、九江的事变都是出于他的指使，但我们还找不出他指使的真凭实据来。我们还替他原谅，就是说或者不是出于他的本心，只因为他的环境不良，他是被他周围的群小误了。国民党内的人们可以说大多数都在这样地替他原谅，总要想出方法来救他。但是现在我

① 唐蟒（1887—1956），字圭良，湖南浏阳人。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谋长，后任军事参议院参议等职。

把他的假面具揭穿了。在安庆“三·二三”之变我看出了他的真相来，他不是为群小所误，他根本是一个小人！他的环境是他自己制造成的，并不是环境把他逼成了这个样子。我们听了斜眼局长那番话，谁个还有方法来替他辩护呢？现在还有人来替他辩护，那就是国贼，那就是民众的叛徒，我们要尽力地打倒他！

我在陆福庭房里谈了一番话后，蒋介石的侍从副官来了，我便走进去见他，照例是那几位豪杰杨虎、朱一民、温建刚、姚觉吾、刘文明、李因等等正在提刀上马准备和暴徒们出去杀民。朱一民是代表蒋介石出席大会的，他是今天的暴徒们的代理总司令了。

我去见了蒋介石，他带着一种栖遑不定的神气。

我说：“今天又要开会了。”

他说：“他们那么样子干，我是不出席的。”——看，他这岂不是不打自招吗？他刚才反闭着房门在和甚么人密议些甚么，我们是很可以想象得出的了。

我也老着面皮向他讲：“我们可不可以派点兵去保护省、市党部呢？”

他说：“你去向参谋长讲吧。”

我反说：“象现在这样军事紧急的时期，这种捣乱的集会，我看总司令可以下一道命令去解散。”

他说：“好吗，你去向陈调元讲吧。”他还要解释一句说：“他是维护这儿治安的。”

我平生最感趣味的，无过于这一段对话。他以为我是全

不知情，在把我当成了小孩子一样欺骗呵。蒋介石，你要掩盖些甚么，你的肺肝我已经看得透明，你真可谓心劳日拙了。

我又只好退了出来。朱一民一面好象忘了甚么东西又回转到他的参谋长室，我也把派兵的话说了一遍。他马马虎虎地答应了，也没有说派，也没有说不派。他走出去，我也跟着他走出去。那一群豪杰杨虎、刘文明、温建刚、李因、姚觉吾等等指挥着流氓把朱一民簇拥起去了。我从流氓群中赶回总政治部，又派人往四处通报消息，叫他们没有准备就赶快回避。还算好，待我第三次派人出去回来报告，说省党部及各种合法的民众团体通统都被捣毁了，打伤了六个人，重要的人物都避开了。

这打伤了的六个人里面有两个是七军政治部的人；有一个是省党部的干事；有三个是外县来赴会的代表。三个代表有一个是从旅馆拉出来的，有两个是一位男同志和一位女同志，他们到省党部去开会，适逢着暴徒们，便被擒着。暴徒们把他们的外衣剥了，只剩着一件衬衫，打得半死之后，拉着他们游街，说他们在省党部白昼宣淫，这就是共产、公妻的赤化分子榜样。暴徒们沿途高呼口号，甚么“新军阀神圣万岁”啦，甚么“蒋总司令万岁”啦，甚么“打倒赤化分子”啦，真是叫得恰如其量。他们确是捧出了一个“新军阀”来，他们确是捧出了一个“实行讨赤的新五省联军总司令”① 来了。暴徒们把打伤

①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在南京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作者借以比喻蒋介石在步孙传芳之后尘。

了的人拖到总司令部的门前便一哄而散了。这就是蒋中正的群众，这就是蒋中正的忠实的同志，这就是蒋中正的纯正的三民主义的信徒，也就是他所认为可以候补文天祥、陆秀夫、岳武穆的材料了。真正是新军阀神圣万岁啦！讨赤联军总司令万岁啦！猗欤休哉！猗欤休哉！

写到此地我也可以不必再写了，但是还有一点余谈。

那天暴动了之后，李宗仁①军长曾去见蒋介石，问他有甚么办法。他说："是民众打了的，我有甚么办法呢?"

我当天晚上也冒着险去会他，他仍然是那种老调子："好啦，你去调查一下好啦，唵，唵。"他最后还向我说："你去把他们各项的执行委员找出来吧，我们好保护他们。"我心里倒忍不住要笑了，好保护他们？哼，找出来好让你一网打尽吗？

这是我和他的最后的一次谈话。他第二天清早便乘着军舰出发了。我们以为他到了芜湖必定又有一场杀伐，但是南京克复就在他痛打安庆民众的这一天，他大约是在途中得到这个消息，所以就赶到上海去了。他日夜梦想的就是在克复南京，好实现他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春梦！但不幸克复南京的是富有革命性的程颂云②军长所指挥的第六军。在第六军

---

① 李宗仁(1890—1969)，字德邻，广西临桂人。国民党军桂系首领。北伐时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第三路军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攻打武昌、江西、安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参与"清党"活动。

② 程颂云(1882—1968)，名潜，湖南醴陵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攻打南昌、九江。一九二七年春任武汉国民政府委员、江右军总指挥，攻占南京。宁汉合流后任国民党特别委员会汉方委员，宁汉战争后任湖南省主席。

未克复南京之前，他使程颂云军长孤军奋斗，不给以充分的接济，不给以充分的后援，想和程军长攻入南昌城一样再加以一次打击。然而勇敢善战的第六军终竟把南京克复了。从浙江入江苏的第二军也和第六军会集了起来，这是我们革命势力的最大的一个屏障。他现在新发表了一个作战计划，就是要把第六军第二军调赴徐州，把何应钦①和白崇禧所领率的他的直属部队来镇守南京，他的阴谋是十二分显著的。他现在想解决第六军、第二军，同时还想解决第七军、第三军，他和陈调元、王普②、叶开鑫③等深深勾结起来，陈、王的军队现驻在芜湖，本来是应赴皖北的江左军（第七军）只有一营人驻在安庆，他也把它调到了芜湖，这就是他一方面想借陈、王的军队来断绝六、二两军的后路，一方也想来解决七军的一营。他取的是零碎击破的策略，这个策略在对第三军的手段上更为明显。他把第三军第九师调到当涂，名义上归程颂云军长指挥，把第三军的第一师驻扎安庆，名义上给李宗仁军长指挥，驻扎南昌的第七师他仍然在不断地零碎调遣，他这样使第三军已经不得成军，而他在江西方面不久正要为所欲为。目前所有的交通

---

① 何应钦（1890—1987），字敬之，贵州兴义人。一九二四年任黄埔军校总教官、教导一团团长。北伐时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东路军总指挥。南京政府成立后任第一路军总指挥、陆军参谋总长等职。

② 王普，字慈生。曾投靠直系军阀，又转附孙传芳。一九二七年三月在北伐军接连取胜时，于芜湖驻地反戈，所部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任军长。

③ 叶开鑫（1887—1937），字竞秋，湖南宁乡人。一九二七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五军军长，后改任第四十四军军长。

机关都握在他的手里，电信、邮局可被他严密的检查，前后方的消息完全隔绝，他防备近友比防备敌人还要厉害。我们从安庆拍发的通电全被扣留，比如安庆"三·二三"的惨案，九江、南昌的同志，竟连丝毫的信息也不曾得到，拍到各地方的电报也被扣留了。中央已发表以李宗仁军长为安徽政务委员会主席，被他扣勒着没有发表，另外擅行委任了一批二十八名的政务委员，去掉几位洁身自好、绝对不会服从他的伪命令的同志之外，都是些败残的军阀，安福系①、西山会议派的余孽，流氓痞棍的头目，比如青红帮上的杨虎、李因，著名的大刀会②匪的首领刘文明都是榜上有名的人物，而以陈调元为主席。现在安庆城内完全为白色的恐怖所支配，党部的同志除少数已赴武汉传达消息之外，都坚持着住在城内以与恶势力作殊死战。到了黄花冈节（三月二十九日）一定有冲突的，因为两方面都有准备，现在还没有消息传来，不知道又流了多少同志们的鲜血了。

但是这场奋斗是最有意义的。蒋介石叛党叛国叛民众的罪恶如此显著，我们是再不能姑息了。他在国民党内比党外的敌人还要危险。他第一步勾结流氓地痞，第二步勾结奉系

---

① 北洋军阀皖系政客集团。皖系军阀段祺瑞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后，皖系政客徐树铮、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举行伪选，成立"国会"，推徐世昌任总统。时称该集团为安福系，一九二六年段祺瑞下野后瓦解。

② 大刀会，原为清末民间反抗封建压迫和外国教会势力的秘密结社之一，属白莲教支派，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也曾被反动统治者利用，反对人民革命。

军阀，第三步勾结帝国主义者，现在他差不多步步都已经做到了，他已经加入反共的联合战线，他不是我们孙总理的继承者，他是孙传芳的继承者了！同志们，我们赶快把对于他的迷恋打破了吧！把对于他的顾虑消除了吧！国贼不除，我们的革命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数万战士所流的鲜血便要化成白水，我们不能忍心看着我们垂成的事业就被他一手毁坏。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

现在我们中央已经一天一天地巩固起来，新改组的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国民政府已经正式成立，武汉已经真真正正地成为了革命的新都！单从军事的指挥上来说，现在有了军事委员会，已经用不着再有蒋介石这个“总司令”了。所以消灭这个总司令，在军事的指挥上只是有好的影响，并没有坏的影响。

或者有人说：现在奉系军阀还没有打倒，我们便自相残杀起来，这于革命有很大的危险。我敢说这完全是一种杞忧，而且是蒋介石派反宣传的一种策略。他天天都在残杀我们内部，而他偏偏说“你们不要残杀”。“不要残杀”，就是说“我打你，你不要还手，好让我来独霸”，这是一种反宣传，我们千万不要中他们的毒计！

至于未打倒奉系军阀的话，我还敢说一句：未打倒奉系军阀，先要打倒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已经成了张作霖的爪牙。张作霖的命令他已经早早奉行了。张作霖说：“你把左派排开，你把赤化分子除掉，我就和你合作。”蒋介石早就拚命地排

斥左派，拚命地讨伐赤化了。我们根本的作战计划本来是决定北上与西北国民革命军①连成一气，先去打倒张作霖的。蒋介石因为想实现他的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春梦，他因为妒嫉冯焕章，怕冯焕章夺了他的首功，所以他题外生枝，要来解决长江下游。他对于冯焕章不肯加以接济，使他久陷在西北边地，不能早日东出会师中原；他甚至连武汉方面的党军也不肯加以充分的接济，使西路军不能早入河南。他把张作霖的势力养得非常雄厚，而自己摧残自己，他这还是我们的友人，还是我们的同志吗？他这不是比我们的敌人还要厉害吗？同志们，我们学他一句话："你看他该杀不该杀！"

现在幸亏我们前敌将士的奋勇和民众的努力，我们已经把长江下游肃清了。河南方面靳云鹗②司令所率领的军队也深明大义克服了郑州，使敌将于珍战死③。西北国民革命军经过长久的苦战奋斗已经到了洛阳。我们可以说消灭奉系军并不是困难的事情。我们当前的敌人就是我们内部的国贼！国贼不除，我们的内部只有崩溃下去的，民众一天一天和我们脱

---

① 指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祥参加北伐后所部西北军，亦称国民革命军西路军。

② 靳云鹗（1879—1935），字荐青，山东邹县人 北洋陆军将领，曾协助冯玉祥作战。一九二六年在汉口拥吴佩孚出山，自任副总司令。后与吴分裂，任河南保卫军总司令。一九二七年被武汉国民政府委任为河南省省长、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

③ 于珍（1883—1959），字济川，辽宁铁岭人。奉系军阀。一九二六年任京畿卫戍司令。一九二七年驻守郑州，为北伐军所俘，次年获释。所传"战死"，不确。

离，勇敢有为的同志一天一天被他们排挤，不要等奉系军阀、帝国主义者来攻击我们，我们自己就会败亡的。所以我们未打倒张作霖，先要打倒蒋介石！

或者有人说：他是劳苦功高，我们不能因为他一时错误便抹煞他以往的功绩。这是骗人的话！他劳苦甚么？深居高拱，食前方丈，比古时候的南面王所过的生活还要优渥。他劳苦甚么？前呼后拥地被无数的手机关枪、驳壳枪簇拥着，偶尔上上战线看察，这是那个干不来的事体？至于说到功高，那更是封建时代的废话。大凡一种事业决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任何个人不能独居其功，即使有功——就是说把一件事业做好了——这也是应分的事，并不能以此自矜。蒋介石以往的军事并不是他一个人所手创的，都是同志们为革命为国家努力的结晶，同志们为革命为国家努力，这是十二万分应该的，这有甚么功？而他个人的功又高在那里？我们只有革命事业，只有国家，没有个人。同志们努力的结晶，便结成革命的光荣历史，这是永远不能磨灭的。有人想要来磨灭它，毁灭它，这就是革命叛徒！这种人我们对他不应该有甚么姑息，不应该有甚么迷恋，不应该有甚么顾虑的。蒋介石就是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为尊重我们革命先烈所遗下来的光荣历史，我们要保存这种历史，我们要继续着这种历史的创造，所以我们尤须急于地要打倒他，消灭他，宣布他的死罪！

我想说的话也大抵说完了。我是三月二十八由安庆动身的，本是奉了中央的命令要赴上海工作，但因种种关系先折转

到了南昌来。前天我到九江的时候，听说中央已经免了蒋介石的职。今天是三月三十一日，我在南昌草写这篇檄文，愿我忠实的革命同志，愿我一切革命的民众迅速起来，拥护中央，迅速起来反蒋！

脱离蒋介石以后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七、九、十一、十四、十七、二十三日武汉《中央日报·中央副刊》。

一

我们是三月二十四号离开蒋介石的——也可以说是蒋介石放走了我们。

去年十一月八号总政治部派我们到九江去做工作，本来预定的是两个礼拜，但一到了九江，老蒋就不肯放我们回来了。从此便在他的形同监视之下，做了半年的秘密工作，他始终是不肯放我们回来的，尤其是对我个人。他在南昌的时候，不知道对我说过多少次，要我住在他的周围，就是三月十五号他临走的一晚上也还对我说过："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现在李仲公①被他们扣留了，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到了长江下游，有多少宣言是要请你做的。"象这样的话，他在九江的时候也亲自对我说过两次。

三月二十二号的晚上我奉到中央②的电令，叫我到上海去组织总政治部分部。那是一个普通电，老蒋当然是瞒不过的，所以我在第二天的清早便拿着电报去见他。

当我还没有把电报拿出来的时候，他先就对我说："听说武汉有电报叫你到上海去啦。"

---

① 李仲公(1890—1978)，原名其荃，贵州贵阳人。北伐时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营秘书长兼二十一军党代表、江西省政府委员。

② 作者原注：当时的武汉政府。

我说："是的。"我便把电报拿给他看。

他说："这次到上海去，赶快要把'总司令行营政治部'的招牌打出来了。你是要跟着我同去的，到了南京、上海，有多少宣言要仰仗你做。"

不消说我依然是敷衍着他。

他委我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是三月十四号，委任状现还保存，委任状写的是三月一号。关于名称和人选上他也很费了踌躕。起初他是想用"东南总政治部"的名义，以邵力子① 为正主任，以我为副。后来决用了新名，更承他的"皇恩浩荡"把正主任的荣衔加给了我。——我现在是让给吴老头子(稚晖)去了，我想那个老头儿一定是在暗中感谢我的。象我这样的人实在是"不识抬举"；他委我为政治部主任，而且每月还津贴我三百元大洋的费用，我却反脸无情，竟至把他"卖"了，不消说我和我们邓大主任(演达)一样，又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坏蛋"。

他委我为政治部主任的事情是很秘密的，在总司令部里面只有四个人晓得，就是老蒋、总参议的张群、军务处长陈焯② 、我。委任状是陈焯写的，印是张群盖的。张群在十四号

---

① 邵力子(1882—1967)，原名闻泰，字仲辉，浙江绍兴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后参加共产党。历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一九二六年八月以国民党代表身份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行前退出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二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② 陈焯(1892—1950)，浙江奉化人。一九二四年任黄埔军校教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军务处处长。

亲手把委任状交给我的时候，他诚心诚意地向我贺喜，我还当面回过他们：要请他们吃大餐的呢。

但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实际上却不只这四个人，当老蒋授意于我，要委我为政治部主任的时候，我早就密电了中央，并且将他当面对我说的话也密告了。他叫我和武汉脱离关系。他的叛逆，在那时候我已经就得着了确实的证据，我们那时候早就可以离开他了。但是中央的指示还是叫我“虚与委蛇”，好到长江下游去再做秘密工作。所以我也就成了一个“私娼”，做了一个秘密的政治部主任；因为老蒋那时还在掩耳盗铃，他这个命令要到了南京之后才能够公开。

他已经相信我到这样的程度，既委我为政治部主任，又准备要我做扬雄——替他做《剧秦美新》① 的宣言，我真是枉也冤哉，看看便要由“私娼”而公娼了。我老早就想不顾一切，丢了就跑；但是我一人跑是很容易的事情，我跑了，我们那里的几十个同志不免就要大受冤屈，要带着几十个人同跑那可不是很容易的事了。

在南昌所过的烦闷的生活，现在已用不着回述，一句话归总，就是无时无刻不是想跑的。

好了，我们奉命到九江了。在九江跑是比南昌更容易的，就带着几十个人同跑也并不是好难的事情，因有一水之便，一船便可以跑回武汉。但是那时候我们的野心又起来了。三月

---

① 扬雄（前53—18），一作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文学家。王莽篡位后，作《剧秦美新》以谀莽，为世人诟病。

十六号到九江，“三·一七”惨案发生后第二天他就叫我们先到安庆去。我们以为只要离开了他，在安庆还可以做些工作，所以又决心赶到安庆，但是结果是我们前脚到，他后脚就来，来就发生了“三·二三”惨案。一个炸弹打下来，把甚么都打得一个粉碎，还说得上甚么工作计划吗？又加以“三·二三”惨案我算是他的阴谋的一个破坏者，我的真面目他应该知道，他一定是含恨入骨的。我们假使还要在他的口中，那是只有听他咽下了。

但不料准备着早迟听他咽下的我们，却遭了他的恩赦。

他在二十四的清早，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我，信是这样写的：

沫若同志，等候不及，中正先赶赴下游，兄与一民兄同来。中正。

得到了他这张赦令，我们那时候是怎样地快活呀！我真不知道，他怎么能够那样地放心，竟肯把我们放手。或许他正是不放心，所以才没有叫我跟着他去的吧？但这个哑谜儿，我现在也没有工夫来猜想了。

我们虽然脱离了他的虎口，但仍然是在他的虎肘中的。朱一民就是监视我们的人。而且自从他走了以后，安庆的左派分子都集中到总政治部的周围，总政治部和他们总司令部形成了两个对垒。青红帮的流氓们天天造出谣言，要来捣毁总政治部，并且要用暗杀手段来对付我们。二十五、二十六、二

十七的那几天，我们真正是有点岌岌不可终日。那时候上下行船都没有，真正是如象陷在天罗地网里面的一样。

其实安庆当时的局面，自老蒋走后，在客观上或许还缓和了些，不过在主观上我感觉得十二分危险的，是在二十五日我去游说过一次李宗仁以后。

二

李宗仁的江左军总指挥部是设在安庆的工业学校。二十五日上午十时，我和辛焕文①同志两人去访李宗仁。李宗仁是我的酒友，同时如象李仲公、朱一民、俞飞鹏②诸人都是我的酒友。我是借酒来韬晦，同时也是以酒为钥匙去打开他们的秘密关锁。可是酒给我的恩德也就不浅了，我的两耳几乎要成为全聋，我的睡眠也被它替我剥夺掉了。以后或许是我用不着酒的时候了吧，这是我的一个希望。

那天很冷。我们到李军长那儿的时候，他正和陈调元的党代表袁熙绩在围炉谈话。我们到后，袁熙绩便告辞走了。我们便立刻喝起酒来。

一面喝酒，一面把许许多多的话来打动他，希望他在安庆举事，肃清一切反革命派的势力。

那时候在安庆举事是很容易的。拥蒋的武力只有陈调元的两营人，反陈的有蔡文彬的一旅。蔡和陈是势不两立的，蔡

---

① 辛焕文（1901—1927），湖北安陆人。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指导员，八月在赴南昌起义途中牺牲。

② 俞飞鹏（1884—1966），字樵峰，浙江奉化人。一九二四年任黄埔军校经理部主任。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兵站总监、江海关监督、江西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一九二七年参与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前已经解决过陈部杨世荣的队伍。老蒋到安庆抑蔡，他留朱一民在安庆的任务就是要强迫蔡部出城。蔡文彬不消说是不甘心的。“三·二三”惨案发生后，二十四的晚上，蔡派人到省党部和政治部来接洽，说他可以举兵反陈，但怕李宗仁解决他，想得到这一层的保障。我们去说李宗仁，一半也就是为这个原故。我们把甚么话都说尽了，李宗仁的头脑似乎也明白，但他总下不起决心。他知道蒋的恶迹，他知道“党权运动”①的意义，但他对于蒋总还不免有些姑息和顾忌的地方。最后说得我烦躁起来，竟扬声愤气地说：

——“象老蒋这样残杀民众的叛徒，只要是忠于革命，只要是有良心的人，那个不应该起来反对他！我现在就首先反蒋！”

这一说也把他激动了，他说：“只要中央有命令我就干。”

我说：“现在中央的命令那里能够来？一切通信机关都被他封锁了。你干了，中央是只有嘉奖你的；并且又不是反对他，只假着不知道他的秘密，我们起来肃清反革命派，他是有苦难说的。”

他说：“我只有一营人怎么干呢？”

我说：“我只要有一连人都敢干！”

---

① 一九二七年二月，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在武汉举行会议，针对蒋介石企图控制国民党，破坏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阴谋，议决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由吴玉章、邓演达等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予以贯彻。是年三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免去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委会主席和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此后，“党权运动”在全国展开。

实际我最痛心的，就是总政治部的武力只有两支驳壳枪，那时我们假如真有一连人，把一切反革命派都可扫除干净了。

——“好，干！干！干！”李宗仁把右手握成拳头向空中举了几下，再说了一次“干！干”，但接着他就萎下去了，又连说“厉害，厉害，我要睡”。我看他脸色也转苍白了，他的确是醉了。

两个人谈了半天，喝了一瓶半的白兰地——焕文是不喝酒的，他也先走了。我把李宗仁扶上床去，他立地就睡得人事不省，结果是今天的一场游说算是布了一场迷魂阵。

自从我说了李宗仁一次之后，我自己便感觉着危险了。无论上行也好，下行也好，那时候我急于想离开安庆，但是不凑巧地那几天都没有船。我那几天实在有些焦急。

最令人着急的，是二十六的那一天，

那天有一只兵舰开来，朱一民发出一个通告，要总部各部处的人全体准备出发赴南京，这时候真令人两难。同去呢，不仅工作做不动，且又陷入老蒋的虎口之中。不去呢，老蒋立地就晓得我们是反他的，他一封电报给陈调元或者其他的任何青红帮的首领，都可以囚禁我们，甚至致我们于死地。幸好一只兵船载不下总部全部人员，我们等他们各部处的行李、人员都上了船，朱一民也上了船，船快要开的时候，才派辛焕文同志去问一民说，我们有几十担宣传品和几十名人员，该安置在那里；一民说没有地方安置。我们便叫他们先走，随后另外弄一只差船赶去，于是便闪过了这一重难关。我们和老蒋以及

他的爪牙，便全部脱离了。

安庆非可久居之地，青红帮已与我们为仇，随时都可以袭击我们。我从二十六号起已经改了装，移住于城外候船，但是船是始终没有的。一直等到二十八的一天，杨正宗①同志领导着南昌留守的人员，坐了一只差船来到安庆，我们才遇见了一个救星，一个意外的救星。

我们离开南昌的时候，留了一部分同志在后方留守。我们所担心的便是这一部分人，怕的是我们与蒋脱离了关系，他们会不能走脱。亏得杨正宗同志也是善于"做上层工作"的人，他竟把总部留守的张群瞒过，能够公开地带领着全部人员出发。他们不仅是做了我们的救星，而且给了我们无上的安慰。我们在安庆江边重逢的时候，真是如在梦里了。

二十八日全体同志都上了船，我们是决计到上海去的。因为船上没有灯也没有旗号，便派人到第八师去接洽。快要到午后两点钟的时候，派去的人还没有回来，朱克靖② 同志和他的夫人来了。

克靖是第三军的政治部主任，他是从武昌来的。过九江时船没有停，便一直把他拖到安庆来了。他把武汉的情形告诉了我，说是中央已有坚确的决心一定要罢免蒋介石。同时

---

① 杨正宗（1899—1982），字默仁，安徽广德人。北伐期间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南昌办事处留守负责人、政治部秘书处秘书。

② 朱克靖（1895—1947），原名宏夏，字竹懿，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二年参加共产党。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昌起义后任第九军党代表。一九四七年十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他是负有重要的使命到九江去报告朱培德①军长的，他要求我们把船送他回九江去。往返九江也不过三两天的工夫，再加上海方面我已经派了十个同志去做工作，那方面也还有许多重要的人可以指挥一切，所以我就决计送他回九江。

① 朱培德（1889—1937），又名益之，云南盐兴人。曾任滇军总司令、广州国民政府军需部长等职。北伐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兼右翼总指挥。

三

那时九江在形式上还是反动势力的下边。我们到九江是三月二十九号，国际工人代表团① 也是在同一天到的。

到了九江，我同克靖便去见朱培德军长。我把安庆的情形报告了他，朱军长显得很有决心，也象很有计划。他当天便发出了命令，把当涂的第九师团调回，集中安庆。南浔铁路沿线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第三军的势力范围。江西方面蒋介石的残部是很惊惶失措的，不过他们依然还在蠢动。同时就在我们到达九江的一天，我们还得着一个顶快心的消息，那就是中央在三月二十三号已经罢免了蒋介石的职权。那时候我们真是高兴，以为从此长江下游更是不成问题了。朱军长及其他同志们劝我在江西再做一番工作，我也觉得还有到南昌去一次的必要，因为一切的通信机关都被蒋介石封锁了，安庆"三·二三"惨案，连相隔仅仅几点钟水程的九江竟连一点风影都不知道。我觉得应该趁着这个时候，把蒋的罪状宣布出来。所以我便把部里的人除掉少数人留在九江之外，通统遣回了武汉，我的意思是要他们回来报告消息的。我于三月三

---

① 第三国际和红色战士同盟一九二七年春组织英、法、美等国工人代表来华慰问声援，考察中国革命现状。

十日便同克靖同志同赴南昌。

南浔铁路的检查是很严密的，我们所有的行李都经过了检查，我假充为第三军的一个参谋，姓高名叫浩然。

南浔铁路沿线的春光是很明媚的，仅仅离开了两个礼拜的江西，已经成了一片锦绣的世界。四处的桃花都在开放，杨柳已经转青了，一片金黄的菜花敷陈在四处的田亩上，活活的青水流绕着沿线的溪流，清脆的鸟声不断地在晴空中清啭。这些亲切可人的自然，对于两礼拜来日日焦头烂额的我，不免更觉亲切。自己的心中虽然怀着些轻淡的不安，无名的恐怖，但总觉得是回到了故乡来的一样。不过每逢车一到了一个车站的时候，总怕把头伸出窗外，总希望停了的车火速再开。

南浔铁路是不能直抵南昌的，终点的牛行车站与南昌城还隔了一道章江。章江也浩浩荡荡地涨满了一江春水，淡黄的江水上浮着无数的浮沫，要比如群鸥——可惜是黑黄色的。天上也时有白色的水鸥飘飞。这些泡沫的浮岛，有人说可做肥料，怕是沿流土岸中硝质的溶集。

渡过章江，由章江进城，我把眼镜取了。我倒没有看见甚么认识的人，但不晓得有没有认识的人看见了我。

进了南昌城，一直便跑到东湖边朱玉阶（德）① 同志的家

---

① 朱玉阶（1886—1976），名德，四川仪陇人。一九二六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初到南昌创办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团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

里，我便住在那儿。玉阶本是第二十军的党代表，因为杨森①不信任他，他便到了江西，在第三军充教育团的团长。这次江西能够免受蒋介石的屠戮，江西能够成为革命势力的范围，玉阶所率领的教育团，是有不小的功劳的。

——“你认得我么？”

我看见朱玉阶夫人便首先问她。

——“怎么不认识你？你是吹号的。”

说了便不觉大笑。“吹号的”！这个徽号的来源，真是一个绝大的耻辱。那是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的事。二周年纪念的一天，在南昌方面因为大雨，大会没有正式举行。十三、十四是公奠的日期，十五又才正式开会。因为到会的群众将近二十万人，蒋介石的声音不能传遍，他便叫我用传话筒替他传达。那时候我不该过于卖力气了，因为我的声音素来大，我便替他传达起来。他说一句，我传达一句，传到后来他的演说才完全是反革命的论调。他叫江西群众要拥护江西省党部（以前的伪省党部），反对江西省党部的就是反革命，反革命的就要把他打倒。这些话当着二十万的群众面前，也不能不给他传达，我真想把传话筒来打得他一个半死了。但为情势所迫，只得忍耐着又出卖了一次人格，昧了一次良心。我在江西半年，可以说完全做的是这样昧良心、卖人格的工作，我现在回

---

① 杨森（1884—1977），原名叔泽，又名伯坚，字子惠，四川广安人。四川军阀。一九二二年投靠吴佩孚，任川军第二军军长、军务督理、四川省省长。一九二七年春响应北伐，任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但暗中仍与吴佩孚勾结。

想起来，不觉犹有余痛。玉阶同志说得好："蒋介石是不识抬举的东西！"

这"吹号的"一个徽号，大约就是从那次大会赢得来的。受了别人的践踏，卖了自己的人格，有苦难诉却还要受社会的骂名——听说在我未正式反蒋之前，武汉的同志有不少的人怀疑我，上海的同志更有人准备做文章来骂我了——这种工作真不是人干的，然而也忍耐着干了半年。蒋介石哟，我还要痛骂你一句：你真是不识抬举的东西，不识抬举的狗东西！

我自己的性格素来是倔强的，这一次把我磨练够了。我自己就好象已经成了一个无聊的政客，我很替我自己危险。我想以后我还是要恢复起我的倔强性来。干得下去就干，干不下去就拉倒。我不愿意再替任何人捧场。自由恋爱还可以，不情愿地被人强奸总是不情愿的。

在玉阶家里总共住了四天，头一天去见王副军长治平①，向他报告了安庆的情形。他也把南昌的情形详细对我说了。南昌自从蒋介石走后，总部留守的张群和伪省党部、伪省政府打成了一片，几次收买流氓、伤兵来想大肆屠杀，但都被王副军长镇压下去了。张群志不得逞，很想用武力来对付第三军，但这条小狗总还没有大狗的胆量大，在四月二号的清晨，终竟不安于位，"逃之夭夭"了。

① 王治平(1891—1936)，名均，云南呈贡人。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七师师长、南昌卫戍司令、第三军副军长等职。

四

在玉阶家里一间光线不十分充足的室内，第二天的清早便开始草《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手不停披地写了将近一天的光景才脱了稿，脱稿后便拿去付印了。

第三天又草了一篇《敬告革命战线上的武装同志》，这篇文章是偏重在理论方面的，好象没有传到武汉来。

把这两篇文章做了之后，我赴南昌的使命算是完毕了。本来决定在第四天四月二号的清晨走的，因为张群同在那个时候走，所以不得不避开了他，改到下午。下午走到章江边上的时候，火车已经开了，又不得不改到明天。我是四月三号的清晨才离开了南昌。

四月二号的下午，南昌的民众团体，实行解决伪省党部，捉了二十几个反动分子，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程天放①。

这位程天放，可以说完全是段锡朋的工具。他做了一回伪省党部的宣传部长，又荣升为伪省政府的教育厅长。在他未做部长之前，有人介绍他来请我委任他为军官团的政治指

---

① 程天放(1899—1967)，原籍江西新建，生于浙江杭州。北伐时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青年部长、省党部执行委员、省教育委员会主席等职，参与“AB”团反共活动。

导员，我拒绝了。他有一个流芳百世的典故，就是解释帝国主义者为"地大物博的国家"。他的程度是怎么样，那就可想而知了。

程天放被捉，我特别到总工会去观光了一次。我看见他那个小流氓的样子煞是可恨，又煞是可怜。两手是用麻绳反剪着的，斜戴一顶呢帽，穿一身不十分周整的西装，领带也是偏在一边。

我问他："段锡朋往那儿去了？"

他说："我不晓得。我是晓得的时候，你拿我去枪毙。"

我听见他说了这一番话，心里只想说："可怜你也有今日！"

旁边有许多的工友揶揄他："喂，厅长啦！厅长大人啦！"他只青着一个面孔，鼓着一双眼睛，没有说话。

此外二十几名的反动分子，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倚在墙上，有的缚在柱上，到这时候每一个人都不认识段锡朋了。

其实段锡朋也并没有多么大的本领，只是他肯干，他的领袖欲强，这便是他的全部。大凡领袖欲强的人把一切的人都看成他的工具，蒋介石便是一个好例子。段锡朋也是一样，他是素来看不起人的，国民党中没有一个首领可以值得他的称许，而且也没有一个首领没有受过他的批评的。他之拥戴蒋介石，也不过把蒋介石当成一种工具罢了。

他的肯干的程度是可以令人佩服的。他在不得势的时候，人所不能干的事体，他都能够干。他的钻营本领也可概括以"肯干"两个字。就我所知道的，他在武昌大学被赶跑到广东

的时候，本来也想在政治上活动的，但是他初到广东，政治上没有可以使他活动的余地。那时候的广东大学便是容纳这些人的逋逃薮，凡是在外边没有地位安插的，便都介绍到广东大学里来。段锡朋便是这样被介绍来的一个。但是介绍来的不必一定就有位置，广东大学的门罗主义①也是很严的。他初介绍来的时候，本来应该进法科，那时候的法科连他这样的"英雄"都拒绝了。他便时常来扭着我。在那时段锡朋是甚么人，我是连他的姓名都没有听见过的，尽力推荐他的就是郁达夫。达夫在武大的时候和他同过事，所以认识他，尽力地说他勇敢。他天天地来扭着我，一天怕要来过三四次的光景。我想这样的程度是谁也不肯干的，然而他却干得出来。我相信了达夫的话，便把他弄进文科去当西洋史的教授。那时候因为史学系里一个人也没有，他不消说也就一跃而当到史学系的主任了。他就这样进了广东大学。但他一进去便显出他的本领，他立地和右派的学生勾结了起来。在文科风潮中暗地里反对我很激烈的，他就算是一个。他和右派学生勾结，借此以为媒介，更与陈果夫②拉拢，他于是便进了组织部。这就是他得以充当特派员入江西活动的原因。所以严格地说起来，段锡朋之能在江西捣蛋，我自己实在要负一部分责任。

---

① 美国总统门罗一八二三年十二月提出一项独霸美洲的外交政策，以"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为口号，抵制欧洲国家插足拉丁美洲。

② 陈果夫(1892—1951)，原名祖焘，浙江吴兴人。二十年代初和蒋介石在上海证券物资交易所作经纪人。一九二四年应蒋之邀往广州成为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北伐期间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组织部部长等职。

段锡朋跑了，程天放捉住了，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战栗起来，总司令部的人员都纷纷变装逃难了。在三号的晚上我还带着两个同志，带着驳壳枪，到财政厅长周雍能①的家里去准备捉他，但他已杳如黄鹤了。那时候大家真是痛快，埋名隐姓了好几天突然可以公开起来。黑暗的南昌立地光明了好几百倍。东湖边上的杨柳，东湖边上的游船，东湖里随着轻风微微闪动着的碧绿的波浪，你们那一瞬时给我的印象比我在东湖边上和你们同住了四个月的认识还要深刻呢。

我第二次到南昌只住了四天，但这四天的生活比从前四个月的生活还要值得令人留念。我所忘不了的是南昌的奋不顾身为革命努力的同志们，我所忘不了的是玉阶夫妇的殷勤的款待。玉阶家里还有一位女同志，是一位很带几分男性的青年，她姓什么，名甚么，是玉阶的甚么人，我都不知道。我只晓得她也是四川人，是从广东才回来的，而且她还能喝酒。有一天她要和我喝酒，可惜没有白兰地，便没有喝成。听说她是能喝一瓶白兰地的。有甚么机会再到南昌的时候，再和她拚醉一次吧。

---

① 周雍能（1893—？），字敬中，江西鄱阳人。一九二六年任九江关监督兼江西交涉员，一九二七年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

五

满腔高兴却被一盆冷水淋头，我们第二次回到九江，外面的形势与前一次所传说的完全不同了。

第二次回到九江是第七师的政治部主任吴缉熙同志送我的。坐的是总司令部职员的专车。他们也是逃难，我们也是逃难，但他们是公开地逃难。我们几个人关在一间公事车里，一点都不敢露头面。回到九江来才知道中央那时并没有免蒋介石的职。不但没有免职，而且还任他为第一集团军的总司令，中央所取的策略依然是和他妥协的。

在朱军长处又看到蒋的好几通电报，说是“汪先生（兆铭，精卫）①已抵沪，并且晤谈几次，党务已有办法，不致分裂”云云。这更使我们失望。我们觉得蒋的策略也还是要和中央妥协，他这样一来可以缓和反蒋的空气，而且分散反蒋的战线。

我是三号到九江，当晚又接着邓主任（演达）的一封电报，说是上海方面财政、外交及一切政治工作的进行，指导需人，而我们才滞留江西，使他不胜愕异。这样一来，我简直是进退维谷了。在当初我尚未公开反蒋之前，要与蒋虚与委蛇，也还可以勉强敷衍。但现在既已公开反蒋，我怎么能够再去继续从前的工作呢？我从九江遣辛焕文同志等回武汉的时候已经写过一封信给邓主任，表明了我自己的态度，并且已经申明，

我一到九江便要公布蒋的罪状。而邓主任的来电，却反转责备我，这是使我十分诧异的。

三号的晚上本来有一只英国的商船到上海，遣回武汉的同志中有四个人在船上，到九江来见了我。我见了辛焕文的信，传达邓主任的意思，仍然是要我火速赴沪。我也就下了决心到上海去。但是朱培德军长以及其他的同志们都劝阻我，以为我去是自投罗网，毫无意义。中央要叫我去，是因为不知道我已经发表了反蒋的文章；我无论如何是应该先回武汉一次，请示行止。我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因此在三号的晚上，也就没有上船。

江西的省政府委员和省党部的筹备员也是三号到九江的。九江的民众在四号开会欢迎。四号的上午我替省政府草了一篇宣言，正午的时候，朱培德军长和其他的同志都出去赴欢迎会去了，我一个人留在三军司令部里。一间宏敞的会客室里面，沿壁都摆着行军床和军用文具。一架紫檀木的大钟放在正中的桌上，机器坏了，死沉沉地已经失掉了运动的作用。时间好象是凝固了的一样。我的寡白的烦闷形成了下面的一段日记：

革命的悲剧，大概是要发生了。总觉得有种螳臂当车的感觉。此次的结果或许是使我永远成为文学家的机缘，但我要反抗到底。革命的职业可以罢免，革命的精神是不能罢免的。我的路径已经是明了了，只有出于辞职的一途。始终是一个工具，但好在是被用在正途上的工具。我当然没有悲愤，结果是我太幼稚了。别的同志们都还幼稚，多视我为转移，而我自己也太幼稚了。种种的凑巧

与不凑巧凑成了现在的局面。我好象从革命的怒潮中已被抛撇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上。

一个人坐在客厅里面，冷清清地在日记本上写出了这一段感想。

悲剧的形成就在两个大势力的竞争的纠葛里面，一个私人的破产，而且是正不敌邪。一个人在团体的活动里面的时候，他可以忘却一切。团体的意志就是他个人的意志，团体就好象绝大的洪炉，把一切的个人都融成一片了。但从洪炉中突然迸出一个火星子出来的时候，这个火星子的命运是只有感着孤独而且渐就死灭的。孤独就是个人意识的抬头，渐就死灭就是执着个人意识的开始。我当时就好象成了这样的一个火星子。

六

在九江等船回武汉，但是四号没船，五号也没船。五号的清晨朱军长和其他同志们回南昌，就好象凯旋将军一样，自己愈觉得无聊。这样的生活过了一天就好象过了一年。在这样的时候，谁个都会发生一种幼稚的感想的，那就是想飞。但是你那里飞得动呢？

好了，五号的下午，三北公司有一只上水船到九江来了，船名叫"凤浦"。这是我们可以飞的时候了。我便和第三军的马顾问一同上船。马顾问假充一个德国的新闻记者名叫马奕尔，我便假充他的翻译。上了船去，船上所载的货物是很多的，而码头工人不做夜工，恐怕要到七号才能卸完货物开船。这是再难令人忍耐的，我便和船上的买办商量。

我说："有甚么办法可以早开船？"

买办说："工人老爷不做工有甚么办法？"

我说："假使我们去找码头工人做夜工，你高兴不高兴？"

他说："只要你有那样的本事，那个不高兴！"

我到这时候，才把我的名片拿出来，写了一封信给九江总工会，请他们设法动员码头工人破例做一次夜工。我本来也存的万一的希望，以为为个人的利便便破坏一次成例，总怕办不到。但不料我的信去便立地生了效，这把船上的买办骇得

五体投地了。他把我特别请到最上层的船长室里去，拿出了上好的雪茄、上好的苏打饼干、上好的咖啡，而且还有上好的恭维话。他不仅恭维我，而且恭维起我们一切的工友来了，其实他在二三分钟前还在骂工友们的跋扈的。

——“郭某强过蒋介石，蒋介石深怕工友们罢工，郭某一封信去便可以请工人上工。”

其实这那里是我的力量，这是工友们为革命利益而牺牲一切的精神的表现！一切资本家们，一切的买办阶级们，一切的自命为革命的领袖们，你们看工友们是何等有纪律！何等富于牺牲精神呀！你们自己疑神疑鬼，把工友们看得来就和三头六臂的恶魔一样，你们把镜子来照照你们自己吧！三头六臂的恶魔，是你们自己的投影呀！

因为有这样的关系，船上的人都晓得我已经上了船了。船到武汉的时候，武汉方面也传说我已经回来了。就在十四、十五那两天，我正在上海的时候，上海方面的报纸也传说我回了武汉，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烟幕。九江的工友们哟，我深深地感谢你们！

不消说我那回并没有回武汉来。工友们正在做夜工的时候，辛焕文同志率领着许多赴下游工作的同志，坐着原来的差船，又从武汉来到九江了。他会见了我，传达了中央的意思仍然叫我赶赴下游。我问他关于安庆的事和我公开反蒋的事，是否已经向邓主任说明，他说是说明过，邓主任说的“工作很难做的地方，尤其是急于要求做工作”。好，我是只有服从命令了。我又转换了我的方向，从“风浦”号下到小差船，由九江赶

赴下游。

我已经发表了反蒋的文章还要跑到上海去，有许多同志不能了解。有的以为我很勇敢，还想到上海去拚一条老命。其实我那里有那样的勇气，我之所以赶赴上海，只是如象陈嘉谟、刘玉春、岳思寅、张凤岐一样，我是"服从命令"罢了。

我三号到九江的时候，当晚就有电给择生，说我已公开反蒋，如中央与我不合，我决不愿赴沪，甘受处分。择生曾有三通电报催我回来，但我一通都没有接到，我所接到的只是辛焕文同志传述的一番话。后来我才知道辛焕文同志回武汉只见过邓主任一面。

我们是六号的清早才离开九江的，八号的上午十一时到达南京。在船上的几天没有甚么特别的事可以记述，只是风太大，船太小，小船在狂涛恶浪中簸荡，这几日的行船大有航海的苦味。在船上还读过一些《狂飙》① ——是一位宣传员带的书籍——中有长虹② 先生者骂我"浮夸骄傲"，我觉得颇中肯綮。不过骂我为"浮夸骄傲"的长虹先生也好象不见得沉着谦恭。我们是同病相怜的人呀。然而浮夸骄傲，我觉得，比沉着谦恭倒还要好一点。我们的东方文化就是过于沉着谦恭了。自己的老婆总是"拙荆"，自己的儿子总是"豚儿"，自己的家乡

① 文学刊物，有月刊、不定期刊和周刊三种，均狂飚社创办，高长虹、高歌等人编辑。月刊，一九二四年九月创刊，共出三期；不定期刊，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创刊，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八年各出一期，共两期；周刊，一九二六年十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七年一月终刊，共出十七期。文中所指当是《狂飚》周刊。

② 即高长虹(1898—1949)，山西盂县人。作家、诗人。著有《心的探索》、《献给自然的女儿》等。

总是“贱地”，自己的祖国总是“敝邦”，自己的面皮总是屁股。我是不愿意把自己的面皮当成屁股的，也不愿意把别人的屁股当成面皮——喂呀，太“赤化”了！太“赤化”了！再写一点文雅的东西吧。

风太大，船太小，
在狂涛恶浪的当中，
船儿不能进行了。

日本的兵船，日本的商船，
一只只赶赴上游，
怕是要去威胁武汉。

长江的气魄，
伟大的民族灵魂，
一片赤色的洪涛涤荡乾坤。

风哟，你能摇动我的船，
不能摇动我的心！
纵使是樯摧舵折，
我也要向前迈进。

武汉是我的爱人，
我为她甘愿牺牲。

赤化的黄鹤楼，
要永远屹立江滨。

说写文雅一点，还是文雅不起来。算了吧，闲话休提，我已经到了南京。

七

南京的江岸排列着许多兵士，还有无数的旗帜在空中飘飏，听说是蒋皇帝今天要驾临了。“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①——“君”者何？皇帝也。“落花”者何？打得一个落花流水也。民众是在鹄候着欢迎他——欢迎他来屠杀他们！这也是我们贵国的东方文化的表现呀！

我因为是皇帝的叛臣，所以不敢上岸去闯驾。小小的差船又不能再开赴下游了。我便在浦口上了一次岸，暂时住在一家小小的客栈里面，想探听了沪、宁一带的情况，再定行止。

不久辛焕文同志来了，拿了一张七号的上海报来，才知道总政治部的上海分部已被蒋介石查封。这样一来，上海简直没有我们可以公开工作的余地了。但那时我心中却也暗暗地欢喜，因为老蒋这样一表示，更足以促进我们中央的决心，因为我们中央的各领袖正在揖让立于朝与虎豹讲东方文化啦。请看吧，请看我们中国的这位墨索里尼！你看是可以和他讲礼，还是不可以和他讲礼的？可怜我们许多很勇敢的同志的牺牲哟！

上海既不能公开工作了，我便把派赴下游的人，由原差船

① 见唐杜甫诗《江南逢李龟年》。

送回武汉，只和辛焕文同志两人在傍晚的时候，渡过下关，走到车站上去。

金陵的形势的确是大有王气存焉。下关车站附近的一带平原，紫金山、狮子山等一带峰峦，沉默在清冷的晚气中，的确是给人以一种伟大的印象。但可惜这儿只是帝王之都，只配蒋介石来定鼎罢了。蒋介石是一个石头，我们东方人是相信谶语的，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一片降旗出石头”① 的时候。

车站上恰好有一列兵车准备开往上海去装兵。一个检查的人都没有，车子空在那儿，我们便上了车，在铁板上睡了一夜。铁板的振动真是厉害，头在上面就好象在抛皮球。

——“今天遇着我两个才敢来，你也不怕，我也不怕，是不是啦？”

——“民治同文彬② 不晓得他们怎么样了，他们经过安庆不上岸，真是不应该。”

两个皮球在铁皮车中对起话来，焕文字号的皮球差不多每说一句话都要加上一个“是不是”的。

——“他们是很精细的，想来总不会遇险吧，是不是啦？”

我最担心的就是民治和文彬两人。文彬是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的那一天由南昌回武汉的。民治是我们出发安庆的

---

① 语出唐刘禹锡诗《西塞山怀古》：“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旛出石头。”

② 即袁文彬（1901—1941），曾用名方强，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共产党员。北伐时在南昌任政治部社会股股长。“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任战地服务团团长。一九四一年在苏北遭日伪军杀害。

时候，从九江转回武汉的。他们两人都是到武汉来请示，究竟我们到下游去工作怎样进行，对于老蒋怎样应付，以及中央对蒋的最后的决心如何。这些都要请示明白了，我们的工作才能够开始。我在安庆、九江所盼望的就是他们两人的赶快转来，但不料他们在二十四号过安庆的时候，听说老蒋已经走了，他们以为我一定也跟着走了，便没有上岸，一直赶赴下游去了。

——“要不遇险才好。老蒋是干得出来的，他一翻了脸的时候便不认人的。三月二十号之变，邓大主任还受过他的拘禁呢。”

——“邓主任从南昌逃走的时候很危险啦，是不是啦？”

——“那一回我想倒没有甚么危险，倒是我们同回南昌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啦。”

——“是的，是的，那一回可惜张静江①没有和你们同路，不然倒把他骇死了，是不是啦？”

那是阳历的二月一号，——就是阴历的除夕。我和邓主任从庐山转回南昌，同路的还有在上海把孙炳文同志卖了的褚民谊②。

老蒋自从从武汉回到江西，便藏在庐山，构成所谓第二次

---

① 张静江（1877—1950），名人杰，祖籍安徽徽州，生于浙江吴兴。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执委会常务主席，参与制造“中山舰事件”。北伐时任广州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参与策划“四·一二”政变，促成蒋、汪联合。南京政府成立后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一九三〇年起寓沪经商，抗战后旅居国外。

② 褚民谊（1884—1946），字重行，浙江吴兴人。北伐前任广东大学代理校长。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军医处处长。后追随汪精卫，任汪伪政府要职，一九四六年以汉奸罪被处决。

的庐山会议。中央的要人都聚会在这儿，和老蒋争持迁都逐鲍的事情①。那时候演出了不少的悲喜剧，可惜我没有列席的资格，我把它写不出来。我们中央的要人们事务太忙，恐怕也没有把它写出来的时候。我是一月三十号，应邓主任的电邀跑到九江的，在庐山上算是幽会了一次，于二月一号，又同下山来。

当其要下山的时候，张静江本来都把行李整备好了，是要同走的，但因老蒋的挽留又迟了一天。

我们到牛行车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钟的光景，看见南昌城起火，并听见些枪声——当时我们还以为是鞭炮，是南昌城里的人在过热闹年。

在牛行车站有二三十名的卫士大队来迎接我们——其实不是来迎接我们，是来迎接张静江的。有三乘轿子，几十名挑夫。我、邓主任、褚民谊便各坐了一乘轿子渡过章江。进章江门的时候，早就看见许多散兵，背着上了刺刀的枪出城，城门口放着十几乘的藤轿，都是总司令部派往牛行车站接人的。我们那时还没有甚么惊异。进城，城里的商店全部掩闭了，街上是死气沉沉的，只是街沿上处处都有散兵，我们还以为是放的步哨。及至走到省长公署的前面，前面开起枪来了。接连放了好几枪，打伤了卫士大队两个人。卫士大队便搬枪应战，把一些轿夫、挑夫骇得五零四散，丢下肩上的东西就跑。一街都是轿子，一街都是担子，真正是纵横狼藉。那时候我坐的是第一

① 一九二七年初，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企图在南昌另立中央。一月九日，他在武汉的一次集会上受到群众质问，苏联顾问鲍罗廷亦发表讲话表示谴责。蒋乃借故提出驱逐鲍罗廷。

乘轿子，邓主任是第二乘，褚民谊是第三乘。在黑夜里当面受枪，竟没有吃着铅弹，真是侥幸了。

卫士大队一搬枪应战，前面的敌人便都溃退了。我们拥进辕门，还夺了一架机关枪（里面是上好了子弹的），擒着了一位连长，才知道是第三军有一部分的军队闹饷滋事。

那天晚上好容易才走进了总司令部，在总司令部住了一夜不敢出来。南昌城里是颁布着临时特别戒严令的。

我们时常谈起那晚上的事，便不免有一番失悔，悔的张静江那个病鬼没有同回南昌。假使那天晚上他是回来了的时候，不会把他打死，也会把他骇死的了。

择生那一次也是万分侥幸，他离南昌是二月三号，老蒋就是在那一天从九江回南昌的，假使再迟一天，他一定不能逃脱。

——"你的夫人留在广东，想来没有甚么危险吧？"

——"想来不会有甚么危险吧？无论怎样蛮横的蒋介石，他总不会连诛我的九族，而且我的夫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啦。"

——"哈哈，哈哈哈。"

两个皮球东鳞西爪地讲了一些话，时而睡熟，时而又醒来，最后到了一个灯光辉煌的车站，我以为是到了上海了，殊不知才是常州。车从常州是几时开的，我们也不知道，但到离常州三十里的横林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早了。

八

苏州胥门外一家破旧的客栈，客栈第一进一间西南临街的楼房，两个人坐在房中挟着一张方桌谈话。一个是长袍短褂，戴着一顶马纱的瓜皮帽，一眼看去，俨然就是一位土豪劣绅。其他一个是穿的军服。穿军服的挟着一个皮包，站起来又坐下去。

最后是土豪劣绅说："你到了的时候立刻打一个电报给我。假使情形是严重的时候，你就说'生意不佳'；他们是有危险的时候呢，你就说'货物业已销售'。好的情形你说不好的话，不好的情形你说好的话。我得到你的消息，无论怎样，总设法赶来。"

军官说："我去总接不起头，恐怕调查很费手续。"

土豪劣绅说："没有甚么，你只要会着银行里的那位文先生，便甚么事情都知道了。"

——"你不晓得他不是我们帮上的人呢。"

——"他虽然不是帮上的人，但他们的消息他总晓得的，你一问着小毛就行了。"

这两人就好象两个做私贩的一样，最后是军官的一位走出房外去了。

这两人是谁？土豪劣绅的一位是我；军官就是辛焕文同志。当我变装的时候，有的劝我装个勤务兵或者马夫，有的劝

我装个工人，更有的劝我装个尼姑的——因为我的胡子差不多是等于没有的。但我终竟装了个土豪劣绅，我想蒋介石他们正在与土豪劣绅勾结，他们是决不会注意我的。倒是装工人或者女人，那简直是犯了他们的忌讳，因为工人和剪发的女子在他们眼中正是“共产公妻”的塑像呀。这一回从广东逃跑的同志们，听说有好多是装工人和女人上了当的，我就我的经验来说，要到长江下游去做工作的人，最好是扮土豪劣绅。

我们的车到横林便停止着了。那列兵车要到横林前一站去运兵回南京，不到上海，所以我们便不能不在横林下车，再再等第二次的车来。

我们在横林足足等了半天。蒋介石是九号才往南京的，他的专车经过横林的时候，我们在车站上还亲眼看见先有一列兵车清道，随后才是他的专车。堂哉皇哉，大有乾隆皇帝下江南的风味了。

在横林足足等了半天，又才有一列东路军总指挥部的专车开来。我们跳在一节装马的敞车上坐着。好象是要下雨的光景，但也顾不得甚么，这时候马之对于我们，比人还要亲密。但不幸这部车又只开到苏州，到了苏州，我们又不能不下来。下来我们买了一份上海报来看。这一看却把我骇住了。

在南京看的报，只知道政治部被查封，还不知道他们逮捕了人，这一回才晓得他们捕了十九个人去。报上载着潘宜之①

---

① 潘宜之（1893—1944），名祖义，湖北广济人。北伐时为白崇禧部政治部主任。“四·一二”前后在上海与白崇禧策划“清党”。一九二八年任武汉市市长兼党训所所长。

小子的一段很跋扈的话。他说："捕了十九个都不是重要的人，重要的主犯在逃，现正严密查拏究办。"这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狗材，说话的官气真是十足！但我愤恨的不是他这点官气，我是知道了他们捕了十九个人。十九个人！我一计算起，安庆派了十个去，武昌四个，九江三个，加上民治与文彬，这不刚刚一网打尽了吗？所说的"主犯在逃"，这不消说是指我区区大人阁下了。嗳！真是糟天下之大糕！把我一个人捉去倒不要紧，竟连累了这十九位同志！

得到了这个消息，我们便不敢梦梦然再往前进，便在胥门外找了一家很小的旅馆住着。辛焕文同志是初到上海，总司令部认识他的人也不多，所以我便派他先到上海去调查情形。头上一段小说一样的叙述就是焕文同志和我在苏州分手时的光景。

辛焕文同志走了，我一个人留在苏州，真正是成了一个孤臣孽子了。

苏州是一个安全地带，除掉车站及阊门等处，有些"皮带"及"青天白日"在往来之外，绝少我们同帮中人，——或者可以说都是我们同帮中人；因为都是长袍、短褂、瓜皮便帽的土豪劣绅。苏州的同志们，你们见了不要生气，实在苏州地方是我们中国的大地主发育得最完美的地方。苏州的地主是有一种类似托拉司的组织，小地主都集中着他们的租谷请大地主代收。大地主是有私设的差役和私刑的。他们收租的时候挂牌——"某某堂自某日起至某日止收租。"收租是不收谷而收钱的。农民得了谷还不能直接上粮，第一步不得不使粮谷变成钱。然

而在乡下收买粮谷的是甚么人?就是这些大地主。农民就这样受着大地主的重重的剥削,所以弄得来卖田地,卖房廊,所有一切的自耕农都化成农民无产者;还不够,还要卖老婆,卖女儿。上海滩上的一些娼妓、野鸡、姨太太、丫头,多是苏州姑娘,她们的来源是甚么,你们就可以知道了。

我在苏州住了五天,可以说一点也没有甚么危险。我每天只是跑进城去买些书来看。

除读书外,没有一个钱的事情可以做,苏州城里简直可以说是"死都"。不信你们请到那儿去尝尝滋味吧。你们到了那儿,一定就感觉得死后的状况了。——我并不是想说苏州的坏话,要晓得死并不是坏的东西,死后我想是最恬静也没有的,那儿就是宗教家所幻想的天堂,文学家所幻想的乐园,比抽大烟上了瘾的人所感受的那种忘神状态恐怕还要愉快。我没有死过,本来不晓得死后的情况,但在苏州也算是死过一回。苏州城里的一些背街真是恬静哟,一些砖砌的民房就跟坟墓一样,街头巷口泛着一种形容不出来的恬静的幽光,人到这儿就好象魂游太虚之府。一些玉石凿成的女子都是天上的可儿。你听她们那清脆的声音哟,那真是清,真是甜,真是如象雪梨的滋味一样清甜。——嗳,写着我不觉又吞了一次口水了。

留园!你请到那里面去走一走吧。你会感觉得你自己是贾宝玉,你的周围都是晴雯,都是秦可卿,都是一些天仙化人。你到这儿难道还想死吗?足见这儿是比死还要舒服的地方了。人到过一次苏州,可以说是死过两倍的死。

在这样的死都，然而也还有些不安分的活人。

那是十号的清早，我到阊门去。看见一座青年会的门前，挂有党旗、国旗，是苏州市党部第四区分部的办公处。我进去看了一些报。我看里面办事的人都很注目我。我向他们问侯绍裘①、张曙时②诸同志的消息，他们都答应不晓得。回头连门外的党旗、国旗都取进来了。大约他们以为我是侦探吧。

就是这一天是苏州总工会缴去日本租界警士的枪械的一天。日本的一家纱厂积欠工人的薪资不发，准备关门回国，工人不依，日警士便要以武力对待，所以工会缴了他们的枪械。（这件事我记得不十分清楚，只有请苏州的同志们出来更正了，假如是有错误的时候。）这使白崇禧得了一个口实，以查封总工会及市党部。献媚于帝国主义者的蒋介石，献媚于帝国主义者的蒋介石的走狗白崇禧等，其甘心卖国已至于如此。而他们最近更丧心病狂，在上海一带乱造谣言，说国民政府已经把汉口租界送还外国人，国民政府是媚外的政府，其不要脸的程度，真可以使鬼都害怕了。

苏州这样安全的地带，虽然也时有危险袭人，但在我自己是一点甚么危险也没有的。因为我不认识一个人，也好象没

---

① 侯绍裘（1896—1927），字墨樵，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一九二三年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委、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后参与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当选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在南京被捕就义。

② 张曙时（1884—1971），江苏睢宁人。北伐时期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执行委员、秘书长。国共合作破裂后以江苏省党部代表身份参加南昌起义，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党务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三年加入共产党。

有一个人认识我。我在这儿好象尽可以悠游自得了。然而我在苏州的几天却是最痛苦的几天。我自己已经是被革命的潮流卷上岸去了的人，一方面又担心着沪上被捕的十九人的生死。这十九位同志可以说都是因为我的缘故遭了缧绁的，我自己的心怎么能够安得下去呢？

十号的晚上，旅中的邻室有小儿们嬉戏的声音，是有一个家族寄宿。两个小儿时而唱歌，时而读书，时而顽皮，笑声没有一刻的止息，真好象两个大小的珠子在玉盘里面回转的一样。他们一点都没有忧虑，一点都没有畏惧，他们不消说是受战事的影响才流落羁旅的，然而他们简直是如住在家里的一样，或许比在家里还要快活。我在邻室听着，不觉得流下泪来。"感伤"的魔鬼伸出它的巨爪来把我捉着了。

好友呀，你们为我幽囚，
妻儿呀，你们为我离散。
我如今独宿中宵，
禁不住愁肠万转。

我无端地成了悲剧的主人，
我被革命的洪流卷上岸滨。
你们充满着情爱的邻居哟，
你们是何等的美满呀，欣幸。

侧听着小儿们嬉笑的声音，

好象是听着钧天的雅乐，
邻居哟，你我仅相隔板壁一层；
你那里是乐园，我这里是地狱。

我是舍生命去救我友人？
抑或隐姓名去顾全妻子？
二者交战于我的心中，
我的歧途是界于生死。

我早已矢志牺牲，
本用不着再事夷由，
但一边是妻子五人，
一边是友人十九。

万事是永远不能两全，
我只愿和我妻儿再见一面，
可怜他们孤单的羁旅，
和我的相别已经将近一年。

我希望他们离开了羊城，
在目前并已经到了上海；
到友人陷入网罗的地方，
我要冒万险而不迟滞。

九

辛焕文同志是九号往上海的。去了之后，十号不见回来，十一号也不见回来，竟连甚么消息也没有。大约是连他也被逮捕去了吧？

我的心已经决定了，我想去见蒋介石或者白崇禧。我想，我是他们所指的主要人犯，我去见了他们，让他们惩办我；我是可以把那十九位同志救出来的。这是我应尽的责任，无论从革命的利益上，或从个人的道德上说，我只是一个人，而且是别无多大能力，能力也已经是固定了的人。正是我应该死的时候，我不能够顾全我自己而牺牲十九个年少有为、正有无限的将来的勇敢的同志。

我的心已经决定了，任凭蒋介石、白崇禧把我去怎样处治，我总要去救那十九位友人。十一号的中午时分我把电报都拟好了，准备打给蒋介石。

> 南京总司令部蒋介石先生大鉴：沫若现在苏州，阅报见上海总政治部已被查封，并拘捕同志十九人，不胜愕异。一切责任由沫若个人负担，不日即将踵赴行辕或前敌总指挥部自首，听受处分。惟彼十九位同志皆年少有为，缧绁非其罪；应请速电前方，迅予释放为望。沫若叩。

这是在文字上我称老蒋为“先生”的最后一次。现在想起

来真不免有些滑稽，但在当时实在逼得无法可想了。我记得好象就在那一天，还写过一封信给我们"革命的大姐"蔡畅①同志，报告我的行踪，并报告富春②同志已到上海的消息。我怕武汉的同志们不知道我的下落，替我担心，但我又不能公开地通信，我写给蔡畅的信上，"沫"字是写成"妹"字的，于是"土豪劣绅"一变而为"母豪劣坤"了。打倒土豪劣绅而不打倒母豪劣坤，未免太不平等，谓天尊地卑，母豪之不足打倒乎？我如果是妇女解放协会的人，我就要起来抗议。因为有许多反革命的人，或者反革命的事实，多是由于母太豪而坤太劣了的呀。妇女解放协会应该提出一个口号是"打倒母豪劣坤"。

我们政治大部所制的妇女解放协会的调查表格上有一栏是"男会员若干人"。有的人很不了解，以为怎么妇女协会中会钻出"男会员"来？他以为我们政治部里面的人太糊涂了。其实这真正是想得周密呢。象我们这些男子，在逃难的时候，摇身一变随时随地都可以变成女人。而她们有些女同志，剪了头发，穿上军服，走起一摇一摆的堂皇大步的时候，那个又晓得那是雄乌还是雌乌呢？革命是客观的。所以我们政治大部的人才制出了这样客观的革命表格——不过这种表格我还没有拜观，是林熙盛同志告诉我的，我相信总不会是没有的吧。

---

① 蔡畅（1900—1990），湖南湘乡（今属双峰）人。一九二五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妇女部长、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北伐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妇女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上海等地从事妇女工作和工会工作。

② 即李富春（1900—1975），湖南长沙人。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江西省政府委员、中共江西省委委员、代理省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在江苏、上海、广东负责党的工作。一九三一年进入中央苏区。

没有的时候，是我们政治大部减少了一段光荣的历史。

总之，我已经决定想去尝尝铅弹或者铁窗风味了。因为这是再经济也没有的事体呀，人总是有一死的，得尝铅弹而死立地便成为烈士；幸而至于不死，从铁窗里尝过一次风味出来，那可不得了了。人坐过一次监，就好象建过一次很大的功业。不要说坐监，象我们弃甲曳兵而走的从反革命的势力之下逃回来了的人，不有些象凯旋将军一样，成了骄兵悍将吗？——今天不晓得怎样，写出来的东西总是反语。这个倾向有点不大对头，再继续着反一点下去，会成为“反革命”了。

还是来写些正面的文章吧。

我给蒋的电报已经拟好了，但是没有发。我总想等辛焕文同志回来。我的遗言都写好了。我身无长物，只有两部可以抽版税的书，每年可以抽得二三百块钱的样子。这是我的给我的夫人的唯一的遗产。我的夫人是要嫁人的时候，只要真正能够爱她的人，就是日本人也可以。还有我的三个男孩子中，总政治部的铁罗尼顾问想要一个，只要我的夫人同意，可以听凭他选择一个，那是一定可以养育成一个好人的。——铁罗尼顾问是我们的最好的一位同志，他要我的儿子这是正月尾间的事了。他的夫人有孕，是去年五月快要分娩的时候回俄国去的。他那时对我说：他要我的儿子去，送回俄国去受教育，第一步使他成为童子团，第二步使他成为西歪①，第三步使他成为西比②，在职业上是要使他成为一个极好的工

① 作者原注：C.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缩写）的音译。

② 作者原注：C.P.（共产党的缩写）的音译。

程师。他说：他的夫人假使产的是女儿，就把来配给我的儿子。那样一来，我们的孩子就是国际人了。因为他是高加索人，他的夫人是俄罗斯人，我是中国人，我的夫人是日本人。铁顾问是一位富于幻想、富于文学趣味的实行家，他的幻想真比我还要超脱。可是他的夫人所产的是男公子，而我的孩子们最近还不知道下落如何呢。

我索性在城内的玄妙观、城外的留园、西园去畅游了一遍，在久华楼上就跟“吃衣禄”的一样大吃了一场。第一次才尝试了江南的莼菜的风味。傍晚的时候回到寓处，辛焕文同志却已经在房中坐着了。

——“哦，你回来了吗？民治和文彬怎么样了？”

——“他们一个都没有捉着，你放心，民治有封信给你。”啊，我真是喜出望外。

——“他们怎么会没有捉住呢？捉着的是些甚么人呢？”

——“民治同文彬都出去做工作去了，因为六号那天是工人纠察队授旗。”

——“查封的时候情形是怎样？到底是因为甚么事情才查封了的？”

——“民治到了上海，在五号召集了一次各级政治工作人员的联席会议，通电拥护中央，写信质问老蒋，并群往总司令部请愿，要老蒋表明态度，被老蒋痛骂了一场。六号的下午五点钟的时候，白崇禧的卫队便去查封总政治部，简直就跟强盗一样，把甚么东西都抢干净了。他们捉着一位女同志，开始就在她手指上找戒指，又把她的两手向上一勒，勒到她的上膊，是

想在她的手上找出金镯子来的。他们的确是捉去了十九个人，除了几个真正是本部职员之外，有些还是外来的客人。现在他们络络续续都释放了，还剩下八个人，只要有相当的保人便可以保出来的。他们所要的是民治。卫队在政治部楼上捉人的时候，指名要李秘书；捉到龙华去的时候，潘宜之首先便来查人，问李秘书捉住没有。所以他所说的'主要犯人在逃'，是指的民治呢。"

——"民治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呢？"

——"都躲起来了。"

——"北火车站检查得厉害不厉害？"

——"检查是检查的，有兵在车站上把守，不过我穿的是军服，他们没有检查我。我一去就会着文先生，便把民治找着了。本来昨天就想回来的，因为没有火车所以才等到今天。"

——"你今天假如不回来，我几乎跑到南京去了呢。啊，真正是侥幸！"

我贪着和焕文讲话，民治的信都忘记了看。看了，也没有写什么，只是叫我不要坐火车去，最好是坐小火轮从苏州河到上海。啊，现在我还怕甚么呢？就是走路到上海，也不过仅仅两百多里的路呀。

一〇

真正是象遭了大赦的一样。十二、十三两天都没有车，也没有船，我们仍然留在苏州。我的创作欲公然发动起来了。我那时就想写一篇小说，叫着《未完成的悲剧》，想把这场滑稽的悲剧写出来，不消说这场“悲剧”永远没有完成。

我自从去年三月到广东去后，便决心想和文学断缘，一年以来我实在也没有写过甚么文学作品。有许多朋友骂我，说我作了官便不作文章了。其实官之于我何有哉？我一直到现在并不觉得我是做了官，只是不知道是怎的，文章总是没有兴会做。自出发以来，传单、标语、宣传大纲、政治报告，虽然做得不少，——这是我们邓大主任所说的“新艺术之创造”，好象不是那么一回事。创作欲的发动可以说是只有两回，一回是这“未完成的悲剧”，还有一回是“烧了像片”。这像片是一位女同志送给我的，那是二月初间的事，我因为有一天晚上想起我的夫人来，我又把它烧了。就只有这么一回事，可是也没有写出来。我这人究竟是脱不掉东方文化的束缚，我实在没有谈我们那位性学大博士的“新文化”① 的资格。有许多人误以

---

① 性学大博士，指张竞生（1888—1970），广东饶平人。著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编有《性史》等。曾开设“美的书店”，创办《新文化》杂志，宣扬性学。

我为浪漫鬼，其实我之不浪漫，犹如鬼之不浪漫也。因为鬼是没有的，那里会浪漫得起来。

——“我在车上还遇见一位很好的女子呢！”辛焕文同志突然得意地说起来。

——“吓！你还有那样的艳福吗？”

——“我一上车便遇着她。起初我和她的哥讲话，还有一位是她的未婚夫，她很留意我。我和她的坐位之间本来有一个空位的，她的未婚夫，这是她告诉我的，要来坐，她没有让他坐。她自己坐来挨近我，让她的未婚夫坐在她的旁边去了。我从上海和她一直谈到苏州，她是在上海读书的，社会上的事情不十分清楚，我向她尽力地宣传，她也很能接受的光景。”

——“吓吓，做政治工作的人，做妇女运动是拿手好戏啦。”

——“不过，可惜她问我的姓名，我不敢认真告诉她，我依然说我是‘文焕星’，是总司令部秘书，恐怕她会有信写到南京去吧！她还削过一个苹果给我吃。”

——“好幸福！你问她的姓名和住址没有呢？”

——“问是问了，我没有记得清楚。”

——“糟糕，你这简直是一场春梦了。”

一团和气的焕文同志把身子扭了一下，又微微叹息了一下，但我相信，他的宣传一定拉了一位女同志上了革命战线的。

近来皮带的作用很大；有许多女同志因为恋爱皮带的关系，竟也革起命来。还有许多男同志，因为吃醋的关系，竟也背起皮带来。皮带啊！皮带啊！汝之为用大矣哉！愿天下有

情人都背皮带！

只要能够革命，恋爱是不要紧的。能够借恋爱的力量来增进革命的热情，这是可以讴歌的现象。卡尔·马克思不是有绝好的爱人？加里波的[①]不是有共生死的情侣吗？代表未来社会的中国女性是应该产生的时候了。这种人决不会因恋爱成功而堕落，也决不会因恋爱失败而沮丧，恋爱就和吃饭一样，吃了饭是要干革命工作的。不过我看见有些女同志，吃了饭便做起太太来，这可要令人悲观了。

"投机少年，跨党分子。"——这是蒋介石给我们政工人员下的八个字的批语，不消说我也算是其中的一个。说我们"投机"，但投的是革命机，并没有投你蒋家机。说我们跨党，那真是不胜光荣之至了。现在"跨党"二字差不多成了"革命"的代名。只要是革命的，便是跨党的。蒋介石是在骂倒我们，其实是在恭维我们。

明明是屠杀农工，他偏也要打着农工政策的幌子。明明做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他说不是，"我是做的马儿"。明明欢迎孙传芳、张宗昌的代表，极力向他们求和，他说不是，"是他们来投降我的"。明明在南京、上海、闽、浙、广东一带惨杀了无数的勇敢的同志，他在南京偏要发出一个通令，令海内外各级党部追悼此次死难的路友于[②]等十数位先烈。明明"是一切

① 作者原注：十九世纪意大利革命运动的领袖，当时在欧美各国的声望很大。

② 路友于(1895—1927)，一九二七年与李大钊等二十人一起，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平。

权力属于蒋"，他偏也要说"护党，护党、护党"。偷了人，还要想建贞节牌坊，蒋介石哟，你真好不知羞耻！你的膏药已经卖得有点程度了，你自杀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吗？

"惟大英雄能本色"，有许多人都说蒋介石是"英雄"，其实他那里有半点的英雄资格！不消说他是想当一个英雄，然而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狗"，刚刚是成了一条帝国主义者的跛脚的走狗。

狗，也自有狗的厉害。我们骂一个坏人就说他是狼心狗肺。蒋介石的心，蒋介石的肺，的确是人所不能具有的。他的残忍，他的恶毒，不仅是一条狗，简直是一条疯狗了。他十二号，骗缴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枪，十三号大规模地屠杀闸北市民，我们是十四号才到上海。

十四号那一天在三等车的车厢外站了好几个钟头，一直站到上海。上海的北火车站上的确是有许多兵士在巡查着，但他们一点都没有注意我，我虽然悬心吊胆地，但也泰然自若地摆起土豪的架子走出车站。白色的恐怖正是达到高潮的时候，闸北的市面真是惨淡。在市面上走的人每行一步都好象提防着要触地雷的一样。租界的戒备不消说是非常谨严，重重叠叠的铁线网把重要的通道都堵塞着了，洋丘八在铁线网内巡逻，土丘八在铁线网外巡逻。人类这东西真是莫名其妙，他们时时在拘捕敌人，把来投进铁牢里，但他们在自己的周围自己筑就一座铁牢，却是洋洋得意地不可一世。达观一点说：上海就象一座大鸟笼，关着一群鸟洋鬼子。不过这一群鸟，它们所吃的东西却是我们的人肉罢了。

一一

我在惊惊惶惶的人群中好容易才走进了租界。我是和辛焕文同志约好了的，我到北四川路的一家书店里去等候他们。这家书店的主人① 和我很要好，其主要的原因不消说是因为我的“帝国主义者”的关系。自从我去年出发以后，只要一有便人到广东，书店主人是要送些礼物或者儿童画报之类给我家里人的。我很感谢他。

我一走进书店，老板看见我，把他两只眼睛都睁圆了。他是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的。他赶快把我引到背僻的地方坐着，向我说了一些上海的情形和日本人对于我们的态度。我也毫无隐讳地把我的态度对他说了。

回头他的夫人回来了。她又引我上楼去坐，十分殷勤地款待着我。她晓得我是吸烟的，她赶快亲自买了一筒“司令牌”来。她听说我早饭、午饭都没有吃，便赶快又叫了些日本料理来。她和我的夫人是在彼此通信的，久不得消息了，她也很在关心。她说我比从前在上海的时候强壮多了。店主人是要在楼下坐店的，招待我的责任就由她一手承担，倒使我心里

① 指内山完造(1885—1959)，日本冈山人。一九一三年来上海，先就职于日本药店，后开设内山书店，从事文化交流。著有《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花甲录》等。

非常地难受。我感受着一种谢意的浓重的压迫。每逢楼下有中国人来买书的时候，他一定要跑上楼来告诉我。她知道我的听觉不敏，总是要把她的嘴挨近我的耳边递话：

——"楼下有中国人来买书了，一定有认识你的人在里面，你暂时不要下去。"

象这样很细密的对于我的关心，我真是感觉得她就跟我的姐姐一样。

但我这人也很奇怪，我愈受着别人的优待，便愈觉得不安。不怕他们那洁净的楼房，整列许多书橱的楼房，对于我是十分的安全，但我总想能够离开得愈快就愈好。

民治走上楼来了。相隔仅一月，差不多到了不认识的程度。面色很黄黑、很清瘦，一眼看去就是饱经了忧患的神情。他一上楼来就叫我：

——"走，走，车在外边等。这里可以'派司'①吗？"

——"不要紧的。"

我说着把正在读着的一本《西洋社会运动史》②放还原地，便随着民治下楼，向主人夫妇告别。他们苦口留着我，怕我出外危险，劝我就在他们的楼房里居住，我辞谢了。主妇跑上楼去，把刚好抽了一支的"司令牌"拿下楼来。她说："我们家里不吃烟，请你带去吃吧。"我没有接受。她的丈夫去包书去了，因为我买了两本书。他把书包好来递给我，看见桌上的

① 作者原注：Pass（通行无阻）的音译。

② 全名《西洋社会运动史六讲》。日本石川三四郎讲演，黄源记录整理，华通书局出版。

烟，也说：

——“你把烟送给高先生吧。”

他的夫人说：“我送给他，他不要呢。”——隐隐含着一种埋怨的意味。

我心里觉得很对不住；烟是她亲自替我买的，送给我我又不受。但我要受时，我实在受不住这重重的谢念的压迫，所以我也只好忍着心不受。

——“不危险吗？你要当心些呢。”

筋壮力强的主人和肉体丰满的主妇送我出了店门，都伸出手来和我握了手，还在向我叮咛。我握主妇的手比握主人的手要长过一秒钟的光景。——这点是我报答她亲自去替我买了一筒纸烟的好意。

他们一直把我送上了汽车。汽车上坐着文彬与焕文，大家的欢愉充分地表示在握手的强度里，眼光的明发里。文彬正想说话，民治把手一捏，把嘴一呶，我们大家都沉默着了。

十里洋场，一街都是洋丘八，轰隆隆地乘着一部敞的大汽车跑来，轰隆隆地又乘着一部敞的大汽车跑去。乘马的、乘阿托拜①的、乘摩托的、走路的、站岗的，步枪上都上着刺刀，不知究竟在戒备些甚么。天气尽管是十分晴明，市面尽管是十分的繁盛，但总横溢着一种十分严重的惨淡的空气。所谓“白色的恐怖”，人到这儿，就是瞎子也可以感觉得到的。惨白的上海哟！我们同志们的血总有一刻要把你染红的时候。

---

① 作者原注：Automobile（汽车）的音译。

乘着汽车由北四川路一直跑到静安寺路的尽头处。民治们是住在一处弄堂里面的，他的小毛我也看见了。他们是去年九月在汉口成就了革命的恋爱的。“浴天撒下自由种，伫看将来爆发时。”——这是民治爱写的两句诗。小毛妹妹的肚腹随着革命的潮流一天一天地高涨起来，民治所撒下的自由种，看看要达到爆发的时候了。

想起来不免令人好笑。我们初见小毛，就在去年九月，那时候合林在组织秘密侦探队，要一位女同志帮忙，有人就介绍小毛。小毛是才从襄阳来的，有一天晚上，合林引她到南洋大楼——那时候政治部是设在南洋大楼，我才第一次看见她。她戴着一付药片眼镜，穿的是竹布短衫、青绸的裙子，头发不消说是没有剪的。那时候的小毛，全身都是封建制度。最有趣味的是她那付药片眼镜，我们称之为“保险镜子”，

合林是惯爱替人做月下老人的，他遇着小毛，便想把她和民治拉拢。我们便极力地向民治鼓吹，说小毛如何庄重，如何小巧，如何美貌，如何伶俐，不消说把民治也打动了。殷勤的合林特别在一天晚上约他们在广州酒家吃饭，我也在那儿奉陪。民治和小毛是第一次见面。两人都不肯说话，就跟敌对着的两个壁垒一样。我们是做政治工作的人，就拚命地鼓吹，拚命地在旁边替民治出力，总想鼓动着民治赶快上前去冲锋陷阵，然而民治总一句话也不说。民治的不说话是他的特性，他在无声无息里面把一切的事情都干好了。所谓“斗鸡不叫”者是也。那时候武昌正在围城，武昌城围了四十天才攻下来，比武昌城还要坚固的封建时代的女儿城，被我们沉勇的民治

还没有攻上四天便老早攻下了。

武昌攻下后，一城的“新艺术”便“诞生”了出来，完全成了革命化的武昌，而我们小毛身上的封建制度也了无孑遗了。她的药片眼镜老早送给了我，因为有了保险的人，用不着再用镜子来保险了。剪了的短发加上了烙铁，竹布的短衫变成了红色的旗袍，青绸的裙子变成了鲜艳入时长齐脚跟的肩褂，添花的丝袜、黑漆平跟透花的尖皮鞋、糅皮的手套、漆皮的长方手提包，小毛的一身整个儿起了一次社会革命。不过这一次的革命是由封建制度到资本制度的革命。然而资本制度刚好才开始，而自由的种子已经播下了，并且等不到资本制度的完全成熟，而第二次的社会革命看看便要爆发了。

1927年 7月①

① 从最初发表时间推断，应为一九二七年五月。

海 涛 集

涂　家　埠

一

一九二七年"八一"革命后的第三天，那是阴郁的一天，清早，我同一氓两人从庐山下来。我们是忙里偷闲，在分外冷落的庐山上只呆了一夜。

在大暑天，正好避暑的时候，避暑胜地的庐山偏会冷落，说不定会有人奇怪吧。但假如明白了当时的局势，那就一点也不会奇怪了。

那时是大革命的分化期。蒋介石已经背叛了革命，在南京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残余，和武汉的所谓赤色政府对立。但那"赤色政府"究竟赤到了怎样程度呢？五六月中在河南和张作霖作战，虽然打赢了，然而牺牲很大，而迎接出来的西北军却主张和南京妥协。就这样，内面潜伏着的反动势力便抬起头来，逼得投机分子们汪精卫和孙科① 之流逐渐右倾，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八年七月香港《小说》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① 孙科（1891—1973），字哲生，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北伐时任国民政府常委、青年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等职。一九二七年八月宁汉合流后，任中央特别会议委员、财政部长。后因受冷落，出国考察。

解除了中国总工会的武装，并解散了总工会和农民协会，而结果连政府本身也不能不逃难了。

武汉政府所依赖的唯一武力，是张发奎所领率的第四方面军，这里包含着原有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还有贺龙① 的两师人和叶挺的两师人，军容是相当盛大的。本来坚守着武汉，和唐生智、何健② 等所代表的反动势力作一坚强斗争，也未尝不是办法。但由于长江下游的封锁，汪精卫等的自私与无能，而更加上张发奎的想保全实力，终于全面退让，所有的政府要人和军队，都移到南浔铁路沿线来了。

所假借的名义倒是很堂皇的，东下讨伐南京蒋介石。但在实际上，政府要人在和南京方面勾结，企图宁、汉合作③；军事方面的人，特别以"保护阿斗"自居的张发奎，则是心存观望。他之占据着南浔铁路沿线，连他自己都很直率地对我说过，是"进可以谈，退可以走"。——还要向什么地方退走呢？退回广东去，由北伐而南旋了。

革命的形势是这样，真正的革命核心也就采取了新的动向，突破那些已腐或将腐的果皮果核，而迸发出新的根苗来。那就是在八月一号在南昌所揭幕的八一革命的意义。参加了

---

① 贺龙(1896—1969)，本名文常，字云卿，湖南桑植人。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等职。南昌起义时任起义部队总指挥。

② 即何键(1887—1956)，字云樵，湖南醴陵人。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师长、第三十五军军长。"四·一二"政变后追随蒋介石。

③ 一九二七年五月，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逐步走上公开反共的道路，七月十五日在"分共会议"上决定与共产党分裂，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合流，八月合组国民政府。史称"宁汉合流"。

那次革命的主力是贺龙、叶挺的四师人，另外还有后来走了岔路的第十一军的旧部。这样一来，把张发奎的部属几乎抽成了一个真空。

避暑胜地的庐山要遭冷落，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二

我那时是第四方面军的"党代表"，照例是兼摄着政治部主任的。我们跟着军队也到了九江。驻扎在一座已经放了暑假的教会学校里面。

我同张发奎通了电话，他要我立刻到他的指挥部去商量善后的办法。我去了，那是在一间两面临着庭园的楼房，陈设相当零乱，除张发奎之外，还有两位新任军长黄琪翔和朱晖日①也在座。他们也才接到八一革命的消息没有好一会，面容都很颓丧而又兴奋。

张发奎和我商量的就是解决政治部的事情。他主张解散，我也同意了。这是一种革命的逻辑，在当时一般认为：凡是干政治工作的都是共产党。八一革命是共产党发动的，所有的政工人员自然也应该共同进退了。

四方面军政治部虽然成立不久，但它是跟着我一道从总政治部分化出来的，它却集中了人力物力的精华，单是骡马我

---

① 朱晖日（1893—1968），字步云，广东台山人。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师长、第十一军军长。

们就有四五十匹。这在二十年前，不要说一个政治部，就是一个师部或军部都还没有这样的豪华。那些东西，我们既然拿不走，也就乐得慷慨，全部移交了。但是我们的结论是：人员一律以礼遣散，不作留难。

三

张发奎和我，本来是有些相当的友谊的。北伐期中，我们共同过甘苦，尤其是在河南作战的时候，我以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资格曾经上前线去慰劳，在新郑我们作过一番深切的谈话。我认为我们那时进河南作战是错误了，应该趁着南京的勾结还未成功之前，先讨蒋而后讨张。他那时很尊重我的意见，说我们是志同道合。故在回武汉之后，他升为第四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也就邀请我做他的"党代表"。但一从我做了他的"党代表"之后，便由"志同道合"一变而为"貌合神离"。你要向他提供些意见，他一句口头禅，便是"书生之见，纸上谈兵"。于是我们的交情便进了一境，由"貌合神离"再变而为"分道扬镳"了。

当我们在同意之下，决议解散政工组织之后，他却关心到我个人的进退上来。他问我打算怎么样，我回答他打算到南昌去。他却希望我能够跟着他走。他说，他个人打算乘日本船偷偷到上海，再由上海到日本去，部队交给黄琪翔和朱晖日带回广东，希望我能够帮他的忙。他自然是看上了我是日本留学生，懂日本话，够做他的私人秘书，但我谢绝了。

不过在这儿我倒也应该感谢他，我虽然坚持要到南昌去，他也没有阻拦我，而且还帮了我一点小忙。

他说："要到南昌去，至迟今晚上就要动身。我们回头就要下戒严令，今晚上的口令和特别口令可以照发，明天就不能保险了。"

还有，也是他说的，要到南昌去，最希望为他传达一点意见：

"第一，我希望他们尽速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免致发生冲突。

"第二，我听说他们要回广东，我希望他们走东江，不要走赣南，因为我的部队要走赣南回广东，免致发生冲突。

"第三，河水不犯井水，我们彼此不相干犯，我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我张发奎的名义，做傀儡我不来。

"第四，我对政工人员一律以礼遣散，希望他们不要伤负了我的人。"

这些话我请他笔记下来，他很勉强地用铅笔来在随便一张纸头上写出了，但不肯签名。不过，尽管不签名，尽管用铅笔，这总算是他自己的亲笔文件了。

四

就和毁坏一个器皿是很容易的一样，解散一个组织当然也是很容易的。没有费上半天工夫，整个方面军政治部和留在九江的一切政工人员都一律遣散了。但只剩下四个人决定

在当晚一同赶到南昌去。

这四个人是谁呢？便是李一氓、阳翰笙、梅龚彬①和我。一氓是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秘书，翰笙和龚彬是属于四军和十一军的军政治部的，职分我记不清楚了。我们是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聚齐。此外还带了两位勤务兵：一位是一氓的小勤务兵，另一位是我的大勤务兵。这两位勤务兵的姓名，我也记不清楚了。

戒严令是很严厉的，六点过后街上已经很少行人，车辆不用说更不能通行了。街头隔不几十步便有哨兵站岗，枪头戴上刺刀，如临大敌。我们依然是穿着军服的，在天光还不十分暗淡的时候，当然可以通行无阻。

那天是特别阴晦的一天，等我们快要走到火车站的时候，天色已经朦胧下来了。于是"口令！"……"特别口令！"的叫唱，把那严肃的气象弄得更加严肃。

在车站附近的一条侧街上，替我扛着一口小皮箱和一卷被条的我的大勤务兵，突然把担子放下，当街向着我跪了下来，流着眼泪，向我叩头。

我们都吃了一惊，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哭着把意思说出了："请饶恕我吧，我家里还有一位八

① 阳翰笙，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笔名华汉，一九〇二年生，四川高县人。作家，创造社后期成员。北伐时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南昌起义时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党代表。著有《地泉》、《草莽英雄》等。　梅龚彬（1900—1975），字电龙，湖北黄梅人。北伐时任朱晖日师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被通缉，流亡日本。著有《社会科学大辞典》等。

十岁的老母亲!”

这位勤务兵是湖北人，他是从武汉跟着我来的，看起来很雄壮，没有想出才这样胆小。他自然以为我们是上杀场，要他的命了。真是糟糕，他早又不说！但也只怪我们以貌取人，在事前没有经过一道甄别。

这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请他回去，我便把被卷也送了他，把小皮箱接过手来自己提。

五

车站上的人是很值得感谢的，尤其是铁路工友。

火车的交通已经停止了，据说在涂家埠以南有一道铁桥被炸断了，火车头留在九江的也只有两个，其它的都在南昌被扣留了。要去，就只好乘手摇车，但保不定能够到达。

车站上的人叫我们不要去，认为很危险。他们又说，外边还有这样的风声，说不定南昌那边还要打过来。

但我们坚决要去，请他们准备手摇车。他们答应了。北伐期中，铁路工友是有很好的组织的，他们知道了我们的来历，尤其自告奋勇，愿意把我们送到南昌去。

手摇车是一种正方形的木板车，下面四个滚子放在铁轨上，上面横置着一把固定的有靠背的长椅，可以并坐三两个人。摇车的人站在椅背后，摇着两边的发动机，车子便自然滚动起来。

我们连人带行李占了两架手摇车，我和一氓和他的小勤

务兵占一架，翰笙和龚彬占一架。每架两位工友替我们摇，摇起来的速度，似乎和火车的速度相差得并不怎么大。

是漆黑的夜，没有月，也没有星。除掉到了车站，站上的电灯显得分外辉煌之外，沿途只于黑影森严中偶尔露出一些农家的灯火而已。那是情意深厚的灯火，好象是亲人的眼睛。沿途都有哨兵站岗，走不好远便有“口令!”“特别口令!”的呐喊，在这之中还可以听出扳机柄的声音。

工友们很卖力。他们是轮流换班的，摇得二三十分钟光景便要换班一次。那样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在车站上，车上的人把车停着，只要向暗中一呼唤，便有回应的声音，接着便有人提起灯来换班。一听了我们的来历，新来的人又勇气百倍地接着把我们摇向前去。我们在路上换了好几班。在夜深应该睡觉的时候，要工友们起来作分外的服务，但却不曾听见他们出过一次怨言。真是值得感谢的事啊!我们是南面而坐的，真好象是南面王一样!

我们不断地劈进柔和的夜空中，劈出浩荡的长风来，感受着万斛的凉味。

六

到了德安车站，已经是半夜过后将近一点钟的时候了。

月台上，横七竖八地堆积着一些货物的包箱，有一排人光景在那儿守卫。

虽然叫了口令，把口令也应对上来了，但士兵们一定要我

们停车，不准我们过去。

一位短小精干的人来了。一眼看去便知道他是广东人，哨兵向他敬礼，称呼他是排长。

我对他说："我是党代表，受了总指挥的嘱托，有重要的使命要赶到南昌去。"

那人用多少已经官话化了的广东话，铁面无情地回答说："唔得！就系总指挥自己来，也唔得过！一定要有营长嘅命令先至得！"

"营长是不是在车站上？"

"唔在，在德安城里！"

"今晚好不好去通知他？"

"唔得！听晨我同呢一道见佢去。"

真不愧是"铁军"的少校，斩钉切铁地说了这几句话，他又各自回车站里去了。

士兵里面也有些是四川口音的，其中有一位带着同情安慰的意思说，这德安是最后一道防线啦，不是轻易可以通过的。前面十里路光景，还有一个尖兵站，这儿就算通过了，那儿你也通不过。

"你们的营长姓什么？"

"姓张，张总指挥的张。"

糟糕！这一张比那一张更难说话，我开始有点疑心了。我疑心的是张发奎在玩花头，当面做人情，背地里摆这一关来让我们不能过。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过不了的，的确就是张总指挥自己

来也怕过不了。我们便决计在车站上过夜了。

摇车的工友们是有朋友的，他们要我们跟着他们去找一个宿处，我们谢却了。四个人加上一个小勤务兵，就坐在那手摇车上，睡了一个半夜。

七

德安城离车站还有五六里路光景，那是在铁路东面。第二天清早，在八点钟左右，我们算得到那位广东排长的许可，让小勤务兵在站上看守行李，我们四个人进城去见营长。他自己并没有陪伴我们，而是派了两位士兵荷着枪，上着刺刀，把我们送去的。我相信，他一定和营长通过电话，而得到营长的许可，叫他那样做的。照官制，党代表和总指挥是平行的，而且有监军的任务，一个营长就劳他的尊驾，亲自到车站上来迎接迎接，论理也还应该。不过在这样内部起分化时的党代表，事实就等于"共产党的代表"，派两位武装的兵士来护送，倒是最合格了。

这一天是晴天，迎着清早的太阳，在一片甘薯中向德安城走去。

营部驻扎在一个中学校里面，我们被卫兵引进了一间课堂，那便是营长的办公室兼寝室了。在黑板下陈着一张行军床，床上便睡着那位营长。他受了通报，看见我们进了课堂，便很想撑起身来。一眼看去，他是在害病。我劝他不要客气，但他仍然抬着半身，指挥我们在附近的课椅上坐。

营长也是广东人，说他在发疟疾；看那样子的确也很狼狈，脸庞是瘦削而灰黑的。

我估计他一定认得我，但我却不认识他。

我把来意告诉了，并把张发奎的亲笔文件拿出来给他看。我告诉他："这是机密要事，故尔只能用铅笔写，也不好署名。但总指挥的亲笔，你总是认得的。"

营长没有多么留难，只是说要到南昌，恐怕也很困难吧，有几处铁路听说炸断了，不通火车。但他立即命令在那课室里的一位下属，写了一张路条，写明"有某某官长四名，勤务一名，准予通行"字样。我们便算得到了通过最后一道难关的把握了。

营长也很关切着当前的情势，他说："我们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人要打自己人？"

我因为不明白他的思想底细，没有多说话。我只是说："一定打不起来的，请放心。南昌的革命委员会里面，不是还有张总指挥的名字吗？他们只是反对蒋介石和汪精卫，并不反对总指挥。大家都希望赶快回广东，说不定我们可以在广东再见。"

就这样，我们便告辞了出来，循着原路走回车站。这次的心境特别轻松，我自己都在佩服我自己的机敏。幸好当张发奎和我谈话时，我要求他写出了他的意见，不然不是要很费周折，而且说不定还要遭意外的危险吗？

八

回到车站，立即又坐上手摇车出发。

在前面十里路左右，的确有一队尖兵在那儿守卫，有一班人的光景。

见了营长的路条，毫无留难地便让我们通过了。

真是愉快呀！过了这一线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天下了！太阳照得特别的光明，南风吹得特别的馥郁，田园青翠得特别娟妩。两条铁轨发着银白色的光，就象专门为我们铺设出来的那样，坦坦荡荡地丝毫也没有阻挡，要把我们运往革命的乐土。

工友们也摇得特别起劲，不断地只看到两边的林木往后飞。眼前的大地真是活着的，一切都在笑，都在跑，都在长风中发着浩歌。我们有时也让工友们坐在椅上，自己去摇它们。都是自己人，在车上是无话不谈，毫无顾忌了。

我同一氓坐的车子是跑在前头的，不知道是车轮的活泼，还是人力加紧的原故，我们跑得特别快。翰笙和龚彬坐的那一架，有时他们一齐起来帮助摇，但也摇不过我们，总是落在后面很远很远的，要相差十几二十分钟的光景。

"这样的手摇车，坐着实在是再舒服利落也没有。我这回要算是坐第二次了。前一次是往河南慰劳前线将士的时候，由信阳坐往新郑。那时是六月初，枣子树正在开花，河南平原很多枣树林，车子在枣树林中摇过，一望无涯的枣花，漾成一

片香海。那是使我终身难忘的一种印象。”

这个回忆自然会被唤醒起来，活鲜鲜地。在我们的车快要到涂家埠的时候，我向一氓说着，而于十分快意之中却表示了一星星的不满足：“江西境内的风物，太平淡无奇了。这儿和长江沿岸所见到的别无二致，希望能有一项有特征的东西，足以使我们这一次的旅行，增加点色彩。”

说也奇怪，大抵人在走顺路的时候，希望总是容易得到满足的。

就在我们达到涂家埠车站那一段期间，同样使我终身难忘的另一种印象，出现到我们的眼前来了。

九

涂家埠是一个大车站，位居南昌与九江之中。这在军事上是一个冲要的地方。周围有水回环着，因而在南北两段的铁路上都有铁桥。当北伐军在江西境内和孙传芳作战的时候，孙传芳便屯驻重兵于此，借铁路的联络，以策应南昌与九江两端。攻破涂家埠是很费了点力量的。

我们到达了涂家埠，倒也并不是将近一年前的战绩惊悚了我们。认真说，那样的战绩，在车站上是丝毫也看不出来了。但在那车站上确实有一样东西惊悚了我们，至少是我自己。我们在车站上，看着一列火车停在那儿，有三个车厢都挤满了兵。还有好些服装不整的兵，拥挤在月台上。火车头向着九江的一边，升着火，正冒着烟。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惊讶了，“已经可以通车了吗？”

我们的手摇车本来还没有到换班的地点，但我要他们停下了。我到车站上去找站长。站长就在那月台上，我问他那火车是怎样的情形，他说，他也不清楚，是从牛行开来的，他们逼着加煤加水，要开往九江去。

“不是说有铁桥炸断了吗？”

“看情形大概是没有炸断吧，不然火车怎么能够开来呢？”

情形算弄明白了。我在心里这样想：这列火车是不好让它开往九江的。假如开往九江，那不是替那边增加了一个火车头和三个车厢吗？而且证明铁桥并没有断，不是又可以立刻通车运兵了吗？

因此，我便向站长说，要他不要让这列火车开出。

月台上的散兵看见我在和站长交涉，有的便簇拥上来。都是些没有符号的徒手兵，显然是在南昌被缴了械的程潜和朱培德的部队了。他们看见我穿的是军服，起初摸不准确我是那一边的人。有的喊我是“官长”，问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湖南人的口音。我没有十分理会他们。

我走进站长室里去打电话。天气很热，我把皮带和上衣解了，脱在室内的一张床上。我是在裤带上佩着一枝布隆宁手枪的。我打电话给牛行车站，要他们转南昌的贺龙和叶挺，报告他们我到了涂家埠；并希望他们注意铁路的交通，要断绝就应该严密。

当我在打电话的时候，一些散兵便拥在窗外听，他们自然看准确了我的身份，知道我是什么人了。

电话不容易打通，我又走出站长室，想找一氓来再打。待我走出月台的时候，那些散兵便簇拥上来了，立即把我包围着。我顿时感觉着情形的严重。我的手枪是上了子弹的，但不是拔出来自卫的事，而是护卫着手枪不要被人拔去的事了。我把两只手紧紧抓着手枪，约略二十名的散兵便来抓着我。有的在喊打，有的不作声地只是出手出脚，有的争着抢我的手枪，有的争着抢我的手表。眼镜被打掉了，自来水笔被抢去了，手表被扭去了，我仍然死命地保护着手枪。从月台被打下轨道，当我倾斜着还没有倒上轨道的时候，一个家伙从附近顺手捡了一个大石头向我当胸打来，但幸好只是一个大炭渣。

十

大家的目标都在争取我的手枪，我又被暴徒们从轨道拉上了月台。二十几个人扭着一团，我被打倒在月台上了。结果，皮带终竟被扭断了，手枪被一个人抢了去。他举起来，楞着仰睡在地上的我。就在这一瞬间，我自己的脑筋真是清凉透了。那真是形容不出的一种透彻的清凉。

种种的回忆在那一瞬时辐凑了起来。

一年半前由广东出发的时候，霍乱症正在流行，在爬南岭的途中，看着看着一些伕子和士兵，便倒在路旁死去，然而我没有死。

去年八月三十号打到武昌城下，跟着士兵一道去冲锋，纪德甫是阵亡在宾阳门外的，然而我没有死。

蒋介石已经叛变了，并且下了我的通缉令①，我还公然到过南京，并和军部的人员同坐一部火车由苏州到上海。那时我也没有遭逮捕，也没有死。

由上海回到武汉的时候，坐着一只英国船，船到南京城下，正遇着孙传芳反攻，两军隔江炮轰，船只好停在江心五天。那时我也没有死。……

然而，没想出才要死在今天，死在这涂家埠，死在这些被缴了械的乱兵手里呀！……

清凉的意识在替自己不值，然而很奇怪，那枝手枪却没有送了我的命，而是救了我的命。

当那个把我手枪抢去的人高举手来的时候，一群殴打我的人却把我丢开，大家跑回头去争抢那枝手枪去了！

这样一个好机会还能失掉吗？我的生命便乘机脱逃，一直穿过车站，走向后面的一排工友房下。那里有齐胸高的一排方格窗，都是开着。我便在一个窗口上，用两手一按，跳进房里去了。房里沿壁都放着床，在靠北的一张床上，一位中年妇人，正抱着一个乳儿在午睡。她被惊醒了，我把来历告诉了她，请她不要声张。

不一刻，外边的哨子响了，有火车开动的声音。我知道是那站长被迫着把火车开出了。但到了这时，我也无法挽回。等调匀了气，我又慢慢从工人房走出。

---

① 蒋介石因作者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前夕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其叛变革命的面目，乃于同年五月颁令通缉，称作者"趋附共产，甘心背叛"，"电令一体严密缉拿"，"务获归案惩办"。

奇怪，刚才那么高的窗，一按便可以跳过的，现在却是移步都感觉艰难了。虽然还在兴奋当中，但周身都已感觉着有点微痛。

十一

一场险恶的风波过了，在月台上又看见了一氓、翰笙和龚彬。一氓也挨了打，他是被一部分人追进一间待车室里面，躲在一只角落里，虽然受了脚蹴，但还没有什么严重的伤痕。

翰笙们的车到得迟，他们停在站外，正是我们挨打的时候。翰笙因为往田里去小解去了，得免于难。龚彬受了一部分人的追逐，幸好开火车的哨子响了，散兵们都丢下了人去抢乘火车去了。

小勤务兵呢？失了踪。这在我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当我在月台开始挨打的时候，我看见他在月台的南端，把身上的驳壳拔出来，想要救护我，然而另一群散兵却把他簇拥着了，以后便不知道他的下落。车站上的人说，他被簇拥上火车去了。这定然是实在的。因为始终没有听见开枪的声音，月台上也没有什么血痕，他被架去了是毫无疑问的。但他的死活是怎样，我们至今都不知道。

那小朋友怕还不足二十岁吧？他是从前我们在南昌工作的时候跟着一氓的，一氓一定还记得他的姓名和籍贯，我是丝毫也不记忆了。只是记得他有一个还未十分成熟的身子，相当结实，不足五尺高。有一个桃子形的脸蛋，相当丰满而健

康。的确是一位纯洁可爱的小鬼。但从那时以后，我们便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他到底死了，还是活着的呢？假使是死了，那可以说，完全是为了我的轻率造次而死，而且他还是存心救我并打算开枪的，他更完全是替我而死了。

大家的行李都被抢光了，最可惜的是我在北伐期中的一些日记，还有是一口皮箱里面装满了的二十七枝驳壳。这武器没有成为人民的武器，而成为反人民的武器了。

1948年6月5日

南昌之一夜

一

遭了散兵的殴打，自以为会死的，却从死亡线上挣脱了转来，这总是愉快的事。小勤务兵失了踪，全部的行李遭了抢劫，四个人倒真真正正成了名实相符的四条光棍了。

摇车的工友劝告我们，最好把摇车减少一部，我们大家都集中到一部车上，他们四个人轮流着摇我们四个人，沿途就不用换班了。看情形沿途一定经过了散兵的骚扰，换班恐怕也是不容易的。

我们接受了这个意见，接着便在车站附近，尽可能采办了一些干粮，在十点钟左右，又重新坐上了摇车，离开了涂家埠。

八个人坐一部手摇车，两个人坐在靠椅上，两个人摇，四个人坐在车板上，虽然拥挤得一点，但力量可显得愈见集中了。

车在轨道上飞快地滑走着，沿着铁轨两旁，不断地还有零星的散兵从对面走来，又和我们擦身走过，有的是湖南口音，有的是云南口音，当然都是在南昌被缴了械的难兵了。情形都是很狼狈的，他们离开南昌，沿着铁路线走来，是已经整整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八年七月香港《文艺生活》海外版第五期。

走了两天了。

他们对于我们倒也没有什么敌意，没有来抢我们的车，也没有来拦我们的车。毫无疑问，他们是摸不准确我们的身份的，看我们是从九江方面来的，或许怕还认为负有什么调解使命的吧。

难兵愈朝前走愈见稀少起来，到正午时分便终至绝了迹。

沿途的车站都没有人办公，乡村都是关门闭户，有些地方显然遭过抢劫。我们都私自庆幸，幸好减少了车子，并采办了些干粮，不然是无法应付的。

在阳光下直射着，摇车以单调而同一的速度进行，天气虽热，而却有不断的凉风，这些正好是催眠的因素，过了正午以后，车上除摇车的人以外，都打起了瞌睡来。

但我自己始终是兴奋着的。胸上和头上的打扑伤时时作痛。

眼镜失掉了，眼前的印象是模糊的，我也只得闭着眼睛养神。这样却打开了我内部的回忆的闸口。我回想到了整整七个月以前的一段往事，就好象得到了一个天启的一样，我把一个长久不能解释的疑团突然领悟了。

二

那是一九二六年的除夕，我和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同乘火车由九江回南昌。

是蒋介石和武昌政府酝酿着分裂的时候。广东的国民党

政府北上，道经南昌，便被蒋介石控留在南昌，费了很大力量的争取，算把政府人员争取到武汉去了。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军权和政权分离，让蒋介石负军事上的责任，而同时要受政府和党的指挥，党和政府不能放在蒋的挟持下受他操纵。蒋自然是不甘心的，因此正秘密地在进行着种种的阴谋，联络帮会、勾结各种反动的民间力量，以从事破坏。

蒋上了庐山，代表反动势力的张静江和陈果夫们在他的左右。

邓演达是代表着武汉派，和当时还算是左翼分子的顾孟余① 一道，从武汉到庐山见蒋。他们是受了蒋的电邀，还是自动出发的，我可不甚清楚。照我估计，恐怕出于电邀的成分居多。

邓在庐山和蒋的谈判并不惬意，蒋要邓到南昌总司令行营代理参谋长。（北伐时的参谋长是李济深②，李一直留守广州。前方是由白崇禧代理着的，但这时白已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向浙江出发了，职务暂由总参议的张群代理着。）这自然是调虎离山之计，邓和武汉派都是不能同意的。然而在邓却有不能抗命的理由：因为蒋是直属上司，邓是一个军人，怎能不服从命令呢？

我那时是在南昌服务的，我以政治部副主任的名义，在管

---

① 顾孟余（1889—1972），名兆熊，河北宛平（今属北京）人。一九二七年任武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兼教育部部长。

② 李济深（1885—1959），字任潮，广西苍梧人。一九二五年任黄埔军校副校长。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理着行营政治部和整个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邓电邀我到庐山，我是在除夕的前一天去的，我们在旅馆的一间小房里，谈了话。本来不想让蒋知道，以便秘密离开的，但不料于不经意间，遇着蒋的一位随从副官，也就只好公开出来，在山上住了一夜。

邓是讲好在除夕那天去南昌的，他说非去一趟不可，不去恐怕就不能下山。我自然也就决定和他同车。

当除夕的清早，我们在要下山之前，我先到庐山疗养院去见蒋。走到门口的时候，他正从里面出来，照例披着他那件黑披风。他突然见到我，很诧异。他问我："什么时候来的？"我答应他："昨天晚上。"他又问："是择生（邓的字）叫你来的吗？"我回答说："不是，是六军政治部（当时驻扎在九江）请我训话，我个人顺便上山来看看阵亡将士墓的工程的。""见到择生吗？""见到，我们同住在一个旅馆。他告诉我他今天往南昌，因此我来见你，我要和他同车回南昌去了。"

蒋听了我这些话，好象放了心的一样，他要我和他一道走。他说："好，我们到招待所去，一道去看张静江先生。静江先生也打算乘今天的车去南昌的，但我想多留他两天。"回头又象有些不能放心地问我："择生和你谈过什么？"我只好说没有。他接着又说："我叫择生到南昌去代理参谋长，他们总可以放心我了。他们总说：军事的发展太快，政治赶不上军事。他来，总可以使政治赶得上军事了。关于武昌方面的总政治部的事情，我还打算要麻烦你去一趟呢。……"

走到招待所了。半身不遂的张静江，已经在一间凉厅式

的会客间里等着，在那儿聚集着很多的人。邓演达、顾孟余、陈果夫，都在。下山的藤轿都准备停当了，轿和轿夫们也聚集着在窗外的草地上。

那是阴晦的一天。蒋一走进会客间，大家都站立起来了。只有不能站的张静江，瘫坐在藤椅上，特别睁大着在那猴子型的脸上已经够大了的一双眼睛。

蒋没有十分理会别人，却匆匆忙忙地对张静江说："静江先生，今天不要走。"

"为什么呢？"张反问着，"一切都准备好了。"

蒋没有说出理由，只说："我要你多留两天。"

就这样，我们该走的人也就告别下山。顾孟余在九江留下了，邓演达和我便乘火车到南昌。

三

一氓从午睡中醒来了，他和我是并坐在靠椅上的。于是，在我脑中盘旋着的回忆，便找着发泄的对象了。

"一氓，你还记得，去年的除夕，南昌城那一次的兵变吗？"

"那一次你们不是几乎遇险吗？那次是第三军的少数士兵的哗变。"

"在那时候，一般是认为第三军少数士兵，因为年关的薪饷没有发足，激起了哗变，但我现在有点怀疑起来了。"

"怎么的？"

"我猜想，那一定是蒋介石和第三军的某一个下级军官串

通起来，所组织的一个人为的兵变。他们是想在乱军中把邓演达打死的。”

于是我把离开庐山时的情形，向一氓诉述了一遍，接着又重述出我们到达南昌时的情形。

“我们从牛行车站过江，天已经黑了。一上岸，便有三五成群的乱兵，携带着武器随便开枪。我们探问了一下，晓得是第三军的兄弟。邓主任是军事家，他看情形不稳，便叫我们要小心，一直挨着街边走。走到城门口的时候，竟有机关枪架在那儿。有兵来盘问我们，我们只说是自己人，第三军的，他们便把我们放过了。进了城，沿街都关门闭户，依然是三五成群的士兵不时地乱放枪。走近臬台衙门的时候，在昏黑中又看见有机关枪架在那儿，听见有扳机柄的声音了。有人高声地盘问：谁呀？我们又说，自己人，第三军的。于是乎便把臬台衙门通过了。我们一直走到总督衙门的总司令部，便再没有遇到什么刁难。那晚上，我和邓主任都是草率地在总司令部过了一夜的。”

“怎么便可以断定是蒋的阴谋呢？”一氓听着我的陈述，他考虑了一下，还是有点不大相信。

“我的怀疑是有五点根据。第一，时间那么凑巧，刚刚在我们回南昌的时候便起了哗变。第二，变兵公然布防，而且只布防由码头到臬台衙门——我们到总司令部所必由之路的那一段。第三，当晚的兵变并没有经过好长的时间，便自行终止了。第四，事后，并没有惩办任何人。第五，这是怀疑出于蒋的阴谋的最坚强的根据，便是，张静江本来决定当天和我们同

车到南昌的，由蒋的临时变计，差不多等于命令一样的方式，把他强留了下来。这不表明是有计划的吗？我揣想，他一定是头一天晚上，用长途电话约好了，所摆布的诡计，就是张静江他们也不知道的。”

一氓点着头表示同意，接着又问我：“你们在当时是不是觉察到呢？”

“我是刚才坐在这手摇车上，才忽然想到的。我想就是邓主任，恐怕也不曾觉察。”

我的根据是择生在第二天离开南昌时的情形。我便把往事又继续说下去：“除夕，我们在总司令部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一早，我回到东湖的政治部，择生到南门外俄顾问的公馆里去了。九点钟左右，他打了电话来找我，我去了。他把他立刻要离开南昌的话告诉我，他说顾孟余在九江等他，他们从武昌乘来的一只小火轮，是靠在九江上游的一个隐蔽着的地方，他们是不愁没有方法回武汉的。他说到要分离，他流出眼泪来了。他关心着我，要我小心。但同时他又说，他和蒋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但他总有一天会觉察到，谁是在为他革命的生命着想，谁是阿谀着他断送他的革命的生命的。这是择生临到那样的瞬刻所说的话，他对于蒋可谓一往情深。你能够相信，他已经觉察到，蒋就在头一天晚上竟摆布出一场兵变来，打算断送他自己的‘革命的生命’的吗？”

“演达邓（邓演达的签名，照例用西式，因此我们也每每这样称呼他）毕竟是一位忠厚的人。”一氓自语般地赞叹着。

“还有，你应该还记得：就在邓主任走的那一天，蒋也从庐

山回来了，他打电话来要我到总司令部去。我去了，他第一句问我的，便是'择生呢'，他竟把择生关心得那样紧。可见他没有要到命，便紧迫地向着我要人了。"

"你那次倒应付得满好，老蒋丝毫也没有怀疑到你。"

"我看他是把我当成书生，无足重轻，不值一杀罢了。"

在我们说话的当中，坐在我脚下、靠着椅脚睡熟了的翰笙，也早醒来了。他很象感到兴趣，他插口问起我来："你是怎样应付的？"

"我吗？我是装傻。我对蒋说，就是为了除夕的兵变，择生认为有当面向总司令报告的必要，他便赶着回到九江去了。当然是在火车上彼此错过了。就这样，蒋也就没有再追究我。但我想，蒋在当时怕也认为，择生是不能够逃出九江的，因为船舶管理处不会为他备船。但他却没有想到，择生早自预防着了他这一着。那一次的阴谋，在蒋无疑地是失败了。"

四

这些回忆和谈话，算打破了车行中的寂寞，我自己也在私自庆幸着：我的生命力毕竟有蚂蝗那样的执扭，要想使它和我的躯壳脱离，好象也是不很容易的事。

手摇车摇到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的确到了牛行车站。车站和附近的市镇上，依然一个人也没有。

要打电话吧，电话房是上了锁的，没有办法打通。

我们走到赣江边上去，隔江可望到南昌城，但喊话的声音

是不能到达的。江面上连一只船影也没有。赣江正是洪水期，无情的水滚滚地旁若无人地排泻着它的浊浪。有一团团的浮漂象小鸭一样浮在水面一道奔流着。

南昌城上时而有零星的枪声射来，也时而有模糊的士兵的影子可以看出。想来他们也是看见了我们，才在那儿瞄准射击的吧？

——这样是相当危险的，有什么办法过江呢？

我们不期然地，都有些焦急起来了。

在江边望了一会，又回到车站，想找那四位工友设法，但他们连影子也不见了。他们的任务是达成了的，赶紧脱离了危险地带，也正是应分的事。但是我们四个人，到了这时候，却俨然成为了无依无靠的四个孤儿了。

车站上没有办法可想，又只好折回江边。江水依然无情地滚滚地流着，船影一只也没有。有的是城上模糊的人影，空中零星的枪声。我们隔着江，整齐着嗓子，又试了几番喊话，然而一点反应也没有。有的依然是模糊的人影，零星的枪声。

——这是相当危险的，怎么办呢？

虽然并没有追兵在后，而确确实实是有大江在前。我们面面相觑着，真好象伍子胥在过昭关了。

江岸上骈列着一些大户人家，围着很高的封火砖墙，一家家都关门闭户。我们也试着去扣了两家大门，谁也没有人应门。说不定每家人家都是空的，家里人都到别处去躲难去了。

就这样，我们在江边上往复徙倚着，足足有一个钟头，突

然晴明的天黑暗下来了，就跟谁在变戏法的那样，满天都涌上了浓黑的稠云，黑得来有几分令人可怕，就象快要到半夜光景。

这是暴风雨的先兆。我们赶快在一间大草棚下躲避起来，那在平时是从江船上起货的堆栈。

天愈来愈黑，突然间下出一批倾盆大雨。——不，这“倾盆”两个字还不够形容，倒可以说是倒海翻江，或者说，整个的天都垮塌下来了的那样。

五

暴雨没有好一会也就过了，眼前的一切，更加真真正正地被冲洗得干干净净。

天气倒凉快了下来，可却增加了心境的凄寂。

——过不了江，和自己人接不起头来，怎办呢？

天色渐渐昏黄起来了，江水在经过一阵暴雨之后，好象流得更加得意，更加汹涌，船影依然是没有的。不仅渡船没有，就是上下游来往的船，偶尔错误地开来了的也没有一只。

这明明是封了江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在当时实在不大明白：张发奎的军队还远远驻在德安，从德安到牛行是一片无人之境，也应该是自己的区域吧，为什么要那样退缨，竟到划江而守呢？

大家的心境都已经达到绝望的程度了，真个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对着那浩浩的赣江，竟想喊出两声蹩脚的秦腔了。

在无可奈何中，我一个人沿着江边往下游走去。

但是奇怪！走了不很远，我突然发现了一只小船，打着一张红旗子，在江心不安定地摇着。

“呵，救命的船来了！”我不禁叫了出来，又接着拚命喊，“请把船摇过来！请把船摇过来！我是郭主任，要进南昌城去！”

船上有两个人影子，一个在后边掌舵，一个坐在船头近处。

“这真是天外飞来的救星了！”船果然在向着我摇来。

船摇拢了岸，船头上的一位是年青人，他竟认得我。

“你们是城里派来接我们的吗？”

“不，”年青人回答，“我是来收军用电线的。是你一个人吗，郭主任？”

“不，我们还有三个人呢，在那上面。我们是昨天夜里由九江动身，坐着手摇车赶来的。”

“你们碰着我们真好了，队伍今晚上就要开拔，从清早起封了江，我这一只船要算是最后一次了。”

啊，这真是天外飞来的救星呀！我自己在心里反复着：简直就象戏里编凑的情节一样。伍子胥过昭关，遇着江上渔父；① 楚霸王到乌江，遇着乌江亭长；② 我们来南昌，遇着这位

---

① 伍子胥（？—前484），名员，春秋后期吴国大夫。其父楚国大夫伍奢遭谗被杀，他为报父仇经历宋、郑等国入吴。相传其经昭关时，不得通过，又有追者，焦虑惊恐万分，乃至一夜间须发皆白。“遇着江上渔父”，事见《史记·伍子胥列传》。

② 事见《史记·项羽本纪》。

电信队的青年。

六

在昏茫中，渡过了江，天已经黑下来了。

除夕遇险的一幕，自然又回忆起来．但我们这一次是化险为夷了，虽然费了一些周折。在全街关门闭户的街道上，被人引到了贺龙的军部，恰巧是在臬台衙门。贺龙和他的幕僚们正在吃夜饭，他看见我们到了，欢喜得跳了起来。

“呵，你们来了，来了，大家关心得要命啦！”说着便把我们拥抱起来。他当然还不知道我全身都感觉到疼痛。

我们少不得便把九江出发前后的情形，告诉了一遍。他听说我同一氓挨了打，便要叫军医来看．但我们推辞了。因为并没有受什么内伤，外伤也不怎么严重，大家都在忙乱的时候，最好是省得麻烦了。

我们被留着吃了晚饭，贺龙又叫勤务兵拿了两套卫生衣和短裤来送我作为换洗用。他虽然比我肥壮些，但我们的高矮是相差有限的。

不一会，恩来得着消息也赶来了。他已经在电话中知道了我们挨过打并把一切行李都丢掉了，他随身带了一套蓝布军服，是他所分得的，拿来送我。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我把张发奎写来的四项要求，交给了恩来．他拿着看了一遍，说：“都不成问题了。我们是决定走东江，不走赣南的。本来我们打算今晚就出发，离开南昌，现在改成明早出发了。我们和他

自然可以各不相干。我们的方针是缴械，不杀人，他也是应该知道的。'八一'革命，我们只缴了第三军和第六军一部分的械，并没有杀一个人。"

"不杀人，有时也好象不大好。"我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倒几乎被你们没有杀的人杀掉了。"

大家哄堂笑了一会，真的快心称意的大笑。

南昌方面的情形，我们也算弄明白了一些，彼此都在庆幸着来得的确是时候。假使我们再迟得一晚上，不仅会掉队，而且有可能会当俘虏的。南昌城里还潜伏着很多的反动分子，等我们的军队开拔之后，他们立地便要露出面来报复的。就是张发奎早迟也难保要翻脸

恩来是属于参谋团本部的，负责指挥军事上的责任，他很忙。那个组织里面，包含着刘伯承、李立三、彭湃①，和其它的主脑人物。他先走了。

当时的革命委员会里面也有总政治部。我和一氓、翰笙是派在总政治部里面的，龚彬属于那一个组织，我可记不清楚

---

① 刘伯承（1892—1986），四川开县人。早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一九二七年任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同年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起义失败后赴苏联学习。　　李立三（1899—1967），原名隆郅，湖南醴陵人。曾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参与领导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一九二五年参与领导五卅运动。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广州起义失败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彭湃（1896—1929），原名汉育，广东海丰人。一九二四年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次年任广东省第一届农民协会副委员长。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后领导海陆丰农民起义，建立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任委员长兼中共东江特委书记。有《彭湃文集》。

了，大约仍然是那一军的军政治部吧。

我们也得赶着在明天出发的，接着便被人引到旧总督署，去就自己的岗位。

七

旧总督署，这个在北伐期中曾经做过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的，现在是革命委员会的大本营了。这儿是我在一九二六与一九二七年之交的三四个月中，每天必须出入的地方。隔了不上半年，又算是旧地重来了。

情形是变了。虽然是在夜间，照例是那有"瞎子"之称的电灯光朦胧地照着，而且都显得零乱，但大家都很兴奋，也都显得那么朝气勃勃。

北伐军由广州出发，不到一年工夫便席卷了长江流域，并几几乎完成了统一华北的使命，现在由蒋介石为首的内部叛变，阵线是分裂了，只剩下革命的核心力量，又从长江流域要折回到广东，准备卷土重来。照道理，这应该是革命的挫折，然而在当时，谁也没有这样的感触。"八一"革命是成功了，我们是胜利者。胜利者的气氛的确是涨漫着的，就仿佛那"瞎子"电灯，都呈现着胜利者的面貌。

就在那样的电灯光下，我看见了谭平山和恽代英①。

---

① 恽代英（1895—1931），字子毅，江苏武进人。一九二七年主持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后参加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同年十二月参加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平山在那时是革命委员会的事实上的主席，我们从武昌分手仅仅半个月光景，现在是在另一个天地里会面了。除欢喜之外，彼此都没有什么话好说。

但我对代英却表示了特别的谢意。因为在我未来之前，他已替我们把政治部组织了起来，而且处理得井井有条了。虽然明早就要出发，也没有剩下什么工作要让我们来赶夜工的。

代英在担任着宣传委员会的工作，我虽然也是宣传委员之一，同样也无须乎要我来作事务上的处理。

说也凑巧，当晚让我留宿一夜的房间，正好是七个月以前的除夕我避难过的地方。旧时的回忆免不得又来萦绕了一番。虽然身上还在痛，但午前在涂家埠遇难的一幕，却比除夕避难的一幕，更加辽远了的一样。

1948年6月21日

流　沙

一

从汕头市黄夜撤退以后，到了流沙，在这儿已经停留了一天一夜了。在第三天的中午，终于等到了两位军事负责人贺龙和叶挺的到来。首脑部聚集在天后庙①（？）里一间细长的侧厅里开会，作着最后的决策。决策大体上已经是商定好了的，只是在征求贺与叶的同意。

主要是恩来作报告，他是在发着疟疾的，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为什么我们在瑞金、会昌连捷之后，毕竟在汤坑打了败仗？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我们已经打到筠门岭，应该穷追，由蕉岭、梅县打出，不让溃败了的黄绍雄、钱大钧②们有整顿的机会。我们没有这样做，竟由筠门岭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八年八月香港《小说》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① 应为流沙基督教堂。

② 黄绍雄，即黄绍竑（1895—1966），字季宽，广西容县人。一九二七年八月，被蒋介石任命为前敌总指挥兼右路军总指挥，截击南昌起义部队。　钱大钧（1892—1982），字慕尹，江苏吴县人。一九二六年二次东征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师长，一九二七年八月奉命阻击南昌起义部队。

折回，绕道长汀、上杭、大埔而入潮汕。这样便把我们作战力最强的两师人不能不分开来，留了一师在三河坝镇守。终竟让敌人得到了居高临下的形势，集中力量来把我们个别击破了。

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我们的另外两师人，竟至中了敌人的诡计而失掉了斗志。——这说的是贺龙的两师人，两位师长——有一位是他的堂弟①——初被敌人收买，但结果终被解决了。②

其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我们不仅没有把民众发动起来，我们在进入汕头之后，反而还采取了类似旧军阀的作风，枪毙了两位工友，用以维持旧秩序。

把这些失败因素检讨了之后，接着又提说到大体上已经决定了的善后的办法。——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这工作已经做得略有头绪了。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好了好些当地的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

报告完毕，大家的视线差不多都集中到贺龙身上。他向来是豁达大度、异常乐观的人，但现在显然抱着严重的责任感，面孔分外地沉郁和黝黑。他咬着牙关沉默着。

---

① 指贺锦斋(1901—1928)，原名文绣，湖南桑植人。一九二六年随贺龙参加北伐。次年四月在河南临颍大败奉军，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同年八月参加南昌起义，南下途中，代理指挥第二十军。一九二八年随贺龙、周逸群创建湘鄂西根据地，同年九月在石门泥沙战斗中牺牲。

② 贺锦斋部在十月三日流沙军事会议期间已安全通过乌石，到达陆丰地区时与总指挥机关失去联系，十月十日被缴械。此处记述不确。

叶挺先以他平素就带着几分兴奋的语调，开始说起，但说得很简单："我们再有得一团人，便什么都不成问题的啦。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

贺龙最后以他宏亮的声音，带着愤怒沉着地说："我被我自己的家族出卖了，连累了革命，对不住大家。但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就这样等一切都说好了，要准备执行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两点钟左右。就在这时候，一位牒报员仓惶地传来一个消息：村外的山头上，有敌人的尖兵出现。

二

这一消息本来是在意料中的，大家在这两天所担心着的也正是这件事情，但毕竟来得太快了。各个单位还来不及充分疏散，有些改了装的人员也还来不及和向导接头，我们便只好整队出发，准备往云陆①（这个地名记不甚清晰，或许有误）宿营。

在村头陆续收集，临时整顿好了的武装同志，可有一营人左右，武装还相当完整。这一营人被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殿后，另一部分打冲锋，由叶挺领队，争夺那必经的西南山头。

走中间的是庞大的非武装人员，这一队伍可比一营人还要庞大。这儿集中着由武汉、南昌、上海、长沙及其它各城市

① 应为云落。

疏散下来的一切男女同志，更加上不少的勤务和挑夫。就单拿政治部来说，就有好几名挑夫在挑着硬洋。离开汕头的那晚，财务处要各单位去分钱，大家怕累赘都不要硬洋，而我们却自告奋勇，把好几箱袁头全都挑来了。

浩浩荡荡地走出流沙，向西南面横亘着的山头进军。山相当高，有蓊郁的林木，远望去，并看不出有什么异状。村外一直到山脚是一片旷阔的田畴，晚稻有些还未收割。田畴当中有二十来户人家，自成着一个小庄落，离村大约有三五里路光景。

是九月下旬的阴晦的一天，已经有充分的秋意了。虽然是在逃难，但在田畴中走着，迎接着从山上吹下来的凉风，大家似乎也都感觉着舒适。在我旁边走着的安琳①，在低声地唱着《国际歌》。

我们是走在队伍的正中的。正当快要走到那个小聚落的时候，前面突然响出了几声尖锐的零碎的枪声。这枪声的来源我至今都还不明白，不知道是先头部队的人走了火或故意乱放，还是小聚落里的地主向我们袭击，还是真的敌人占据了山头冲下来了。原因是模糊的，可是效果却非常显著。枪声一响，队伍立地成了乱了阵的蚂蚁。挑脚把担子抛下便乱跑，勤务也乱跑，穿长短衫的革命老爷们也乱跑。殿后的部队在往前冲，想冲上前去迎敌，但被这乱了阵的核心反而把他们冲溃了。

---

① 安琳，原名彭猗兰，一九〇八年生，安徽芜湖人。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妇女股干事、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政治指导员。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做宣传和财务工作。

但幸好枪声没有继续，乱了阵的蚂蚁又渐渐稳定了下来。

安琳不再唱《国际歌》了，但她紧靠在我的身边。我们一道在小聚落中陆续收集着有枪的同志们，也收集到了二十人左右。走出村落，在前面的田畴中一段浅浅的高地上，看见有不少的人聚集着，也有一部分武装同志在那儿整顿。我们便把所收集的人也带去加入了。

高地是一簇坟墓，墓并不大，墓碑也不很高，都向着山的一面。各单位的人差不多都在。开头是一位卢师长在指挥那些有武装的同志，他在发着疟疾，正冷得全身发抖。

武装同志们被集中了的也有一百人左右，略加整顿之后，卢师长便命令他们每十人为一小队，每一小队相隔十分钟左右出发，以冲锋的姿势向山麓前进。这样分遣着，到了中途，卢师长本人也随着一个小队出发了。接着便由恩来指挥，但恩来这时已经在发着四十度的高烧了。

临时整顿起来的队伍，部署自然不十分周到，特别关于联络通信的工作，没有规定得明白。先头部队上去后，一直没有消息下来。后续部队每一小队上去，也立即失掉联络，简直就象一枝枝的箭射出去了的一样。几十人逐渐化成小队射出去，射到后来差不多就只剩下些非武装同志了。天色逐渐昏黑了下来，耸立在前面的连山，阴森得象一条庞大的吃人的怪物。大家都感觉着焦虑，向导也没有，只知道路向是从一个山缺口处翻过山去。

天色愈来愈黑了。恩来很着急，最后他叫大家整队，冒险上前。他说："不冒险是只好坐以待毙的呀！"大家在开始整

队了。

就在这时候，于万籁无声之中，在不十分远的背后，突然又零落地极尖锐地响出了几下枪声。这比前一次更加出人意外了。我回头一看，在一片昏黑中什么也看不出。参谋团的几名年青卫士是很机敏的，立即掉头伏在地下，用他们的驳壳还击了一排过去。我也学他们掩伏下去了，在一个墓碑的下边。

三

一排枪反击过去之后，对方却沉寂了。

这一次的枪声，我也至今不明白它的来源。假使是敌人，为什么敌人绕到我们的背后去了？或许是反动地主的恶作剧吧？或许是由汤坑溃退下来的散兵，我们自己的人，把我们当成了敌人吧？

但枪声沉寂了。我从墓碑下爬起来，高地上除几位卫士还荷着枪向枪声响处凝视着之外，全体的人员都撤退了。我也照着既定的路向追赶上去，走不好远便遇着安琳，她是折回头找寻我的。再走不远又遇着两位朋友走回头路，他们都是江西人，一位姓傅，曾在南昌市党部负责；一位姓易，在主席团任会计。他们两位也掉了队，正在那儿徘徊，看见了我们就象遇着了救星的一样。

由田间小径登上一条大堤道，下面斜流着一条大堰，在昏暗中看去水象很深，似乎不能涉，堰口也很宽，不能跨越。我们

便在堤道上向山的一面走去，揣想走不好远一定会有桥。但愈走和要翻过山去的那个缺口相去愈远了，桥却始终不见。前面不仅毫无人影，连人的脚步声都没有。心里有点着慌了，便又由原路折回，一来想和参谋团的那几位小卫兵结合，二来揣想一定有桥在下游。折回原处时，卫兵们的影子也不见了。再朝下游走，愈走，却同样始终没有一道桥。我们四个人就象成了四个孤儿，被留在一片昏黑的天地里面。

吊着胆子还是往下游走。开始十分诧异，大家怎走得那么快？那几位小卫士分明比我们迟走，怎么也不见人？是打从那儿走了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他们毫无疑问是涉过了那条大堰，并不是靠着什么桥。这个简单的答案，在我脑里浮起来的时候，时间已经经过了好一段，就再要徒涉，也没有可能赶上前面的队伍了。自己怨艾着近于绝望地在暗中摸索，从堤道却又走上了一条大道，似乎是公路的光景。突然从路旁的一处林薮中漏出一些火光，有人的说话声，是湖南口音。我高兴极了，认为这一定是我们的队伍了。窜进林薮中去，在一丛丛的竹丛下，看见聚集着好几堆人，都是些没有武装的。有的正在造饭，有的横睡在地上抽着大烟。看情形，一定是贺龙部队的火伕，在汤坑附近掉队下来的。说不定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打了败仗。

这是很危险的，我心里想，一等到天亮，不忙说被敌人发现会遭歼灭，就是地方上的土匪或地主武装，也会把大家解决了。

我们又从林薮中走出。这次很凑巧，劈头和一队有武装的

队伍碰着，看光景有三十人左右。我挨上去，看见有些人的符号，知道是叶挺的部队。这一次可高兴了，我们便跟着走。走在最尾的是一位年青的军官，我和他打话。他是一位排长，但队伍是七零八落地沿途集合起来的，各军各师的都有，他并不是正式的指挥者。我又问他在队伍中还有没有更高级的官长？他说，看情形似乎没有。我表明了我自己的身份，要他在实际上负起指挥的责任。但他很没有把握地说："很难的，恐怕就是叶军长来，也没法指挥。"他这话，我开初感觉着诧异，认为他不肯负责，但转瞬我也就明了了。

打了败仗的兵，的确是怪可怜见的。尽管有三十来往人，也有枪械，而且还有一架机关枪，不知怎的，大家的胆子真好像碎了的一样。古人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话，实在是完全的实感。我们本来在走着寂寞的夜路，却听不得一声狗叫，也见不得一粒火光。只要一听到，一见到，立刻就要惊悚起来，从大路插进小路，从小路插进更小的路。向导是没有的，方向打不清，最有趣的是爱朝甘蔗林边擦过，大约是企图遮掩的吧。

这样瞎穿，毫无疑问不是办法，有急于找个向导的必要。但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又在夜间的乡下，向导往那儿去找呢？队伍中没有人能懂潮州话，连能懂广府话的都很有限，这限制可更难了。但我们没有气馁，决定了一个方针，我们簇拥着那位排长，走向队伍的前头，让我们自己领队。我们拣大路走，拣有灯火的地方走，总期在路上能够碰见一两个人。没有电灯的乡间的夜半，就连灯火也是很少见的。有一次，我们

不知不觉地走近了一座村落，轰隆地轰出了两声土炮。队伍立刻鸟兽散起来，我们便破着嗓子尽力向士兵鼓励："我们是革命军，我们不是强盗，我们怕什么呢？我们有枪有械，我们怕什么呢？土炮有什么可怕？不要紧，我们冲上前去！有人反而倒容易说话。"

还好，士兵们的胆子被鼓励了起来，我们往前进，大家也就以散兵线的形势往前进。走不好远，村落的样子比较清楚了。那是土墙围着的，墙上有碉堡，土炮大概就是从那碉堡中轰出来的。土墙外也有些负郭人家，我们碰着两个人，一个个子很魁梧，一个很矮小，看情形，他们定是线子，我们便把他截住了。

我们说明了来历，想找一位引路的人，引到云陆，再往海陆丰。魁梧的一位，自命为能懂广府话，也能懂普通话，我们的话他是听懂了。他的话虽然有些难懂，但结局也算弄明白了，他愿意做向导，把我们引向云陆。

四

这位魁梧的向导，始终是使我们起着戒心的。他太魁梧了，头上打着黑纱的包头，身上穿着洗黄了的香云纱的短衫裤，乡下老百姓的气息是丝毫也没有的。我估计他是个土匪或北方人所说的兵油子。他引路也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是走捷路，还是故意作怪，总不大拣正路走，时时在跨沟跳坎。有一次跳过一条相当宽的沟，大家都跳过了，我当然是能够跳

过的，但我的近视眼是把眼镜失掉了的（在涂家埠被打掉后，在汕头市的七天当中，没有工夫去配），由于估计的错误，我没有用足力量跳，跳到对面的斜面上，站不牢，便跌落下水里去了。

水相当深，虽然赶紧爬上了岸，我的蓝布军服和贴身的衣裤，里里外外都打得蘸湿。大家都只有一套衣服穿在身上，没有可以替换的。傅君把他的短裤脱下来借给我穿上了。我打着赤膊把湿衣套在一条竹竿上，就象旗子一样，扛在肩头上走。那竹竿也要感谢傅君，是他在路上拣来拄路，而且准备用以打狗的。

虽然是在南方，九月下旬夜半的气温，依然感觉寒冷。我沿路走，只好交换着用一只手来在浑身上下磨擦，用以取暖。老是在黑夜里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穿来穿去地走着，没有表告诉时间，两只脚实在走疲了，肚子也饿了，走的实在不耐烦了。我在心里憎恨着那魁梧的向导，你到底要把我们引到那里去呢？你这鬼头，但我没有说出口来。大家也沉默着只是跟着走。沿途也发现了一些散兵，同样是从汤坑溃下来的，我们便把他们吸收着。

事实上恐怕没有走好久吧，但在心理上总觉得夜太深长了，总是走不天亮。天一亮了，心里在这样想：尽管就有什么危险，总可以打得出一个方向来的。

到头走到了一个地方，向导要大家休息，等到天亮后再走。他说，没有危险了。我们起初也看不出是什么地方，停顿了一会，眼睛习惯了，知道是在一家瓦窑厂的前面。从那瓦

窑的小小的窑孔里，漏出了火光来。那好亲热的温暖的火光！我们从厂门外望见它，它也把厂内厂外的光景，暗暗地慢慢地告诉了我们。厂门外是一面空场子，厂门右手边便是窑，其余都堆着干草。

士兵们究竟是受过革命训练来的，都在场外空场上歇下，尽管饿也好，倦也好，丝毫也没有罗唣。那位年青排长也很能称职，他渐渐和他们熟悉起来，大家也都能听他的指挥了。

我们四个人走进了厂去。烧窑的只有一位老人，怕已经七十多岁，有点象甘地，很瘦削，但眼睛很慈祥。他见我打着赤脚，冷得发抖，便把窑口的一个矮木凳让给我坐，只有一个条件，要不断地送干草进窑孔里。我感谢了他。虽然他的话我不懂，我的话他也不懂，但是我们凭着手势和动作，便心心相印了。我坐在窑门口一面取暖，一面用铁钳送着枯草，大有苦尽甘来的感觉。窑口是很小的，仅有一尺来往高，七八寸宽的一个穹窿的洞口。因为洞口小，洞口前面的光明，也只有两三尺宽的范围。

要说是神秘吧，确实是有丰富的神秘味道。我感觉着那瓦窑就象是一头活着的异兽。它张着小小的口，不断地吞食着枯草。口腔里是通红的，红得那么爱人。它是慈祥的，如象传说中的麒麟那样的瑞兽，但它比麒麟更要伟大，比赵公明坐下的老虎更要伟大，比佛祖座下的白象也更要伟大。甘地样的老人，把这伟大的瑞兽，放在自己的座前，让它吃下枯草，吐出无数的鳞片出来遮盖人们，可以避风雨寒暑，实在比甘地、比

佛祖更要伟大。我自已也真是起了这样的心，何不就留在这儿，替老人家做一个帮手呢？

坐在窑口前面，作着一些不经心的空想，肚子里虽然饿但已经饿过了头，倒也并不感觉着怎么。衣服也逐渐地烘干了，下过水，把浸渍了几天的臭汗冲去了些，穿上身，使已经感觉着舒适的身子更加说不出的舒适。

同路的人都睡了。排长同士兵们睡在厂外，傅君、易君和安琳他们睡在厂内的草堆里面，似乎都睡熟了。我起身在厂里巡视了一下，干草堆满了大半厂，所余下的空间并没有多少。同窑对称的一面，靠壁有一座长灶头，连着大小三口锅。这表示厂里并不止那烧窑老一人，一定还有相当的人口的。灶的前手，在厂门的左侧，有一间卧房，门是关着的。在这卧房与灶之间的壁上有一道门，掩闭着。不知门的那一边，是空场，还是别有建筑。

肚子是有点饿，这逼得我悄悄地把一个大锅盖揭开来，发现盛有一大碗的菜粥在锅底。我高兴极了，把那粥端起来想喝。我想：喝了给他些钱吧。啊，钱！这一下又才觉悟到，我身上是一个铜板也没有的。他们或许有吧？谁能保定呢？在突然的出发之下，又经过骚乱，公的私的都丢光了，谁能保定有多少带在身上呢？但粥的诱惑委实大，又有内应的饥饿要伸出手来，这可把碗端到了嘴边。我想到了坐在窑门口的那烧窑的老人慈祥的眼睛。他是在做夜工的，这粥一定是备他充饥的东西，我吃了，他怎么样呢？盛着粥的碗，依然放到锅底上了。

五

睡在比弹簧床还要舒服的干草堆上，一觉醒来已经是大天光了。傅君他们还没有醒。我连忙起来，跑出厂外一看，糟糕！士兵们和向导连影子都没有了。

我把傅君喊醒了来，他们也只好瞠然若失。

厂里是有不少人的。灶侧的门开着，那边原来也有一个很大的厂子，一边陈着烧好的瓦，一边摆着几张方桌，是备瓦匠吃饭的地方。

厂外也还有好几户人家，有的相当高大，自成着一个庄落。烧窑老人却不见了，换了班去休息去了吧。

话虽然不能通，大家却和我们很亲热，并不怎么见外。大约看见我们都是文弱书生，并不是什么匪类，也并不是真正的丘八吧。更主要的原因，或许是真正的丘八们，昨夜就睡在露天的空场里，并没有惊动他们；今早一早动身，也没有翻动他们一根干草，这可使他们更感觉着我们的不足怕吧。男的女的，很多人都簇拥来看我们。他们，尤其女的，对于安琳的装束，特别感觉兴趣。安琳也穿的是蓝布军服，蓝布马裤，剪着一个男子式的分头。她们有点不大相信她是女子，但她毕竟是位女子，也是无法否认的。安琳在广州住过半年光景，广府话能说得一些，我们差不多就全靠着她做了我们的喉舌。

人是容易适应环境的，只要危难没有逼在眼前，倒也很快便镇定了下来。在我自己首先感觉着愉快的，是那位魁梧的

向导走了，我释下了对他的戒备。其次我们考虑到经济问题。在这儿应该特别感谢安琳和易君。安琳以她女性的仔细，她从汕头出发后，有四十块硬洋，缝在裤腰带里面，是随身带着的。易君也因为是会计的关系，主席团的伙食费在他身上，也有两百元左右。有这么多的钱，是一笔大财产了，我们可以免掉做讨口子的命运了。

我们被邀到一座有砖墙围着的房子里去。那是在瓦窑的西南端，房屋并不怎么堂皇，但明显地是那庄上首屈一指的富室。家长是小地主，也是毫无疑问的。他是一位三十左右的人，年青时分读过书，能勉强和我们作笔谈。

我们谈到今后的去向，大家决意走出海口，然后再走香港。在流沙准备疏散时的步骤，给了我们以必要的知识。我们知道有一个甲子港，大概要走四五天，又有一个碣石港，要远一点。要到这些地方去，不可少的当然是向导了。家主要我们不要着急，在庄子上多休息两天，慢慢替我们想办法。我们在这时便开始换装，把了些钱出来买旧衣服，把身上穿的也完全施舍了。为了要装成一个老百姓，凡是身上可疑的东西都得丢掉，如图章之类，把字磨光了，然后丢掉。但我却有一样东西始终舍不得丢，便是一只红色的头号派克笔。这大约也就是知识分子根性的绝好的象征吧。

早餐的菜颇丰盛，花了两块钱，阉鸡大肉盛了四大碗，陈在一张方桌上。大家正要就席吃的时候，就跟晴朗的天空突然冒出了一朵乌云来的一样，那位魁梧的向导又回来了。不仅我们吃了一惊，连庄上的人们都象有些诧异。他满不客气

地坐上方桌同我们一道吃，接着便替我们开出条陈来，带着强迫的口吻。

“你们几位呆在这儿很危险，地方上的当局一知道，便要来拿人。我的家离这儿不远，我把你们接去住一向，看风色。”

我回答他：“我们要出海口，到甲子港或碣石港去。”

“那也离不得我，我懂话，除我而外，没人懂。你们到我家里去住一向，我送你们去。反正，你们有钱，迟几天不关事。”

听他说到有钱，我和傅君们面面相觑了一下。安琳接过去说：“我们是落难的，钱都丢光了。”

“我看得很清楚，”猛人毫不踌躇地说，“你们都是官长，当然有钱。没钱，你们还不着急？”

这家伙的确是在打鬼算盘！我心里这样想，但没有说出口来。我看他是死心纠缠着我们不肯放的。庄上的主人起先和我们很亲热，很肯替我们想办法，自他来后都象有所顾忌，不再多说话了，说时，反而替他帮衬一两句。我凭这些和自己的直觉，断定那大汉必然不是好人。我在心里筹划着应付他的办法。我想，既没法摆脱他，那就以早走为是，免得他去摆布一切。我们是四个人，他只一个人，总能对付得过。我们还可以找些拄路的东西做武器，他要怎样，我们便先下手。我这样想了，便说出口来。

“就烦你老兄引路吧，往甲子港，吃了饭就动身。”

“我还得回家去关照一下啦。”

“对不住，你不是说，我们呆在这儿很危险吗？迟了，我们不便等你。”我回头便向同席的庄主人说，“请替我们找四根扁

担，我们出钱买。我们要装成挑脚，一面也好用来拄路。”

猛人有点泄气的神气，他插上一句：“你们也走路吗？走甲子要走好几天，这位女官（他指着安琳）至少会吃不消。”

“你不要看见她是女的，”我特别夸大地说，“她还打过仗呢！她从江西的南昌，一直走到汕头，难道还怕走不到甲子？”

“要快走也好，我总送你们。”猛人回答着，显然又有了新的打算。

六

饭吃过后，庄主人果然替我们找了一根扁担和三根竹棒来，我们付了两块钱。那向导大概有他的什么准备，走出去了。我趁着把我的用意向傅君们说明，他们也早明白了我的意思。但我自己的心实在还是放不下，我感觉着，我们还是难于应付的。假使他果真是匪类，他尽可以有办法来解决我们。衷心地懊悔着，不应该贪睡，和有武装的朋友们脱离了。

我脚上穿的是一双胶鞋，昨天落水，酱上了污泥，穿在脚上满不舒服。我便从那庄子里走出去，想找些水来冲洗一下。走出庄，一望都是田畴，只有左手一带是高地，有些林木。一条溪水就在庄落外流过，水不深，也还清洁。在一条木桥边，一处有践脚石的，庄上人汲水或浆洗用的地方。我把鞋脱下来，先洗了脚，再弓着身冲洗着鞋里面的泥。

溪水的对岸是一条大路，有一位年青的乡下人①从下游走来，渐渐走近我的面前了。我望了他一下，又把头低下了。那青年在我面前突然站立着，更使我大吃一惊的，他竟向我打招呼，用着我可以听懂的话：

“郭先生，你不是郭某某吗？”

我又抬起头来，不认识他，又摸不准他到底是什么人。年纪并不大，只有二十左右，是还没有充分成人的一位农家子。我没有踌躇地否认了我自己：“我不是郭某某，你认错了人。”

“你不要怕。”那青年更拿稳地说，大概他从我的口音上又得到一层保证，“我认识你，我是农民协会的。”

这下可使我放心了。啊，我在心里叫，也在口里叫。这真是一个救星了！——这是心里想的，但口里说着：

“你来得真好，正有一个不可靠的人，在纠缠着我们！”

“另外还有人吗？你怎么到了这儿？”

“随后慢慢谈，我们是四个人，请你赶快同我一道去。”

青年过桥来了。他很矫健，也很亲热，就好象和我是多年的旧友那样。他不待我问，便很愉快地一面走，一面对我说：“我昨天中午在流沙天后庙（？）看见你，在天井里我们擦身过。你的额头特别宽，头特别大，我便注视了你的符号，看出了你的名字。”

不错，那时自从武汉出发以来，我们的军服上，每个人的

---

① 即黄寿山（1908—1929），广东普宁人。一九二六年任普宁县劳动童子团团长；次年负责共青团工作，参加接应和掩护南昌起义军领导人转移的工作。后在战斗中牺牲。

左胸上都是有符号，而且写着自己的名字的。

我心里嘴里都只是叫："你来得真好！你来得真好！"

"你们那时在找向导，我也是要来领路的人，没有来得及，你们便出发了。"青年继续着说，他让我没有一丝一厘的阴翳存在了。

我们走到了吃早饭的地方，那魁梧的人已经回到那儿，青年一看见了他便打着招呼："啊，是你呀！"以下谈的是我们不懂的话，毫无疑问是潮州的土话了，实在连一个字也听不懂。那人也回答了几句，没精打采地便各自离开了。青年便回头向我们说："走，我引你们到别的地方去。"

我向傅君们介绍了，大家都喜出望外，无条件地服从了他，把扁担和竹棒都丢了，立刻便跟着动身。庄上的人很多把我们送出庄，我们也向他们道了谢。我很想再看一下那位"甘地"，他始终没有露面。

青年把我们引着向左手的高地有林木的地方走去，走得离瓦窑已经相当远了。我开始问他："那位大汉子究竟是什么人？"

"你们今天真是幸好遇着我呢。"青年满愉快地说，"他是一位土匪头子，加入了国民党。国共合作的时候，我们也合作过一会。后来分家，我们也分开了。他有得三十几条枪。"

"刚才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他在说：'我们讲交情，这笔生意就奉让吧。'意思是有点双关的。"

"这一带地方叫什么名字？"

“大地名是盐酸寮。”

“那瓦窑所在的地方呢?”

“就叫瓦窑墟。”

“离流沙有多远了?”

“二十几里。”

“才二十几里吗?”

这倒真的使我惊叹了,走了好象一个通夜,才走了二十几里。

天气是很晴朗的,在山林里走着,虽然走得汗涔涔,不断地有微风吹送。

时而有些不知名的鸟,在空中清脆地叫,空气里饱和着浓重的土香和木香。

真是清新得很,安琳又在低声地唱着《国际歌》了。

1948年7月15日

神　泉

一

青年让我们在一处山林里躲着，等到黄昏，才把我们引到了盐酸寮。这是一个很富庶而宏大的乡镇，从远处望去，只见屋瓦鳞比，黑压压地耸立着，仿佛一座小规模的县城。昨天晚上遭土炮轰击的，或许就是这儿吧？

一切都静悄悄地。我们被引进一处小户人家里，坐落在镇的边缘，离栅口不甚远。一进朝门，踏两步便是小小的中堂，左右似乎还有侧室。在这中堂里已经有两位地方上的负责人潜伏着，我们一加进去，算一共有七个人了。正中一张方桌，两尊床，一座神龛，神龛上点着一盏菜油灯。这是农会主席①的家。主席是一位年近六十岁的和蔼的老人。清党以来，老人的一位儿子，被地方上的土劣打死了，一家人都出去逃难。在我们打进了汕头的时候，老人又才悄悄地逃回来，现在又该是他准备逃难的时候了。老人只有五尺来往身材，虽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八年九月香港《小说》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① 指陈开仪（1879—1973），广东普宁人。一九二八年曾任普宁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然冒着危险掩蔽着我们这许多人，但他非常镇静，一点也不矜持，一点也不畏缩，真是平平淡淡地若无其事。

但他也并不是毫不紧张，或者听天安命，得过且过，不，他并不是那样。他是有计划，有步骤，因而也是有充分的把握的。他叫我们潜伏一晚，在第二天清早天不见亮，要把我们带上后山去，藏在他的草仓里。藏得几天，等外边的风声平息了，他再带我们出海口。

二

一切都照着他的计划进行了。

第二天清早，我们在微微可以辨路的时刻，被带上后山。倒也并不是怎么高的山，在舒缓的斜坡上走了四五里路，已经到了没有人烟的地方。山上树木是很稀疏的，枯黄的秋草，使全山就象蒙上了一大张狮子皮。

所谓草仓，就是收藏这些秋草的仓库。草到冬季来是乡里人的主要燃料。仓是砖瓦建的，有点象江浙乡间停棺材的建筑，但要宽大得多，七个人藏在里面，大有回旋的余地。可感谢的一仓都是枯草，人睡在上面，就象坐上沙发。

这样的仓在邻近处也有两三座，不用说，都是没有人住的。山境是寂寥的，但我们藏在仓里不敢轻易露面，话也不敢大声地谈。七个人活着进了坟墓。

和蔼的老人，每天要上山来两次，挑着担子替我们送饭来。他照常是那样平淡无事，不矜持，也不畏缩。每次等我们

把饭用毕，又挑着些枯草卷子回家。

这样的生活在山里足足过了六天，山境照样的寂寥，没有什么意外的骚扰。

在第七天上，在下着大雨。老人一大清早出现，带着些斗笠来。他把我们从草仓中领出，冒着雨不作声地让我们跟着他走。在岑寂的山路上走了有半个钟头光景，到了一处地方，是山泉的发源地。一个大石壑，掩映着泉源，还有好些嶙峋的大石四处耸立着。这个好去处，是适合于原始人生活的场面了。可惜没有摄影师来摄取镜头。

但是，在那侧近却有一家瓦房，仅仅一位年青人住在那里，有着打铁的设备。为什么一家铁匠店要安设在这样偏僻的地点呢？这是有点令人费解的。

到这里老人才告诉我们：他在今天趁着大雨，要把我们带出海口。他要带我们去的地方，不是碣石，也不是甲子，而是神泉。这是一个产盐的口岸，隔当地只有一百二十里路，比碣石和甲子都更近。一切的步骤，他在这几天当中都已经准备好了，他要我们都装成盐贩子，好象到那神泉去贩盐。在那铁匠店里面，替我们每一个人准备好了一根扁担和一付箩筐。

这老人到底不愧是农会主席，他做事是这样负责任而有条理。我自己在内心里倒感觉着有点惶恐了。他为了我们的安全费尽了苦心，但我们到底有什么价值，值得他这样营救呢？

三

动身之前，铁匠还跟我们准备了一顿早饭，煮了一锅白水罗卜，雪白的罗卜片拌着盐，那味道实在是再鲜也没有。

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快要动身了，然而临时发生了一个问题。那是同伴的易君突然发了病，肚痛，腹泻，而且发出了高烧。大约是缺乏运动，发生了急性腹炎，而且着了凉的原故吧？易君是不能走了，怎么办呢？要吗改变行期，大家等他病好之后一道走；要吗便把他一个人留下，大家先走。商量的结果，是采取了后一办法，把易君留下了。理由是人多不容易掩护，一切都准备停当了，不好再改期。易君留下来，一个人是容易掩护的，只要他好得快，我们在神泉还可以会齐。

就这样，易君是被留下了。老人向铁匠嘱咐，请他照顾，我们便装着盐贩子在大雨中动身。

——我在这儿要插说一句：这位易君是一位二十几岁的青年，身体并不健壮，就在这儿一别之后，我们便没有再见过面了。不知道他的病后来好了没有，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逃了出来。同在患难中，却把他一个人留下了，这在我自己始终感觉着是一件遗憾。

四

在大雨中走着，大抵是一些山路，有时是沿着一条大的溪

涧在走。路上很少行人，偶有擦身过的人，对于我们的容态，似乎也没有什么诧异。从南昌出发以来，跋涉了快两个月，脸色的黧黑大体上是可以充得上老百姓的了。

路上也经过一些村镇，但都不敢停留，只是熬着饥渴赶路。在下午大约两点钟的时候吧，天气晴起来了。我们走到了蜈蚣岭（这是沿途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个地名），是群山中的一座小峰，峰顶有一座神庙，庙门的横额上写着"蜈蚣岭"三个字。

这是很适宜于上《水浒传》的地名，但从这里倒并没有什么剪径的强徒出现，而是有两位乡下的妇女在庙门口摆着簸箕，卖些杂食来揽过路人的。我们买了些芝麻饼来吃了，特别值得感谢的，是有一位卖饼的带了一壶冷茶，我们给她喝得一个精光。

在蜈蚣岭上息了一会脚，庙里也去巡视了一下，规模并不大，供的神像相当多，是些什么神像，已经不记忆了。

接着再往前走，走到五点钟左右，居然到了神泉。不愧是产盐的口岸，人烟稠密，盐田四处都是。脚是已经十分疲劳了，不足十个钟头，算走了一百二十里，是两只脚生下地来的第一次大跃进。

农会主席把我们引着沿着场边向左手转，转到场尽头处靠海的地方。海岸上停着很多渔船。经过大雨冲洗过的海和沙岸，都很沉静，空气中饱和着浓烈的盐腥味。薄黄的夕阳光照在眼前的一切物象上，仿佛还有几分留恋。

老人叫我们分散在渔船间等着，他进场去看情形，并打通

关系。本来在几天前他已送有口信来，拜托这儿的一家碗店老板姓陈的①，暂时收留我们，他不知道这口信是不是已经带到。

五

老人离开我们有半个钟头光景，他又转来了，脸上呈着欣慰的神色。他又把我们带着，从一条侧巷走进场里去。离场尾不远，就在那侧巷附近，便是陈老板的碗店了。是两座店面夹街对立，靠海一边的门面要小些，专门卖些土缸土钵之类；对街的一座要高大得多，在卖细瓷兼做些杂货生意。

我们被引进靠海的一座，立刻上了楼，安定了下来。老人关照我们，不要轻易下楼，场上有不少的反动派，走漏了风声，陈老板也担戴不起。我们是很听话的，我自己感觉着，这老人的态度，比我幼年时我自己的父亲对待我还要亲切。

陈老板也来和我们打了招呼，他是老人的忘年的好朋友，年纪恐怕要小二十好几岁。他是一位小城市的小商人型，个子很小巧，给人的印象很清晰，显示得他为人精明，但丝毫也不奸猾。他很诚恳地接待着我们，并不感觉到唐突，也没有那种畏首畏尾的神气，怕受什么拖累。他还很客气地说：怕招待不周到，要请原谅。他这倒也并不是俗套的外交辞令，看他的神气，他是说得非常诚恳的。

---

① 指陈少光（1897—1951），字春吉，别号衍瑞，广东普宁人。曾在普宁县神泉镇经营“荣兴”碗铺。一九二五年被选为镇商会主席。

在这楼上潜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我们又被搬到对街的大店楼上去了。这边的楼房更高大，也更深。前楼是两个套间，大小共有四间房屋，中部夹着一个天井，后面还有一间小楼房，从那儿可以下楼去。在这边住着，不用说是更有可以回旋的余地了。

到了海口，为什么还要在这儿逗留呢？起初有点出人意外，后来才知道，我们要等风。到香港去的船经常是有的，只是一些小帆船，这样的船也就要等风。要吹东南风，才使这船能沿着海边驶往香港。假使风向不好，会把你吹到南洋，吹到琉球，吹到日本，吹到朝鲜。这还算是幸运的，不幸的便只好葬身海底了。在这样原始的情形之下，古时候的人，把飘洋过海当成一件天大的事，是能够理解的。古人的哲学，要人听天安命，也是能够理解的。人是成为了自然界中的一点可怜的浮沤。

天天都坐在楼上等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没有什么书可以读，因为言语隔阂，更没有什么话可以谈。外边也没有什么风声，倒也过得无忧无虑，但脑子却不由得不去作种种的想念了。

仅仅十五个月的期间，随着北伐军由广东出发，经过了八省的遍历，现在又差不多孤影悄然地回到了广东。这变化不能说不剧烈。在这期间，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当着号筒，所到之处，处处吼破过喉嗓。但那有什么用？

一切的一切都太空洞了。一场大革命，不就好象放了一大串花炮，轰轰烈烈地过了一阵，只剩下满地残红，一片硝烟，

散了，也就算了吗？在战场上，死了多少的斗士，在清党时分，牺牲了多少的战友呀！到底留下了些什么呢？毫无疑问地，是留下了一个无用长物的我！一粒鞭炮的残渣，被风卷到这海边上来了，空空洞洞地躺在这儿。我到底还可以做些什么呢？该怎么做？

朋友们的去向，丝毫也不知道。特别是病中的恩来，时常在我脑海中回旋着，我不知道他的病是不是好了，是不是脱了险，顺畅地到达了海陆丰？这要算是不幸，只因偶尔的差池，便和他们离开了。那许许多多精神上的支柱，中国革命的火种！

有这些火种的存在，中国革命的火，依然要燃起来，而且会从地心燃出，而不是在地面上燃鞭炮了。革命是人民的大翻身，人民没有动，革了什么命呢？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关系丝毫没有动，革了什么命呢？耕者已经有其田了吗？工人的组织不是刚在萌芽中便被摧残了吗？这样怎么能够应付国内的反动派？怎么能够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是的，种子进了农村！这应该是深入，是进展，而不是失败！然而，我却和这革命的播种队分离了。这在我个人，正应该是生平的一个大失败！要怎样来补偿这个失败，使我自己对于革命，能够多少有点什么贡献呢？……

在神泉天天等风，不由自主地在脑子里总爱想着这些问题。而答案呢？隐讽之间也好象已经有了。在盐酸寮的瓦窑墟，我把什么附身的东西都给丢掉了，只剩下一只红色的头号派克笔。这不是我下意识中的一个很具体的答案吗？

六

天气凉起来了，又住在海边，在瓦窑墟用钱换上的单衫裤不能御寒了，大家又添制了一些。陈老板把他的一件半新旧的洋缎夹衫拿给我，我们要把钱给他，他拒绝接受，还是农会主席的老人解了围。他大概听到安琳和傅君的宣传吧，说我会写字，最好写几张字来送给陈老板留作纪念。这自然是不费力的事，但在神泉要找宣纸，在陈老板却似乎费了大力。

字是写了，写的是些什么，现在已经不记忆了。只是记得当我写字时，陈老板在一旁殷勤称赞，要我写了又写，写了好几张，送给他的亲戚朋友。农会老人的慈和的两眼，也在一旁浮着安慰的微笑，好象在说：他的推荐，是货真价实的一样。其实我的一点毫无功力的字，是值不得那件宝贵的洋缎短夹衫，更值不得他们那样诚实的赞赏的。

字是写了，但没有图章可盖。我的大小图章都完全丢掉了。我更明确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将来有机会，我希望重到神泉，到那时再来盖章吧。"——看情形，神泉不久是可以重到了。我如重到神泉，一定要先去访问陈老板，字纸如还在，一定要盖上图章，如是毁了，那我一定要再写。

七

等风足足等了十天，因为不敢进市上去，神泉的市面究竟

是怎样，一直不知道。

就在那第十天的晚上，农会主席面有喜色了。他告诉我们："风向已经转了，东南风。我们明天便上船动身了。"

原来海上的风向一转，同样的风是要连续着刮好几天的，船家趁着这样的机会开船，便可以达到希望的地点。

这晚，陈老板还烧了一大盘红立鱼，添了一壶烧酒，替我们饯行，他预先道了歉，说他明天清早不能送上船，怕被人注意到，回头出岔子。我们都由衷地向他道了谢。十天的掩护是够他提心吊胆的，然而他从不曾吐过一句怨言，露过一丝愠色。谁能说市井里面没有圣贤呢？

第二天一早，我们被引到海边，登上了一只靠在岸边上的船。船并不大，只有两道帆樯。船上的载子是洋桃和罗卜干，大约神泉就是这些货物的产地吧？

我们被安置在船头的尖舱里。另外还有一批逃难的人，其中有几位是从南昌同路来的，有几位是地方干部，他们先上了船，被安顿在腰舱里。在那些舱里是不见天日的，但空气却不嫌不够。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去沧海"①，古人所渴想的诗境是具现在眼前来了。是豪情逸致吗？不，一点也不！我自己是连坐轮船都要晕的人，不敢睁着眼睛做梦。

船要开了，但我到这时才知道，农会主席是不和我们同走的。经过了翻译，受到了他的临别赠言：

---

① 语出李白诗《行路难》第一首："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大家努力吧，后会有期。我自己是不能离开土地的。我回去料理一下，便要到海陆丰去。”

1948年8月9日写于香港

离沪之前

一九二七年的年末，我从广东回到上海，不久便害了一场很严重的斑疹伤寒，由十二月十二号进病院，住到第二年正月四号才退了院。退院后住在妻儿们住着的窦乐安路的一家一楼一底的弄堂房子里，周围住的都是日本人。

初出院的时候是连路也不能走的，耳朵也聋了。出院不几天，算渐渐地恢复了转来。在我写出了那二十几首诗——那些诗多是睡在床上，或坐在一把藤椅上用铅笔在钞本上写出的——汇成了《恢复》(Reconvalescence)之后，从一月十五号起便开始在同一钞本上记起了日记来，没间断地记到二月廿三号止，因为廿四号我便离开了上海了。记日记的事情我是素无恒心的，忙的时候没工夫记，闲的时候没事情记，在那样的病后记下了整整一个月以上的生活的记录在我却是很稀罕的事。

我现在把它们稍稍整理了一下再行誊录了出来，有些不关紧要和不能发表的事情都删去了。但我要明白地下一个注脚，这“不能发表”并不是因为发表了有妨害于我自己的名誉，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十二月和一九三四年一月上海《现代》月刊第四卷第一至三期。

实际上在目下的社会能够在外部流传的“名誉”倒不是怎样好的事情。

日记中创造社出版部和同人们屡见，当时的出版部是在北四川路麦拿里，几位同人大抵是住在北四川路底附近的。

1933年9月24日记

正月十五，星期日。

今天清早把《恢复》誊写完了。

天气很和暖，午前曾昼寝一小时。

人很疲倦，午后把《恢复》校读了一回。

三时顷仿吾来，将《恢复》交了他。

仿吾的膝关节炎发了，有意到日本去洗温泉。

晚与和、博、佛在灯下看«Kodomo no Kagaku»(《小孩之科学》——日本出的儿童杂志）。章鱼的脚断了一两只，并不介意，有时养料缺乏的时候，自己吃自己的脚。往往有没有脚的章鱼，脚失后可以再生，大概经过一年便可以复元。

文艺家在做社会人的经验缺乏的时候，只好写自己的极狭隘的生活，这正和章鱼吃脚相类。

正月十六，星期一，晴。

午前读安德列夫的《黑面具》① ——一位公爵开化装跳舞

① 安德列夫(Л.Н.Андреев，1871—1919)，又译安德列耶夫或安德烈夫，俄国作家。著有《地下室》、《往星空》等。其所著《黑面具》又译《黑假面人》。

会，由假面的恐怖遂成疯狂，读了三分之一便丢了。假得太不近情理，说这也是杰作。

读德哈林①《康德的辩证法》，未及十页。

安娜买回高畠的《资本论》二册，读《商品与价值》一章终。——内山对她说“很难懂，文学家何必搞这个”。我仍然是被人认为文学家的。

午后倦甚，看了些芭蕉②《七部集》。有把中国的诗句为题的(《旷野集》野水诗题一六)，这俨然是试帖诗的赋得体，但很自然。其中有咏“白片落梅浮涧水”句云：

“水鸟のはしに付たる梅白し”。

回译成中文是“水鸟的嘴上粘着的梅花瓣子雪白”，浮涧水的情景用水鸟粘嘴来形象化，觉得更加漂亮。这也和中国的以诗句为画题的相似，有画“春风归趁马蹄香”的，画了几只蝴蝶环绕着在春草原上驰走着的马蹄。

又有“暑月贫家何所有，客来惟赠北窗风”云：

“涼めとて切りぬけにたり北の窗”。(请纳凉吧，北边的壁头上有个凿通了的窗洞子。)

夜读列宁《党对于宗教的态度》一文，宗教在无产阶级及农民中最占势力，其原因即由于对于榨取者心怀恐怖，恐怖生神。反宗教运动应隶属于阶级斗争之下。

---

① 德哈林(А. М. Деборин，1881—1963)，通译德波林，苏联哲学家、历史学家。著有《黑格尔与辩证唯物主义》、《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等。

② 作者原注：芭蕉是日本古时的一位俳谐诗人。〔芭蕉(1644—1694)。——注释者〕

内山送菊花锅来，晚餐后倦甚。仿吾来，《文化批判》① 已出版，并携来《无画的画帖》旧译稿。

跳读《文化批判》，夜就寝时得诗一首：

战　取

朋友，你以为目前过于沉闷了吗？
这是暴风雨快要来时的先兆。
朋友，你以为目前过于混沌了吗？
这是新社会快要诞生的前宵。

阵痛已经渐渐地达到了高潮，
母体不能够支持横陈着了。
我们准备下了一杯鲜红的喜酒，
但这并不是那莱茵河畔的葡萄。

我们准备下了一杯鲜红的喜酒，
这是我们的血液充满在心头。
要酿出一片的腥风血雨在这夜间，
战取那新生的太阳，新生的宇宙！

正月十七，星期二，晴。

读唯物史观公式：——

---

① 创造社后期综合性刊物，月刊。一九二八年一月创刊于上海，同年五月终刊。丁悲主编。

“人们在其生活底社会的生产没入于种种既定的必然的不受意志支配的关系里面，此种种关系即是生产关系，与物质的生产力之某一既定的发展阶段相应。诸生产关系之总和构成社会之经济的结构，这是真实的基础，各种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结构建筑于其上，各种既定的社会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物质的生活之生产方式是一般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过程底前提。不是人们的意识规定自己的存在，反是自己的社会的存在规定人们的意识。社会之物质的生产力，到了某一阶段，和向来在其中活动着的既成的生产诸关系，以法律上的表现而言，即私产诸关系，陷于矛盾。此等关系由生产力之发展形式变而为生产力之桎梏。于是便有一个社会革命的时期到来。随着经济的基础之变革，所有全部的庞大的上层建筑或早或迟地一同崩溃？……”①（译至此中辍。）

正月十八，星期三，晴。

杂读《资本论》。

仿吾来，《创造》九号出版，《一只手》自读一遍，也还无甚破绽。

“China und die Tische fingen zu tanzen an.”(China与桌子开始跳舞)。——China，福田德三译作“支那”，高畠素之和河上肇的《资本论》译本都译作“陶器”。同仿吾讨论此语，德文“China”无陶器意，又“Tische”之前有冠词“Die”，而“China”之前无冠词，恐怕仍宜译作“支那”。

① 语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此语在《资本论》中其全文为

"Man erinnert sich, dass China und die Tische zu tanzen anfingen, als alle uebrige Welt still zu stehen——um die an dern zu ermuntern"——脚注二五。

（人们记得，在一切其余的世界都静止着的时候，支那和桌子跳舞了起来，去鼓舞别人。）

Dass以下疑是引用语，但不知语出何人。

文艺作品中不革命的勉强可以容恕。

反革命的断不能容恕。

反革命的文艺里面不能说没有佳作，就和反革命的人物里面不能说没有美人。

但那种美人于你何益？

你不要中了美人计！

文艺的所谓永远性就是一些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作品所投射出的幻影。

"天才的小说作品，如其政治主张与我们相反，我们只好挥泪而抹杀之；如尚不至相反，只是冷淡或者无关心，我们还可以容恕。"鲁那查理斯基① 说。

---

① 鲁那查理斯基（A. B. Луназарский，1875—1933），通译卢那察尔斯基，苏联政治活动家、文艺评论家。著有《奥里维 · 克伦威尔》、《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等。文中所引的这句话见《文艺领域内的党的政策》一文。

把《天才病治疗》草完，改题为《桌子的跳舞》。

正月十九，星期四，晴。

补写《桌子的跳舞》。

今日异常倦怠，实在太没有事做，书也不想看。只想《浮士德》、《前茅》、《恢复》早出版。

中午将近时，民治来，交来豪兄① 答函，闻有新第三派出现（闽赣皖湘四省联盟），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对南京方面是一打击。又云择生已回，在香港，与P辈组织第三党②。

民治去后仍然倦怠，读托勒尔的«Masse Mensch»（《人民大众》），毫无意趣。前五六年对于托勒尔之心醉神驰，对于表现派之盲目的礼赞，回想起来，真是觉得幼稚。

午后蔡大姐③ 来，打扮得象一位女工。她说，病中有好多同志都想来看我，因医生拒绝会面，所以都没来。——是谁引路来的？——安琳呢。——安琳为甚不同来呢？——她说："她怕使你难处。"……

蔡大姐坐不一会又走了。

冰山浮在海中，十分之八在水里。

---

① 即周恩来。

② P，指彭泽民（1875—1956），广东四会人。曾参加同盟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后与邓演达等联合组织中华革命党，人称第三党。

③ 即蔡畅。

呜呼太雷[①]，果死于难。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三日政权[②]，对河南[③]防御失利，Y[④]被开除。

临睡前读斯大林的《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已经十二点过了，右眼涩得难耐。

正月二十，星期五，晴。

无为。民治与叔薰[⑤]来。叔薰夫人[⑥]病，无医药费，嘱创造社在我的版税项下抽送了五十元。

螳螂交媾后，雌吃雄。

午后仿吾来，将《桌子的跳舞》交了给他。《战取》被遗失，又缮写一遍。同用晚餐而去。谈"文学的永远性"，无结果。

——文学家为甚么总是一个苍白色的面孔，总是所谓蒲柳之资呢？

——那是一种奇怪的病人呢。或者也可以说是吃人肉的人种，不过他们总是自己吃自己罢了。就因为这样，所以文学

---

① 即张太雷(1898—1927)，原名曾让，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七年任中共中央委员，"八七"会议后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同年十二月与叶挺、叶剑英领导广州起义，在战斗中牺牲。

② 指广州起义时建立的广州苏维埃政权。

③ 指广州的珠江南岸。

④ 疑指叶挺。

⑤ 即李硕勋(1903—1931)，四川高县人。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二八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一九三一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同年牺牲于海南岛。

⑥ 即赵君陶。

家的酸性总比别人强。肉食兽的尿的酸性通例是强于草食兽的。人到病时不能进饮食，专靠着消费自己的身体，在那时是成为纯粹的肉食兽，尿的酸性一时要加强的。

正月二十一，星期六，雨。

午前读秋白译的哥列夫① 的《无产阶级的哲学》中《艺术与唯物史观》一章。

倦怠，怎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午后曾昼寝一二小时，起来仍不舒服，东鳞西爪地看了些旧杂志和各种书籍，但总得不到满足。

夜来头感隐痛，在左前方四分之一隅。

怕是神经衰弱，因为完全没有运动。实际上是已经两个月，没有在外面散过步了。

正月二十二，星期日（旧除夕），雨。

上午读独步② 的《号外》、《春之鸟》、《穷死》三篇，确有诗才。《号外》与《穷死》尤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可惜此人早死，在日本文学界的确是一个损失。

读芥川（龙之介）③ 的《沼》与《秋》（在一本旧的《改造》杂

---

① 哥列夫(Б.И.Горев,1874—1937)，苏联历史学家、哲学家。著有《历史上的战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概论》等。

② 作者原注：国木田独步，日本明治末年的一位小说家。〔国木田独步(1871—1908)，著有小说集《独步集》，散文集《武藏野》等。——注释者〕

③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日本小说家。著有《罗生门》、《鼻子》等。

志上)，故意要制造出一种神秘的世界，令人不快，与读《黑面具》时的感觉同样。

托勒尔的《人民大众》是以群众与人类对立，而作者站在人类方面说法，人道主义的畸形的胎儿！

中午伯奇送年货来，并送来《到宜兴去》的稿子。今日头已不痛，但仍沉闷。午后校读《到宜兴去》，失悔当时没有写完。

傍晚时仿吾来，把《到宜兴去》交给了他。

正月二十三，星期一(元旦)，雨。

晨起颇晏，仍无为。

傍午时分将《水平线下》编好。

午后仿吾来，时正昼寝。有朱某者译《漪溟湖》，完全脱胎自《茵梦湖》，① 还在序文中吹毛求疵地任意指摘，嘲骂。这种人太没道德，出版家的无聊也可慨叹。

晚上很不舒服，神经性的怒气把脑袋充满了。

一个对话

A　文学家为什么总带着一个苍白色的面孔呢？

B　那是一种奇怪的病人呢。

A　什么病？

---

① 朱某，指朱契。所译《漪溟湖》，是德国作家施托谟的中篇小说，上海开明书店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版，此前已有郭沫若与钱君胥的合译本《茵梦湖》，一九二一年七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B　怕或者可以说是吃人肉的人种。

A　唉！

B　文学家时常是自己吃自己的，就和章鱼一样自己吃自己的脚。

A　那我可懂得了，同时我还解决了一个问题，便是文学家为什么总带些酸性。

B　哼哼，肉食动物的尿啦。

A　对啦，文学家是等于猫子的尿。

正月二十四，星期二，雲。

两颗煤炭

兵工厂的外边丢了的炭渣里面，有两颗漏网的煤炭。它们在那儿对话。

甲　啊，我真快活，我现在又跑到这开旷的空气里来了。

乙　嗳唷，有什么快活哟！我们在地底被压了几千万年，没有压成金刚石。我只想早投在那烈火里去化成灰啦！

甲　你变成了金刚石又会怎样呢？

乙　怎样？多么好啦，我要是变成了金刚石，一切的贵妇人都会要爱我，不怕就是女王，或者王姬，都要把我看来比她们自己的生命还要贵重。我不知会接近怎样的芳泽，会住着怎样的华堂；那会在这样的地方呆着，只等待那儿的乞丐来把我们捡起送葬了呢？

甲　你这种想法我是从没有想过。我虽然晓得金刚石是我们的同族，但我从没曾羡慕过它们。它们只是依附着权门

豪贵，我倒是满不高兴的。它们没把贫穷人看在眼里，它们完全是有钱人的玩具……（稿至此中辍。）

正月二十五，星期三，傍晚时夕阳出。

本日完全无为。

晨早下痢，早饭未用，算只一次也就恢复了。

晚入浴一次。

正月二十六，星期四，快晴。

太阳晒在北窗外人家的红瓦上呈出喜悦的颜色。安娜早出，因新年停了市三天，今天开市，她又赶着去采办家中的日用品去了。

读《资本论》。

午后仿吾来，坐至夜。无甚重要的谈话。促他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编好。共夜食，用正宗酒。将终食时，王独昏①来，甚慌张不定。谈及C某②要找他去当艺术大学（？）的委员，他颇得意，不知C某滑头，乃在利用创造社而已。独昏的虚荣心真比女人还要厉害。

食后仿吾大有醉意，继偕家人同出，只余独留。——刚写至此，安娜偕儿辈归，买回《哲学的贫困》、《小孩科学》及

---

① 作者原注：即王独清，当时我们几个每每戏呼之为独昏。此人后成托派。

② 指陈抱一，广东潮安人。画家，中华艺术大学创办人之一。曾任教于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其它。

夜同儿辈读《小孩科学》。安娜复外出，未言去向，夜境渐深，将儿辈服事睡了，闻邻近犬吠声甚烈。心颇不宁。至十二时顷，安娜始归自邻舍犬医家。

正月二十七，星期五，雨终日。

午前几昼寝半日。本日安娜原与仿吾约，午后游法国公园，但不幸雨竟日。昨天天气真好，全如初夏一般，在室中未烧火盆，只御夹衣。今天则闷人殊甚。

读《资本论》(一卷七篇《资本之堆积过程》)，拟于今日将第一卷读完，终未办到，然所余已无几。

《浮士德》仍无消息来，我想二月一日断然不能出版，办事真不起劲。

夜饭时牛乳倒了一火盆，臭得难耐，佛儿的恶作剧。

正月二十八，星期六(初六)，
上半日颇晴，下午半日阴。

晨起颇迟。午前教了和与博儿道算学。

午后仿吾来，安娜本与相约往江湾看赛马，但因天气不好又中止了。看了方某①给仿吾的信，十分不愉快。这些小子真是反掌炎凉。

独昏终竟想上C某的当，这家伙的委员癖真是不可救药。

---

① 指方光焘。

“人怕出名猪怕肥”，其此人之谓耶？

仿吾说，《浮士德》已全部印好，今晚可送来，但仍杳如黄鹤。《恢复》在二月十日前无希望。

想改编《女神》和《星空》，作一自我清算。

晚入浴时博儿右膊触着烟囱，受了火伤，以安娜所用的雪花膏为之敷治。此儿性质大不如小时，甚可担心。安娜的歇斯迭理也太厉害了，动辄便是打骂，殊令人不快。

春风吹入了我们的故乡，
姑娘呀，跳舞吧，姑娘。

我们向碧桃花下游行，
浴沐着那亲蔼的阳光。

你的影儿和我的影儿俩，
合抱在如茵的春草场上。

春风吹入了我们的草场，
姑娘呀，拥抱吧，姑娘。

小鸟儿们在树上癫狂，
蝴蝶儿们在草上成双。

空气这般地芬温软洋，

含孕着醇酒般的芳香。

春风吹入了我们的心房，
姑娘呀，陶醉吧，姑娘。

正月二十九，星期日，阴。

终日烦闷，午后读完《资本论》第一卷。

晚饭后仿吾把《浮士德》的校样拿了来，校对至一时过始就寝。误植太多。

威特林(Weitling)与蒲鲁东(Proudhon)① 均工人出身，但均逃入了小资产阶级的阵营。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工人出身，却成了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导师。谁说无产政党不要知识阶级？谁说非工人不能做无产阶级的文艺？

中国的现势很象一八四八年的欧洲。

法兰西二月革命影响及于全欧，但德、奥、比、法均相继失败，白色恐怖弥漫，马、恩都只得向海外亡命。

正月三十，星期一，晴。

晨十时顷仿吾来，《浮士德》正误表已制好，约于今晚赴市

① 威特林(W. Weitling，1808—1871)，通译威廉·魏特林，裁缝工出身。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著有《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等。蒲鲁东(P. J. Proudhon，1809—1865)，早年做过工人和职员，后成为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著有《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等。

中晚餐。

中午时分民治来，拿来了几本《布尔雪维克》[1]，吃了中饭又走了。他说团体里面经济短绌。

午后无所事事，只为安娜理了几团乱丝和旧绒线，安娜为四女淑子打袖口，制毛颈巾。

五时顷仿吾来，至晚大家装束好了同赴美丽川菜馆，两个人喝了绍兴酒三斤。是病后第一次出街，满街的灯火都感觉着亲热。

食后赴永安、先施，安娜买了些东西。

回家后同仿吾赴创造社，见《贡献》[2]、《语丝》诸杂志，反动空气弥漫，令人难耐。

正月三十一，星期二，晴。

午前仿吾来，送来《洪水》二册，校正《盲肠炎》。

昨夜食过多，下痢，不舒服。晨食粥一碗，中午未进食。

午后伯奇来，无甚要事。

夜下痢平复，仿吾又送来《女神》和《星空》各一册。校读《女神》。

天气甚冷。连日窗上都结冰花，楼头残雪犹未消尽。

---

①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一九二七年十月创刊于上海，始为周刊，后改为半月刊，再改为月刊。一九三二年七月终刊。

② 国民党改组派刊物。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九年三月终刊。初为旬刊，一九二九年五卷起改为月刊。孙伏园编辑。

二月一日，星期三，晴。

是日《浮士德》出版，装璜尚可观。

博儿脸色苍白，食欲不进。安娜携至石井医师处诊察，云是肋膜炎，殊可忧虑。

晚仿吾来同用晚饭，安娜为祝《浮士德》出版，特购“寿司”（日本制的冷饭团）一大盘，儿辈皆大欢喜。

伯奇亦来，言独昏终竟做了野鸡大学的野鸡委员。这是他个人的事，只要不用创造社名义，我并不反对。

二月二日，星期四，晴。

昨夜遇盗，将楼下铁箱里放着的皮外套和皮靴偷去了。因为厨房没有关严，还有几件旧东西丢在了厨房里，没有拿去。皮外套本是去年年底缝来预备往苏联去的，一次也未曾用过。苏联未能去成，连准备下的行装都又被人偷去了，安娜很愤恨。但那是黑色的羊皮做着里子的，只值得一百来块钱，拿去了倒也好，纵横不会有穿的机会。

编《沫若诗集》目次，尚未十分就绪。

中午时分石井医院送来医费清单，竟在四〇〇元以上，安娜出自意外，我也出自意外。我想到从前学艺大学还欠着我两三个月的薪水没有发，可有三四百块钱，我叫安娜同仿吾去找王宏实（旧学艺大学的校长），去收讨那一笔钱来清付。安娜说：“今天是最不愉快的一天。”

晚赴内山，赠以《浮士德》一册，安娜同行。赴创造社，取

来《浮士德》三册。

安娜归时买得《改造》① 二月号一卷，有意大利的小说家G·德列达② 的一篇小说《狐》。此人系今年得诺贝尔奖金者。印象的自然描写，暗示的事件推进，颇可注目。是一位写实派加技巧家，无甚新意，小资产阶级的文艺。

罗伯特·修士③ 作《华盛顿传》，称华盛顿为一流氓无赖，牛皮大王，赌博大王，好色大王。这或者近于事实，中国历史上所谓创业的帝王多是这样的人物，一被偶像化了便神圣了起来。偶像的本质原来是泥塑木雕的。

二月三日，星期五，晴。

午前丘某④ 来，示我以择生所做的政治宣言，意欲托我付印。我看了一遍仍然交还了他。择生自从武汉遁走以后，在莫斯科和柏林两地住了半年，一个脑筋仍然未改旧态。

《沫若诗集》第一种本日编成，计剧四篇，诗百首以上。编成时已夜深，安娜看电影归。

---

① 日本综合性刊物，月刊。一九一九年创刊于东京，一九五五年终刊。山本三生编。

② G·德列达(G. Deledda, 1871—1936)，通译黛丽达，意大利女作家。著有《伊里亚斯·波尔塔鲁》、《活人的神》等。

③ 罗伯特·修士(Hughes Rupert, 1872—1956)，又译罗伯特·休士，美国作家、时事评论家。著有《华盛顿传》等。

④ 指丘哲(1885—1959)，原名竞荣，字映美，原籍广东梅县，生于福建漳州。早年加入同盟会。大革命时期参与联络和筹划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邓演达发起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农工民主党和民主同盟创建人之一。

内山送来葡萄酒两瓶，祝《浮士德》之出版。

二月四日，星期六，晴。

早餐后由安娜作向导赴心南处，赠以《浮士德》一册，蒙以《小说月报》的特刊《中国文学研究》一册见赠。

本拟再到仿吾处去，自心南寓所出后，安娜已不知去向；因不识仿吾住址，故改往创造社。几位负责人，直至吃中饭，一个人都不在。

编好了《水平线下》。

安娜为生活费与仿吾口角。安娜要创造社每月付一百五十元，仿吾说只能出一百。我说只要生活过得下去，一百也就够了，不要把社抽空了。安娜说，社里做事的人白做事，吃饭的人白吃饭。归家后为此事半日不愉快。

夜草《水平线下》序，拿到社里去，仍然一个人都没有。拿了一本《文艺战线》① 回来，空空如也，没有东西。

下午跳读了些《中国文学研究》，也真是狗吃牛屎图多。资本家的印刷事业就是这个样子。可惜了印刷工人的劳力，可惜了有用的纸张，可惜了读者的精神。编的人也真是罪过，罪过！

二月五日，星期日，阴晦，雨。

晨起异常不愉快，神经性的抑郁。

---

① 作者原注：日本初期的普罗文艺杂志。

赴社编改《文艺论集》和《译诗集》。中午时分回家吃午饭。饭后再赴社。《译诗集》成。

理发一次。

晚李初梨来，邀往谈话。他们几个人住在我的寓所后不远，有壁炉烧着熊熊的炭火，比起我的寓所来，自然是更舒服，也难怪老婆要说闲话了。

在壁炉前为他们谈说南昌"八一"革命。仿吾、伯奇、彭康、朱盘①、乃超均在。独昏未见，听说应了C某的邀约去开会去了。奇妙的是大家都赞成独昏就聘，以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占领一个机关。我觉得有点好笑，不过也好，所谓"娱情聊胜无"也。

二月六日，星期一，雨。

早餐后赴社，安娜为打绒线事，与社中两位姑娘冲突，一位姓严的姑娘今日出社。本来社里的同人都是些文学的青年男女，是浪漫性成的人，安娜凡事要去干涉，言语不同，意见又不能疏通，结果是弄得来凿枘不相容。

在社中校《文艺论集》，校《前茅》，这个集子并不高妙。

社中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今天是伯奇轮讲，讲的是列宁的

---

① 彭康（1901—1968），原名坚，字子劼，笔名嘉生，江西萍乡人。创造社后期成员，"左联"发起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文委委员、代理书记。著有《前奏曲》等，译有《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　朱盘，即朱镜我（1901—1941），原名德安，浙江鄞县人。社会科学家、创造社后期成员。曾任中共中央文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家党团书记等职。皖南事变中牺牲。著有《社会主义的发展》，译有《哥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的价值论》。我也列席旁听了一会。和儿来说家里有客，便告辞了。

回家看时，来的是冠杰和董琴，他们否认择生回港说。

冠杰说："石达开有两句诗：'身价敢云空冀北，文章昔已遍江东'①，宗兄足以当之。"

我自己很惭愧，并不敢承当这样夸大的赞奖，不过这两句话从石达开的口中说出，足见是有点骄傲。

午后医科的同学桂毓泰来访，有费鸿年和他的日本夫人同来。桂的日本夫人花子病死在日本，他把她埋葬了才同费君夫妇回来的。乘的是往香港的船，今晚在沪停泊，他们特别登岸来访问我们。

不久仿吾也来了，同在我家吃晚饭。

费夫人在此留宿。

夜校《文艺论集》，毕。

二月七日，星期二，雪。

昨夜与和儿同宿于亭子间中。晨餐后安娜与费夫人同出。

读托尔斯太的《黑暗之力》第一幕。

安娜在中午时曾回家一次，复出，费等今日午后三时即将解缆赴广东也。安娜回家时已是午后五时。

① 见石达开诗《答曾国藩五首》之第一首。

二月八日，星期三，晴。

读《查拉图斯屈拉》①旧译，有好些地方连自己也不甚明了。着想和措辞的确有很巧妙的地方，但是尼采的思想根本是资本主义的产儿，他的所谓超人哲学结局是夸大了的个人主义，啤酒肚子。

有力无用处，实在是闷人。

傍晚曾赴社一行。与伯奇、独昏两人谈到达夫，听说他在《日记九种》中骂我是官僚，骂我堕落；我禁不住发出苦笑。我自然是乐于礼赞：我们达夫先生是顶有情操、顶有革命性的人物啦。独昏又说他在未退出创造社以前，便在对人如何如何地短我。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亏负了他。

午前斯啸平②来，赠以《浮士德》一册。

二月九日，星期四。

读高尔基的《夜店》，觉得并不怎样的杰出，经验丰富，说话的资料是源源而来的。巡礼路加的找寻“正义的国土”一段插话，未免过于造作。

《黑暗之力》读完了，也没有怎么大的逼人的力。尼奇德的忏悔只是精神病的发作，阿金伞的宗教味只觉得愚钝，并不足以感动人，使尼奇德犯罪的根本原因是财产，是一切的私产

---

① 作者原注：Zarathustra 的音译，古代波斯国教袄教的始祖。这里指的是尼采的著作的译名。

② 斯啸平，名力，浙江上虞人。黄埔军校四期生。

关系。不然他不会弃玛林那，不会爱阿尼霞，不会杀克里那的婴儿了。

下午仿吾来，与安娜同出购物。晚归饮葡萄酒。谈《创造月刊》事，我主张把水准放低，作为作育青年的基本刊物，仿吾很赞成。

定十一号走，心里涌出无限的烦恼。又要登上飘流的路，怎么也觉得不安。这一家六口真是够我拖缠。安娜很平淡，在她又不同，是回她自己的母国。她的太平淡，反增加了我的反抗性的懊恼，脑子沉闷得难耐。

豪兄不来，一时也不能动身。恐怕十一号不一定能够走成。仿吾说，明早去会梓年①，请他去告诉豪，因为他听啸平说，民治已经搬了家。

二月十日，星期五，晴。

豪和民治来，同吃中饭。

仿吾亦来，约了初梨等来谈话。

晚伯奇来，留仿吾与伯奇在家吃晚酒，颇有醉意。决延期乘十八号的"坎拿大皇后"。

二月十一日，星期六，晴。

上午王独昏来，谈及邓南查②的剧本《角孔达》，一位有妻

① 即潘梓年（1893—1972），江苏宜兴人。一九二七年在中共上海文委、中国互济总会工作。

② 邓南查（G. D. Annuzio，1863—1938），通译邓南遮，意大利作家。著有《新歌》、《死城》、《死的胜利》等。

室的雕刻家和女模特儿的角孔达发生恋爱，由这个三角关系，发生了种种的葛藤。主题是：艺术与家庭——自由与责任——希伯来精神与异教精神①。

我新得着一个主题：——革命与家庭。

盐酸寮山中的生活是绝好的剧景，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

午后民治与继修同来，谈及刊行周刊事。我拉他们去访仿吾，未遇；到出版部，亦未遇。

留出版部，看了一篇《鲁迅论》②（见《小说月报》），说不出所以然地只是乱捧。

在出版部用晚饭。

二月十二，星期日．晴。

今日一日苦闷得难耐，神经性的发作。

究竟往东京呢？还是往长崎？

这样一个无聊的问题苦了我一天，为什么一定要走？

儿女们一定要受日本式的教育才行吗？

到日本去靠着什么生活？

根本是钱作怪。钱把一切都破坏了。

头痛。

---

① 希伯来精神，即基督教精神，主张轻现实，崇未来，守真节欲；异教精神亦称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相对立，以现实、享乐为人生之终极目的。

② 方璧撰，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海《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十一期。

午后往出版部，读了彭康的《评人生观之论战》，甚精彩，这是早就应该有的文章。回视胡适辈的无聊浅薄，真是相去天渊。读了巴比塞①的《告反军国主义的青年》（均《文化批判》二期稿）。

与博、佛二子同在部中吃晚饭。

二月十三，星期一，晴。

午前赴部，与仿吾诸人谈半日。

中饭后看电影《澎湃城的末日》。彭康同坐。后起之秀。

二月十四，星期二，晴。

继修、民治复来，为周刊事。末几仿吾、伯奇亦同来。周刊决定出，我提议定名为《流沙》。这不单是包含沙漠的意义，汕头附近有这样一个地名，在我们是很可警惕的一个地方。继修任部交际主任。

晚，仿吾、独昏邀往都益处晚餐。

二月十五，星期三，晴。

读日本杂志《新潮》②二月号，无所得。

---

① 巴比塞(H. Barbusse，1873—1935)，法国作家。一九二七年发起组织"世界反帝大同盟"。著有《光明》、《澎湃城的末日》等。

② 日本文艺刊物。一九〇四年五月创刊于东京。楢崎勤主编。

回读正月号，有藤森成吉① 的《铃之感谢》，是写一位奸商办交易所的自白，颇能尽暴露的能事。但这小说用的自白体，殊觉不很妥当，应该用第三人称来客观地描写而加以批判。

啸平来，说《浮士德》难懂，他喜欢《我的心儿不宁》②的那首诗。那首诗便是我自己也很喜欢，那是完全从新全译了的，没有安琳绝对译不出那首诗来。那虽是译诗，完全是自己的情绪借了件歌德的衣裳。

（1）酒家女（2）党红会（3）三月初二（4）未完成的恋爱（5）新的五月歌（6）安琳（7）病了的百合花③

二月十六，星期四。

无为，读德哈林的《康德的辩证法》。康德的永远和平是求资产阶级的安定的说法，他承认“财富的大平等”，有了个人的财富，如何平等乎？

午前啸平来，言民治及其他诸人在都益处等候，要为我祖饯。未几仿吾亦来，我把仿吾拉了去，安娜也同去。

---

① 藤森成吉（1892—1978），日本作家。著有《青年时的烦恼》、《悲哀的爱情》等。

②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一章《甘泪卿之居室》中的一首诗。

③ 作者原注：这七项是那时打算写的七篇小说，除第五项有成稿之外，其余的都没有写出。

在座的是民治夫妇、继修夫妇、叔薰夫妇、公冕、啸平、安琳。安琳比从前消瘦了，脸色也很苍白，和我应对，极其拘束。

她假如和我是全无情愫，那我们今天的欢聚必定会更自然而愉快。

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专靠精神上的表现是不充分的。

十八号不能动身，改乘廿四号的卢山丸。家眷于同日乘上海丸。

晚七时顷归。赴心南家，谈至夜半，所谈者为与商务印书馆相约卖稿为生也。他劝我一人往日本，把家眷留在上海。这个谈何容易，一人去与一家去生活费相差不远，分成两处生活便会需要两倍费用。并且没有家眷，我何必往日本乎？……

十一时过始由心南家回寓，与安娜谈往事。安娜很感谢心南，她说在我未回沪之前，除创造社外，旧朋友们中来关照过他们母子五人的就只有心南。

安娜问安琳和我的关系，我把大概的情形告诉了她。

安琳是芜湖人，在广东大学的时候，她在预科念书，虽然时常见面，但没有交往。去年十月她由广东到武汉，在政治部里担任过工作，不久我便到南昌去了。今年南昌的“八一”革命以后，由南昌到汕头的途中我们始终同路。我在路上患了赤痢，她很关心我，每到一处城市她便要替我找医药。在汕头失败以后，流沙的一战在夜间又和主要部队隔离了，只有她始终是跟着我。和着几位有病的同志在盐酸寮山中躲了几天，后来走到了一个海口是一个小规模的产盐的市镇，叫着神泉。

从那儿搭着小船到香港，又从由香港回到了上海来。

——你爱她吗？安娜问我。

——自然是爱的，我们是同志，又同过患难来。

——既是爱，为甚么不结婚呢？

——唯其爱才不结婚。

——是我阻碍着你们罢了。安娜自语般地说。——假如没有这许多儿女，——她停了一会又指着日本式的草席上睡着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自语般地说下去，——我是随时可以让你自由的。……

我没有再说话。已经二时过了，心境随着夜境深沉下去，很有点感触。

二月十七，星期五，晴。

今晨起甚迟。午前半日无为，午后往出版部，杂读了一些书籍，无甚铭感。

晚上陈抱一的日本夫人来，并无要事。

晚饭煮蠔油豆腐很可口。到过一次广东，知道了蠔油的美味。广东的蠔油拌面，真是再好也没有。

二月十八，星期六，晴。

拟做《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顾》。

一　诗的修养时代

唐诗——王维、孟浩然、柳宗元、李白、杜甫、韩退之(不喜欢)、白居易。

《水浒传》、《西游记》、《石头记》、《三国演义》都不曾读完，读完且至两遍的只一部《儒林外史》。喜欢《西厢》。喜欢林纾译的小说。

二　诗的觉醒期

太戈儿、海涅。

三　诗的爆发

惠迭曼、雪莱。

四　向戏剧的发展

歌德、瓦格讷。

五　向小说的发展

福楼伯尔、屠格涅甫、斐理普①、柔尔・鲁纳尔②。

六　思想的转换

追想出以前做过的旧诗（此处写出了旧诗二十余首，现刻选录几首在下面）：

天寒苦昼短，读书未肯辍。

檐冰滴有声，中心转凄绝。

开门见新月，照耀庭前雪。（这是一九一三年在未到日本以前在北京做的。）

---

① 斐理普（C.-L. Philippe, 1874—1909），法国小说家。著有《母与子》、《蒙帕纳斯的蒲蒲》等。

② 柔尔・鲁纳尔（J. Renard, 1864—1910），又译勒纳尔，法国作家。著有《胡萝卜须》等。

月下剖瓜仁，口中送我餐。

自从别离后，怕见月团圞。（这是一九一五年在日本冈山做的。）

红甘蔗，蔗甘红，

水万重兮山万重。

忆昔醉蒙眬，

旅邸凄凉一枕空。

卿来端的似飞鸿，

乳我蔗汁口之中，生意始融融。

那夕起头从，才将命脉两相通。

难忘枕畔语从容：从今爱我比前浓。

红甘蔗，蔗甘红，水万重兮山万重。（与前诗约略同时，题名为《蔗红词》。）

清晨入栗林，紫云插晴昊。

攀援及其腰，松风清我脑。

放观天地间，旭日方杲杲。

海光荡东南，遍野生春草。

不登泰山高，不知天下小。

梯米太仓中，蛮触争未了。

长啸一声遥，狂歌入云杪。（这是一九一六年的春假，同成仿吾游日本四国的栗林园做的。紫云是园内的一座山名。）

二月十九，星期一。

仍追忆旧诗，所拟题未着手。

伯奇来，送来《前茅》及《文化批判》二期。《前茅》并不高妙，只有点历史的意义。

晚作《留声机器的回音》，答初梨，只成一节。仿吾来，留饮葡萄酒。

近来外边检查甚严，又破获了机关三处。

独昏来，为古有成① 译稿事与仿吾大闹。原因是在广大时，有成曾经反对过独昏。有成译了一部美国奥奈尔② 的戏剧，交给仿吾，仿吾已允为出版。因此遂惹王不快，大启争端、其实因为私怨而拒绝别人的译稿，独昏这种态度是很不对的。他近来出了名，忘记了他从前有稿无处发表，四处乱投的苦况了。我居中调解，叫把原稿详细经过一次审查。

仿吾真难处，介乎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之间。

二月二十，星期一。

写《留声机器的回音》。往出版部取来《文艺论集》、《玛丽玛丽》③ 等书作参考。

---

① 古有成，当时广东大学的学生。

② 奥奈尔(E.O'Neill,1888—1953)，通译奥尼尔，美国剧作家。著有《榆树下之恋》、《奇异的插曲》等。

③ 《玛丽玛丽》，英国小说家J·司蒂芬斯著。徐志摩、沈性仁合译，一九二七年新月出版社出版。

继修与啸平来，为小红帔事安娜与我大闹。小红帔是孙炳文的夫人送给淑子的，淑子大了不能再用，安娜日前说好送给民治的孩子用，我已经向民治说了。啸平来，我便叫她拿出来给民治拿去，而她又不肯，说要留来做纪念。真是令人难乎为情。

午后半日不愉快，至晚始将《回音》写完，一八页。

二月二十一，星期二。

晨往仿吾处，不在。赴独昏处，示以《回音》，彼甚愉快，要我交给他在月刊上发表。

我说，要等仿吾看了再说，最好是在《文化批判》上发表，不然同社的人会俨然对立了。

独昏说："你的文章总有趣味，要点总总总总提得着。"他说这个"提"字费了很大的力，在说出之前先把两手握成了拳头来向上捧了几下。

——我自己总不行，我时常读你的《革命与文学》和《文学家的觉悟》，光慈还笑我，后一篇的力量真不小。

与独昏在面馆里吃炒面。

午后仿吾来，把《回音》交给了他。

二月二十二，星期三。

晚在初梨处谈话，独昏不在。

仿吾在我家晚餐，用菊花锅，葡萄酒。

读了一篇徐祖正的《拜伦的精神》，所告诉我们的未知的

事件只是拜伦赴希腊后，一次午热，入海行浴，竟得骨痛病以至于死。

此病在作者未探究其根源，我想一般为拜伦作传的人恐怕也没有人去探究过。据我看来，那明明是梅毒第三期的骨痛，拜伦是一位梅毒患者无疑。

有人说我象拜伦，其实我平生没有受过拜伦的影响。我可以说没有读过他的诗。

二月二十三，星期四。

船票都已经买定了，决定明天走了，心里异常的不安。到日本去，安娜说可以得到自由，我是感觉着好象去进监狱。纵横好，在现在那还有自由的土地呢？

晚间伯奇来，说由民治送来的消息，我的寓所已由卫戍司令部探悉，明早要来拿人。

临时和仿吾、独昏两人同出，先吃面，往独昏处。后仿吾、伯奇均来，在新雅茶楼会食，至十二时过。

是夜与仿吾同宿日本人开的八代旅馆，是内山替我们订下的房间。

（日记至此中辍）

跨着东海

一

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大约是在下旬吧，我经过了“由广东到广东”的北伐战役之后，从香港回到了上海。但已经是被通缉的一名亡命之徒了。

那时候创造社还存在，出版部设在北四川路的麦拿里。成仿吾、郑伯奇、王独清、穆木天，都已经从广州回到了上海。安娜带着四个孩子赁居在窦乐安路的一栋小弄堂房子里，周围住的大都是日本的居留民，我也就暂时潜伏在这儿。

上海是不能久呆的，甚至中国也是不能久呆的。往那儿走呢？

那时最初的计划是到苏联，而且决定全家都去。

在行期未定之前，我不甘寂寞地也写过一些文章，是用麦克昂的变名发表的。当时的英国宰相是工党的麦克唐（Mac Donald）①，我这个变名有人以为是摹仿他，想和他攀为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九月上海春明书店《今文学丛刊》第一本《古旧书讯》。

① 麦克唐（J.R.Mac Donald，1866—1937），通译麦克唐纳，英国工党领袖之一。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九年两次组阁。

弟，其实我的用意倒别有所在。我这"麦克"是英文maker(作者）的音译，"昂"者我也，所以麦克昂就是"作者是我"的意思。

但也有用我的本名发表的文字，最值得记述的应该是《浮士德》第一部的译文的整理了。

我开始翻译歌德的《浮士德》，是五四运动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九年的秋间。我翻译了浮士德老博士在中世纪的书斋中，苦诉着学枷智梏的束缚的那一场独白。少年歌德的狂飙时代的心境，正适合于五四前后的一般知识青年的心境，我的译文在当年的双十节上海《时事新报》的增刊上发表过，便引起了很大的共鸣。因此我便受到了共学社的劝诱，要我把全部译出。我在第二年的暑间，只把第一部译出了。艰涩的第二部我没有工夫译，而且也不想译，出版便成了问题。第一部的译稿带在身边，一直延搁了十年，中间还经过一次鼠灾，老鼠在原稿上砌窝，把前半最难译的一部分几乎全糟蹋了。

潜伏在窦乐安路的一座亭子间里，算得到了充分的整理的时间，我把损失了的补译起来，把残存的旧稿，也彻底润色了一遍，仅仅费了十天工夫，便把这项工作完成了。这在我当时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译文相当满意，而且把十年中的经验和心境含孕在里面，使译文成长了起来。可见延搁的十年，也并不是空费。浮士德作了复活节的春游，由原野回到书斋之后，所唱出的这几句：

嗟我小斋中，灯火今复燃，

胸底生光明，深心知内观。
花开希望蕊，理智复能言；
景慕生之川，景慕生之源。

完全是我当时从战场的驰骋中回到小房间里的如实的心境；生活虽然受着限制，希望是非常葱茏的。我有着这样的自信，我在这句译文中所含孕的感情，比歌德写下它们时是还要丰富些的。

整理完毕，立即交给创造社付排，在这次是没有受着丝毫的阻碍了。

自然我也过问过创造社本身的业务。

创造社成立出版部，是在一九二六年的四月一日，是由五元一股的青年股东们凑合起来的。（前一向章靳以[1]先生曾经告诉我，他也是当年的一位小股东。）成立虽然仅仅一年半光景，因受青年们的爱护，业务的发展蒸蒸日上。而出版部本身，差不多就是一个文学俱乐部，每顿开饭，连主带客常常是两大圆桌。但这盛况并不是春和景明的繁花，而是在暴风雨激荡中的海燕。因为我个人的政治关系，在孙传芳统治江苏的时代，它已经几乎遭了封闭；在孙传芳被打倒之后，它是更加危殆了。

我是爱护创造社的，尤其爱护创造社在青年中所发生的影响，因此我想一面加强它，一面也要为它做些掩护的工作。

① 章靳以（1909—1959），原名方叙，天津人。作家。著有《红烛》、《圣型》等。当时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

怎样去加强它呢？我在人事上发动了李一氓和阳翰笙来参加，同时又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的活动，请求过鲁迅来合作。鲁迅在那时也由广州回到上海来了，对于我的合作的邀请，他是慨然允诺了的。

怎样来掩护呢？我当时所拟定的办法是这样：第一是恢复《创造周报》，专以青年为对象；其次是充实《创造月刊》，使它从纯文艺的范围扩展而为综合性的；更其次是发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丛书。我们从第一步做起，曾经在报章上登过恢复《创造周报》的启事①，在这启事上是以鲁迅的名字领衔，我以麦克昂的变名居第二，以次是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等。

但这计划却不料来了意外的挫折。我在订这计划的时候，仿吾到日本去了。我满以为他对于这个计划是会同意的，因为求其速成，我在事前并没有征求他的同意。而仿吾在日本方面，却又和另外一批朋友，订了一个新的计划，便是要把创造社作为明朗的思想战的基地，要尽力从事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推阐工作。这一批朋友便是李初梨、彭康、朱镜我、冯乃超、李铁声②。他们是少壮派，气锐非常，革命情绪火热地高涨，就为了推行这一计划，大都临到大学快毕业了，把毕业试验抛弃，陆续先仿吾而回到上海。

---

① 《创造周报》复刊的广告刊登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上海《时事新报》。

② 李铁声，原名声华，湖北潜江人。翻译家，创造社后期成员。译有《法兰西内战》等。

两个计划彼此不接头，日本的火碰到了上海的水，在短短的初期，呈出了一个相持的局面。我主张等仿吾回来，彼此谈好之后，再来一个抉择。打电报去催仿吾，仿吾也从日本回来了。他坚决反对《创造周报》的复活，认为《周报》的使命已经过去了；支持回国朋友们的建议，要出版战斗性的月刊，名叫《抗流》（后来这个名字没有用，是改为了《文化批判》）。对于和鲁迅合作的事情，大家都很冷淡。到了这样，却是该我自己来抉择自己的态度了。我深深地知道，假如我要坚持我的主张，照当时的情形看来，创造社便可能分裂。这是我所极不愿意的。并且我不久便要出国，仿吾对于将来的创造社要负更多的责任，照着他所乐意的计划进行，精神上必然更加愉快而收到更大的效率。更何况新的主张，虽然危险得一点，说不定是更合理的办法，没有经过实验，我也不好凭空反对，因此我也就退让了。

这些事情的酝酿和进行，大约就在十一月那一个月里面，而我的退让，就表现在专心整理《浮士德》的那个期间，那是十一月的下旬。我的第一部译后记里面保存着了这个日期，那儿记着“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改译竣”，文中也明明说到“自着手以来仅仅只有十天的工夫”。

出国的行期一天一天地迫促了，虽不能决定在那一天，但总不出十二月初旬。因为要到北国去不能不预备些御寒的服装，于是大人制了皮外套，小人也制了些厚实的大衣。没有多的钱，象毛袜、毛手套，和围巾之类，不能够买，便只好靠安娜自己用绒线来编打，那真可是把她累煞了。

当时的中苏邦交已经不绝如缕，上海的苏联领事馆曾经被人袭击，苏联的船只剩下最后一只，以备领事馆人员的撤退了。我们是被允许搭乘这一只船由上海直驶海参威，再经由西比利亚往莫斯科。船，听说也不敢靠拢码头，只停在吴淞口外，上船时要用小划子载去。

一切的准备都粗略地停当了，朋友们也先后替我们饯了行。我们在十二月五号的下午，得到了一个通知，是六号动身，动身前会有人来接，我们须得在家里等候，我自己仿佛回到了幼年时代，自己感觉着兴奋而愉快，从此可以到我所渴慕着的地方了。

六号那一天，孩子们都穿了一身新，也非常高兴。少数的朋友偷偷地来送行，集中在那一楼一底的房子里。大家都兴奋着从清早等到了中午，又从中午等到快吃晚饭的时候，临时的通知来了——船不能开，发生了障碍，开船的日期，到决定后再临时通知。

这是一个意外的挫折，但还不算严重，因为船早迟总是要开的。但就在这个挫折之后，却来了一个更大的挫折，决定了我嗣后十年乃至半生的生活路径。那可不能不算是严重了。

十二月八号的晚上，我突然得了重病。头痛，四十度的高热，脸色发红而带浮肿，两眼充血。自信对于疾病尚属顽强的身子，一得病便不能起床了。第二天睡了一天，病情毫无起色，经过日本医生的诊察，疑是斑疹伤寒。于是在第三天上便不能不进病院了。要进病院吧，也不能够公开，只好偷偷摸摸地进了一家在北四川路上的私人医院。这是日本医师石井勇

开的。他和我是先后同学，而且是一位《浮士德》的研究者。

入院后在开始的两个礼拜当中，我完全失掉了知觉。不断地发出谵呓，时而表现狂暴。听说在最严重的时候，医师已经关照了安娜，可以准备后事了。

可是我依然活了下来。病在两星期之后，渐渐地好转，虽然好得很慢。在病院里差不多住了四个礼拜，才回到家里，但我依然是活着了。回家的时候还不能走路，上楼是两脚两爪爬上去的。

医生说我抵抗力强，是死里逃生。得了斑疹伤寒的人，在三四十岁以上的过半数是要死亡的。这话一点也不夸张，事实上有一位和我约略同时得病的人，的的确确是死了。

那是桂毓泰博士的日本夫人斋藤花子。桂博士和我是同期生，是由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的。在北伐前后，他在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任教职，后来做过院长。我们是同学，又是同事（我在北伐前，担任过中山大学的文学院长）。因此在广州的一段时期，花子夫人和安娜，更因同国的关系，是特别亲密的，她们就和姊妹一样。

就在我整理《浮士德》的那十一月的尾上，桂博士同他的夫人也由广州到上海来，他们是要一同往日本去省亲。船过上海的时候有一夜的逗留，在当天晚上，他们是被留宿在我经常坐卧的一座亭子间里面的。就只这么一夜，我们便分别了。但等到第二年的二月初头，我还在养病的时候，桂博士一个人孤影悄然地从日本回来了。夫人呢？死了！就在到东京之后不久，害了斑疹伤寒，死了。

事情是很明显的，我们是同时受了传染。

斑疹伤寒是靠着虱子传染的。我们虽然住在一楼一底的弄堂房子里，但我们比较爱洁净，周围的日本人也是比较爱洁净的，无论怎样不至于生出虱子来。这虱子的来源，毫无疑问，是桂博士和花子夫人在几天的船上生活中，由船上带了下来的。花子夫人早在船上受了传染，而我又受了她的传染的传染，就这样，我们虽然隔着一个东海，却差不多同时害了同样的病，而她是死了，我是活下来了。再补充一点医学知识吧，斑疹伤寒的潜伏期，是有十天到十四天的间隔的，算起花子夫人留宿在我们家里的日期，和我们发病的时期来，恰恰合拍。

我的生命虽然留下来了，但我也失掉了很重要的一些东西。我的两只耳朵，在十七岁时，得过一次肠伤寒，已经是有些重听的，再经这一次的斑疹伤寒，在大病初愈时，差不多把听觉完全失掉了。但这还是小事，而更重要的，便是我一家人失掉了赴苏联的机会。

苏联的船是十二月十二日开出的。那天最后的通知虽然来了，但正是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安娜后来告诉我，假使我在这之前死了，她都是决心把孩子们带去了的，但我却没有死。

真是一个大遗憾！一个偶然的因素，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一世，甚至于一家一族。我时常在这样作想，假使我不发病，我当然决不会有此后十年间陷在日本的局促的生活。更假使发病得迟几天，我已经上了船，由于海浪的颠簸及车船的劳

顿，我可能死在旅途上。但我的儿女，是过着了别一种生活的。这不真正是命运在作弄人吗？

自然我是不相信命运的，但这一偶然的播弄，怎么说的好呢？它确确实实地影响了我，乃至一小簇人的半生。

二

大病新愈，但我也赢得了一番新生的欢喜。“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尽管是无足重轻的生命，留下了总还是有用处的，我自然该得欢喜。但这欢喜不单是心理上的感觉，而是在生理上也好象更始一新了的一样。大约是由于久病中的绝食，和病愈后的严格的食物限制的原故吧，口味非常的清恬，情趣也非常的明朗。短期间，我差不多什么忧虑都一扫而空了。

在恢复期中，有过失眠的现象发生，继续了差不多有两个礼拜光景。白日黑晚躺在床上，丝毫的睡意也没有。头脑非常的清醒，而且一点也不感觉疲倦，一点也不感觉焦躁。诗的感兴，倒连续地涌出了。不，不是涌出，而象从外边侵袭来的那样。我睡在床上，把一册抄本放在枕下，一有诗兴，立即拿着一枝铅笔来纪录，公然也就录成了一个集子。那便是曾经出版而且遭过禁止的《恢复》了。象那样受着诗兴的连续不断的侵袭，我平生只有过三次。一次是五四前后收在《女神》里面的那些作品的产生，一次是写《瓶》的时候，再一次便是这《恢复》的写出了。但这写《恢复》时比前两次是更加清醒的。

随着身体的渐渐恢复，睡眠也渐渐恢复了，一切的生活都

渐渐恢复了病前的原状。但诗兴消失了，而焦虑却逐渐地跑来代替了它。苏联是去不成了，祖国是不能呆的，往那儿跑呢？最值得焦虑的，是拖着一位日本夫人和四个小儿女。大的一个儿子已经九岁了，超过了入小学的年龄已经三年。第二个儿子也七岁了，已经到了入学的年龄。这些尤其是使他们的母亲焦急的一件事。我因为在外边奔跑，长期地离开了他们。他们住的地方也不曾固定下去，上海、广州、武汉、上海，不断地在转徙，住得最久的地方，也不过一年光景而已。他们平时是很少同中国的小朋友们接触的，虽然请了家庭教师，也没收到多么大的效果，他们的中国话实在懂得很有限。这怎么办呢？这在他们母亲的份上，自然是很想带着他们回日本去了。这里是我的一个苦闷。日本我是不甘心去的，但为儿女们着想，我又不能不去。在当时我可能走的，似乎也就只有这一条路了。假使有钱，跑欧美自然也可以，但这谈何容易！即使弄得到护照，弄得到路费，向欧美跑去了，将来的生活怎样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家人的问题呀！我为这，逐渐逐渐地感受沉重的苦闷了。有的朋友劝我一个人离开，把家眷留在上海。有的朋友又劝我一个人留在上海，把家眷送往日本。但两者都有困难，孩子们太多又太小了，安娜又是日本人。结果还是决定了全家都到日本去的路。

作了那样的决定，已经是一九二八年的二月下旬了。虽然还软弱得一点，但我已经能走路了。我应该感谢成仿吾和创造社的其他的朋友们，是他们经过商量的结果，在我赴日之后，每个月送我一百元的生活费。当时的一元约略抵日本的

一圆，虽不能算是怎样的丰裕，但也不能够说是怎样的菲薄了。好，到日本去吧！路是人走出来的，自己的路尤其要自己去走！

在当时要往日本是很容易的事，不要护照，也不要任何人的允许，只要你买一张船票，便随时随地都可以让你登陆。问题倒是在上海上船的时候了。一家人同船走吧，人太多，容易被人注意到。弄得不好，在码头上便会被人扣留。同船是不行的，只好分开。我一个人乘一只日本邮船，赴神户登陆。让安娜带着四个儿女，乘上海和长崎间的联络船，由长崎登陆，再改乘火车到神户聚齐。乘联络船是要快些的，只须一天一夜便可以到长崎，再由长崎乘火车，那比起轮船来更要快了。因此假使同日乘船，安娜们是会先到神户的，到了神户，在轮船码头上便容易接着我了。

上船的日期，是二月二十四日。但在上船的头一天晚上，却小小地起了一点风波。有朋友来报告，据说当时的龙华司令部，已经打听到了我住的地址，窦乐安路是属于越界筑路的范围，当天晚上，要准备来拿人了。于是乎匆匆忙忙地便和仿吾两个人跑到内山书店，由内山完造老板又把我引到一家日本人的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在汇山码头上船的时候，送行的也只有内山老板一人。我真个是孤孤单单地离开了我很不情愿离开的祖国。祖国并不是不需要我，然而我却不能不离开了。在开船的时候，我望着沉默着的祖国，潸潸地流下了眼泪。

买船票的时候，我用的是假名吴诚，南昌大学的教授，目

的是往东京考察教育。因此我就一个人呆在吴诚的舱房里，连饮食都是叫用人搬进舱里来吃的。一直呆了三天。

三天后的上午，到达了神户。下船的时候，既无护照须验，也没有行李待查，虽然有新闻记者来探听消息，他们看见吴诚既非知名之士，自然也就很容易滑过了。我是第一个下船的客人，在码头上很快地便和安娜见了面。

安娜和四个孩子比我早到了半天，落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座名叫花屋的小旅馆里面。她打听到了轮船到码头的时刻，便把孩子们寄放着，到码头来迎接着我。我们在花屋聚齐，就在当天下午又乘火车往东京。

往东京，落在什么地方呢？

我在一九一四年的正月初到日本的时候，在东京学习日本话，费了半年的工夫。那年的六月，考上了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预科，在学的期间又是一年。这一年半是我在东京住得最长的时期，以后便被分配到乡下去了。高等学校的本科三年，是在日本的西部冈山（Okayama）的第六高等里面渡过了的。医科大学是九州岛上福冈市（Fukuoka）的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在这儿前后住了五年。东京，在我是比较生疏的地方，我在那儿没有什么朋友，无论中国人或者日本人。就有，也经过多年的离别，不知道他们的住处了。

我和安娜最初的相遇是在东京，那是一九一六年的暑间，我已经把第六高等的一年级读完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得了肺病，在美国人办的东京的京桥医院里治疗，我趁着暑假，由冈山往东京去看他。那时候，安娜在那医院里服务。她本是仙

台(Sendai)人，才从教会学校里毕业，到东京想学习产科的。我们偶然地在那儿会面了，因而相爱，在那年的年底便在冈山同居。因此，安娜在东京也还没有住上一年，她在东京，一样也是没有朋友的。她有一位姨母住在横滨，在从事教育工作，但也不好去投奔那门亲戚：因为安娜和我的结合，根本是没有征求过她的家族的同意的。

现在一家人作了亡命客，要到东京，究竟投奔什么地方呢？假使我们有多的钱，落在旅馆里，慢慢再相宅定居，那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们那有那样多的钱？假使是一个人还好说话，而无奈又是一家六口。

这些早就苦恼过我们，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已经在火车的三等车中颠簸着了，安娜才好象突然得到一个天来的灵感一样，很高兴地告诉我：我们决定去投奔桂毓泰博士的花子夫人的娘家。

花子夫人虽然死了，她和安娜的情谊很深，她的娘家当然是知道我们的。她的两老还存在，父亲是一位木匠师傅，还有一位年青的兄弟，在住着庆应义塾的大学部。那当然是中等以下的人家了，据说在兼营着"贷间"的副业——把剩余的房间来租给学生，连带着供给食膳，是一种变相的小规模的旅店。唯其是这样的人家，最好作为我们的投奔的对象，我也很乐意地表示了同意。

斋藤家是在东京西南部的品川区(Hinagawa)，接近郊外的地带，我们便在离中心车站的东京驿两个车站前的品川驿下了车。那只是东京的一个小侧门，大约是三等车站吧，下车

的人是寥寥无几的。下了车，在这里当然是没有一个迎接的人，便雇了一乘“圆托”——在街头招揽乘客的小汽车(Taxi)，一趟大率一圆钱——连人带行李，一直开到斋藤家去。

这样出乎意外的不速之客，却受着了真正是由衷而出的恳切的欢迎。两位老人都是上了六十岁的年龄了，非常朴素，而且也非常忠厚。家是东京大地震（一九二三）后新建的，屋顶虽是洋铁皮，倒也还不怎么简陋。屋前还附了个小小的庭园，有些花木和石凳之类。的确是在兼营着“贷间”，住着好几位中国留学生。家里没有用人，一切炊爨洒扫，就由花子夫人的那位老母亲一个人在担任。

安娜到了这样的人家，她是很高兴的。她感觉着就好象回到了自己的娘家。斋藤老母接待着我们，也没有感觉着什么累赘，看那情形她也好象感觉着她的花子女儿是复活转来了。你看她不是一面在欢喜，一面又在揩眼泪吗？

家里已经没有空的房间了，但那几位留学生对于我们，也特别表示欢迎，他们特地空了一间出来，集中到另外一间去了。他们也很关心我，要我暂时不要声张，免得引起日本警察的注意。他们说，日本人是把我当成要人看待的，恐怕不一定让我久住。

接着来的，当然也就是这能不能居留的问题了。我自己事实上是一名“政治犯”，东京是不是肯容许我？我是公开出来，还是长久地隐藏下去？假使东京不能容许我，那我便得及早离开。这些琐碎而又闷人的问题，我又不能不找一个可以商量的对手了。

找谁呢？

我记起来了。有一位大众文学的作家，名字叫村松梢风(Muramatsu Shōfu)①的。在北伐前，由内山老板的介绍，在上海曾经有过一段的交游。他在编辑着一种大众文学性的杂志《骚人》(Sōjin)②。那骚人社的地址，是标记杂志上的，在任何小书店的店头，一查便可以知道。我查到了，是在神田区饭田町。因此我和安娜两人，便在到东京后的第二天，去访问村松。

日本的所谓大众文学，导源于我国明清两代的章回小说，那是充分带有封建性的东西。写这种作品的作家，当然也就是封建性的人物。这种人向坏的一方面充分发展，便成为流氓，成为浪人，成为黑龙会③的骨干。但有的也有好的一方面的属性，便是人情味浓厚，社会性广泛，这便结合成为他们所标榜的侠义性。村松梢风似乎是具有着这好的属性的人。

他在他的办事室里，很诚恳地接受着我们的突然的访问。一切的问题差不多都不等你向他开口，而他凭他那富有人情味的了解力，便这样那样的先替你想到了。

他说，娓娓婉婉地说：你们这次来，当然是以孩子为本位的，主要是为的孩子们的养育。那吗最好是不要住在东京。但

---

① 村松梢风(1889—1961)，日本作家。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二年间多次来华。著有《魔都》、《中国漫谈》等。

② 一九二六年创刊，一九三〇年停刊。村松梢风创办并任主编。

③ 日本军国主义者团体，玄洋社派生组织之一，一九〇一年成立。因极力策动、支持侵占黑龙江两岸的东北、蒙古等地，故名黑龙会。

也不好离开东京太远，最好在东京附近的乡下，找一个半永久性的住家，一方面适宜于孩子们的健康，一方面也适宜于写作生活。文人不写作是不能生活的，住在东京，不仅于孩子们不宜，于写作也不宜，而且生活费太贵了。

因此，他就想到他的一位朋友，名字叫横田兵左卫门（Yokoda Haizayemon），他是住在江户川（Edo-gawa）的彼岸，一个小市镇市川（Ichikawa）的。那市川虽然属于千叶县（Chibaken），但和东京仅一衣带水之隔，有电车火车直达东京，要不上半个钟头，便可以到达东京的中心地带。

还有是，他继续着他的话题，那横田兵左卫门是一位富于侠义性的人，他是击剑的名手。据说击剑家要练到两个手背上的指关节都起茧，那是不容易的，而横田就是这样有茧的人。他的交游很广，值得注意的，是东京的思想检事的首席（便是检查所谓“思想犯”的头子）平田勲（Hirada Kaoru）是横田的同学，公开不公开，或允住不允住的问题，由横田间接先征求平田的同意，那就很容易得到解决了。

村松是一位瘦削而孱弱的人，年龄比我大些，但恐怕也大不了许多。戴着一付玳瑁框的老光镜，配着那黝黑色的面孔，复着前额的剪成了流海式的头发，沉着气在那儿悠徐地说，真好象就是娓婉的化身那样，于老成持重之中，露着一脉的幽默感。

他也说到要我把北伐中的经过写出来，逐一地登在他的《骚人》杂志上。我自己要用日本文来写文学作品，是没有充分的把握的，即使有吧，我和村松不同的，是我还感觉着具有

充分的矜持。我的文章要登在封建性的刊物上，会是两来都不适宜的。

结论还是在解决目前的问题，我们同意了他的去访问横田兵左卫门的提议。等他先向横田通信，把这意思说明了，得到回信之后，再约定日期同去访问。我们对于他的访问，也就作了一个愉快的结束。

三

事情差不多全部照着村松的安排实现了。

在有一天星期的上午，我和安娜又到他的骚人社去，由他作伴，往市川去拜访那位击剑的名人，横田兵左卫门。

我们先到押上(Oshiage)，那便是通往市川的一条商营电轨的终点了。从这儿坐上电车，向东驶去，通过一些破破烂烂的工场区、贫民区之后，很快便到达郊外了。车道两旁都是一些田畴，东鳞西爪地还积着一些残雪。走了有二十几分钟的光景，便到了那条比较有名的江户川——日本东京在前本叫江户，大约就是由这条河得名的。有铁桥横架在河面上，而且平行着相隔不远还有几座铁桥，那些是铁路和公路所通过的。这条河便是东京和千叶的界线了，以铁桥的正中点为界，桥西是东京，桥东便是千叶。

村松在车上告诉我，象这样交界地方是两不管地带，出了刑事事件是最麻烦的。譬如杀了人，你把尸首放在这交界线上，那吗东京的警察会推给千叶，千叶的警察会推给东京了。

东京和千叶的警察不是一个系统的吗？不，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直接隶属的关系。东京的警视厅，直隶内务省，其它各府县的警察，隶属各府县政府的内务课，因此东京的警视厅，并没有直接指挥各府县警士的权利。因此，假如是犯了罪的人，你在东京或千叶犯了罪，只要跑过了这境界线，便可以得到暂时的逍遥。

这些话对于我是一个启蒙，我在日本虽然前后住了很久，但这种在日本人是常识的问题，而在我听来却是十分新奇的。

过了江户川的铁桥，电车便停在一个小站口上，这儿名叫真间（Mama），我们是到了目的地了。由这儿下车往北走，和电轨成垂直地有一段相当热闹的小街道，这是市川的边区，大约是电轨开通以后才繁盛起来的。市川的本街是和电轨平行的，还在远远的南部。在这一段街道上，走过三二十家小商店的铺面之后，由一条与电轨平行的通道向右转，走不多远再向右手的侧道转进去，又走到电轨的附近，在右手耸立着一家有楼的房屋，在这附近要算是建筑得特别讲究的，这便是那击剑的名人横田兵左卫门的住宅了。

应门的是一位年青的童子，有十五六岁光景，他把我们接上去了，但没有接进那日本式的正室，而是引到那正室前面的一间西式布置的客厅。那儿有沙发，有地毯，有小型桌椅，壁上有油画，在前面隔着玻璃窗，还有一座布置得相当精巧的庭园。但隔着一道木屏，那外边便逼近着电轨了。

横田出来了。人很高，背有点弓，面孔瘦削，一双浓眉下的炯炯的一双黑眼，一个隆起的鹰嘴鼻，骤看去仿佛有点象高

加索人。他说话却是很和蔼，说话时有一种习惯，爱把右手掩罩在嘴唇前面，就象怕有唾沫飞溅出来的那样。这个习惯，细看，是他们的家风。那开首出来应门、回头又捧茶来晋献的童子，这是横田的义子，虽然到了进中学的年龄，而却没有进中学，他说话的时候，也是把手来掩罩着嘴唇的。还有一位非常年青而非常素朴的夫人，她捧着糖点来晋客，她说话的时候，也是把手来掩罩着嘴唇的。这习惯是一种礼节，而且还是由中国传去的礼节。我小时候读过《礼记》，记得《曲礼》上有这么的一项规定："童子立必正方，不倾听，长者诏之则掩口而对。"这"掩口而对"虽然本是童子的礼节，但在后来是扩展成一般人的了。在我们中国这种礼节是失掉了的，就在日本一般也是不遵守的，而在这横田家，却依然还成为一种习惯。这在我虽然有点时代错误之感，但也隐隐感觉着分外的亲切。

原来这横田兵左卫门也是仙台藩的士族，他一和安娜叙起家族的历史来，他们彼此都是知道的。安娜的娘家佐藤，是仙台藩的"剑道指南番"，就是教导击剑的老师，就在她祖父的一代，都还在充任着这个职守的。当然他们是同属于一藩，而且同是士族了。日本人的封建意识保持得很牢固，他们在这族别上分别得相当严。明治维新以后，改革了封建的藩主制，在氏族上依然保持着皇族、华族、贵族、士族之分。皇族是天皇的族系，华族是皇族的近亲，贵族是旧时藩主的后裔和新封建的公侯伯子男等，士族是旧时的武士(Samurai)的子孙。名义上虽然是四族平等，但不同族之间，照例不通婚姻。在这四族之外还有平民，平民之外还有所谓新平民。这新平民是

被一般人视同狗彘的。俗间的恶语称之为"Yotsu"，是"四条腿"的意思。日本社会上有所谓水平运动，便是这些新平民所组织的人权运动了。日本人对于新平民的歧视，恐怕和美国人对于黑种人的歧视相差不远。新平民事实上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门而居，可以彼此不打招呼。甚至新平民坐过的凳不愿意坐，新平民用过的碗不愿意用。这些忌避，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有点类似于不可思议的。那吗新平民究竟是什么人种呢？其实和通常的日本人一点也没有区别，有的就只这社会阶层的属性而已。但在士族与平民之间的界线，是不那么严的，彼此可以通婚姻，这或许是明治维新的唯一的社会变革吧。由士族与平民可以升而为贵族，但由平民升而为士族，却是永远不可能了：因为在爵位上已经没有武士的那一个阶段。

横田赞成我们就住在市川，他很慷慨地答应照拂我们，要去和他的朋友平田检事接头。他领着我们在他的住宅附近看了一些房子，但都是很简陋的，没有合适的地方。在附近相隔只几十步的一条侧巷里面，有了一家出租的平房，很旧，只有三间房间，一间比较大，另两间都很小，而最坏的是不见阳光，但取其相隔得很近，我们便勉强把这房子订下来了。

我们当天还被横田留着吃了一顿午饭，这在日本可以说是异数的招待。在吃饭的时候，横田有一位妹子和她的丈夫从东京赶了来，他们是应了横田的邀约来和我们见面的。原来这位妹子在仙台读女子高等学校的时候，也正是安娜在教会学校读书的时候，她们彼此是知道的。这位妹子，一眼看去，

便可以知道她过的是很放纵的生活，不是新式的摩登，而是旧式的糜烂。她和那位丈夫倒是十分配合的。那是不折不扣的一名日本式的流氓头子，听说他可以号召千百把人的部下，日本话所说的“子份”。他的身子是标准的日本式，矮促而粗犷，有点象一条野猪。他的姓也姓得稀奇，就叫着袋猪，日本音读为Fukuroi（虎苦罗野）。（日本人用汉字的“猪”就代表野猪，普通的家猪，他们是称为“豕”或“豚”的。）

这位袋猪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坏，但他相当客气，没有说什么话。只是说，假如有需要他的地方，他很可以帮忙。我对他是取着戒心的，心里倒暗暗地在私自庆幸，幸好这位豪杰不是住在市川。

安娜经过视察的结果，她对于市川相当满意，于是在视察后的第三天上，我们便由品川一直迁到市川来了。

横田的尽力自然是值得感谢的。经他的奔走和说项，得到平田检事的同意，以为我可以不必声张，只消和地方上的负责人接一个头便行了。平田还写了一封介绍信，把我介绍给当地的地方检事樋口（Higuchi），由横田陪伴我去见了他。他原来也是六高出身，和我是先后同学。这位樋口检事又亲自领着我们去和市川的警察局长见面，说明了我寄居的来意。日本的警察是要受检事的指挥的，普通要逮捕人或搜查人家，没有检事的传票，警察论理是不敢专擅的。经了检事亲自出马的介绍，警察局长当然是奉命唯谨，没有第二句话好说了。为孩子们进学校的事，他们也愿意帮忙。市川是有一座两级小学的，但不曾收过外国学生。为孩子们不受同学的歧视起

见，他们建议不妨用他们的母姓。这是在他们官宪的同意之下作假的事情，我自已当然也同意了。

事件的进行，就这样一切都非常顺利，顺利到连自己都感觉着稀奇。这是怎么的呢？日本人怎么会这样放松我呢？平常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分，都是暗暗地受着监视的，凡是有留学生居留的地方，不怕就是在冈山或者福冈那样的乡下，都是有一两位刑士（日本的便衣警察）专门设来照管我们的。我现在已经不是学生，而是一位亡命之徒了，怎么反而这样受着优待呢？日本的统治阶级，是比以前更开明了吗？不，当时正是日本的思想统治开始走向极端反动的时候。曾经盛极一时的左翼文学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介绍，逐渐受着摧残。特别是所谓"三一五"事件，即三月十五日对于日本共产党的大检举，就是我搬到市川来不出十天内的事。我要算是在逆流中游泳着的，而一切却是出乎意外的顺利，这不是足够稀奇的吗？

在市川住定之后，我和国内的朋友通起了信来。东京有些熟朋友的地址我也知道了，我也时而往东京去。我会见过钱介磐和杨贤江①，他们也都是到日本来亡命的，都改换了姓名。还听说有好些朋友是躲在京都和长崎一带。贤江曾经警

① 钱介磐（1889—1938），原名城，又名亦石，湖北咸宁人。北伐时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参加组织上海工人起义。著有《中国经济史》等。 杨贤江（1895—1931），字英甫，假名李浩吾，浙江余姚人。教育家。一九二七年参加组织上海工人起义，大革命失败后旅居日本。著有《新教育大纲》等，译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告过我：日本不可久居，我的相片，乃至全家的相片，都曾经在日本报纸上登载过，是被视为"左派的要人"的。介磐也是同样的见解，他自己不久便由日本的敦贺港(Tsuruga)渡过海参威去了。董必武①和林祖涵去苏联，听说也都是走的这条路。

在介磐还没有离开东京的时候，有一次我到他住的寄宿舍里去，那是在早稻田大学附近，里面住着很多的中国留学生。我在他的房间里的时候，有好些同住的人也都来了，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晓得介磐就是介磐，晓得我就是我的。其中有一位突然提起了郭沫若来，有点伤感地说，不知道郭沫若到什么地方去了？另一位却毫不犹豫地回答：郭沫若是被关在南昌的监狱里的，是朱培德把他抓起来了。有一位更说已经牺牲了。我和介磐听了，只好彼此看了一下。

不久成仿吾也从国内来了，他在市川的寓里住过几天。据他说，就在那"三一五"事件之后，国内又流布过这样的谣传，以为我被日本政府递解回国，已经遭了大辟。北平的报纸上还登载了这样的消息，标题是"郭沫若成了断头之鬼"。这便激起了很多年青朋友的悲哀，有的人还做过很长的诗来追悼过我的。

我能够不感奋吗？国内国外的年青朋友们这样对于我关心，不是他们给予了我无上的安慰和鼓励，不是他们使我感觉

① 董必武(1885—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北伐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湖北省政府常委兼农工厅厅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赴苏学习。

着有强有力的支柱在扶持着我吗？无论在怎样环境中，你得拿出勇气和耐心来，更坚毅地生活下去。你虽然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工作岗位，你不应该专门为全躯保妻子之计，便隐没下去的。

由于成仿吾的来，我得以详细地知道创造社的工作情形，《文化批判》一出版之后，在文化界和思想界，燃起了弥天的烽火，很热烈地受到了青年的拥护。我听了是很兴奋的，但朋友们的一种严烈的内部清算的态度，是由于我多活了几岁的关系吧，我始终认为总有点过火。我在上海时，邀请鲁迅、蒋光慈和其他朋友们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合战线的打算，不仅完全被扬弃，反而把鲁迅作为了批判的对象，让蒋光慈也被逼和另一批朋友组织起太阳社①来了。于是语丝社、太阳社、创造社，三分鼎立，构成了一个混战的局面。仿吾也开始感觉着矫枉有点过正了，他说他在动身之前，曾经提议过组织作家联盟，把分裂的局面再结合起来，抵御那可能到来的外界的压力。他这个建议我是极端赞成的，但我是身居海外的人，仿吾也要到远远的欧洲去了，我们对这建议的促成上都无能为力。——这个建议到后来——怕是在一年之后吧，是被采纳了。我当时曾经把《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捐献给联盟②，把那书的版税作为联盟的基金。凡是参加过那初期活动的朋友们，对于这个小小的往事，应该还有人能够记忆吧。

---

① 文学团体。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成立于上海，次年一月出版《太阳月刊》，提倡革命文学。一九三〇年"左联"成立后，解散。

② 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由于仿吾的来，因为他曾经访问过东京的一部分左翼作家，因此也有左翼朋友到市川来回访，我自然连带着也被访问了。我住的地方简陋，没有可供谈话的地方，便每每借横田家的西式客厅会客。记得有一次是战旗社①的两位作家来访，一位是藤枝丈夫，还有一位地位比他高的，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姓名来了。他们详细地问了些国内的文艺运动的情形，仿吾也照实报告了。仿吾是一位极端朴讷的人，他的话平时都是过分俭约的，应该说十分的他只肯说一分，应该说十句的他只须说一句。他根本不会宣传，更说不上自我宣传了。但在从事左翼运动的人，在初期总不免有些人要犯着夸夸而谈的毛病，似乎是普遍的超越了国界的倾向。那一次的会面，被记录了出来，在《战旗》杂志上发表了，那是藤枝丈夫的手笔。他说到成仿吾的赴欧洲，是"中国无产阶级选出的文化代表"，又说到一位文化巨头的K(感谢他没有写出我的姓名)宣说"鲁迅在中国文坛受着清算"。我知道这是要出岔子的。果然在鲁迅先生的一篇杂文②上，不久便生出了反应，他是含着愤慨地奚落了仿吾，并奚落了我。在鲁迅先生要生气是势所必然，但把底细说清楚了，在仿吾和我都不能负责，也是理所当然的。

仿吾的赴欧洲，也是经过了由敦贺到海参威的那条路线。他很有意思要我和他同去，我也很有意思想和他同去，但我可

① 即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机关刊物《战旗》的编辑出版机构。

② 指《文坛的掌故》。该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海《语丝》周刊第三卷第三十四期，后收入《三闲集》。

能吗？拖着一大家子人，不要说旅费和生活费大成问题，就是要在日本办出境证，也决不是容易的事了。

四

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使它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朋友的努力，是有不能抹煞的业绩存在的。鲁迅自己已经很坦白而公平地说过这样的话："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其实就是我，也是实实在在被"挤"的一个，我的向中国古代文献和历史方面的发展，一多半也就是被这几位朋友"挤"出来的。

辩证唯物论是人类的思惟对于自然观察上所获得的最高的成就，那是毫无疑问的。但只是作为纯粹的方法来介绍，而且生硬地玩弄着一些不容易消化的译名和语法，反而会在这个方法的接受和运用上增加阻碍，也是容易理会的事情。中国现代化的普遍落后，连初步的科学知识，都还没有十分普及，在物质上虽然已经被外来的资本主义吮吸得几乎成了瘫痪，而在思想上却俨然横亘着一道难攻不破的万里长城。一句老话：国情不同。不是旧有的东西，不要说辩证唯物论，就是机械唯物论都是排斥着的。要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使

得一般的、尤其有成见的中国人，要感觉着这并不是外来的异物，而是泛应曲当的真理，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已经有着它的根蒂，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循着那样的规律而来。因而我的工作便主要地倾向到历史唯物论这一部门来了。我主要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这种工作的动向，虽然由于我的教养和所处的环境有以促成，但确实是经过后期创造社的朋友们的"挤"，我也愿意很坦白而公平地承认的。

在逐渐高涨的逆流中，住在一个乡村的陋巷里面，我在开头的几个月，主要贪读了一些书，不仅是科学的文艺论，更广泛地涉猎到了一般的意识形态：哲学、经济、历史等等。到了七月底，离开祖国已经快半年，我的写作的欲望动了。我感受着一种迫切的冲动，想把小时候背得烂熟的《易经》来作一番研究。我感觉着那所包含的宇宙观是符合于辩证式的与唯物论的。它把自然界看成为一种流动的过程，是一种"变化不居，周流六虚"的东西。而且它还探索到了那变化的原因是矛盾的对立，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由太极而两仪，由两仪而八卦，那不和细胞的倍数分裂巧合吗？尽管它是穿着一件神秘的衣裳，而且多是在粗糙的观察中夹杂着过量的想象成分，但在两三千年前，有了那样一个有系统的组织观念，那是值得拿来作为对象加以阐发的。但中国的古书我一本也没有。市川没有图书馆，虽然有些小书店，都是卖些应时的书籍

杂志之类，决不会找出《易经》来的。要看这样的书，要买这样的书，那是只有跑东京了。

东京有很多的旧书店，大抵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神田区，一个是东京帝国大学所在的本乡区。我在一天下午，就在本乡三丁目的一家旧书店里，花了六个铜板，买了一部日本版的《易经》。那是在前的水户藩的藩学读本，虽然有些日本式的句读点，差不多完全是白文。但我所需要的正是这白文，我没有多的工夫和兴趣去和前人的注疏作纠缠。这书还有一种好处：上下两册把经同传整个分开来了。这也正合乎我的需要。把这书买回家，费了六天工夫，我便写成了那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后来是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篇，被收入了的。

是文章写好后的第二天，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是八月一号。吃了中饭不一会，我因感觉头痛，正面起地铺来在休息的时候，有六七个人的脚步声，气势汹汹地窜进了“玄关”（日本房屋的大门）。安娜前去应接的时候，已经有两三个人闯进房里来了。看见我在睡，一个粗糙地说：“哦，生了病吗？”我已经撑起身子来了，一眼看去，就晓得他们是便衣警察的“刑士”。那种警察虽然穿着便衣，其实也都是穿着一色的制服，不过那制服不是普通警察的形式，而是黑羽纱的西装而已。来人的一位说，他们是东京警视厅派来的，有事情要请我到东京去谈话。我知道事情不妙，然而也感觉着应该到来的一个瞬刻毕竟是到来了。我起了床，没有多说话，便答应和他们同去。当我在“玄关”穿皮靴的时候，我看见了市川的一位常见的刑士

立在门外，他有点难乎为情的样子。看来这一批东京来的豪杰，是在市川的警察局里打了招呼来的；我居留市川的经过情形，他们是应该打听到了。因此安娜一方面在和他们分辩，想阻止我去，又想和我同去。我把她劝止了。我说：即使有问题，断不会枪毙我的，还是和孩子们留在家里的好。

我带了少许的零用钱出了门，刑士中有三两个人跟着我走，其余的留下了。我知道他们是要搜查我的住宅的。随他去吧，我也没有什么秘密，并也没有抵触到你日本的什么！

上了电车，跟我的却只剩下一个刑士。大约他们看见我没有拒捕的情势，是放了心的吧？电车在过江户川的铁路的时候，那个刑士在旁边突然和我打起话来。他称赞我的日本话很到家，简直和日本人差不多；又恭维我对于东京的地理很熟悉。他的意思我是懂得的。我想起了初到市川访问横田时，村松告诉我的话：象这样交界的地方，出了刑事案件是最麻烦的。哼，好家伙，你在把我当成罪犯啦！天理良心，我熟悉什么东京地理呢？但我没有理会他。

到了东京，被引到日本桥区的警察局。为什么要引到这里呢？上楼，引进一间长方形的房间，当中放着一条餐桌，是会议室的布置。在餐桌的那一端，坐着一位脸色苍白的绅士，刑士前去和他打了一番耳语。他们叫我在一边坐下，便一阙走进侧室里去了。不一会，他们又走出来了。苍白绅士仍然坐在先前坐过的位子，我坐在他的右侧，和我同来的刑士坐在我的对面。他们开始审问起我来了。

我却先问了那绅士的身份，旁边的刑士代替他表白：是警

视厅的外事课长。（姓名，对不住，我已经忘记了。他是东京帝大的法学士，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课长的神气相当俨然，他用第二人称“Kimi”称呼我——多谢他还没有用到“Omai”。日本话的第二人称是有等级的，尊敬你时称为“Anada”，鄙视你时称为“Omai”（有时也是爱称），平等视时称为“Kimi”。（学生彼此间多用之。）但我们初次见面，他不用敬称而用这种平等的称谓，其实也就是鄙视了，因而我也就“Kimi”了他。

他问得很详细，问了我的履历，还问到安娜的履历，这是没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我一一都告诉了。

问到我来日本的经过，我也一一告诉了。

他只抓着我的一点，问我为什么要假名为吴诚？这不证明我有什么秘密的使命，企图瞒过日本的警宪吗？

其实这是无关痛痒的，我要用假名是备上船时瞒过上海的警宪，并不是对于日本有所企图。我住在市川，虽然没有公开用我自己的本名，但都是经过了检事和警察局的同意。到了日本以来快半年，我也没有做过对于日本不利的丝毫的活动。总之，我是坦然的。

苛烈地反反复复地问，问，问了我足足有三个钟头。天渐渐黑下来了，问的人似乎也有点烦腻了，两个人又退进侧室里去了。这次出来的就只有刑士一个人，他要我跟着他走，我满以为大概可以自由了。刑士把我引下了楼，但不朝大门走，而是领着我向相反的方向走。我知道，他是要拘留我了。哼，随你去吧！果然，他把我引到黑洞洞的一个角落里，交给了守着

一道小门的两位警察，刑士各自走了。

两位警察押着我进了那道小门，里面就象地下室一样，特别地暗黑。进门的右手角落里，由两张条桌隔成了一个区域，一位看守人坐在条桌后面。在这儿把我的姓名记录下来了。两名警察把我身上所有的零件都搜出。我的西装是鱼骨纽扣，用铜铁撇上去的，他们也把那些取下了。要我解下皮带，更检明了我的贴身短裤不是用绳索拴的，那看守的人拿了一束稻草给我，要我把来作为裤带的替用。我开始莫名其妙，而且有点不耐烦地想冒火了。但我忽然了悟到：哦，这一切的一切，是怕我自杀。我不禁悯笑了起来，你是这样的慈悲！却为什么无原无故地要把人关在狗洞里？

检验停当了，看守指着进门左手的一间小房，要我进去拿睡的东西。我在踌躕着，倒是一位警察替我取了两床军用毯来，塞在我的手里了。是棉制的。

警察退出门去了。看守走出他的圈域来，把我带到右侧的第三号的监房门前，他把锁开开，一手推着门，一手把我推进门去，向房里面的人打着招呼：

——Hagematsu tanomu！（秃松，麻烦你！）

房里挂着日本式的绿色蚊帐，从蚊帐里有人答应了一声。门在后面关上，又上了锁。

秃松从帐子里面伸出了一个头来，是秃的。他低声地说："Dozo，dozo（请，请）！"一面把自己垫的毯子折成双叠，向里面推，替我留出空位来。他看我在踌躕，便索性从我手中把毯子接过去替我面好了。不断地比着手势要我睡下去，我也勉

强照着他的指示睡下去了。我直觉到他是没有恶意的。

有生以来受到第一次屈辱遭遇，在我当然是不习惯的。我有点朦胧，也有点兴奋，更有点愤慨，情绪很复杂，说不出所以然。

监房是长条形，广可六尺，深可一丈。左右两壁是砖墙，前后两面是铁窗。面积刚好够睡两个人。照我进拘留所时的一瞥，这样的监房，共有二十间光景，左右各十间，是两两对称着的。中间有一道木屏挡着，使相对称的监房里的人，不能够相望。

在毯子上睡着，倒还好，并没有什么臭味。臭虫、虱子之类，似乎也没有。我静静地睡着，怕触着旁边的秃松，但却怎么也不能睡熟。我首先担心的就是市川家里的情形，安娜和儿女们不晓得怎样了？日本人到底要把我怎样呢？把我移交给中国政府吗，或者把我驱逐出境？一面先通知中国，等我一上岸便被捕吗？再不，把我正式丢监？把我不明不白地暗害？……这些问题，很执扭地来纠缠着，确实不是我在想，而是它们自己来。一个脑子就象饮茶过多了的一样，愈来愈是清醒，是一种不愉快的烦恼的清醒。头却一点也不痛了。还是暑天啦，然而夜却是特别的长。睡在旁边的秃松的鼾声，时而象闷雷一样，在那沉闷而燠热的空气中，有规律地吼着。别的监房里，也有吼着鼾声的。

鬼子，你侮辱了我！我爱了我的祖国，我爱了我祖国的人民，这就是罪吗？是的，这就是罪，你不单侮辱了我，你更侮辱

了我的祖国！侮辱了中国人民！

眼泪涔了出来，不是我想哭，而是眼泪自己来。整个中国睡在那个狭隘的监牢里，整个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民，都睡在那个狭隘的监牢里了。

睁着一双眼睛，整夜没有睡。唯一的希望是赶快天亮。好不容易发亮的天，到头也还是亮了。

大概是五点钟的时刻了，我忍耐不过，轻轻地坐起了身来。那晓得睡得稳稳的秃松，他也一翻身起来了。我向他道歉：对不住，把你惊扰了。

——不，他摇着手。很迅速地便叠好毯子，把蚊帐也拿下来叠好了，并且还把我的毯子也帮忙叠在一道。

这秃松是一位矮个子，面孔呈着古铜色，虽然已经是五十以上的人，却显得很精干。他姓松井(Matsui)，因为头是秃的，所以便被人叫着秃松。他知道我昨晚上没有睡熟，他很鼓励我，叫我把心放宽。把两手在心口上摩一摩，又坦开来。

在拘留所里原来是不准人说话的，说话时只好放低声音，或者比手势。我的两耳重听，有时秃松的声音说得大些，于是看守便立刻怒骂起来了。

六点钟的时候，看守来开监门，把人放出去洗脸和大小便，有三十分钟的时间。便所和盥洗所都是附设在拘留所里的。这是一天中唯一的一次开放。过了时刻，又依然关进房里。放出是挨着号数的。

我出监房门的时候，瞥见左手的邻室里关着一位青年，脸色惨白，头发已经有两寸多长了。看那情形象是一位大学生，

关了怕已经有两三个月了。我断定他一定是一位左翼分子。

又被关进房里之后，不一会，从房门下的一个四方形的狗洞里，送进了两匣饭来。秃松很有精神地把饭移过来，劝我和他一同吃。饭是黝黑的，似乎有点发酸了，菜是两片风萝卜。我在昨晚上虽然不曾用饭，但一点也不感觉饿。秃松尽力地鼓励我，要我吃，他说身体要紧。我也只得勉强地吃了几口。

房间里，只面着一张日本式的草席“塔塔弥”，靠里窗的一段是木板。两个人就象一对猩猩一样，蟠着脚，凭着墙，坐在那草席上面。秃松的精神很好，他是很泰然的。同他住了半天，我得到了很多的经验。

据他说，我的情形是很轻的，只是普通的拘留，一个对时。他是检束，检束就要关二十一天。他已经在那里关了十天了。

他是一位做米生意的人，但为什么被关，他却没有说。他说那日本桥的拘留所，在东京要算是最上等的了。言下表示着他自己也是上等人的那种神气。有些下等的地方，一间这样窄的房间里面，要关二三十个人，那是等于火柴匣一样的，不用说，连坐都坐不下。据我看来，他可算得是一位老资格，似乎东京市内所有的拘留所，他都是住过的。

他叫我要强硬，要强硬。把两手撑着腰，挺直着比一个强硬的姿势给我看。他说，你的处分，顶多不过是敕命退出。你是外国人，日本的法律是不能制裁你的。

他想尽了种种的话来安慰、鼓励我，我真是出乎意外地，在这儿遇着这样的一位好人。这样的一位好人在东京却是“常习犯”，把东京的拘留所都是住遍了的。

在十一点钟的时候，看守来提我，要我出去。秃松表示着向我庆贺的意思，在他认为我是可以自由了。我向他告了别。

在拘留所的门口，看守把昨晚搜查去的东西又交还了我。我被门外的警察领导着，又从昨晚上走过的原路走上楼去。依然是受过审问的那一间会议室。这一次外事课的课长没有来，代替他的是一位胖子，很有点和袁世凯相象。另外的一位，是昨天送我来的那个刑士。他们又开始审问我起来，但和昨天所问的并没有两样。

提出了些新的问题，问我认不认识钱亦石（就是钱介磐的改名），我答应认识。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他在东京。问他的住址，我也把住址告诉了他。袁世凯把他的手册取出来对了一下，没有再问了。但那时候，钱亦石已经老早到了海参威了。

他又问到成仿吾，我揣想到仿吾给我的一封信，是被他们搜查了去的。那是一封很长的信，怕有三四千字。仿吾由敦贺港渡过海参威，经由西比利亚铁路，一直经过莫斯科，到了柏林。他从柏林把他沿途的所见所闻，很详细地写给了我。那时苏联的革命成功才仅仅十年，旧俄时代的一些不好的风俗习惯，还多分地保留着，仿吾也就很不客气地加以一些批评。这信落在了他们的手里，是一件很可惜的事，然而对于我的现状却是很有利的。日本人所高兴的就和今天的美国人一样，是你肯批评苏联，只要你肯批评苏联，那你就好象减少了危险性了。我因而也把成仿吾的详细的情形告诉了。

问了有一个钟头的光景，他们替我叫了一客西餐来请我

吃。我肚子实在有点饿了，便放怀地吃了。我吃了，要付钱的时候，他们说是请客，我倒完全出乎意外了。但我委实也高兴了起来，今天总算可以自由了。

饭吃过了，那位袁世凯先走，又由刑士把我引下楼去，再度出乎意外地依然把我引进了拘留所。

进拘留所后，照例又是昨天的那一套，看守又把我关进了秃松的那间房里。秃松这一次倒显出诧异了。他等看守去远了，又偷偷地问我出去后的情形。等他听完之后，他开始发起愁来了。他说：这事情有点蹊跷，可能你会受长期的拘留的。

他告诉我：照日本的法律，被拘留只有二十四小时。因为假使有罪，二十四小时之内便该起诉。但日本的警察，却可以有办法永远拘留你。那便是每天把你引出拘留所一次，引出后再把你引进来，那又算是第二次的拘留了。就这样象猫儿吃老鼠一样玩弄，让你连续地被拘留，永远不会超过二十四小时。

这说得我已经暗淡的心境更加暗淡了。

在我被引出去的时候，我越过木屏看见了对室里面的一位熟人。那是小原荣次郎(Obara Eijiro)，是内山完造的一位很好的朋友。他开了一座商店，就在那日本桥警察局的对面，叫京华堂，贩卖些中国杂货和中国的兰草。他早年和内山老板一样，也在中国境内做过小贩。他是在东京与上海之间时来时往的。(鲁迅的《集外集》里面有一首《送 O.E.君携兰归国》的诗，便是这个人了。)我到日本后，创造社每月送我的生活费，是由小原划拨的。创造社把钱交给内山，小原在东京把

钱交给我，因此我们便常有往来。

这是使我费解的事，是我连累了小原的吗？连小原都被连累，那连累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了。

我已经没有昨天那样兴奋了，这或许是习惯了的原故吧。我索性死了心，管他妈的，就让他永远拘留。

1947年，上海

我是中国人

一

在东京桥区的警察局里，被拘留到第三天上来了。

清早，照例被放出牢房来盥洗之后，看守人却把我关进另一间牢房里去了。是在斜对过的一边，房间可有两倍大。一个人单独地关在这儿，于是便和秃松分离了。这给了我一个很大的精神上的突击。我顿然感觉着比初进拘留所时还要抑郁。

和秃松同住了一天两夜，他在无形之中成为了我的一个支柱。白天他鼓励我，要我吃，要我运动，务必要把精神振作起来，免得生病。晚上他又关心到我的睡眠，替我铺毯子，盖毯子，差不多是无微不至的。

他真是泰然得很，他自己就跟住在家里的一样。有他这样的泰然放在身边，已经就是一个慰藉，更何况他还那样的亲切，那样的善良。我对于他始终是怀着惊异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然而竟公然有这样的人。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十月上海春明书店《今文学丛刊》第二本。

我憎恨着那个看守。那是象一株黄角树一样的壮汉，把我和秃松分开了。是出于他的任意的调度，还是出于有心的惩罚呢？同住在一道的时候，秃松是喜欢说话的，而我的耳朵又聋，因此时时受着看守的虎声虎气的干涉。大约就为了这，那株坏材便认真作起威福来了吧？不管怎样，这对于我的确是精神上的一个打击。

房间已经够大了，一个人被关着，却显得更大。但这儿却一点也不空洞。虽然四面是围墙，除我一个人而外什么也没有，但这儿是一点也不空洞的。那四围的墙壁上不是充满着人间的愤怒、抑郁、幽怨、号叫吗？那儿刻满着字画，有激越的革命口号，有思念家人的俳句，有向爱人诉苦的抒情诗，有被幽囚者的日历。那些先住者们不知道是用什么工具刻划上去的，刻得那么深，那么有力！

盘旋，盘旋，盘旋，顺着走过去，逆着走过来，我成了一只铁栏里的野兽，只是在牢房里兜圈子。偶尔也负嵎，在草席上胡坐一下，但镇静不了好一会，又只好起来盘旋着。……

上午十时左右，看守来开门了："喂，出来！"他向我吼了一声，我出了牢门。照例又在看守处把裤带、衣扣、钱包等交还了我。我明白我又要被放出去晾一下了；过了一会，依然会被关还原处的。

走出拘留所后，同样被一位武装警察，把我带着上楼，进了审问过我两次的那间会议室。这次却有四个人在等着我。那位袁世凯坐在长桌的一头，旁边坐着从市川押解我来的那条壮汉。另外，又添了两个人：一个有点象朝鲜人，我记得是他

最初踏上了我市川寓里的居室的，他和壮汉同坐在一边；另一个是第一次见面，瘦削得跟猴子一样，他却隔离着坐在对面通侧室的门次。

依然是袁世凯的那一位主讯。问的还是前两次的那些话。他手里有着一张纪录，要我阅读一遍，又问我有没有错误。我阅读了，承认没有错误。他要我签个字在旁边，我签了。他又要我打一个指印，我也打了。于是他指着那位瘦猴子说：这位是司法主任，他要给你照几张相片，回头还有话给你说。

于是那司法主任按壁上的叫铃，又有武装警察进来了，他吩咐带我去照相。我起来走动着，四位也跟着我走。走到了楼下的一间光线很充足的房里，司法主任用一张白纸写上了我的名字，要拿来撇在我的胸上。我拒绝了。我说：对不住，我并不是犯人。猴子脸痉挛了一下，准备发作，袁世凯却来缓频：不要紧的，可以折衷办理，把这纸条贴在这椅背上，不要撇在胸上。我想，这不还是一样吗？但你不让他照吧，他也有办法把你的名字写在胶片上的，我也就随他去了。照了正面，照了左右两侧面，又照了背面，一共四张。照得竟这样周到！这是什么意义呢？已经把我关着了，难道还怕我逃跑的吗？我在这样想着。

相照好了，又把我带上楼，又进了会议室。这次的袁世凯却和颜悦色地向我说起话来了：今天你可以回家了，但在走之前，司法主任要给你讲话。

这一突然的宣告，使我出乎意外，就这样便放我出去了

吗？我心里明白，一定是安娜在外边的奔走收到了效果。但我心里却也没有感受着怎样的快活。照相的意思，我到这时候也才完全明了了。原来是想把我释放进更大范围的监视里去。

猴子开始说话了，俨乎其神的一个"训饬"的样子——这是我后来才知道，凡是被检束或拘留的人，在被释放的时候，要被司法主任严烈地"训饬"一顿。

他说：本来是打算更挫折你一下的，但念你有病——他插问我一句："你不是头痛吗？"我倒把这件事情忘了，起初被抓来时，的确是在头痛的，但关了两天两夜，头痛倒老早忘记了。——因此提前释放你。(好家伙，你完全把我当成罪犯！)但你要明白，日本警察是不好惹的。你在我国做一位客人，要做一位循规蹈矩的客人，我们会保护你和你的眷属。假如你有什么不轨的企图，我们随时可以剥夺你的自由，甚至你的生命！(好家伙，你有杀人的本领！)好，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一切事情你自己应该明白，多余的话，我也不必向你说了。

这样经了一番"训饬"之后，案件表示结束了。我便向袁世凯发问：我是不是就可以走？

——不，不要着急啦，还要请你吃中饭。袁世凯更加和颜悦色地说，他倒在窗下的一个沙发上去了。

其余的也跟着解除了精神上的武装，和我开始漫谈起来。

原来那位象朝鲜人的，懂得几句中国话，在外事课中要算是"支那通"，为了奉命调查我的下落，他足足苦了半年。警视厅晓得我是到了日本，但不晓得我住在什么地方。他们也怀疑

到吴诚就是我，因为那位到东京考查教育的吴诚，一从神户登陆之后，便失掉了去向。他们甚至打过电报到南昌大学去询问。支那通不胜惊异地说："真是稀奇得很！那边回电报来说，有这位教授吴诚。"这自然是出乎意外的巧合，我当初用这个假名的时候，的确是随意捏造的。支那通提到了仿吾给我的那封长信来，那信果然被他们检查了去，他为翻译那封长信，弄得两晚上没有睡觉。我到这时又算弄明白了一件事，就是这家伙的中文程度太蹩脚，使我在拘留所里多住了一天一夜。

支那通从他的提包里面把信拿了出来，红笔蓝笔勾涂满纸，但有好些地方他依然不懂。他要我讲解，我给他讲解了。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文言文是比较容易领会的，因为他们积了一千年的经验，有他们的一套办法，读破我们的文言文。但他们拿着白话文便感棘手，很平常的话，都要弄得不明其妙。那封信，支那通说：他们要留下来做参考，希望我送给他们。这分明是强盗的仁义，我也慷慨地答应了。我想，假使东京的警视厅没有被炸毁，那封信或许到今天，都还被保存在他们的档案里的吧？

端了两碗日本面来，是一种没有肉的粗条面，他们叫着"乌东"，汉字是写成"馄饨"的。我草率地吃了，我道谢了他们。这次可该我走了。我问他们：是不是还要送我回市川？那位押解我来的壮汉说："不了，你的地理不是很熟悉的吗？"我明白他的话里面是有意义的，但我没有再多说话，我动身走了。

那是阴郁的一天，走出了警局的大门，我看着一天的阴

郁，而这阴郁差不多是透彻着我的内心的。我自己很明白，我只是从一间窄的牢房被移进宽的牢房，从一座小的监狱被移进大的监狱。但我背后却留下了一样东西，那便是在拘留所中和我同住了一天两夜的秃松。我没有办法去向他告别，我很感觉遗憾。他以后在拘留所里面不会再看见我，我相信他一定会替我高兴，他会以为我是得到“自由”了。他是泰然的，但我能泰然吗？可惜我的旁边失掉了这样的一个泰然，而且是永远失掉了！

站在这警察局的门外，踌躕了好一会，我看定确实也没有什么人跟我，我便踱过街去。

京华堂就在斜对面的街上，我踱进那店里，打算去打听小原荣次郎的情形。我在这儿又看见了鲁迅写的那首诗：

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
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①

那是一幅小中堂，嵌在玻璃匣里面，静静地悬挂在账台旁边的壁上。小原老板娘出来了，态度很冷淡，而且有点不耐烦。我问小原，她说上半天才放出来，洗了澡，吃了中饭，在睡午觉。接着就开始了她的唠叨。但她使我弄明白了，原来火头就是小原。小原时常跑上海办货，因为有走私的嫌疑，受了警察的搜查，而在他那里，却发觉了他和我有往来，因此便受了两倍的嫌疑，而被拘留了。他被拘留了五天，要多我两天。

---

① 此诗作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二日，题为《送O.E.君携兰归国》。

这多了的两天是东京警视厅对我的暗访，和他们行文到市川警察局，正式会同拿捕，所费掉了的。在我被抓前两天的中午时分，有几个刑士样的人，曾在我住宅周围盘旋过，那一个疑团到这时也才冰释了。

老板娘很直率，她明白地说："小原在埋怨你，要你以后不要再由我们这里兑款子了。"小原在北伐期中曾经到过广州，那时他替安娜们照过一些相片，老板娘也取了出来交给我。她说："小原说的，打算给你们寄来，我现在就亲手交给你了。"我知道，他们是要乐得一个干净，免得将来再惹是生非的。我道了歉，并道了谢。但我揣想：恐怕老板娘还不知道我也被拘留了三天，我便告诉了她。她说："是的，我知道的。小原看见了你，也听见局里面的人说。"

于是我就象一只落水鸡一样离开了京华堂。想到村松梢风也可能是受了连累的，便乘电车到骚人社去。果然，他那一间在楼上临街的编辑室，坐满了客人，都是来慰问他的。"骚人"另外显示了一个新的意义，便是骚攘不宁的人了。村松完全失掉了他那娓婉持重的常态，非常兴奋地在向着客人们诉说他的经过。

原来在我被抓的那一天傍晚，他的编辑所也被搜查了。村松当时不在家，他的太太便被抓去做了人质。第二天清早村松自行去投局，才把太太换了回来。他们更不幸的是被拘留在神田区的警察局，便是秃松所说的"最下等的地方"。一间牢房里拘留着二十来往个人，村松和他的太太·各各在那样的猪圈里挤着坐了一夜。村松是在午前释放出来的。

村松和他的夫人对于我的态度都忽然地陌生起来了，他们的怨恨似乎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在座的客人都以异样的眼光看我。我感觉着我的周身时而在作寒作冷。这真是有趣，我是拿着中国钱到日本来过生活的，我犯了你日本什么呢？白白地关了我三天，受了无穷的侮辱，但谁也没有向我道过一声歉，仿佛我是罪有应得，而且我还自不知趣，跑来连累了别人。我知道，我是被眼前的人们视为瘟神了。

好吧，我就知趣一些！我匆匆地，差不多等于狼狈地，又从骚人社告辞了出来。我很想往品川去看看斋藤家的情形，但我再没有多余的勇气了。几天来的疲倦，一齐冲集了上来，脑子突然痛得象要炸裂。满街的日本人看来都象是刑士。我没有胆量去坐电车，我受不了那满电车的刑士的眼光。于是我在街头任意雇了一乘圆托，闭着眼睛便一直让它驶回了市川的寓所。

二

回到市川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家中的一切和往常一样，小的一个女孩子，照样的欢呼着跑来拥抱着我。因为她的母亲瞒着了她，她竟以为我是去旅行了回来，看见我没有带回些土产，倒表示了小小的失望。

安娜告诉我：我去东京后，以为当天晚上便可以回来的，没想到竟没有回来。第二天她才邀请横田兵左卫门同往东京，去访问那思想检事平田熏。据平田的表示也是没有问题

的，很快就可以回家。她到品川去过，斋藤家算没有受波及，虽然有人去调查过，但没有拘留他们。市川的警察局很客气，他们对于东京警察的越俎代庖，抱着不平。横田家也是安然无恙的。

这些对于我当然是很大的安慰，我为表示我的歉意和谢意，便和安娜一道去访问横田。

横田还是那样豁落着一双眼睛，把手障在嘴前面说话，但他也好象有点从梦里醒来的样子。他抱歉而又似乎讽刺地说，他的翅膀太小了，掩护不了我这个"鸵鸟蛋"。——他是这样比譬我，在他或许是出于恭维，而在我却是感着了侮辱。然而他也尽了他的至善，倒是事实，我自然是感谢着他的。他又说：也好，一切都扯开了，以后不会再有问题了。

是的，也好，以后还会有什么问题呢？我的行动以后一直是受着了两重的监视：一重是刑士，一重是宪兵。但事实上还不仅止这两重，而是在这两重之外，还有重重的非刑士、非宪兵的日本人的眼睛，眼睛，眼睛！

周围的空气的确是变了，邻人们都闪着戒备而轻视的眼光。那对于我倒还比较简单，对于安娜是应该更复杂的了。那分明是在说："你太不自爱，以一个日本女人，而嫁给支那人做老婆，而且是一个坏蛋！"

这是使人受不了的。因此我们便决定搬家，特别是安娜，搬家的心异常迫切。

当然我们也不能搬得太远，而且也不好搬出市川。就在真间区的北部有一带浅山，名叫真间山(Mamayama)。那山上

有一座佛寺，有茂盛的松林，也有可供眺望的一座亭子。我是时常带着孩子们到那儿去散步的。从那亭子上可以俯瞰市川的市容，遥望江户川的上下游和彼岸的东京郊外。就在那山脚下不远处，在供奉着女神“手儿奈”(Tekona)的神社旁边，我们找着了一间新造不久的房子，从地位、大小、房金来说，都使我们相当满意。在我从东京回来，不出十天光景，我们便搬到这儿来了。

这是一座相当僻静的家。它有一间书房，一间正室，一间侧室，附有玄关间、厨房和浴室。背着真间山，坐北向南。屋前有一条甬道，东西横贯。东头是大门，西头是一区水井地带。以短短的栅栏隔出后门，和外面的一带小小的死巷相通。经过那死巷可以通往街道。那便是北通真间山、南通市川镇的大道了。大门倒是向田野开放着的，隔不两家便是田畴了。大门内有一片园地，只在篱栅边种了些樱花树和夹竹桃之类，地面空旷着，在等待着居住的人把它辟成花园或者菜圃。这园地在房屋的东头，可接受全面的阳光，小小的书斋便是面临着这片园地的。书斋在东南两面开窗，窗外有回栏可凭眺，的确是可以够得上称为小巧玲珑。小巧处呢？是在它只有四席半的容积。我特别喜欢这书斋，我的那套三部曲：《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主要地就是在这儿写出的。

读过我《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人，应该还记得那里面有一篇《周金中的社会史观》吧？那是就周代的金文来研究周代的社会的。在那文章后面有这样的一行标注：“一九二九年十

一月七日夜，一个人在斗室之中，心里纪念着一件事情。"所说的"斗室"便是这座书斋了。心里所纪念着的是什么事情呢？那是和"十一月七日"那个日子有关联的十月革命。在三年前，我在武昌筹备纪念这个日子，就在当天晚上，奉命往九江、南昌一带去做工作。那些情形是活鲜鲜地在我脑中显现着的。

读过我《甲骨文字研究》的人，应该还记得那里面有一篇《释支干》吧？那书是我用毛笔写出来石印的。在那《释支干》里面有一段的字迹特别写得粗大（第三十九页），那也是我坐在这斗室里面，发着高烧，所力疾写出的痕迹了。当时因为昼夜兼勤的研究，昼夜兼勤的写，不幸着了寒，便发出了高烧。文字愈写愈大，结果终竟不能支持，睡倒下去了。

象这些往事，就在目前回想起来，都还感觉着颇有回味。还有好些往事是和这书斋、和这家，是有关的，因而我至今还忆念着这座书斋和这座家。

但这座家也有一点相当大的缺陷。在家的正南面是一家有钱人家的后园，有一间很高的仓库，劈面地立在玄关前面。这样，在冬天便把太阳光完全挡着了，而在夏天呢又要挡着南风。这便使住居的人，冬不暖而夏不凉。这所意味的缺陷是怎样大，在有多数儿女的母亲是特别感受着的。

不过在我倒满不在乎。尽管冬不暖，总冷不过零度以下的西比利亚，夏不凉，也总热不过赤道地方，而在我却有宁愿住在西比利亚或赤道地方的苦境。

初到市川的时候，因为向警察和市政当局打过招呼，他们倒委实宽大，对我的戒备是很松泛的。自从东京警察拘留过

我一次之后，他们却把我当成为“巨头”了，于是便特别增设了一位刑士来专门管我。我要到东京去他总是跟着我的。呆在家里的时候，隔不两天，他便要来拜访，扭着谈些不相干的话，消耗你半个钟头光景，他又各自走了。时间虽然只有半个钟头，但他留下的不愉快，至少可有你半天。

但这刑士的监视倒还比较容易忍受；因为他还比较讲礼。刑士来拜访的时候，总还走前门来，在玄关门口打着招呼。你理也好，不理也好，他是不敢上你的居室的。他的目的，只在看你的动静，看你是不是在家。只要这目的达到，在他便算尽了责任。有时有初来接任的刑士，恭敬的礼貌每每还要出乎你的意想之外。凡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候，旧的刑士要把新的刑士带来见面，那新来者因为是才从乡下来，没有见过大世面，他听说我是“巨头”，自然就愈见要必恭必敬了。日本人的平常用语和称谓，尊卑之间是大有分别的。同样意义的话，说得愈长，用的字眼愈复杂，便愈显示对人的恭敬和自视的谦卑。称谓呢，同样的一个你字吧，便有好多种。对于有官阶的人，文官自简任以上，武官自少将以上，便一律称为“阁下”了。我因为在政治部做工作的时候，曾领受过中将衔，他们便以为我是真正的武官，照例也就以“阁下”称我。在我虽然感觉着难堪，而在他们也倒是习惯成自然的。

有一次横田告诉我：乡下的刑士对中央的要犯是特别尊敬的。因为怕出了岔子，他自己的饭碗要打破。他叫我不妨试一试：凡有刑士跟你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提包交给他，他会给你提的。因为那样他可放心你不会跑，而你当然也就

算是得到一位义务跟班了。我照着这话试过，果然没有遭到拒绝。

又有一次，有初来的刑士来拜访，谈话间他客客气气地问我：阁下，你的部下还有多少人啦？

他自然是视我如同国内的一班军阀，自己虽然亡命在外，而每每有残留部队在国内的。我和他开玩笑，便举出了四个指头。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四个儿女。（我当时是只有四个儿女的。）

——哦，那不得了啦！——刑士吃惊地说：四万人吗？那可要很大一笔数目来办给养啦！

我心里好笑，但也随他去吧，就让他把我看成为四万人的头领。

这刑士的监视委实是比较容易受的，但最难忍耐的就是日本宪兵。

市川是大东京东面的桥头堡垒，虽然是一个小市镇，但有一个师团在镇守着。师部就在真间山的背后，有很大的一个练兵场，步、骑、炮、工、交通、辎重各种兵种都有。时常看见他们在操练，或整日地用大炮起轰。因此，在市川也有一个宪兵营驻扎着。我初来的时候，和宪兵没有关系，没有去打招呼。住了半年，他们也不曾注意过我。但自从我被拘留过一次之后，他们也把我作为监视的对象了。

我们一搬到了这新居来，凑巧地也就添上了这新的监视。这新来者却异常横暴。那是一位宪兵中士，往常在街头可以偶尔看见的，他便成为了我的主顾。开头差不多天天来，全不

打招呼，从那死巷里一直闯进后门，打从那甬道又一直走出前门。这是犯了家屋侵入罪的。在他们日本的国法上是不允许的事情，然而那闯入者却大摇大摆地行其所无事。在不知第几次了，是一天星期的上午，我正在走廊上坐着看报，那侵入者又来了。我忍耐不过，干涉了他。他索性从那甬道跨过短栅，跨上了正屋来。

——怎么样，——他咆哮着。我是奉命看管你的！

——岂有此理！你管不着我！——我也咆哮起来了：你犯了你们的国法！

——哼，你是支那人，我们的国法不是为"枪果老"（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恶称）设的。你有胆量就回你的支那去，我却有胆量就在你支那境内也要横行，你把我怎么样？

我的脑袋子快要炸裂了。他确实是在中国境内也可以横行的人；而我自己呢，连祖国都不能见容，我能把他怎么样呢？

安娜来解围了。她端着茶，并还把预备给孩子们吃的糖点送来奉献，我各自退进我的斗室里去了。隔着纸窗，听见她在向那宪兵中士款待。

——我的先生近来神经受了激刺，容易兴奋，请你不要介意。接着又说：你来看我们是很欢迎的，刑士先生们也时常来，但请以后不要客气，从正门进来好了。

低首下心地说得很婉婉，但幸好也还有些骨子在那里面。那宪兵吞吞吐吐地回答了一些，也各自走了。听那脚步声，是还有余怒未泄，在向我示威。

经过这一次的咆哮，倒也有些收获。那位中士后来不见

来了，另外换了一个。每逢来时，也从正门进来，打着招呼了。但他会随意跨过短栅，坐到回廊上来。

这也是这座新居留给我的一个极深刻的记忆。我只要一回想到它，那些宪兵们的身影，便要浮现出来。他们始终是穿着马裤的，脚上套着一双黑皮的长统马靴。有一个时期，我只要一看见那种长统马靴，我的神经就要发生作用，就仿佛有这种马靴在我头上践踏的一样。但我应该感谢这种马靴，我应该感谢那条死巷，我应该感谢那样位置着可以任人穿堂而过的家，是它们凑积起来，构成了一个机会，让日本帝国主义的横暴，虽是小规模、而却十分形象化地对我表演着。这所给予我的反应，是永远不能模棱下去的，它使我不能忘记：我是中国人！

三

在八月初，我研究《易经》的时候只费了一个星期，接着我又研究起《诗经》和《书经》来了。这回却费了半个月。在我把《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的初稿写好之后，我便踌躇起来了。读过我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人，请把关于诗书研究的那一篇的末尾翻出来看看吧。那儿是这样写着的："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初稿，十月二十五日改作。"初稿的写出至改作足足隔了两个整月，这所表示的是什么呢？这表示着在我的研究程序上，起了一个大转变。

首先我对于我所研究的资料开始怀疑起来了。《易经》果

真是殷、周之际的产物吗？在那样的时代，何以便能有辩证式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而且和《诗》、《书》中所表现的主要是人格神的支配观念，竟那样不同？《诗经》的时代果真如“毛传”或“朱注”所规拟的那样吗？他们究竟有什么确实的根据？《诗经》不是经过删改的吗？如是经过删改，怎么能够代表它本来的时代？《书经》我虽然知道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别，在今文中，我虽然知道《虞书》、《夏书》的不足信，但《商》、《周》诸篇，也是经过历代的传钞翻刻而来的，它们已经不是本来面目。——这同样的理由，对于《易经》和《诗经》也是适用的。毫厘之差可以致千里之谬，我们纵使可以相信《易》《书》《诗》是先秦典籍，但它们已经失真，那是可以断言的。因此要论中国的古代，单根据它们来作为研究资料，那在出发点上便已经有了问题。材料不真，时代不明，笼统地研究下去，所得的结果，难道还能够正确吗？

再次，我的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我这样所得出的结论，不仅不能够赢得自信，而且资料的不正确，还可以影响到方法上的正确。尽管我根据的公式是确切不移的真理，但我如果把球体的公式拿来算圆面，岂不会弄出相隔天渊的结果来？别人见到这结论的错误，粗率一点的，岂不会怀疑到球体公式的无稽？而这个公式的正确与否，事实上我在我所根据的资料中也还没有得到实证。那吗，我的努力岂不是拿着一个银样蜡枪头在和空气作战吗？

我踌躕了，我因而失掉了当初的一鼓作气的盲动力。但我也并没有失望，我把我自己的追求，首先转移到了资料选择上来。我想要找寻第一手的资料，例如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这样的东西，在科学进步的国家是很容易得到的，但在我们中国，却真是凤毛麟角了。我在这时回忆到了一九一六年前后。那时我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肄业，在学校图书馆的目录里面，曾经看见过罗振玉① 编著的《殷虚书契》那样的名目。我虽然不曾取来看过，但我猜想它会是关于古代的东西。我就凭着这一点线索，有一次（大约就在八月尾和九月初）便往东京上野图书馆去查考。

上野图书馆的藏书是相当丰富的，但专门书籍却很少。可我很幸运，就在目录里面却查出了有《殷虚书契前编》，而我便立地借阅了。一函有布套的四本厚厚的线装书，珂罗版印，相当讲究。书的内容，除掉书前编著者罗振玉的一篇简略的序文之外，纯粹是一些拓片。我虽然弄明白了那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字，而出土地小屯在洹水之南，根据《史记》《项羽本纪》知道是殷朝的废墟，所以这些文字便是殷代的遗物了。但那毫无考释的一些拓片，除掉有些白色的线纹，我也可以断定是文字之外，差不多是一片墨黑。

然而资料毕竟是找着了，问题我得读破它，利用它，打开

①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言，号雪堂，江苏淮安人。近代学者。曾整理清廷内阁大库档案，搜购大批安阳出土甲骨。辛亥革命后去日本，曾在那里整理甲骨。著有《三代吉金文存》等。

它的秘密。我这个进一步的要求，不能由上野图书馆来得到满足，它除了有这一部《前编》而外，其它同样性质的东西什么也没有。

于是我又想到了可以问津的第二个门路。一九一四年我初到日本，在东京本乡第一高等学校读预科的时候，曾经有朋友引我到附近的一座专卖中国古书的书店里去过。我记得那书店的名字叫文求堂。那书店有一个特色，是它有一个书房可以让买书的人去休息，看书，店员还要向你晋茶。那时因为我准备研究医药，和中国书没缘，后来也不住在东京，我也就只去过那么一两次。现在我对于它感觉着迫切的需要了。我往本乡区去找寻它。它就在本乡一丁目，离上野图书馆不很远，门面已经完全改观了。在前仿佛只是矮塌的日本式的木造平房，而今却变成黑色大理石的三层楼的西式建筑了。屋脊和大门顶上都点缀着一些中国式的装饰，看来有些异样，仿佛中国的当铺。

卖的中国书真是多。两壁高齐屋顶的书架上塞满着书，大都是线装的。两旁的书摊和一些小书架上也堆满着书，大都是洋装的。靠后左边是账台，右边横放着一张餐桌，备顾客坐息。后壁正中有一道通往内室的门，在那两侧有玻璃书橱，也装满着书。这书橱里的书，大都是一些线装影印的比较珍贵的典籍了。

店主人姓田中，名叫庆太郎①，字叫子祥，把文求堂三字

---

① 田中庆太郎(1880—1951)。

合并起来作为自己的别号，也叫着敹堂。（这是有点类似于儿戏，实际上敹字并不是“文求”二字的合书。）年龄在五十以上。他是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但他对于中国的版本却有丰富的知识，在这一方面他可远远超过了一些大学教授和专家。他年青时候曾经到过北京，就全靠买卖上的经验，他获得了他的地位和产业。大约在日本人中，但凡研究中国学问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这位田中敹堂；恰如在上海，但凡研究日本学问的中国人，没有人不知道内山完造的那样。我在当天走进这文求堂的时候，就在那餐桌后面，发现了一位中等身材的五十以上的人。没有什么血色的面孔作三角形，两耳稍稍向外坦出，看来是经过一种日本式的封建趣味所洗练过的，那便是这位书店老板了。

我去向他请教，问他有没有研究“殷虚书契”的入门书。

他说有的。立地便从一处书架上取下了两本书来，递给我。

那是淡蓝色封面的两本线装书，书名叫着《殷虚书契考释》，是天津石印的增订本。我翻开了书的内容一看，看见那研究的项目，秩序井然，而且附有字汇的考释，正是我所急于需要的东西。价钱呢？要十二圆。在当时这决不是菲薄的数目，而我自己的身上却只有六圆多钱在腰包里。我便向老板提议：好不好让我把六圆钱做抵押，把书借回去看一两天？

书店老板踌躇了一下，婉婉地拒绝了。但值得感谢的他却告诉了我一个更好的门路。他告诉我：要看这一类的书，小石川区的东洋文库应有尽有。你只要有人介绍，便可以随时

去阅览的。那东洋文库的主任是石田干之助[1]，和藤村成吉[2]是同期生啦。

真的，我真是感谢他这个宝贵的指示。他虽然没有慷慨地借书给我，但我是不能怪他的。因为那时候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我以一个陌生的外国人而向他提出了那样的请求，倒是唐突得未免太不近情理了。

我照着他的指示进行了。靠一位相识的新闻记者川上(Kawakami)的帮助，一同去拜访藤村。藤村在我们中国人中是有名的，他是日本文坛上的左翼作家，他和我有过师弟的关系。在冈山六高时代，他教过我一年的德文。藤村很恳挚地欢迎着我，介绍信不用说毫不推辞地便替我写了。我那时还没有公开地使用自己的本名，川上却把他自己在中国时所使用过的假名林守仁，又让我假上了。

东洋文库是日本财阀三轮系的私人图书馆，它是属于川琦[3]家的。川琦两兄弟，兄的一位购买了皕宋楼[4]的宋版书，成立了静嘉堂文库；弟的一位购买了曾充袁世凯顾问的莫理逊[5]的藏书，而成立东洋文库。兄弟两人，隐隐是东京学术界

① 石田干之助(1891—1974)，日本东洋史学家。一九一七至一九三四年任东洋文库主任。著有《欧美的中国研究》、《唐史丛抄》等。

② 疑为藤森成吉。

③ 应为岩崎。

④ 清末浙江吴兴陆心源藏书楼。所藏多为宋、元的旧刻旧钞本。一九〇七年全部藏书为日人岩崎弥之助运往日本，藏于东京静嘉堂文库。

⑤ 莫理逊(G.E.Morrison,1862—1920)，又译莫里森、莫理循，英国旅行家、中国问题专家。曾大量搜集中国古籍，一九一七年售予日本岩崎小弥太。岩崎氏以之为基础，创立东洋文库。

的保护者。莫理逊的藏书本偏于近代欧美人研究东方的著作，归入东洋文库以后，又添置了不少的新旧书籍。关于中国的地方志书、县志、府志之类的搜集，据说也是相当丰富的。

文库在小石川区的一条比较僻静的街上，三层楼的建筑，相当宏大。以白鸟库吉① 博士为主帅的日本支那学者中的东京学派，是以这儿为大本营。白鸟本人(他便是法西斯外交官白鸟某的父亲)除在东京帝大担任教授之外，在这儿有他的研究室，经常住在这儿的三楼。他的下边的一群学者，大多是受了法兰西学派的影响，而又充分发泄着帝国主义的臭味的。对于中国的古典没有什么坚实的根底，而好作放诞不经的怪论。有一位著名的饭田忠夫博士，便是这种人的代表。他坚决主张中国人是没有固有文化的，所有先秦古典，一律都是后人假造。中国的古代文化，特别关于星算之类，是西纪前三三四年(战国中叶) 亚历山德大王东征之后才由西方输入的。因此凡是古文献中有干支之类的文字，在他认为尽都是后人的假托。甲骨文和金文里面的干支文字极多，而这些东西都是在西纪前三三四年之前，不用说也就都是假造的东西了。这样的论调与其说是学术研究，宁可说是帝国主义的军号。东京学派的人大抵上是倾向于这一主张的，因而他们对于清乾嘉以来的成绩，不仅不重视而且藐视。关于甲骨文和金文之类，自然也就要被看成等于复瓿的东西了。

---

① 白鸟库吉(1865—1942)，日本东方学家、文学博士。一九〇八年起主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历史调查室”，执行日本政府对中国东北及朝鲜的文化侵略政策。著有《西域史研究》等。

我所要研究的正是他们所藐视的范围。因此，我在人事方面，除掉那位主任石田干之助之外，毫无个人的接触。而在资料方面，更是河水不犯井水。在那文库里面所搜藏着的丰富的甲骨文和金文，便全部归我一个人独揽了。

一个事情看起来好象很艰难，只要你有决心，干起来倒也很容易。在当初，我第一次接触甲骨文字时，那样一片墨黑的东西，但一找到门径，差不多只有一两天工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这倒也并不是我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而我是应该向一位替我们把门径开辟出来了的大师，表示虔诚的谢意的。这位大师是谁呢？就是一九二七年当北伐军进展到河南的时候，在北平跳水死了的那位王国维①了。

王国维的存在，我本来早就知道。在他生前，我读过他的一部《宋元剧曲考》，虽然佩服他的治学方法的坚实和创获的丰富，但并没有去追求过他的全部。他在中国古代史上，在甲骨文字的解释上，竟已经建树了那样划时代的不朽的伟业，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读到了《殷虚书契考释》，对于他的感佩又更加深化了。那书的一首一尾都有他做的序，不仅内容充实，前所未有，而文笔美畅，声光灿然，真正是令人神往。再有是这《殷虚书契考释》在文库所藏的是初版（一九一五年），是王国维手写影印的，和增订版略有不同。当我读到这初版的时候，我不禁起了这样的怀疑：这样的有条理、极合乎科学律

---

①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曾治宋元以来通俗文学和宋词、元曲，晚年从事甲骨文、金文和汉晋书牍考释。辑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和《观堂集林》。

令的书，会是罗振玉的著作吗？它的真正的作者不可能就是王国维吗？罗振玉自己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九一〇年），相隔仅仅五年，而两书之间是丝毫也找不出条贯性来的。这个怀疑不久我便证实了，原来是罗振玉花了三百元，买了王国维的著作权并著作者的名誉。

王国维家贫，在早年曾受罗振玉的资助和提挈，他们之间便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辛亥革命之后，罗以清朝遗老的资格逃亡日本，王国维成了他的同路人。他们同住在京都。（日本的旧都，和东京对言亦称为西京。）在这儿住了三年，《殷虚书契前编》和《考释》的编印，都是在这期间完成的。王国维把自己的著作、名誉卖给了罗振玉，明显地是出于报恩，而这位盗窃名义的文化贩子罗振玉，到后来竟逼得王国维跳水。（王之死，实际是出于罗之逼，学术界中皆能道之。）罗更参加了伪满洲国，那倒是有他的一贯之道的了。

王国维在东京学派的那一群人中，虽然不甚被重视，但和东京学派对立的西京学派，却是把他当成为一位导师在崇拜着的。他们有着一个"观堂学会"，每年五月三日王国维的忌辰，是要开会纪念的。那态度似乎比国内的王氏弟子们还要来得虔诚。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日本的西京学派事实上是在王国维的影响之下茁壮了起来的，他们的成就委实是在东京学派的霸徒们之上。这一派的领袖是内藤湖南① 和狩野君山，他们和王国维都有过密切的交游。《观堂集林》（卷二十

① 内藤湖南（1866—1934），日本历史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著有《中国史学史》、《清史通论》、《日本文化史研究》等。

四)里面有好些诗是叙述着这些往事的。请看那《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的一首吧,一开首便说"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立东海东,……自言读书知求是,但有心印无雷同",可见作者对于狩野的相当器重。中间又说到"卜居爱住春明坊,择邻且近鹿门子,商量旧学加邃密,倾倒新知无穷已",春明坊便是王国维在京都的住处,他们彼此之间在学术上的接触,在这诗里是坦白地陈述着的。再请看他那《海上送日本内藤博士》一首吧,那是王国维回上海之后,在内藤湖南到中国来游历时做来送他的诗。中间叙述到在京都时钻研卜辞和有所收获的情形,而称许了内藤对于王氏学说的推挽,所谓"多君前后相邪许,太丘沦鼎一朝举",这更足以看出王氏的自负和对于内藤评价的分寸。西京学派就这样在王国维的影响下,他们才脱出了宋、明旧汉学的窠臼而逐渐地知道了对于清代朴学的尊重。对于中国学问的研究上,日本的学术界可以说是落后了三百年,但他们在短期间之内却也把那三百年的落后填补起来了。

我跑东洋文库,顶勤快的就只有开始的一两个月。就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我读完了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我对于中国古代的认识算得到了一个比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在这些书籍之外,我连带的还读到其它的东西,我读过安德生① 的在甘肃、河南

① 安德生(J.G.Andersson,1874—1960),通译安特生,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曾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业顾问,在河南、甘肃、青海等地作过考古。是仰韶村等遗址发现者之一。

等地的彩陶遗迹的报告，也读到北平地质研究所的关于北京人的报告。凡是关于中国境内的考古学上的发现记载，我差不多都读了。因此关于考古学这一门学问，我也广泛地涉猎了一些。这些努力便使我写成了《卜辞中之古代社会》的那一篇，文章的末尾虽然写着“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日脱稿”，但大体上在一九二八年的十月，已经基本完成。只是我的社会研究逐渐移向到文化研究的阶段上去了。我在甲骨文中发现了“岁”字的存在，由此而有天文学上的研究，得以知道十二支文字本是黄道周天十二宫的星象，而它的起源却是巴比仑。这些研究主要便汇成了我那《释支干》和《释岁》的几篇，那是收在《甲骨文字研究》里面的。我在完成这些研究上差不多费了一年工夫。国内有不少的朋友曾经帮助过我，特别是李一氓（就是李民治），他替我把所需要的书，陆续地收集，购寄，使我跑东京的时间也就省下了。

四

朋友们或许会发生疑问吧？我亡命到日本后，把全部精力完全沉浸于这些古代文物的研究里；我是拖着一家六口的人，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余裕来做这样冷僻的工作？请记起吧，这就是我应该感谢朋友的地方，特别是创造社的那一批朋友。

他们每月在送生活费来，我省却后顾的忧虑，因而便得以集中全力来解决我自己所想解决的问题。假使没有创造社，没

有朋友，我那些工作是绝对做不出来的。古时候的人也知道朋友的宝贵，列之为五伦之一；而在我，朋友这一伦更有它的超越的宝贵了！朋友不仅给予了我以物质的支持，而且给予了我以精神的成长。

但是自成立以来便在风雨飘摇中的创造社，终于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便是我流亡日本后一周年光景，被封锁了。在国内的朋友们的处境比我更加困难了，我的每个月一百元的生活费，从此也就断绝了。

怎么办呢？一家人饿死在日本吗？

不，我们倒也还不是那么毫无独立自主性的可怜虫！安娜处家是俭约的，到了日本后，家政一直是她自己在操持，炊爨洒扫，洗衣浆裳，乃至对外的应付，一切都全靠着她。那时儿女还小，用费也不十分大，因此在每月百元之内，总有一些积余，这便解决了我们所间接受到的突然来的打击。但我对于古代的研究不能再专搞下去了。在研究之外，我总得顾计到生活。于是我便把我的力量又移到了别种文字的写作和翻译。我写了《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后》，我翻译了辛克莱①的《石炭王》、《屠场》、稍后的《煤油》，以及弥海里斯②的《美术考古学发现史》。而这些书都靠着国内的朋友，主要也就是一氓，替我奔走，介绍，把它们推销掉了。那收入倒是相当可观的，平均起来，我比创造社存在时所得，每月差不多要增加一倍。

---

① 辛克莱(U.Sinclair，1878—1968)，美国小说家。

② 弥海里斯(A.Michaelis，1835—1910)，通译米歇利斯，德国考古学家。著有《雅典那庙》等。

这样也就把饿死的威胁免掉了。

我开始在国内重新发表文章时还不敢用本名。朋友们想来还记得吧？我的关于《易》、《诗》、《书》的那两篇研究，最初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用的是杜衎的假名。《石炭王》、《屠场》、《煤油》，用的是易坎人。这些假名的用意是这样的。我的母亲姓杜，而我母亲的性格是衎直的，我为纪念我的母亲，故假名为杜衎。我自己是一个重听者，在斑疹伤寒痊愈之后，虽然静养了一年，而听觉始终只恢复到半聋以下的程度。《易经》上的坎卦，其"于人也为聋"，故我这个聋子便取名为易坎人。据懂侦探术者说：一个人取假名，总是和自己的真名有点联带的；但我敢于说，无论怎样高明的侦探，看到这杜衎和易坎人便知道是郭沫若，我相信是绝对不会有的吧。

但后来我的本名又渐渐被人使用了——是的，在这一点上，我的确是被动。那是因为时间经久了，我并没有从事实际上的任何活动，而我所写的东西，不是文艺作品便是历史研究，乃至如甲骨文、钟鼎文那样完全骨董性质的东西，再说郭沫若三个字的商品价值究竟要高一点，因此郭沫若又才渐渐被人使用起来了。

当我把《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写好之后，我便起了一个心，想把那些关于古代文物的研究，汇集成为一部书。于是我又赶着写了一篇《周金中的社会史观》，便集成了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书便是由出版者用我的本名发表的了，于是一时成为哑谜的杜衎又才出现了原形。

我也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

形态》，两部书都经由王礼锡①的接受，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前一书出版时把我写的一篇序言丢掉了，后一书一直被积压着，是在抗战期中才出版了的。但前书的出版，也公然用的是我的本名。这书曾经遭过禁止，坊间后来把封面改换发行，译者是作为李季。这种本子我相信，留在世间的一定不很少。

关于《甲骨文字研究》的出版是费了一些周折的。我从一九二八年的年底开始写作，费了将近一年工夫，勉强把初稿写成之后，我曾经邮寄北平，向燕京大学的教授容庚②求教。我和容庚并无一面之识，还是因为读了王国维的书才知道了他的存在。王国维为商承祚③的《殷虚文字类编》作序，他提到四位治古文字学的年青学者，一位是唐兰④，一位是容庚，一位是柯昌济⑤，一位是商承祚。我因为敬仰王国维，所以也重视他所称许的这四位年青学者。商承祚的《殷虚文字类编》我

---

① 王礼锡（1898—1939），又名庶三，笔名博今，江西安福人。一九二九年参与筹办神州国光社，后与夫人陆晶清合编《读书杂志》。抗战爆发时，在英国任“全英援华会”副主席。一九三八年回国，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著有《海外杂笔》、《南北朝诗论》等。

② 容庚（1894—1983），字希白，广东东莞人。古文字学家。著有《金文编》、《殷墟卜辞》等。

③ 商承祚，字锡永，一九〇二年生，广东番禺人。古文字学家。著有《殷墟文字类编》、《福民所藏甲骨文字及考释》等。

④ 唐兰（1901—1979），字立庵，浙江嘉兴人。古文字学家。著有《古文字学导论》、《天壤阁甲骨文存》等。

⑤ 柯昌济，字纯卿，一九〇二年生，山东胶县人。古文字学家。著有《殷墟书契补释》、《金文分域编》等。

是读过的，他是把《殷虚书契考释》关于文字的一部分稍稍扩大了，而根据说文部首从新编制的，虽然并没有多么大的发明。但商的住址我是不知道的。唐、柯二位，不仅住址不知道，连著作也还不曾见过。容庚，我见过他的《金文编》，那也是依说文部首编制的金文字典，比起吴大澂①的《说文古籀补》来更加详审，在研究金文上，确曾给予我以很大的帮助。它不失为一部有用的工具书。容庚在燕京大学任教职，而且是《燕京学报》②的主编者，由每期的学报是容易发现的。因此，我对于容庚，不仅见过他的著作，而且知道他的住址了。我就以仿佛年青人那样的憧憬，也仿佛王国维还活着的那样，对于王国维所称许的四学士之一，谨致我的悃忱，而以我的原稿向他求教。我得感谢容庚在资料上也曾经帮过我一些忙，他曾经把很可宝贵的《殷虚书契前编》和董作宾③的《新获卜辞写本》寄给我使用过。但他在学问研究上却没有使我得到我所渴望着的那样满足。——这些情形，我曾经写在《甲骨文字研究附录》、《一年以后之自跋》里面，那是“一九三〇年八月十日”写的文字了。但在那里面也有不曾写进去的一些经过。

原稿寄给容庚后，他自己看了，也给过其他的人看。有一

---

① 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江苏吴县人。清末文字学家、金石学家。著有《说文古籀补》、《恒轩吉金录》等。

② 综合性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六月创刊，一九五一年六月终刊。

③ 董作宾（1895—1963），字彦堂，号平庐，河南南阳人。古文字学家。著有《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等。

次他写信来，说中央研究院的傅孟真（斯年）① 希望把我的书在《集刊》上分期发表，发表完毕后再由研究院出单行本。发表费千字五元，单行本抽版税百分之十五。这本是很看得起我，这样的条件在当时也可算是相当公平，但我由于自己的洁癖，铁面拒绝了。我因为研究院是官办的，我便回了一封信去，说："耻不食周粟。"

我一面拒绝了别人的好意，一面却在上海方面找寻出版的机会。我曾经托过友人向商务印书馆交涉，就在这儿我的傲慢却得到了惩罚。商务的负责人连我的原稿都不想看也铁面拒绝了。在商务印书馆的人们要拒绝，当然有他们的充分的理由。象研究甲骨文字那样的书，首先就不能赚钱，而研究者又是我，在他们当时或许会以为我是在发疯吧。因此也就无须乎客气，还要来看我的什么原稿。

但我的原稿在北平方面曾经看过的人确是很多，有人告诉我，他在钱玄同的书桌上也看见过它。出门太久了，我怀念起来，几次写信去要回，都没有达到目的，弄得我自己都有点后悔了。但足足又经过了一年工夫，终竟寄回到我的手里，而原稿的白纸边沿都快要翻成黑纸了。幸好是用日本半纸写的，纸质坚韧不容易磨灭。

《甲骨文字研究》的原稿在北平旅行的期中，我又写成了《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上下两册。这次我不敢再寄回国了；

---

① 傅孟真（1896—1950），名斯年，山东聊城人。一九二八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一九三六年后任研究院秘书长。著有《中华民族革命史稿》等。

然而我却又起了一次野心，我把我的两部原稿曾拿去找过东洋文库的主任石田干之助。我看到文库也在出版学术编著，又看到日本学界也每每用汉文出书，我真是不揣冒昧，竟想把我的论著也拿去尝试。我是在这样想，我的研究是在文库发轫的，我很感谢这一段因缘，假使我的书可以由文库印行，那也就可以表示我的谢意了。报酬多少是在所不计的。石田是长于外交的人，他没有立地拒绝我，要我把稿子留下，让他请一两位专家看看，我自然也就留下了。然而我是明白的，在日本方面究竟有谁是这种古文字学研究的专家呢？

一个月过了，我再去向石田请教。他把原稿退还了我。他说：太难懂了，在日本方面恐怕没有办法出书。这或许是真情话，他是不是在笑我，我不知道，我自己对着自己倒是在笑了：真是太不知自爱！国立的官立机关要出版，你能说“耻不食周粟”，今天却要来向着外国资本家的账房乞怜，岂不是自讨没趣？

但这两部书的出版虽然经过一些周折，仍然应该感谢一氓，是他向上海大东书局① 为我交涉办成功了。交涉的经过情形我不知道，当时李幼椿在担任大东的总编辑，或许是他念到同乡的关系，承受了下来的吧？那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已经出版，对于这两部书的印行，想必也有着催生的作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于一九三〇年的年底，出书之后大受欢迎，很快便再版、三版了。这书似乎保证了甲骨文和金文的研

① 由吕子泉、王幼堂、沈骏声、王均卿创办于一九一六年。孟寿椿任总编辑。一九二八年始由沈骏声任经理。

究也并不是不可能赚钱，同时也似乎保证了郭沫若也要研究甲骨文和金文并不是真正在发疯了。事情终竟是值得感谢的，大东竟肯承印这两部书，而且同时承印。他们在报纸上大登广告，征求预约。那广告之大在当时曾突破纪录，这可替我发泄了不少的精神上的郁积，我很高兴。并不是因为这样使我大出了一次风头，不，我不是那样的风头主义者。老实说，有时候我自己看见这郭沫若三个字都有点讨厌。但我看见那大规模的广告实在很高兴！那替我在这样作吼：本国的市侩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文化前卫们，你们请看，你们所不要的东西，依然是有人要的！

两部书是一九三一年的初头出版的，书局方面每一种送了我二十部。我在一天清早，日期不记得了，接到这些书的时候是多么的愉快呀！我可流下了眼泪。就在那天中午，安娜特别煮了红豆饭来庆祝，我是记得的。但就在那天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宪兵也来了。宪兵老爷说：听说有大批的东西送到了，是什么宝贝呀？我知道，他大约以为是宣传品吧，他当然是为了调查这宣传品而来的了。安娜把堆在走廊上还没有开封的一部分包裹指给他看：是呀，是很好的“宝贝”呀，无价之宝！索性当面开了两封，比较小的包裹是《甲骨文字研究》，比较大的是《殷周青铜器铭文》。宪兵看了，好象吃了满口的粪。好家伙！滚你的蛋！

这些书本来是准备给作者送人的，但我送给谁呢？尤其在这日本！

书到的当天晚上，我每种留了两部下来，把其余的用一张

大包袱包裹着。我和我的大儿子两个人把它扛到电车站上去，一同坐电车带到了东京。接着在文求堂里面便出现了我们。文求堂老板很客气，打了一个七折，当下便给了现钱。

那时候我的大儿子和夫是已经十四岁了。

1947年上海

归　去　来

浪花十日

浪花是日本千叶县面着太平洋的一个村子，离我现在住着的市川，只有三个半钟头的火车的路程。去年暑假，在那村子所属的一个海岸上的村落名叫岩和田的，住过十天。这儿摘录下的便是那几天的日记。

日本的中、小学放暑假的日期不同，中学是在七月二十边，小学是八月一日。大的三个孩子都在东京的中学念书，一放暑假，他们的母亲便把他们和顶小的一个儿子带到海边去了。她的意思自然是想要他们在海岸上多锻炼几天，尤其为着顶大的和儿自八月十一号有高等学校试验班的暑中讲习，不得不提前回家的原故。但还在小学念书的四女淑子便不得不留在家里和我再住几日。

我在七月三十一号把淑子送往海边，八月十号同和儿一道回来，算在浪花前后住了十天。

1935年6月4日

三十一日

午前十时左右，淑子抱着书包由学校回来了。昨天放学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七月上海《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一期。

回来的时候她总说明天还有课，要到后天才放假，但她那小心的推断却是错了。既是今天放假，那今天是应该把她送到海岸上去的。离开了母亲的孩子，尤其女儿，总要失掉些他们的明朗性，带起淡淡的凄寂的调子来，有点怪可怜见。就早半天也好，早一个钟头也好，我定要赶着把她送到她母亲那儿去。这样一下了决心，我便让女儿守着家，一个人到外边去作些出发的准备。

在下着微雨。穿着长统的橡皮靴到邻近的森老人家里向他告诉了动身的话，叫他当天下午便移到我家里来住。又在一家饮食店里为淑子订了一碗“亲子井”(Oyakodomburi——有烹熟了的鸡肉“亲”和鸡蛋“子”盖在上面的一斗碗饭)，叫正午时送去充她的午餐。

在市川的背街上F面包店买了一块钱的盐饼干和其它杂色的糖点，叫装在镔铁罐里送到我家里去。接着又转上正街。在市川车站前面的一家眼镜铺里，替和儿配眼镜，他的近视眼镜有一边的镜片落下海里去了，是前天寄回来叫配的。直径约有一寸半的大而圆的镜片要切成小小的椭圆形，觉得很可惜。

利用着眼镜切制的时间，我跑到一家理发店去剪了发，又到小学校前的平和堂去替淑子买了四切的画纸八张，六切的画纸三十二张，蜡笔十二色的一匣，四年生夏季练习簿二册——是她要拿到海岸上去用功的。

回到眼镜铺时，眼镜已经配好，店里的挂钟已经十二点过了。

肚子本来不怎么饿，只是觉得早迟总有在那儿吃顿中饭的义务，便顺便折进了街头的一家鳗鱼食堂里去。食堂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放送着消息的“雷曲”（收音机）在那里喧嚣。报道的象是关于满洲的事情，在我这重听的耳里，只听见有些“支那”和“满洲”的字样。我拣着在一只角落里坐下了。一个下女端了一杯茶，走来打着招呼。我先叫她把那“雷曲”关了，回头又才叫了一碗鳗鱼饭和一杯鳗脏汤。下女说鳗脏汤要多费些时刻，我便索性叫她替我煮两合日本酒来，想多少来浇一下和那阴雨一样浸润着我这身内身外的苍凉的感觉。

下女把酒煮来了，配了一小碟下酒的盐豌豆，她替我斟了一杯，便毫不客气地坐在我对面的椅上。用不着一口便可以干的小酒杯，只要一干，她便替你斟上，弄得我有点怪烦腻起来。我请她不要管我，让我自斟自饮，她看了我一眼也就立起身走了。眼睛的意思是说：“你公然看不起我。”

把茶杯来代替酒杯，喝了几杯之后，饭也送来了。带着有几分烦躁性的无聊更受了酒的鼓舞，把饭胡乱吃着，又叫了两合酒来，一面吃饭一面喝。

那位下女似乎有意思向我报仇，她没得到我的同意，又把那收音机打开了。

“……满洲……支那……膺惩……不逞……非常时……帝国……”

一批轰轰烈烈的散弹向我的破了的鼓膜打来，显然是一位军人的讲演。

饭只吃得一半，第二壶酒也只喝得一半，我实在没有本领

再吃喝下去了。并不是我这已经年逾不惑的人还感着了青年时代的爱国义愤，我实在恨我这耳朵的半聋，听又听不清晰，只是一些断残的电码打进我的脑筋，使我这够烦乱的脑筋愈见化成为了一些杂乱的观念的漩涡。

叫会帐。结果是吃了一块六毛钱，心里不免叫了一声冤枉。进面馆里吃两碗馄饨，不也一样可以充饥吗？无聊，无聊，万分的无聊。

在三分醉意、七分懊恼的情怀中出了食堂，到了一家肉店去买了三斤猪油，又想到黄油也是海岸上写信来要买的，折回F面包店去买了两包。问得刚才的饼干还没有送去，便把猪油包子一并交给了店主，托他一并送。因为我又想到在正街上还有一样东西好买，是海岸上写信来要的照面镜。跑到正街上的一家店里去买了一面，费了七毛钱。

我的记忆力怎灭裂到了这样呢？简直象一匹阿美巴①，向东放出一只假足出去，缩回来了，又向西放出一只。

回家时已是午后二时，屋后的无花果树熟了两颗，如拳头大，摘来与淑子分而食之，味甚美。把家中收拾了一回，留守的森老人也来了，但是托F店送来的东西却还没有送来。乘自转车送来，是费不上五分钟的。……等吧，等得焦躁起来了，又在焦躁中尽等。等到了四点钟都还不见送来，只得把长统靴拖着跑出去催。原来是那店主人忘了。

五时顷在市川驿搭电车，不上十分钟便到船桥。在船桥

① 英语Amoeba的音译，通译阿米巴，即变形虫。

改乘火车，五点半钟出发，六时至千叶。换车等了半个钟头，六时二十九分又由千叶出发，九时半抵御宿。

在淡淡的电灯光中的御宿车站外的空场上，一个人也没有。托车站上的人向汽车行打电话，隔了一会来了一部可以坐三十个人的公共汽车。我自己心里惊愕着，不知道这样大一部车送我父女两人到浪花村的岩和田去究竟要多少钱。原来车子虽大，却只要六毛，自然使我放了心。不上十分钟我们便被送到了目的地点。

儿子们都已经就寝，只有他们的母亲起床来迎接了我们。因为晕车，一上车便把眼睛闭着的淑子，这时候见了她的母亲，就象开了拴的电灯。

我顶关心小的一个儿子。在家时，我是时常抱他，看守他的。我揣想他到这海岸上，十天没有我，一定不惯。我问他的母亲：

——"我不在，鸿儿没有什么不惯吗？"

我所期待着的答语是："是的，他不惯，他想到你便罗唣。"然而，却不然。

——"没有。我们问他'爸爸呢'？他说'逃走了'。"

八月一日

五时顷起床。在市川时日日苦雨，至此始见晨曦。

屋小，南向，屋前有山如屏立，树甚蓊郁。左侧有连峰耸立，在最高峰之将近山腹处有神社一座，据云是大宫神社。高峰和东侧的窗口正对着，由窗口所界画出的一幅山景，俨如嵌

在镜框里的一幅油画。峰头的天宇好象伸手可攀，有白云点散，瞬复融成一片。

到处都有的是苍蝇，是猫，是蚊子。蚊子白昼噬人。

屋前有一片空庭，周遭有无花果树，碧实在枝头累累，但仅大如鸽卵。无花果该是早熟的时候，闻因今年多雨，故未成熟。

安娜一早便到海岸去买了一篮生鱼回来，同时又买了些蝾螺和鲍鱼。

以蝾螺作"壶烧"。所谓"壶烧"者即将活的蝾螺，连壳在火上炮烙之。蝾螺遇热，即涌出多量水液于其介口停积，如壶之盛浆然。待其水液将干则蝾螺已死，其肉即易取出，拌酱油而食之，脆爽可口。唯其所附着之外套膜则须除净。如不除净，其味颇苦。

早饭吃鲜鱼味噌汤，生鲍鱼片，蝾螺壶烧，大有原始的风味。

早饭后负鸿儿出，步至前山下。山下有一曲池塘，有小鱼在水面喋呷，长可二寸许。池边有大树一株，依山而立，罩临池上，叶色浓碧，堆砌如云。初不知为何树，就视始知是银杏。

佛儿与淑子跑来，先跑上大宫神社去了。我也折向那儿。有莺在树丛深处啼。佛儿说："是'薮莺'(yabu-uguisu)啦，在叫。"他跟着便ho-ho-gekkio的学了一声。莺声便中止了。儿辈走后，山境复归沉寂，莺复缓缓作声。初仅ho-ho地略作尝试，试啭二三遍后始见调匀。

在神社前站着向西南展望，左侧的海湾和海岸，右侧的御

宿街市，远远呈示着。日光颇类秋阳，无盛暑意。空气中有乳糜晕。

下山由屋前通过，左转折下海岸。浴客甚寥寥。

遵海而行，东手有浆岩的石山直达至岸。穴山为隧道者二，一稍浅，一深十余丈。深者甚阴湿，顶上有泉水滴下。通过隧道后有一面狭窄的沙岸，渔人们在岸上勤于补网。路径渐与海岸离别，爬上邻比的小山顶上蜿蜒去了。但离开正道，在对面临海的山脚处又现出一个洞口。我便横过沙岸，向那洞口走去。洞道曲折，前方不可透见。步入后，鸿儿生畏。一面宽慰之，强负之而行。洞中幽暗，几不辨道路，稍一转折，始透见前光。海声轰隆如雷鸣。原来这是鱼业公司的养畜池。所谓养畜者，乃购买渔人所捞获，暂时寄养着，凑足，始运至东京等地推销者也。山石因是浆岩，容易贯凿，洞中临海一面凿成无数龛形，复有甬道相联，俨如画廊。海水涌至，因洞穴之共鸣与反响，其声音增大至数倍。海浪声中亦杂有人声，宏大如留声片中之黑头。盖洞中有办公室，公司执事人之对话也。洞口前有堤防一道，海水掩蔽其上可寸许，意当退潮时水必陡落。堤防之内为一深池，盖即所谓养畜池。沿堤防而行，又可至对岸山脚。欲行，方踏出数步，鸿儿即大啼，只得折返。

鸿儿说："海，可怕。"

这的确是一个实感，连我自己也都觉得可怕。凡是过于伟大了的东西，总是要令人生畏的。希腊的海神 Poseidon① 并没有带着美人的面孔。

---

① 通译波塞冬。

午饭后骤雨片时，译《生命之科学》四页。

晚餐用得特别早，安娜叫儿们准备作木钓竿。大的两个儿子各有一套钓竿，长可七八尺，是两截木棍斗成的，下截粗，上截细。但与其说是钓鱼竿，宁可说是打狗棍。我起初不知道是作甚么用。到了海岸，看见他们各把一大卷钓缗解开来盘旋在沙岸上。钓缗极长，缗端着钩处系一重实的铅环，这尤其使我有些莫名其妙。但疑团立刻冰释了。他们把那铅环来套在那木竿上，铅环的孔能够自由地通过上截的细棍，但不能够通过下截的粗棍。他们举起棍，由离海岸四五丈远处跑向海边去，将竿上的铅环乘势抛向海中，铅环便如铅弹一样飞去，将钓缗曳出可至十余丈远。随手便将竿抛去，理岸上钓缗。

看着这样的情形，我自己也不免破颜一笑，觉得这种钓法，很是别致。据安娜说，儿子们前天在岸上看见有人作这样的钓法，钓到一两尺长的大鱼。他们是昨晚才去把钓具买了来的。我的更进一步的快乐，不用说便是要看到他们钓上一两尺长的大鱼来了。

和儿的钓缗挽上了一次，但只挽上得那个铅环和空的钓钩。在他换上钓饵，准备作第二次投钓的时候，有一位老人领了两位十岁上下的女孩子到海岸上来。她们也为好奇，立在旁近观看。和一准备停当，又照样作势投去的时候，铅环飞得不得力，只飘飘地落进了离岸五六丈远的海中。原来岸上的钓缗被一位女孩子踏着，一投便把钓缗振断了。一场高兴和落进了海中的铅环一样，成了一个空。带领着女孩子的老人告了

罪，扫兴地走了。博儿的钓缗也没有收获，便把来收拾了起来。

儿辈都在沙岸上跳跃，凿穴，作种种的游戏。小小的鸿儿也跟着在沙中游戏。他的母亲说："这孩子只要有沙玩，他是整天都不倦的，连脚也不晓得痛。"

坐在沙上，受着当面的海风，在凉意之中挟着温暖的感觉。海水和岸沙昼间所吸收了的太阳热，在这时候正在发散。那发散着的潜热和海风的凉度调和了，刚好到了适人的程度。

岸上的远村和近村都上了灯火。西手的灯火稠密处，有四盏灯一直线地由上而下排列在一座山上。

——"那四盏灯在登山啦，"我莫名其妙地说着。

——"那是神社，"安娜说，"你看这边也有一串。"

回头看到岩和田的一座小山上果真也有一串，但只三盏。

西手的那灯火稠密处在放花炮，岩和田也遥遥相应。

临海的山影渐渐转浓，终竟和星影全无的暗空融成了一片，登山的电灯们成为了登上天的星宿。

二日

天气快晴。

晨五时安娜便督促着儿们起床，叫他们开始用功，说在午后同到波都奇去。我也起了床又开始翻译。

午饭用后往波都奇。博儿背着鸿，他们兄弟五人先走着，安娜和我在后面跟随。

走到海岸，穿过了东手的两条隧道之后，又翻过了一匹山，山虽不高而径颇陡峭。山下现出了一片海湾来，有几个儿

童在海中沐浴。走下海边时，儿们却不在。

安娜说："是到大波都奇去了。这儿是小波都奇，再往前面一个湾是大波都奇。那儿要更清静些。"

沙岸上仍然晒着网，一位渔夫在坐着补缀。又有一位十六七岁的童子，用橡胶线套在一些竹片上做成了一枝弩枪，象埃及人的跪法一样，跪在岩脚下用砂粒来打一匹伏在岩壁上的蚂蜋。我伫立着看他，但瞧准尚未定，蚂蜋飞了。飞不远又伏着时，童子又瞧准。打了一发，却没打中。我笑了，他也回过头来，向着我发了一笑。牙齿分外的白。

又翻过了一匹小山，这次的路，愈见倾斜，愈见狭隘了。烈日在头上燃烧，汗水不断地浸出。

——"走这样多的路来洗海水澡，未免太吃苦啦。"

——"去年是每天都来的，我还背着鸿儿。"

——"何苦呢？"

——"这边的海水清洁的多，又有岩阴，可以让鸿儿睡午觉。"

——"隔得几天来一次倒还有意思。"

——"凡是天晴是每天都来的。"

我觉得她的母性爱未免太浓厚了，一天的吃食浆洗已够劬劳，还要为着海水的清洁和地方的幽静，在烈日光中背着儿子跑这种陡峭的山路。

由山谷步下海边，海湾的面比小波都奇更狭，但的确更加幽邃。远远看见儿女们都在右手的岩礁上坐着。

——"哦，的确有翻过两匹山来的价值！"我赞叹了一句，

又大声地向着儿们叫了一声。小小的鸿儿在岩礁上站立起来，也在叫着，表示欢迎。

我们也走到岩礁上坐下了。

安娜一面拂着自己额下的汗珠，一面说：“这儿简直是自己的世界！”

两侧的岩臂向海中伸出，把海湾抱着。中段陡峭的沙岸上堆着些篼篮和破旧的衣服，有两三个小儿在那儿坐着。

儿们都下海去了。我也想下海去，但我没准备浴衣，穿着湿裤回去是不舒服的。安娜劝我索性脱了下去。我照着她的说法，在沙岸上把短裤脱了，就和才生下地来的一样，一丝不挂地跳进了海中。

岸边因有岩壁环抱，岸沙堆砌得陡峭，碧绿的湾水便形容得很深。但跳下海去却也平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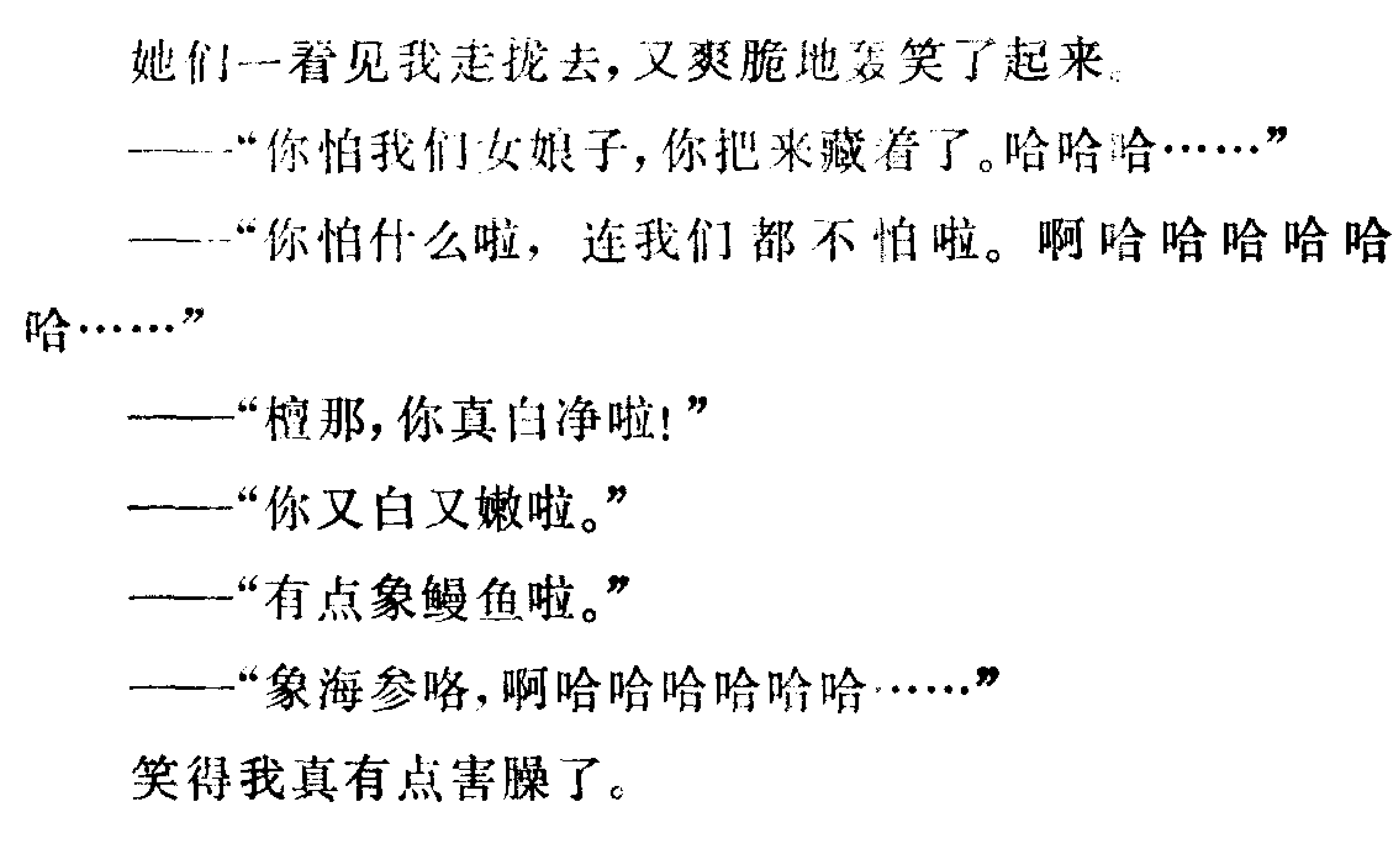
在海中凫不一会，有一只渔船向着湾子回来了，船上都是赤裸的海女。原来岸上的篼篮和破衣服都是海女们留下的，我起初疑心是乞丐的几位小儿才是等着他们的母亲的渔家的儿女。

我赶快跑上海岸把短裤穿上了。

海女们在船上大笑了起来，笑的声音和海浪一样清脆，牙齿和浪头一样的白。

船要抵岸时，大多数的海女都各人抱了一个鼓形的小木桶跳下了海，凫上岸来，只让一二人在船上掌桡。

她们凫上了岸，把船也帮着拖上了岸来时，我走向船去，想看她们所捕获的是什么。



她们一看见我走拢去，又爽脆地轰笑了起来。

——“你怕我们女娘子，你把米藏着了。哈哈哈……”

——“你怕什么啦，连我们都不怕啦。啊哈哈哈哈哈哈……”

——“檀那，你真白净啦！”

——“你又白又嫩啦。”

——“有点象鳗鱼啦。”

——“象海参咯，啊哈哈哈哈哈哈……”

笑得我真有点害臊了。

她们所抱的鼓形小桶原来是浮标，是中空的，下边系着一个网袋。网袋里面都装着蝾螺和鲍鱼。

那些海女多是三四十岁的人，年轻的只有二十来往的。头上勒着印蓝花的白布帕，项上挂着一副潜水眼镜，下身套着极紧扎的红色短裤。除掉这点短裤之外完全是裸体。皮肤是平匀的赤铜色，全身分外呈着流线形而富于弹性，大有膃肭兽般的美感。

一群雌的膃肭兽正笑个不止的时候，独有一位最年青的，她却没有笑。她听见别人说“又白又嫩啦”，把她那黝黑的眼睛举起来看了我一眼，接着又埋下去了。眼睛黑得比海水还要深。

安娜已经带着鸿儿到左手的岩阴下去了，儿女们都聚集在那儿附近，我把海女们的笑声留在背后，向那边跑去。

——“那些海女们大笑了我一场。”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见了她们回来，赶快上岸穿上了裤子。”

安娜也笑了。她又说：“这儿的海女们，性欲是很强的。一两个男子遇着了她们的一群，只好逃走。中年的海女假使成了寡妇，没法满足时，听说在夜深都得跑到海里来浸。”

——“她们提的鲍鱼和蝾螺是可以买的吗？”

——“那是不能明买的，除非是私下偷卖。海产的权利是官厅所有，公司把那权利购买了。凡所采获的虾、鲍鱼和蝾螺之类都要送到公司，由公司给与规定的采获工钱。譬如给了五毛钱的工钱和五毛钱的权利金，本钱算只花了一块钱的鲍鱼，我们向公司里买，便须得费四五块钱。”

——“她们抱的那个桶子，潜下海时是系在身上作救生带用的吗？”

——“不是那样的。那桶下有网袋，是装鲍鱼和蝾螺的。鲍鱼在海底，很深，通常大抵是男子取。海女只在二三寻深处捉那凫着的蝾螺。她们潜下去，停一下又凫上来，抱着桶子休息。一个大汉要取一个鲍鱼，有时要潜水三两次。”

——“一次可经得多少久？”

——“至多怕只得五分钟吧。”

听见了这席话，顿时感觉着那些嬉笑着的海女们的天真，只是在苦海里浮沉着的愚昧。人是的确为一部分垄断的人所膃肭兽化了。

膃肭兽们上了岸，在岸上烧了柴火来取暖；隔不一阵又纷纷上船，划到湾外去了。

我们也从左侧的岩礁折回右侧的来。这右侧的岩礁是坦

平的，呈着五层的阶段。在第三层上有一个一寻见方的方池，只有几寸深，中间安置了一个大的天然石。我觉得这是人为的，安娜以为是天成的。但天成的那有那样的规整呢？那或者是原始时代的渔民所崇拜的生殖神吧？

坐在天然石上，想到这两天来似乎把这浪花村附近的好处已经领略完了，打算明天便回市川去。

——“我打算明天回市川去。”我对安娜说。

——“你何不多休养几天呢？”安娜劝着说，“到十号同和儿一道回去吧。”

——“这儿的好处都看完了，但多住下去，刑士会来麻烦你们。”

——“等来了之后再说吧。”

博在右侧岩腰处画水彩画。画好了走转来时，不注意地踏上石礁上的青苔滑了一跤，仰倒在岩石上，后头很受了跌打，一时竟站不起来。画匣子也跌破了。赶快下去把他扶起来，一场高兴扫去了一半。我担心博是起了轻微的脑震荡，把一张手绢蘸湿，顶在他的头上。

安娜把儿女们都招呼了拢来，准备回去。她背着鸿儿，和佛儿、淑子先走了。我与和儿扶着博，让他慢慢地走。

太阳还是灼灼的，隔着刨花帽晒得头痛。

三日

晴。

五时顷起床，在庭内劈柴。长段的木柴横在地面上，用长

柄斧头当腰纵劈之。虽然用尽了力气，但十斧有九斧是打在地面上，不要说运斤成风要斫鼻上的泥翳，竟连劈这样大的柴头，我都赶不上我的老婆。

午饭前负鸿儿到海滨，在港堤上走了一回。有两个男子携着小叉往海里去叉鱼。腰上各有一条长绳系着一个小竹筒在末梢，在背后的水面上浮着。我问堤上的一位渔夫那小竹筒是什么用意。据说那是用来穿鱼。

回寓后看见有两个穿黑羽纱洋服的人在垣外探头探脑地窥伺，一个肥黑而多髭，一个苍白而尖削。一眼便知其为刑士，心中颇不快。

少顷，肥黑者走进来求见，果然是地方上的刑士。口称他们是来"保护名士"的。

我告诉了他，说在此只短住三五天，便回市川，不必大惊小怪地惹得邻近的人都不安宁。

刑士先生也还客气，坐不五分钟，也就走了。

译得《生命之科学》十二页。

五日

午前译《生命之科学》十页。

午后全家又赴小波都奇。今日浪头甚高，海水不能入浴。我一个人往大波都奇，想证实我那个生殖神崇拜的观念。在右手的巨石上坐着，又遇着那一批海女凫水回来了，真象一群海豹。但我没有再去惹她们的勇气了。

岩礁约略形成五段，如王庭，半是天成，半由人力，处处有

钻凿痕可见。中段坦平，正中的一个正方形的洼陷亦由人力而成，其中立一巨石。这无论怎么是人为的一种东西，要说是系船用的，但那附近都是岩石，不好泊船。船如泊上，被浪头冲打，会在石上碰破的。我始终相信这一定是原始时代的生殖器神。

在巨石上站立起来，望见左手那股岩石上象虾蟆张口的一个洼岩框，昨天在那下面捕过蟹的，和巨石正遥遥相对。顿然悟到这一定是一雌一雄。

六日

昨夜做一奇梦，梦见在南昌的东湖边上受死刑，执枪行刑者为我的一位朋友。

醒来，头真如着铅弹。盖以洋装书做枕头而睡，故生此幻觉。

午前徐耀辰来信，说岂明先生欲一见，问我几时可回市川。以十号前后回去的消息答复了他。岂明先生的生活觉得很可羡慕。岂明先生是黄帝子孙，我也是黄帝子孙。岂明夫人是天孙人种，我的夫人也是天孙人种。而岂明先生的交游是骚人墨客，我的朋友却是刑士宪兵。岂明此时小寓江户，江户文士礼遇甚殷，报上时有燕会招待之记事。

意趣很郁塞，十时顷负鸿儿出交信，淑子相随。在街头遇着前天来寓的那位刑士，他说了一声"今天天气好"。

淑子要采集海藻标本，同到海岸上去帮她采集。

因为睡眠不足，头脑异常的沉闷。我让淑子在岸头看着

鸿儿，跑下海里去浸了一下，今日浪头仍未平。大约是不曾见过海的古人所造出来的谣言，爱说“无风不起浪”，其实在海里是惯爱无风起浪的。忽然间在昏聩的脑中浮出了两句诗样的文字：

举世浮沉浑似海，
了无风处浪头高。

七日

午饭时分从海上回来，淑子远远跑来迎接着我说是有客。是三位中国学生。一个L君我认识的，其他的两位却是初见。

L君说他们一早到了市川，那位森老人把地址告诉了他们。他们是在御宿前一站的浪花下了火车，又坐汽车跑来的。我觉得他们这一错也错得妙，没有从御宿下车，正好免掉了或许会有的麻烦。

他们的来意是要出一种文学杂志，托我在上海替他们介绍出版处。我答应了他们，叫他们把条件等等商议好，我在十号回市川，到那时便替他们办理。

今早安娜烹了一只鸡，预备午饭时吃的，恰好供了客菜。

八日

今晨起来，安娜说“今日大潮”。——所谓“大潮”乃大退潮也。早饭后把淑子和鸿儿带着到海岸上去。海水真是退得很远，显出了很多浅浅的岩礁来。有许多大人和孩子在那浅

水处捡拾一些来不及退却的鳞介。但我们来迟了，只见一些水荡里有些小小的沙鱼（日本叫着dabo）。淑子也热心地用两手来捞沙鱼。捞了一阵，有一位浴客把自己的葛巾中包着的一匹小章鱼给了她，没说一句话便走了。仔细看去，很象是中国人，或者怕是台湾的黄帝子孙吧？

一匹小小的章鱼添上了无限的情谊。

淑子得到了章鱼，她便想连忙拿回去夸示。她对我说："回去不要说是人家给的。"

她这点无邪气的要求，我费了小小的踌躇，但也应允了。

拿回家去，她说是她自己捉的。她的三个哥哥听了都欢天喜地，连她的母亲也在面孔上显出了一段光彩。

但在我自己的心中却不免生着苛责，我觉得是误了女儿，欺了妻子，辜负了那位送鱼的人。不该，真是不该。

九日

午前安娜携着儿女出海岸，我一人留在寓里译书。她说，打算到近村的大东去，看好地址预备明年好来，明年是不再到岩和田来了。但她们出去仅仅两个钟头的光景便转来了。大东太远，没有去成。今天仍然是"大潮"，他们也捡了些鱼介回来。有一匹章鱼比昨天的还大。

午饭后大的三个儿子出去画画去了。乘着鸿儿在午睡，我把淑子携着去看"日、墨、西交通纪念碑"。这碑立在临海的一座山头，是这座小村上唯一的史迹。据说一六〇九年（三二五年前），当时还是西班牙领的菲律滨总督Don Robrigobe V,

乘船到墨西哥去，在海上遇了暴风，飘流到这岩和田来被人搭救了，碑是纪念这件事情的。我来的时候便想去凭吊，但因为几天来的注意都集中在海里，没有功夫去爬山。但已经决定明天离开这儿了，明年乃至永远怕没有再来这儿的机会了，今天是非去不可的。

碑是白色大理石所嵌成的方尖锥形，约有四五丈高。有铜牌用日本文与西班牙文刊载着建碑的原故，是五、六年前由日、墨、西三国所合建的。

碑的地位颇占形势，岩和田、御宿一带的山海都在一望之中。爽适的凉风不断地吹来，在碑下不禁引起了流连的情趣。

和、博二子远远在更高一层的山边上写生。佛似乎是看见了我们，从那儿跑了来。他和淑子两个便催促着去登那更高一层的山，我在碑下低徊了好一会，才又跟着他们走去。

步到和、博所在处时，他们是在番薯地中对着纪念碑一带画水彩。和说已经画完，他把画来藏起了。其实他是怕我看他的画。

佛儿说："我们到雀岛去！"

淑子立地赞成了。

据说，雀岛还在大波都奇前面的一个湾子里面，是一座象石笋一样的岛子，头上有些草木，有很多的瓦雀在那儿结巢。就沿着那山路可以走下去的。

他们都很踊跃，我也就跟着他们。

在山路上走着，俯瞰着小波都奇、大波都奇，都从眼底呈出而又走过。果然在大波都奇前面的一个湾子里现出了那座

石笋形的雀岛来。要说是岛，其实最好是说为石笋。那岛依傍着湾右的岩股，显然是从那岩股切离出来的东西。岩和田附近的岩石大都是柔脆的浆岩，切离是很不费事的。或者怕又和大波都奇的那个方池中的巨石一样，同是一种古代宗教的偶像吧？我又起了一番好奇的心，想跑到那岛下面去观察。

佛儿说他识路，便让他在前面做向导。拣着向那雀岛所在的两山之间的谷道里走去，下了峡谷起初还有一些田畴。在田埂上弯转地走，把田一走尽，便是一望的荒草，有些地方将近有一人深的光景。路是连痕迹也没有的。我冒险把木屐去践踏，仅踏得两三丈远，手足便有好几处受了伤。

淑子说："怕有蛇呢！"

天又不凑巧地突然严重地阴晦下来，看看便有猛烈的暴风雨袭来的模样，没有勇气再往前走了，只好赶快跑回头路。

在山道上拚命地跑，跑得前气不接后气地怕有三十分钟的光景。天，黑得逐渐严重，看看便要崩溃下来。幸好，在天还未崩溃下来之前，我们赶到了寓里。

不一会，起了猛烈的旋风。好象鼓尽了全宇宙的力量一样，倾倒了一批骤雨。之后，天又俄然清明了。

东平的眉目

是三四月间吧，在东京麻布区的W① 的寓所楼上，W向我介绍了一位青年。他说：

——"这是中国新进作家丘东平，在茅盾、鲁迅之上。"

魁梧奇伟的W是在旧十九路军里充当过团长的，听说"一·二八"之变最先开火的便是他那团人。W在军事上或许是杰出的人才吧，他的率直爽快也很令人可爱，他竟公然向我介绍起作家来，并呈出那样的绝赞。他在我心里唤起的感觉是：就和他的身体之魁梧一样，连夸张也很魁梧。

东平的体魄和W成正反对，身子过分地对于空间表示了占领欲的淡薄。脸色在南国人所固有的冲淡了的可可茶之外，漾着些丹柠酸的忧郁味。假使没有那付颤动着的浓眉，没有那对孩子般的恺悌在青年的情热中燃烧着的眼睛，我会疑他是三十以上的人。

——"我有好些小说，你假如有工夫，我要请你替我看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日本东京《东流》月刊第二卷第二期。

东平，即丘东平（1910—1941），原名席珍，广东海丰人。作家。一九二八年参加海陆丰起义，后参加十九路军。著有《通讯员》、《火灾》、《叶挺印象记》等。

① 指吴履逊。淞沪抗战时任十九路军一五四师四六二旅九二二团团长。

看。"这是他对我所说的第一声，意外的是说话的声音和口舌的调节，颇带几分女性的风度。

我自然是不好拒绝的。当时W便拿了一本《文学季刊》①给我，他翻出一篇题名《德肋撒》，下署东平二字的叫我看。

——"你看啦，这便是他的近作，很不错。"

《德肋撒》是一段小小的故事，是写一位在产科医院里当看护的德肋撒，起初是一位心肠硬的独身女子，对于产娘们的痛苦每每要吐出近于残忍的叱责。但后来她自己结了婚，有了孕，难产，不得不进病院去受手术。在呻吟着的时候，往年对于别人的近于残忍的叱责，自然地浮上心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故事。他在用对比法来写一个人的性格转换和心理转换，笔调有些散文诗的风味，取着寓言般的格式，象是在象征什么。全体象是一篇翻译。我觉得作者是注重技巧的人，他是有点异邦情趣的嗜好的，是一位浪漫主义者。大约也因为经验还不充足的原故吧，以我学过医而且自己收生过四五个儿女的人看来，他所描写的产褥情形，便不够真实。

仅仅是这样一篇《德肋撒》时，觉得还只象春前的一只燕子，W的"一·二八"式的大炮似乎车得有点过火。

这是东平和东平的作品所给与我的第一印象。

① 一九三四年一月创刊，郑振铎、章靳以主编，北平立达书局发行。第四期起改由文学季刊社发行，后又改由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终刊。

八月快到尾上了。东平从房州的北条海岸突然寄了一篇小说来，是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沉郁的梅冷城》，要我给他以详细的批评。

我那时很忙，忙的倒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正经事，只是忙着一家七口的面包问题。不赶着把一本书译完去预支点版税，下月便有绝粮的危险。然而我把《沉郁的梅冷城》过细读了一遍，我暗暗地感着一股惊异。我没想到《德肋撒》竟长成得这么快。他的技巧几乎到了纯熟的地步，幻想和真实的交织，虽然煞费了苦心，但不怎样显露苦心的痕迹。他于化整为零，于暗示，于节省，种种手法之尽量的采用，大有日本的新感觉派①的倾向，而于意识明确之点则超过之。我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世代的先影，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中似乎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人。——自然我在近几年来，对于中国的文坛是很疏远的，说不定这种倾向是很普遍的，或者至少是占有领导地位的。

但我终因为忙，他所要求的详细的批评我没有工夫提出。我只给了他一个简单的明信片，说他的作品"别致"。这个简单的批评大约使他感到失望吧。他大约以为我是蔑视了他，或者无诚意地没有过细读他的作品吧。就和自己的女儿被人轻视了而母亲要生气的一样，他回信来便叫我把他的作品（从报

---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以横光利一为代表的日本文学流派。曾创办《文艺时代》杂志，提倡创作依靠直觉，应用感性表达方式。其代表作有《头与腹》等。

纸上剪下的）寄还他，并说假如我只是说那样简单的话，他以后不好再拿作品给我看了。

那是九月到了初头，到海岸去的人应该陆续回东京的时候了。寄还作品的事我拖延了下来，意在等他回东京之后寄还。但没想到他的等待竟异常切迫（后来才知道要赶着寄回上海出版），见我没有立即寄还，竟寄来了一张生气的明信片：

焚香三拜请，请你老先生把我的小说寄还吧。

就是这样的简单的两句，我一读了，想起了他那两条浓厚的眉毛。

十月又到了尾上了。

有一天中午时分，东平突然和孟克① 一道，到了我寓里来。我那时刚好写了一篇小文叫着《七请》，是答复一些朋友对于我们的诘难。《杂文》② 三号上把我写给《宇宙之歌》③ 的作者的两封信发表了，意外地竟引了同一集体内的类似攻击的反应。《七请》便是那反应的反应。

我的眉毛虽然没有东平的那样粗，但稀疏地也有几根。对于诘难文字之答复，自然也不免要把几根稀疏的眉毛略略颤

① 孟克，即魏猛克（1911—1984），湖南长沙人。美术工作者、作家。一九三五年任"左联"东京分盟书记，与陈辛人等创办《杂文》月刊。

② "左联"东京分盟主办的文学刊物。一九三五年五月创刊于日本。三期后被日本当局命令停刊。第四期改名《质文》在国内继续出版。一九三六年出至第七期，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先后由杜宣、邢桐华（勃生）编辑。

③ 诗集，陈子鹄著，一九三五年七月东流文艺社出版。

动一下的。

他们是吃了中饭来的，我让他们看《七请》，各自去吃中饭去了。

《七请》本只是三千字来往的文章，在我把一顿中饭吃完了再回到他们的面前来时，不用说是已经被他们看完了。文中有几处略略过火的地方，东平都劝我删削了。

我到这时又才明白地认识到：东平不仅有一付浓厚的眉毛，也还有一双慈和而有情热的眼睛。

在第三天上，东平没有失信，把他的小说集《沉郁的梅冷城》邮送来了。

一共是三篇故事——

《沉郁的梅冷城》，

《麻六甲和神甫》，

《十枝手枪的故事》。

我仍然是在面包压迫之下，但这个集子却使我想起了一位旧时代的犹太人的话：人的生活不是专靠着面包。

晚上，面包先生把我的头脑蹂躏得来就象炎热下的柏油路快要发火的时候，我把他的集子翻来在电光下展阅，奇怪，他的小说竟有了撒水车的功效。

因此我便生出了一个贪心，想看他所已经发表过的一切作品，并同时想知道一些他的学习创作的路径。

我这个贪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他给了我一封二千多字的长信，叙述他的学习创作的过

程(这封信我要替他保存着，等到将来可以发表时替他发表)。原来他受影响最深的是高尔基和巴比塞。此外如王尔德、鲍特莱尔、尼采、莫泊桑、托尔斯泰等人都给与了他不少的影响。我现在把对于他自己的"预期"摘录下来吧：

> 我的作品中应包含着尼采的强者，马克思的辩证，托尔斯泰和《圣经》的宗教，高尔基的正确沉着的描写，鲍特莱尔的暧昧，而最重要的是巴比塞的又正确、又英勇的格调。

单这一句话可见得东平的抱负之不凡，而他的诗人气质是异常浓厚的。

他已经发表过的作品，大都已经给我看了一遍，如《通讯员》、《兔子的故事》，如《赌徒》，如《罗平将军的故事》，如《福罗斯基》等，都可以看出有一贯的基调，向着他自己所悬的"预期"在进行。然而距离，不用说是还相当的远。那些骤视俨然是互相矛盾的一批要素，要辩证地、有机地综合起来，非有多方面的努力是难以成功的。

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要想达到这个目标的努力所课于东平者的苦闷当然不小。他自己说：

> 我是一把剑，一有残缺便应该抛弃；我是一块玉，一有瑕疵便应该自毁。因此我时时陷在绝望中……我几乎刻刻在准备着自杀。

这是醉心于"不全则无"者所共同的苦痛，我自己觉得很能够了解。

真的，东平啊，我真希望你成为一把无残缺的长剑，而且

饰着无瑕疵的玉。假使办不到这步田地而你便筋疲力尽了时，我索性希望你——“自杀”。

但这“自杀”，不用说，也要采取强者的态度。

1935年11月17日

达夫的来访

不还象昨天一样的吗？转瞬已经是去年十一月的中旬了。

是黄昏时分，邻近的一位医生到我寓里来，正在谈着些医疗上的问题，突然在“玄关”门口现出了郁达夫。

——“哦，达夫来了！”我自己喜不禁地叫了出来。

达夫和十年前一样，一点也没有变。呈着满脸的喜色，而且发着愉快的声音，在和跟在他后面从邻家赶回园子里来的内子讲话。

我走到“玄关”去迎接着，另外还有一位日本人同路，在黄昏中没有认出是谁。他先向我寒暄，我才认出了是改造社的S。

S自然是替达夫作向导来的，我请他们上来，但S却推却着说：

——“突如其来的，真是失礼。今晚社长① 为达夫先生接风，在这个机会上一定要请先生出席。我们是坐汽车来迎接先生的。请务必准备好，我们立刻就走。”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上海《宇宙风》半月刊第三十五期。

① 指山本实彦（1885—1952），日本改造社创办人。

这真有点“突如其来”。我自己踌躇了一下。因为就是这位S不久才写过信来，要我在十二月号的《改造》杂志上做篇文章，我托故谢绝了。现在突然受他们的招待，觉得有点难乎为情。但又想到达夫新来，他们都那样诚恳地欢迎他，并远道坐起汽车来接我，我不出席，似乎也说不过去。结果还是决定了和他们一道去。

把先客的医生送走了，自己在把和服换成洋服的时候，让内子陪着达夫和S在庭前的园子中谈话。

园子里满地的鹦哥红(Salvia)还红得透旺，S的声音在那儿赞美。

——“乡下究竟比东京暖和啦，东京的四郊现在是什么花草也看不见了。”

达夫在和儿女们搭话。

——“这孩子总还记得我，在上海和广东时我抱过他。”他说的是中学三年的第三子的阿佛。——“还有大的两个呢？”他在问在东京住着寄宿舍的阿和和阿博，他们要在礼拜日才偶尔回来的。——“这女孩子竟长得这么大了。小学六年生？”这说的是四女的阿淑，已经十三岁了。

只有顶小的鸿儿，是五年前在这边生的，达夫是第一次见面。但那孩子和他真是一见如故，当我把衣服换好，走下庭园时，孩子已经在扭着达夫，要他把他一道带到东京去。

夜色带点苍茫的意味袭来，随着达夫与S匆匆出门，上了汽车。

达夫在掩闭汽车门时，对着送到车旁来的内子说：

——“礼拜天再来，看大的两个孩子。”

汽车跑了一段乡间的路，窜进市川市头的时候，大街都已经上着灯火了。

跑了有三十分钟光景，沿着一条大路，窜入了东京的不夜城。

达夫在车上告诉我，我们的目的地是先到改造社，当晚为编译《鲁迅全集》正在开会，有佐藤春夫诸人在座。又提到当时在报纸上流传着的仿吾的死耗，但我们都一致以为不确。

到了京桥的改造社，下车，上了楼。从临街的楼房中出来一位矮胖中年人，把我们迎接着。那人自己先行介绍，是改造社的社长Y。我是第一次见面的，看他在那精干的眉宇间却掩不住有一抹颓唐的忧愁，就好象是日本集纳主义①者的象征。

房里两壁堆着打着纸包的书，正中竖放着一张长桌，桌上堆了几垛鲁迅的作品集。桌的四周围着十来个人，的确有佐藤春夫在座。其他认得的居半数以上。

编译会是刚好开完了的光景，拟定了几张目录放在桌上。

社长Y先向我说：“请过目一下吧，有不周到的地方务望指教。”

我接了一张目录来细看了一遍，凡是鲁迅已发表过的著作是全部罗致了的。又看到其中有“书简”的一类。

---

① 作者原注：集纳是Journalism的音译，也叫做新闻主义。报纸注重新闻事件之发展，以多卖多销迎合读者趣味为主，实行资本主义新闻路线的便是集纳主义。

Y要我参加一点意见，我想到南京的《新民报》[1]正在发表着鲁迅给李秉中的信[2]，便向他们报告了。Y不以此为满足，叫我不要客气再说一些。我便想到鲁迅所搜集的许多的隋唐墓志铭来。这一部分的搜集我本没有看见过，四年前上海的内山老板曾到东京向文求堂的主人谈起，说鲁迅有发表的意思。事后文求堂的主人才对我说，因分量太大，出版经费不赀，故未实现。我想到这层来，觉得这一定是很好的历史研究的资料，便又向着大家报告了一番，明知那种朴学式的内容，和集纳型的改造社是不大相合的。说了之后，果然没有得到什么反响。接着我又真正不客气地说了几句话，我说：机会是很难得的，趁着出全集的机会，最好是把鲁迅未发表的遗著全部都搜罗起来。我看，向北平的周作人请教，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的。……

但当我的话还没有十分说完，社长Y摇起头来了，同时又把两只手背挨拢一下又分开了来。他说："他们两弟兄是这样的啦。鲁迅的葬仪时，周氏都没有亲临，并且连吊电也没有。"

我很想再说一句，叫作"至亲无文"。话都溜到唇边了，但又吞了下去。同时，我又想到我自己也是没有吊电的，听说上海有一部分的人也因此对于我有所责备。我这"无文"当然

---

① 一九二九年九月九日创刊于南京。曾迁重庆、成都，又迁上海、北京。一九四九年终刊。陈铭德创办。

② 鲁迅致李秉中信分别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三日南京《新民报》。　李秉中（？—1940），字庸传，四川彭山人。黄埔军校二期生，后成为复兴社重要分子。

又说不上“至亲”，事实上是住在乡间，过海电报不知怎么打，更想到拍电致吊本在表示自己的哀感，只要自己真实地感着悲哀，又何必一定要表示？因此也就节省了几个钱。

然而吊电的有无，事实上才有那么的严重！

停不一会，桌上的书籍通统收拾了，又来了一两位客人。结局是分乘了三部汽车，把主客全部十一人（有些社员没有参加，连坐汽车来接我的S都不在），运到了一处日本料理店。但那是什么店名，是在东京的那一个方角，都不曾过问。只是照那坐场看，达夫所受的是中等优待。

饮了不少的酒，谈了不少的天，有一位满漂亮的似乎是“艺伎”也来侑过一次酒，弹过三弦，唱过歌。在要罢席时已经是九点过钟了。

主人吩咐店里的侍女拿了些斗方来要大家题字，我自己也写了好几张。

达夫坐在首席上，我是坐在他的旁边的，他也叫我写一张给他。

我拿着笔踌躇了一下，结局是写出了下面的四句：

> 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
> 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①

第四句，开始想写成“《广陵散》绝倍苍凉”，以嵇康喻仿

① 此诗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收入《潮汐集·汐集》，题为《赠达夫》。

辱，嵇康临刑自叹“《广陵散》于今绝矣”。但念到消息本不确，便索性夸张一下，改成了国破家亡之句。

读过我的《创造十年》的人，大约总可以了解“相期赴首阳”的那个典故吧。

那已经是一九二二年的事了。时当暑假，我和达夫两人同在上海。那时《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已三阅月。有一晚同往四马路的泰东书局去会赵南公，问到杂志的销路。据说初版二千份还剩下五百没有卖完。听了这句话，两人都感慨得什么似的，约着在四马路上的酒店里去喝酒，一连喝了三家店子。昏昏沓沓、凄凄寂寂地回到静安寺路的住所，沿途曾自比为“孤竹君之二子”。

——“记得么，首阳山的故事？”我把诗写好了，交给达夫时，这样问他。

——“记得啦，孤竹君之二子啦。”达夫毫没假思索地回答着。

十一月二十九号是礼拜，在将近黄昏的时候，达夫一个人果然来了。他说孩子们没吃好饮食，太可怜，要把我们一家人都约到东京去吃中国菜。

住在东京的两个大孩子只有阿博回来了。结果是我与阿博、阿佛同达夫一路往东京，在神田的一家北京馆子里吃夜饭。

我懒得换洋服，以为纵横是自己人，便随意穿着和服了事。但套在和服上的“英邦纳斯”(Inverness)，日本人所惯用

的意大利式的披风，我是没有的。

到了神田，达夫怕我着凉，在一家洋货店里买了一条骆驼绒的围巾送我。他这厚意，真是使我感激，想到了古人的解衣推食之举。

十二月六日的礼拜，天气很晴朗。上午十点过钟的光景，我正在别室里写着一篇东西。阿佛走来报告说："有客来了，是那天晚上请吃饭的叔叔。"

达夫又是一个人走来的。他见了我，第一声便是："我昨天的讲演被警察禁止了。"

达夫在五号午后有讲演，我是知道的。主催者是一部分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文士，其中有一部分特别是崇拜达夫的人。演题是关于中国的诗。我想，无论怎样是没有被禁的理由的。

——"怕是你讲了些什么激烈的话吧？"我这样说。

——"在没开讲之前便被禁止了。"

——"是这样，那一定是主催者的手续没有办妥。"

——"讲演虽被禁止了，可会着了几位旧友。一位是村松梢风，一位是林芙美子①，他们说在十二号要请我吃饭。同时要请你出席，回头会有请帖来。又还有日本笔会，在十六号晚上请我，也要请你，大约不久也会有正式的请帖来的。"达夫很爽快地说着。

---

① 林芙美子（1903—1951），日本女作家。著有《流浪记》、《杜鹃》等。

——“你今天可有什么先约没有呢?”

——“今天可没有的。”

——“那吗,我们可以畅谈一天了。”

但达夫要求到外边去散步。因此还连献茶的机会都没有,便同他两人一道走出。

临行时,内子拿了三块钱给我,说:“这作为你们的中饭费,在市内去用中饭,用了再回来。”

朝西,取着偏僻的背径向真间山走去。山离江户川不远,虽然不高,但是,是东京附近的唯一的山。山上有座佛寺,有些森森的林木。在那寺前的高墩上,达夫和我同去立了一下,倚着一株古老的深松。

江户川两岸的情景在一望之中。川上横列着三条铁桥。南端的一条通着省线的电车和火车,中间的一条通着汽车和行人,北端最近的一条是私营电轨所贯通着的。交通照例是络绎不绝。隔河虽便是东京,然而是新市区,依然是一望的田畴,离殷盛的旧市区还相当的远。

伫立了一会,又取背径插向江户川边。川上有高大的堤,宽广而坦直。冬阳颇暖,江风亦无寒意。与达夫并肩而行,用着母国话谈着些无足重轻的往事。然而这在我是十年以来所未有的快活。

话头本无足重轻,自然值不得纪录。有好些,也就和那拂面的江风一样,吹过后便毫无痕影了。只记得达夫说到他打算到欧美去游历,回国后想寻个机会来,实现这个计划。这层,我是极端赞成的。我看达夫的使命依然是做个文艺作家,

与其为俗吏式的事务所纠缠，倒应该随时随地去丰富自己的作家的生命。凡是达夫的友人，怕都应该注意到这一点，玉成达夫的志愿的吧。

达夫说，他以后打算多取历史的题材来做长篇创作。这自然是该走的一条路。他又说他打算用旧诗的形式来尽量表现新的现象。这种黄公度①路的重践，我却没有表示出什么可否的意见。

在堤上可走了一个钟头的光景，起初是溯江而上向着北行，后来是顺流而下向着南走。中午时分了，折入市中，走到了一家"蒲烧"店去。所谓"蒲烧"，日本音是读为kabayaki，是用文明火烤鳗鱼片，涂有酱汁。这东西颇可口，就是不能吃日本菜的人，这"蒲烧"和牛肉锅，都是喜欢吃的。

"孤竹君之二子"登上了一间小楼房，不仅吃了"蒲烧"，而且还喝了好些酒。结局是费了两个钟头的时间，吃了六块多钱。钱，不消说，又是"叔齐先生"付的。

达夫这次来日本，前后滞留了足足一个月。他来我寓里共有这三次。此外由于日本人的招待，在东京也和他会见过三次。他是十二月十七号的早晨离开东京的。我曾跑到东京驿去送行，赶到时已经是发车的哨子在响的时候了。由三等列车赶过二等列车，在每个车门和窗口上都没有看见达夫。

---

① 黄公度(1848—1905)，名遵宪，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清末诗人、外交官。曾与谭嗣同、夏曾佑等倡导"诗界革命"。著有《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等。

我还以为他是临时改了期。开动着的车子和我擦身驶过，在最后的一等车的车尾的凉台上才看见了达夫。他一个人立在那儿，在向着人挥帽。

我折回头跟着车子赶了几步，大声地喊了几声“达夫”，也向他挥着帽。

但在那稠杂的人群中，他是否看见了我，并是否听见了我的声音，我是不知道的。

我的心中偶然又浮上了“《广陵散》绝倍苍凉”的那句话来。我失悔写给达夫的那首诗，第四句没有用这一句。

1937年1月8日

断线风筝

——纪念于立忱女士

碧落何来五色禽，长空万里任浮沉。
只因半缕轻丝系，辜负乘风一片心。

这是立忱《咏风筝》的一首七绝。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达夫要离开东京的前夜，日本笔会招待他，并请我作陪。在席散后，我把达夫拉到澁谷的立忱寓里去，她当晚把这首诗写给了我们看。

我觉得诗还不错，达夫也说好。

我当时有点感触，也就胡乱地和了她一首。立忱立即拿出一张斗方来要我写，我也就写了给她。

我的和诗是：

横空欲纵又遭禽，挂角高瓴月影沉。
安得姮娥宫里去，碧海晴天话素心。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上海《妇女生活》半月刊第四卷第十一期。

于立忱(1912—1937)，原名佩琛，广西贺县人。抗战前夕任天津《大公报》驻日记者。

① 此诗以《断线风筝》为题收入《潮汐集·汐集》。

但我把题目改为了《断线风筝》。

立忱连说:"格调真高,格调真高。"

达夫没有说什么。我自己却明白地知道,不外是打油而已。

达夫当晚也为立忱写了一张斗方,但他没有和,只写了一首旧作,有"巴山夜雨"之句,全辞不能记忆了。

我回千叶的时候,他们送我到澁谷驿。步行的途中也把轻丝断线一类的话头来作过笑谑。

在澁谷驿前一家快要闭店的饮食店里,达夫一个人还喝了两合日本酒。我和立忱喝着红茶陪他。

我一个人回到乡下的寓居时,已经是一点过钟了。

是没有月的夜,"娥理容"①星悬在正中。

立忱死后已十日,很想写点文字来纪念她,什么也写不出。只她的《咏风筝》和我的《断线风筝》总执拗地在脑子里萦回。

1937年6月1日,园子里的大山朴,
又开了第一朵白花的清晨。

① 英语 Rigel 的音译,即猎户星座的第一亮星。

由日本回来了

七月二十五日

今天是礼拜，最后出走的期日到了。自华北事变①发生以来，苦虑了十几天，最后出走的时期终竟到了。

昨夜睡甚不安，今晨四时半起床，将寝衣换上了一件和服，踱进了自己的书斋。为妻及四儿一女写好留白，决心趁他们尚在熟睡中离去。

昨晚由我的暗示，安娜及大的两个儿子，虽然知道我已有走意，但并不知道我今天便要走。我怕通知了他们，使风声伸张了出去，同时也不忍心看见他们知道了后的悲哀。我是把心肠硬下了。

留白写好了，连最小的六岁的鸿儿，我都用“片假名”(日本的楷书字母)替他写了一张纸，我希望他无病息灾地成长起去。

留白写好了，我又踱过寝室，见安娜已醒，开了电灯在枕上看书，自然是因为我的起床把她惊动了的。儿女们纵横地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海《宇宙风》半月刊第四十七期。

① 即芦沟桥事变。

睡着，均甚安熟。

自己禁不住淌下了眼泪。

揭开蚊帐，在安娜额上亲了一吻，作为诀别之礼。她自然不曾知道我的用意，眼，没有离开书卷。

吻后蹑木屐下庭园，花木都静静地立在清晨的有凉意的空气中，尚在安睡。

栀子开着洁白的花，漾着浓重的有甜味的香。

儿们所掘的一个小池中，有两匹金鱼已在碧绿的子午莲叶间浮出了。

我向金鱼诀了别，向栀子花诀了别，向盛开着各色的大莲花诀了别，向园中一切的景物诀了别。心里默祷着妻儿们的和一切的平安，从篱栅缺口处向田陇上走出。正门开在屋后，我避开了正门。家前的篱栅外乃是一片的田畴。稻禾长已三四寸，色作深青。

璧圆的月，离地平线已不甚高，迎头望着我。今天怕是旧历六月十六日吧。

田塍上的草头宿露，湿透了我的木屐。

走上了大道，一步一回首地，望着妻儿们所睡的家。

灯光仍从开着的雨户露出，安娜定然是仍旧在看书。眼泪总是忍耐不住地涌。

走到看不见家的最后的一步了。

我自己毕竟是一个忍人，但我除走这条绝路之外，实在无法忍耐了。

自事变发生以来，宪兵、刑士、正服警察，时时走来监视，作些无聊的话语。这些都已司空见惯，倒也没有什么。但国族临到了垂危的时候了，谁还能安闲地专顾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

处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我自己现在所走的路，我相信正是唯一的生路。

妻儿们为了我的走，恐怕是要受麻烦的吧。这，是使我数日来最悬念的事。

昨晚，安娜知道了我有走意，曾在席上告戒过我。她说：走是可以的，只是我的性格不定，最足耽心。只要我是认真地在做人，就有点麻烦，也只好忍受了。

女人哟，你这话是使我下定了最后决心的。

你，苦难的圣母！

沿途的人家都还是关闭着的，街路上的电灯都还朦胧着做着梦的眼睛。

路上只遇着了些配报的人。配报者有的投我以颇含惊异的一瞥。

电车还没有开动。走了两个车站，看见在站口上已有两三人在等车了，我也就走到月台上去等着。

儿们醒来，知道了我已出走，不知道是怎样的惊愕。

顶小的可爱的鸿儿，这是我心上的一把剑。儿，望你容恕你的父亲。我是怀抱着万一的希望的，在不久的将来，总可以再见。电车开来了，决绝地踏上了车去。

五点半钟的光景到了东京，又改乘汽车赶赴横滨友人①家，在那儿借了套不甚合身的洋服和鞋袜来改了装。九点半钟的时候，友人偕我到车站，同乘“燕号”特别快车，赶赴神户。

这位朋友，我现在还不好写出他的姓名，车票、船票、一切等等，都是他替我办的。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他。

沿途都还在出兵。静冈驿有兵车一驾停着，正待开发。月台上有许多男女，手拿着太阳旗在送行。其中有许多穿着制服的高等学校学生和许多中、小学生。

沿途的人家也都插着旗帜表示欢送。有标语横张着，大书“欢送皇军出征”。

“燕号”车中也有不少的军人。我们坐的二等，在我旁边便坐着一位步兵少佐，手里拿着一卷油印的军事计划书，时而展阅。我偶然瞥见有“第一作战计划”、“第二作战计划”等字样。

太阳正当顶，车中酷热。田里的农人，依然孜孜不息地在耘着稻苗。

火车一过身，路线旁拿着小旗的儿童们有的在欢呼“万岁”。

下午五时半到达神户，坐汽车直达码头，平安地登上了坎拿大公司的“日本皇后号”(Empress of Japan)的A Deck(头等舱)——平生第一次坐头等舱，有如身入天堂。但是，家中的儿女，此时怕已堕入地狱吧？假使在这样舒服的地方，得和

---

① 指钱瘦铁(1896—1968)，名厓，字叔厓，江苏无锡人。书画家。

妻儿们同路，岂不是也使他们不致枉此一生？

友人把我送上了船，他告辞先走了。

船是九点钟开的，自己因为含悲茹痛便蛰居在舱中，从开着的圆窗孔望出，看着在码头上送行的人们。也有些人在投纸卷，五色的纸带在码头与船间的空中形成着玲珑的缨络。

锵琅嗞，锵琅嗞，锵琅嗞……

船终竟离岸了。

五彩的纸缨络，陆续地，断了，断了。

船上的人有的把纸带集成一团投上岸去，岸上的又想把它投上船来，然而在中途坠落了——落在了下面的浮桴上。

向住了十年的岛国作了最后的诀别，但有六条眼不能见的纸带，永远和我连系着。

二十六日

今天依然快晴，海上风平浪静。

一个人坐在舱中写了好几封致日本友人的信。对于日本市川市的宪兵分队长和警察署长也各写了一封，道谢他们十年来的“保护”的殷勤；并恳求对于我所留下的室家加以照顾。

寂寞得不能忍耐，想到三等舱里有一位C君①，他是在二十二日的夜里到我寓里来辞过行的。我们虽然将要同船，但我那时没有告诉他。

要听差的把他叫了来，C君吃了一惊。

① 指金祖同（1914—1955），笔名殷尘，浙江嘉兴人。著有《郭沫若归国秘记》。

——先生，你一个人吗？

——是的，我一个人。

以后好一会彼此都没有话说，连C君都有点泪潸潸了。

想起了十四日那一天，写给横滨友人的那首诗。那是写在明信片上寄给他的，用的不免是隐语。他的来片也是隐语，说青年会有西式房间十八、二十、二十四号等，设备均甚周全。青年会者神户也，西式房间者外国船也，号数者，开船的日期也。日本报虽然天天传着紧张的消息，但要和妻儿们生离，实在有点难忍。因此，我便选定了二十四号那最后的一只。实则二十四乃是横滨出帆的日期。

廿四传花信，有鸟志乔迁。
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
托身期泰岱，翘首望尧天。
此意轻鹰鹗，群雏剧可怜。

想起了二十四日那一天，预想到回到了上海的那首七律。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这是用的鲁迅的韵。鲁迅有一首诗我最喜欢，原文是：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第七句记得有点模糊，恐怕稍微有点错字。

原诗大有唐人风韵，哀切动人，可称绝唱。我的和作是不成气候的，名实相符的效颦而已。但写的时候，自己确有一片真诚，因此工拙也就在所不计了。

细细考虑起来，真的登了岸后，这诗恐怕是做不出来的。民四（一九一五年）"五七"回国时的幻灭感，在兴奋稍稍镇定了的今天，就象亡魂一样，又在脑际飘荡起来。那时因日本下了哀的美顿书，我怆忙地回国，待回到上海而袁世凯已经屈服了。

一只爱用了十几年的派克钢笔，倒的确和着家室一同被抛在日本了。

但是，缨呢？如有地方可以请，该不会是以备吊颈用吧？

有妹子① 在西湖，妹倩② 在那儿经商，到了上海后或者就往西湖去看望我二十五年来不曾见过面的骨肉。

离开四川二十五年，母死不曾奔丧，兄逝不曾临葬，有行年九旬的老父，如可能，也想乘着飞机回去看望一次。

四川的旱灾也是该得去踏访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

① 指郭琬秋。

② 指胡灼三。

立定大戒：从此不吃酒，不吸烟，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但要锻炼自己的身体，要有一个拳斗者的体魄，受戒僧的清规。

我在心中高呼千万遍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之名以为鉴证：金石可泐，此志难渝。

自己是很清明的，并没有发狂。

下午在小艇甲板上遇着一位阿富汗斯坦的商人，能操英语、日语。他约余投环作庭球式的戏，应之。

戏可一小时，流了一身大汗。海风吹荡，甚感快慰。

海水碧青，平铺直坦，略有涟漪。

阿富汗人连连说：跳下去游泳吧，跳下去游泳吧！

但怎样上船呢？我问他。

他把头偏了几下。

那人是摩罕默德教的信徒，据说该教中人反对跳舞。

洗了一次澡。

自己随身穿着的一条短裤，已被汗渍，自行浆洗了一次，在电风扇上吹干之。

这短裤和一件布日本服，都是安娜替我手制的，我将要永远保藏着，以为纪念。

傍晚，C君邀了几位朋友来谈话。见我衣不合身，争解装相赠，但是，不是过肥，便是过瘦，不是过短，便是过长。据这样看来，我自己似乎最合乎“中庸”了。我这样说出了，惹得大家

好笑。

船上的水手和听差的，几乎全部都是广东人。他们发起了一个“慈善会”，正在募捐。所谓“慈善”者乃是对于抗敌战士之慰劳。因为是在外国人的船上，不好明目张胆地使用救亡抗敌那样的名目。

执事的人到了我房里来，有一位男装的广东女士，普通话说得满好。

她说，他们要捐钱去慰劳华北的抗敌将士，到了上海立刻便要献给政府，请替他们送到前方去。

她说，船上的中国同胞都很关心，很想知道一些详细的情形，关于国际的和国内的，尤其关于日本的。本日晚他们要在三等舱中开一次大会，要请几位从欧美回国的人和从日本回国的人讲话，还有些余兴，要唱广东戏。

听了这些话，感觉着十分的愉快。他们要我捐，我也就捐了五元。这五元的“慈善”，实在是慈他人之善。我出家时，身上只带了五毛钱的电车费。然而我现在的钱包里已有五十块大洋了。这都是那位横滨朋友的慈善事业。

慈善会我没有出席，因为我并没有用本名。三等舱中客人最多，恐有面熟的，反感不便。

二十七日

晨五时起床。

昨夜十时半就寝，睡甚安稳。

吃早餐时，会普通话的广东女士走来报告。

她说，昨晚的会成绩很好，捐了四百块钱的光景。有一位参加了英王加冕礼回来的人最先演说。据说，中国和英国已有协商，中国政府将以最小的牺牲收回全部失地(她在“最小的牺牲”那五个字上说得最用力)。上台时备受热烈的鼓掌欢迎，下台时却没有人鼓掌。大约因为听的多是广东人，不懂普通话的原故吧。

这位女士短小精干，而且说话也似乎颇懂得“幽默”。

清晨，在枕上又做了一首诗。

此来拚得全家哭，今往还当遍地哀。
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

吃中饭时广东女士又来报告，说下午二点半便要到上海了。

我顾虑到自己的衣履太不合身，问了问她：船上的卖店有没现成的可买？

她说：有是有的，但价钱很贵。他们用的美金，一条裤子买起来也要费你七八十块中国钱，你何苦把钱给外国人赚呢？我看你忍耐一下，到上海买合算多了。

我感谢了她的忠告。

她又问我：中国究竟打不打？

我说：论理呢，早就是应该打的；不过究竟能打不能打，我

不得而知。

她有点失望的样子。

在上甲板上又遇着那位阿富汗商人，并排着在甲板上散了一回步。

我问他回教人普通行礼的方法是怎样。他把两手向胸前操着，把上身略略屈了一下。他说，就是这样，和中国的打拱差不多。

我请他唱首阿富汗的歌给我听。

他一面走着，毫不犹豫地便低唱了起来。人是那样的魁梧，歌声却清婉如女子。歌意我是不懂的，他替我用英语翻译了一下：

"I love you, I love you,

You are my sweet-heart……"①

盖乃情歌也。

——Have you sweet-heart?

——Yes, I have.

——Chinese or Japanese?

——Chinese and Japanese.

——Oh, have you many, many?

——No, I have only one, because she is Japanese girl and become my wife.

——Oh, so. But I like more Chinese girl than Japa-

① 作者原注："我爱你，我爱你，你是我的可爱的心肝……"

nese.

——Why?

——Because Chinese girl is very, very fine.①

阿富汗商人很愉快地谈着，但他却没有想到我自己的心里是含着悲戚的。

广东女士又走来了，她说，税关要来检查行李了，请你把行李收拾好，叫听差的提到上甲板来。

我告诉她，我是什么行李也没有的。

她踌躕了一下，把手中卷着的一本便装书展开来，原来是我的《北伐》。

——好不？——她说，——请你替我签个名？

——你怎么知道我呢？

——我看见过你的相片。昨晚我们来捐钱，我早就认出你了，但我没对别人说。我看见你用的假名叫Young Pat-ming，我晓得这里一定是有原故的。这《北伐》上也有你的相片，不过是瘦得多。你现在壮了。

我自己没带笔，走进"纱笼"去，在《北伐》的第一面上替她题了两句旧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自己是壬辰年生的，今年四十六岁。想起了十几年前，在

---

① 作者原注：这些是同阿富汗人用英语的对话。（阿）你有爱人吗？（郭）有。（阿）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郭）中国人和日本人。（阿）哦，你有很多，很多？（郭）不，我只有一个，因为她是日本人而成了我的太太。（阿）哦，那样的。但我，比起日本女人来更喜欢中国女人。（郭）为甚么？（阿）因为中国女人很美，很美。

上海城隍庙曾被一位看相的人开过玩笑，说我四十六岁交大运。此事是记在我的一篇杂文《湖心亭》里面的。忽然忆及，顿觉奇验。所谓“大运”者，盖生死大运也。

海水呈着嫩黄的颜色了。

1937年8月1日脱稿

回到上海

一　黑色的笔

回到上海不觉也快两礼拜了。

初来时满以为这笔是可以投的，事实上朝夕相随的一枝头号派克的红笔，是被投在日本了。

但回上海后的第三天，有一位女性的旧友①，她又替我买了一只二号的派克真空笔来，颜色可不是红的，而是黑质，有黄色的环纹。

她说，你是使用笔的人，没有笔很不方便，故尔买了这枝笔来奉送。

她又说，她自己是喜欢黑色的，但没有，只好买了这种。但又怕我不喜欢，故而把发票也带了来，不高兴时可以拿去掉换。

看发票是"二十四元"，这厚情把我自己一切的奢望都打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六年五月上海北新书局版《归去来》。

① 指黄定慧，原名慕兰，一九〇七年生，湖南浏阳人。大革命时期，曾任汉口特别市党部候补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后，任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第一难民收容所总干事。

消了。

自己是决心和笔断绝关系的，然而一回国便有女友送笔。

笔和我如不能断绝关系，自己的心意是依然迷恋着红色的，然而送笔的女友，却喜欢的是黑色。

笔乎，笔乎，黑色的笔乎！

汝将与我长此而终身乎？

二 一座荒坟

是七月三十号，回国后的第四天。

上午偷了一点空闲，和两位朋友去吊于立忱的墓。

立忱是二月由日本回国，五月自杀了的。

朋友之一谈到她的绝命辞。是“如此家国，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据说第二的“如此”两字是后加的，足见她在决死的一瞬前，意识都很清明，而在锐意修辞。

这样的一位好女子，实在是不应该死的。

到了中国公墓，入门右转，走可三二十步，在路的左侧，几株杂树阴里，横着一个长方形的土坪，周围有石围护。

朋友之二说，这便是立忱的墓了。

碑还没有建立。

墓头有四只已经萎黄了的花篮，大约还是送葬时的品物。

我有点害怕，立忱所走的路，似乎暗示着了我自己的将来。

三 蛾

八月一日搬进了这家捷克斯拉伐克人的公寓里来。

二楼，朝南有三堵窗，不断地有南风吹来。

窗下有一面大草园，也略略有些花木。

这些是把我系留着了的。

初搬来的一晚上，有位朋友在壁上发现了一只很大的暗灰色的蛾。

友人要扑杀它，经我劝止着了。

今天已经是九号了。一个人坐在电灯光下提起笔来，想继续写些文章。无心之间又看见那匹暗灰色的蛾，孤孤单单地，一丝也没移动，依然伏在那原有的地位。

想起了贾长沙的《鹏鸟赋》①。

四 微 笑

公寓生活已经一月有半了，一晚独自归来，看见赠笔的女友在桌上为我留下了一张字条。开首几行是：

我在这儿又静静地坐了三十分钟，一个人望着壁上那只神秘

① 西汉文学家贾谊遭谗贬为长沙王太傅时，因感身世，曾作《鹏鸟赋》。

的蛾，不免生出了无限的感慨和幻想。

是的，那神秘的蛾，始终张着翅子，伏在壁上不动。

太神秘了，你这灰色的使者。

我起了决心，想过细地去看它一下，究竟是否还有生命。

我过细看了，我笑了，一月有半以来一个人独自会心的微笑。

原来那蛾是被先住者钉在壁上的，针已锈得和蛾色一样，看不出了。

明天，赠笔的友人如来，这消息值得珍重地告诉她。

1937年8月

到浦东去来

一

汽车在公路上跑着，沿途多有军事设备，砂囊的堆积，代替铁蒺藜的树枝纵横。那树枝是临时从路旁的杂树斫伐下来的。树叶早已枯了，那提醒我们：战事自发动以来已经经过了十天。

沿途隔不多远便有站岗的兵。我们的汽车头上张贴着"沪警车辆通行证"，丝毫也没有阻碍。汽车以一小时五十英里的速率奔驰着。

路旁绿色的田地在烈日光中虽然有点倦容，依然带着和平的风貌。农人担着农具在路上走，水牛拉着水车在草棚里转。清风不断地从车窗孔袭来，那是上海市上所不能有的风。

同车的某君说：敌人的飞机不会投炸弹吧？

另一某君说：那可保不定。

然而天上没有飞机，地上也没有落过炸弹的痕迹。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六、二十七日上海《救亡日报》。

跑到了黄浦江边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有一批人要往前线去慰劳，须得等着他们一同渡江。

渡口是一个小市（地名我在这儿却不便写出）①，临江的街边多饲着一些白毛猪，被圈在竹栏里。有些猪四蹄被绑，安静地在石面地上，没有竹栏。臭气在和风作顽强的抵抗，更有苍蝇作后援。

等了有二三十分钟的光景，慰劳队的人分乘着两部汽车来了。另一某君告诉我：里面有杜月笙、钱新之、宋子良、吴开先② 诸人。

渡船尾上插着一只小白旗，写着"摆渡第十一号，船主王柏亭"。

江水呈着沉闷的灰黄面孔。

渡江又分乘了三部汽车，有一部浑身涂了泥，和黄浦江旁的肥猪色相仿佛。这自然是避免敌人的烟幕，否，泥幕了。

又是一趟一小时五十英里的兜风，沿途的人家多涂成了灰色。有一家前面竖立着一个怪物，是一根一人高的圆柱，全身污黑，头上插着些枯了的树枝。我疑心是避邪的有关民俗的东西，然而同车的某君毕竟比我聪明。

那个汽油泵，你看！他对我这样说。

---

① 作者原注：地名"闵行"。

② 杜月笙（1888—1951），原名月生，后名镛，上海人。上海法租界青帮头目之一。曾任中汇银行董事长、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 钱新之（1885—1958），原名永铭，浙江吴兴人。一九二七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一九二九年为杜月笙筹划、创建中汇银行。 宋子良（1892—？），广东文昌人。 吴开先，一八九九年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国民党CC头目。

原来那红色的汽油吸筒为避免敌人的视线也变成了那样的一种奇怪的样式了。

终竟到了向华所驻扎的地方。

二

向华是张发奎的号，他是我们北伐时代的老朋友。他现在是在浦东指挥着沪浙区的前线的军事。

我从日本回国不久的时候，他曾由嘉兴来看过我一次，并约我去游南湖，凭眺过那儿的烟雨楼；因为他的"苏浙边区绥靖公署"是设在南湖边上的。

十二号的清晨，是虹桥事件①发生后的第三天，我也曾如约去访问过他一次。我和他两人坐着摩托小艇在南湖里游了半天，在烟雨楼头也喝了一会茶。据说，嘉兴颇有点象意大利的威尼斯，只是肮脏得一点。

就在那一天，日本有十三只兵舰开往杭州，又折回上海；有两只飞机飞到嘉兴上空侦察。这是我们在吃中饭时所得到的情报。

向华曾对我说：南方的战事早迟是会发动的。发动了便立刻打发汽车来迎接我。

我在嘉兴只住了半天，当晚乘夜车到杭州去看了我的妹

① 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日本侵略军驻上海陆战队中队长大山勇夫和水兵斋藤要藏乘军车冲进虹口机场，枪杀一名中国卫兵。中国军队自卫，击毙大山。日军以此为借口，于八月十三日大举进攻上海。

子，第二天一早便赶回了上海。但谁也没有想到火车开到西站便已经不能前进了。北站已经戒严，往北站去迎接我的人，都扑了一个空。在飞机炸弹下的生活居然过了十天，今天二十四号，向华打发来接我的汽车果然也就来了。

三

十日不见，多少有点髀肉之叹的向华似乎更加焕发了。他很慷慨地和慰劳队诸人握手言欢，我也侧闻了他的高论。

据他说：日本兵真是怕死，单在苏浙区内所打下的日本飞机便有十五架。飞机师凡是遭到生擒的，见了我们立即便叩头求饶，说愿意投降做中国人。飞机师身上都穿得有所谓“千人针”的护符。

这“千人针”的缝纴是我所曾目睹过的。日本人每遇战事，便有好些妇女拿着布匹和针线巡行街头，请求过路的人每人缝上一针。这密密地缝就了的布便送到军部去，作为前敌将士的避弹的护符。那东西真正能够避弹吗？那当然是出于迷信。

向华又说：日本兵真是怕死，凡是在浦东上岸的兵，一遇着我们追击，便四处逃跑。你东打，他西逃，你西打，他东逃。逃得快一点的都逃回军舰去了。现在浦东岸上已经没有一个敌兵。

慰问队的人有的问向华，究竟需要什么东西，凡是有什么需要都请告诉他们，他们便立即备来。向华说：我需要日本兵

拿来给我打，请你们多多给我备来。

这话倒说得很机敏，大家都发出大笑。

向华最得意的是他所指挥的炮队。炮火真是准确，凡是浦东沿岸的日本人的码头堆栈全部打得精光，我现在由东至西地把那重要的名称揭在下边：

三井煤炭下码头，

日邮船码头，

川崎船渠，

岩崎用地，

上海制纸公司，

日华纱厂，

大仓码头，

日清码头，

三菱公司码头。

这些都是日本人的重要产业地，据说单是三井煤炭码头的煤炭已经就有万万元以上的价值，日本海军多是从那儿取煤用的。前几晚上我们由外滩遥望浦东，见四处都起着猛烈的大火，大有"火烧连营七百里"的形势的，便是这些地方的堆栈被火葬了。

三四十年的经营一旦化为灰烬，日本的资本家中据闻有因此而自杀的。但这怪得谁呢？纵容军人，使他们跋扈飞扬、横暴无耻的，不正是日本资本家吗？自己养的猛犬发了狂，回头被它咬了一口，这正是作孽自受。

向华很得意，他说，虽然敌人不够他杀，但有敌人的产业

够他们的炮轰，他是死而无憾的。

话是说得很慷慨的。

四

慰劳队的人先走了一步，有几位是回上海，有几位是往杭州。

我们走得稍微迟一点。向华有意留我在他那儿多住一下。他说，有一家宏大的西式房子可以供我住，设备一切都完全，洗澡间不用说是有的。

他知道我喜欢洗澡，特别提到洗澡间上来。是的，假如有人要处我以死刑，在行刑之前更允许我说出最后的希望时，我一定要这样请求说："请为我打一盆清洁的水，让我入浴一次，然后把我处死。"

闻着别人的汗臭在比闻着氯气还要难受。

浦东，据说，敌人是没有胆量上岸的。扬子江南口，自徐家路镇至白龙港的一带，水深，船容易靠岸，敌人屡次在炮火的掩护下企图登陆，但都被击退了。

想到上海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还有许多朋友不好离开，浦东虽然值得留恋，虽然有洋房和洗澡间，但我依然告别，折回上海。

在临别时向华又对我说，你随时来，我都欢迎。这儿可惜没有仗可打，只是消息要比较灵通一点。

他这句话倒是很老实的，所谓"比较灵通"是比较我灵通

而已。

路上依然有悠闲的农人，水车棚里依然有水牛拉着车，满孕着清风的汽车又把我拉回了飞机与枪炮在空中奏着音乐的上海。

1937年8月25日晨

前线归来

一

从杨行回来的晚上，因为已经十一点半钟，寓里的热水管已经停了，便打开冷水管子来洗了一次澡。因为疲倦，又感觉燥热，便照例开着南窗睡了。

睡得很舒服，深熟，醒来已经是第二天八点钟。象这样深熟的睡眠，回到上海以来，还是第一次。然而我的素来不甚健全的肠胃却罗唣了起来。自已是学过医的，便给它个饥饿治疗。整整饿了两天，到第三天上，在附近友人家里，才开始吃了两餐稀饭，身体相当萎顿了下来。

回杨行后的第四天是九月初七了。清早一位姓洪的来访，他说，××（辞修）① 有信给杜君，要请我到××（昆山）去商量点子事情，不知道我愿不愿意去。如愿意去便把杜君引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二至十四日上海《救亡日报》。

① 作者原注：发表时把人名和地名都用〈〉代替的，现注入。〔辞修，即陈辞修（1898—1965），名诚，浙江青田人。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第三团团长、抗战初期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前敌总指挥等职。——注释者〕

来，叫他设法备汽车。

××（辞修）是现任江防总司令××（陈诚）的号，和他自武汉一别以来已经十几年不见了。我是很愿意去和他见一见，但又不免顾虑了一下自己的身体，饿了几天，再来长途奔驰，不知可否吃得下。但这样的顾虑却只有一瞬间。可以说我的大脑皮质上的某一部分细胞正在这样踌躇的时候，而另一部分的细胞已经命令我的喉舌发出了声来。

——好的，我去。你把杜君引来好了。

回头杜君也就来了，约好晚间出发，他打发汽车来接我。

二

晚上五点钟由寓里出发，辗转地换了好几次汽车。到了九点半钟，才同杜君两人认真地由小南门向前途出发。

敌机不断地来袭，沿途的市街都是熄了灯的，俨如一座死城。步哨是密接地布设着的，口令森严，真有些战地风味。

原野中，秋虫清冽地叫着。天上有繁星罗列，正是银河泛澜的时候，然而夜景却很朦胧。队伍的调换，卡车的来往是很频繁的，有些地段，公路的两旁为一上一下的士兵骡马蚁接着，使汽车向前开驶，十分费力。所谓"伟大的时代"，"神圣的战争"，那些语汇的意义，到这时候才真切地感觉着。武装着的同胞们是以自己的血、自己的肉，来写着民族解放的历史。坐在汽车里不知不觉地便惭愧起来：自己有什么德能，公然敢坐汽车？

而且，这汽车还得声明，是商团向私人借来的，并有四位戴铁盔的商团护卫着。

“精诚团结”的话，在口头是讲过，在文字上是看见过，如今是身受了。

自己所愁着的身体，为兴奋、惭恧、感激种种精神上的活动所饬励、鞭挞、鼓舞，却反而振作起来了。病不知躲向何处去了。饥饿也随着它脱离了我的身体。

汽车跑了多少时间，经过了什么地方，在这儿我都不好写。在这儿我深切地感觉着文艺的功利性了。所谓“有什么话写什么话”的那种话，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那种艺术，在平时听起来倒很象是自由而高尚，然而到了战时呢，唉，自己把尊容露出了，只是——汉奸。

三

到了目的地点了。探问起来，××（陈诚）却是上了前线。因为是在夜间，不愿意使人麻烦，不愿意扰乱战友们的宝贵的清睡，我便提议就在汽车里过夜，大家也赞成了。

在汽车里过夜，虽然逼窄得一点，实在十分舒服。因为我们的士兵多是在街头巷口、公路两旁的地面上过夜的。坐在上海租界里过着乐园生活的人，如要想象士兵所过的生活，只消把前几天沪战发动时的一幅难民流离图复活在眼前就够了。

在清凉的朝气中醒来，看明了所睡的地方是街道上的一

片隙地，有株槐树罩着，下有一潭的绿水。正对着的另一街侧有一家做豆腐的人家，已经早早开门在做生意了。

杜君叫我去吃点豆浆和油条。我走进店里时，店中的主持人是一位穿件蓝布衫的六十岁以上的老妈妈，细长的身材，细长的面孔，精神十分活泼，动作异常灵敏，在年青时一定是美貌过来的。她的助手是一位四十来往岁的媳妇，那人却矮而向横的空间发展，面孔忠厚，是一幅随处可见的乡村妇型。还有一位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大约是老妈妈的孙女吧，面貌和身材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折半。这位姑娘穿一件黑色人造丝的短上衣，白色裤子，是十五年前上海已曾流行过的装束了。现行的旗袍，长裾短袖，和西洋夜服相差不远，已经看得有点令人生厌了。看到这十五年前的古式服装，反而觉得本色而脱俗。姑娘面上有点雀斑，敷着一层薄薄的粉，快要脱掉"无嫌猜"的境域而尚未脱掉的一切表情和动作，不错，是很可爱的。

这儿的人情，就和这儿的空气一样，大和上海不同。上海市上的人是失掉了清晨的，也可以说上海市上压根儿便没有清晨。尽管你就在四五点钟的时候起床，都隐隐有一股炎热气袭击你。人情呢？也相差不远。然而，这儿的人，却和这儿的清晨是一样。

老妈妈叫小姑娘替我打水洗脸，磁盆、温水、面巾，都相当干净。我自己是有点洁癖的人，但丝毫的忌避意也没有生出。

一大青花碗的豆浆，两根油条。问要白糖，白糖没有。

我的经过了一番饥饿治疗的不健全的肠胃，跑到乡下来，

又算是经过了一番转地治疗，觉得一点也不罗唣了。纯粹的豆浆胜过上海市的所谓"牛奶"。

我吃完了。杜君替我付了钱，但老妈妈说不要，妈妈说不要，小姑娘也说不要。不过，我们没有让她们不要。我们走出了店门。应着杜君的提议，便从一条侧巷插向原野里走去。

四

禾稻已经是达到成熟的时期了。

看见玉蜀黍，动了食思。玉蜀黍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鲜嫩的玉蜀黍无论烧食或者煮食，但千切不要涂酱油或者白达油①，那滋味实在是够人领略。今年一直还没有吃这玉蜀黍的机会。

荒野上开着一片野生的牵牛花，都是一律的蓝色。这花是只知道有清晨，不知道有炎昼和黑夜的，一万个清洁的小小喇叭，齐向天空吹奏着朝颂。

一道小河，水是活的。一群细长的小鱼，长可二三寸，在离水面不远处作集团跳舞。那活泼！那欢喜！

我看见了荷花，看见了开着各种花样的美人蕉，看见了开着白花的紫苑，红花的紫薇，看见了我所喜欢的大山朴，但花是开过了的。

不期然地遇着了司令长官冯××（玉祥）。

---

① 英文 butter 的音译，即奶油。

文章在这儿写得很突兀，但事实在实际上更要突兀，恕我待日后再自行加注吧。①

十年不见的老将军，磅礴的气概依然不减当年。被他留着又吃了一顿早餐。大饼、油条、白饭、米汤、炒鸡蛋、煮鸡蛋、蛋花丝瓜汤、小青菜，此外还有三四种素食，我老实不客气地向我的罗唣了几天的肚子里尽瓤。让我成为一颗爆击弹吧！轰的一声把我自己轰成灰。

坐了一会，打算再去看××(陈诚)。问到冯将军近来有诗作没有。他答应说有三首。我说，可让我拿回上海去发表？他说，好的，看了××(陈诚)后请再来。我们也就辞别了。

真正是有点出其不意。凡是武装同志，认得我的人，不知道何以这样的多。在街头迷失了方向，向过路的两位武装同志问路，原来又是认识我的人。由他们把我们引到××(陈诚)那里，刚刚走到门口，轰隆隆地飞机来了，是敌人的。引路的把我引到葡萄架下伏着。

轰隆……轰隆……轰隆……

连炸了二十几下。

五

××(陈诚)不在，但他的去向连他的左右都不十分清楚。

遇着了那儿的一位副处长，是从前北伐时在总政治部里

① 作者原注：相隔二十年，现在校阅在这儿，往事已毫无记忆，因而也无从加注了。

做过事的人。他听说我病了几天，又听说我昨夜在汽车里过了一夜，便很关切我，说：怕身体吃不消，请在他的帐子里休息一下。

那是一家逃难走了的人家，据说逃走得似乎十分匆忙，连床上的蚊帐都没有下。

我感谢着朋友的厚意，实际上也有些疲倦，便把帐子放下，拉长了起来。

睡得怕有两刻钟的光景，醒来之后，意趣倍觉闲适。看见房中有一部《唐诗合解》①，顺手拿来翻了一下。

长条的花格门窗外有一个小小的天井，地面是用砖头竖砌成的，但从那砖缝之间却迸出了一些凤仙花、鸡冠花来。又有一个小花坛，栽着些不知名的草花。几盆秋菊尚未蓓蕾，有些憔悴的意思。有微风吹得花草摇动，有淡淡的一抹秋阳。花红得有点寂寞，草绿得分外谦虚。自己便走到书案旁边，就案头的纸笔写出了一首五律。

雷霆轰炸后，睡起意谦冲。
庭草摇风绿，墀花映日红。
江山无限好，戎马万夫雄。
国运升恒际，清明在此躬。

把诗写好了，又在后边写了一段小跋：

在××（昆山）遇敌机轰炸，于明远帐中午睡片时，醒来见

① 清屈复编著，王尧衢笺注。

庭前花草淡泊宜人，即兴赋此。

刚写到这儿。明远在外室看见我已经起床，便走了进来。

——哦，在做诗，就给我吧。他这样说。

——好的。

我于是在小跋后又添了几个字："用赠明远同志。九月八日。"

明远，不用说就是那位副处长的名字了。

明远是看过我的《由日本回来了》的，他问我：夫人有信来吗？

我回答他说：前月廿一号有信来，以后便没有了。

——生活没有问题吗？

——暂时还可以敷衍得过去，不过日子久了便没有把握。

说到这个问题，自己实在是有点渺茫。

六

不一会，××（陈诚）遣人来请我。看见他的时候，才知道他到×××（冯玉祥）那儿去来，我们刚好错过了。

在一张铺着军用地图的方桌上围坐着，细密的地图用红绿各色的铅笔画了许多直线、曲线。

××（陈诚）按着地图对我把前线上的情形详细地说了一番。据他说，我们不如敌人的就只是飞机、大炮，假如全靠步兵冲锋，那敌人是毫不足畏的。

但这所缺乏的飞机、大炮应该如何补充，我是略略想了一

下，不过我没有说出口来。因为××（陈诚）是军事专家，而且是在军事上负责的人；我想就不待我说，在军事上的当局是一定已经有了筹划的。

××（陈诚）说出他的主张是“屡败屡战”。刚才我见到××（冯玉祥）时，他的口吻完全相同。前月我在××（浦东）见到××（向华）时，他也这样对我说过。这，我觉得是每个军人应该抱的决心，也是我们每个人民应该抱的决心。要有“屡败屡战”的精神，我们才能够抗战到底。

××（陈诚）问到我有什么意见，我略略把自己的见解告诉了几点：

第一，我们的后方工作应该化整为零，应该多设医药站、伙食站等，并随时移动，以免敌人轰炸。

第二，军中的政治工作应该赶快恢复起来，民众运动应该从速开放而加以组织，如此才可以巩固我们的后方，铲除汉奸的根蒂。

第三，全军应该速施行防御霍乱的注射，因为霍乱在上海已经有流行的倾向。

第四，军中应该多备日文宣传品，由我们前线的兵士、飞机师投散于敌人阵地，以劝告敌兵，觉醒他们的迷梦。

第五，军中应有一种统筹全局的“战报”，以联络各军彼此的消息，以传达正确的战讯于人民，并以保存这次神圣抗战的纪录。

此外也说到难民移垦的问题，产业迁徙的问题，发动国民外交的问题，××（陈诚）都一一命人纪录了。据他说，他要把

我所说的要点，打电到南京去。

我是主张宣战的，但这点××（陈诚）有些为难的神气。他只是说，究竟宣而后战的好，还是不宣而战的好，颇值得考虑。

我也就没有再多说了。

七

本来是打算吃了午饭就走的，但经过一番轰炸之后，由上海送我们来的车没有得到我们的同意便先开回去了。

又到×（冯）将军那里去。他命人拿出了三首诗，一一在诗尾用墨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他又命人来照了两张相，把胶片一卷交给了我，要我在上海洗好，好登报。（这相是洗好了，然而×（冯）将军和我照的两张却是重叠了，完全看不见。）

×（冯）将军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看，你应该做一篇文章，他这样对我说，为什么北伐的时候，我们的士兵在前线打仗，后方的民众便送茶，送水，送稀饭，十分的殷勤？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前线抗敌，我们战壕里的将士有一两天不见饭的，而后方的民众总老是不管？

——这个问题正是我想跑来找你们谈的问题呢，我这样回答他，北伐时代，三大政策尚未抛弃，国共合作尚未破裂，军中有政治工作，总司令部政治部在出发前受了中央的委托，有到各地开放党部、组织民众的全权。因而军队到的地方便是政治工作到的地方，而且政治工作人员每每比军队先到。民众

相信政策，并有了组织，故尔前方和后方的活动能够打成一片。现在的情形有点两样，我想×（冯）先生是最明白的。目前的民众是效命有心而出力无路，他们并不是冷淡，只是有所期待。在我看来，政策要鲜明，要信赖群众，军中的政治工作应即早恢复，民间组织应即早开放，怕是保证胜利的最切要的事体吧。

我这样说了，那老将军把他那毛虫眉头耸了几下，豹子眼睛闪了几下，点了几下头。

我隔着阑干，看着外面的江山，真正是“一片锦绣”。

辞别了。

沿途又看见红的蔷薇，白的紫苑，紫的紫薇。

看见了大山朴，又想起了我在日本时自己手种在园子里的那一株。

八

司令部里的车都开往前线去了，只得被留着再过一夜。

夜里，××（薛岳）[1]由前线来了。又是一番出其不意的相遇。

××（薛岳）的兴致，好得了不得。他只是谈笑，身体比以前壮得多，胡子有点象希特拉。他被新任为×××（东路军）

---

① 薛岳，原名仰岳，字伯陵，一八九八年生，广东乐昌人。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代理师长、第四军副军长等职。抗战时任第三战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等职。

副总司令，到这时候我才听见人告诉了我。

又有飞机的拍音，熄了灯。在天井中望天，天星真是繁得可爱，联想到了地上的将星云集。

××（薛岳）告诉我，他是当晚便要坐汽车回去的。他叫我明天坐车到他那儿，由他那儿再打发汽车送我回上海。

他又告诉我，×××①也到了前线。

我也异常地高兴。我说：那很好，我明天一定去见他。

吃了晚饭，××（陈诚）、××（薛岳）和另外的几位将领，围着那张方桌，在军用地图上用红绿铅笔指画。桌上仅点着两枝洋烛。

看见朋友们在地图上指东画西，我是外行，不能参赞一辞。

电话络绎不断。

报告！接着又是报告！

我自己所能做的事，除已吃了夜饭之外，似乎以睡觉为最适当。我便悄没声儿地走出作战室，向××（陈诚）的副官说明，要他把我引到明远那边去。

黑暗，手电筒在闪而又闪。

由明远及其他同志的导引，把我和杜君引到另一家屋子去。已经替我们面了两尊床，并烧有蚊香。有沙发，有书架，书架中有些英文的关于经济学的书籍，有金陵大学的学报，足证房主人乃斯文中人，且系教会学校出身。

没睡的时候，自己觉得很有精神；睡下去了，方始感觉着

① 作者原注：此人已记不出是谁。

肚腹中依然有点余孽在罗唣。

但不知几时，什么罗唣也没有感觉着了。

清早起来，从书架中取了一册周瘦鹃[1]编的曼殊[2]遗著（书名记不清爽），卷头有编者的序，有柳亚子[3]的两篇传，等等。

有好几张曼殊的画，日本味很浓厚，日本人所谓“茶味”[4]。画得并不怎么好，不过，我是画不出来的。

把诗和译诗通读了一遍。联想到日本的一位薄命诗人——啄木[5]。他们两个的身世、情感、笔调、地位，都相象。

曼殊，有的说他父亲也是日本人，有的说只是和郑成功一样，又想起了留在日本的自己的四儿一女。

九

××（陈诚）那边又派了人来请我们过去。

---

① 周瘦鹃（1894—1968），原名国贤，江苏苏州人。作家。著有《爱之花》、《亡国奴日记》等。

② 即苏曼殊（1884—1918），原名玄英，字子谷，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文学家。曾与柳亚子等人组织南社。有《苏曼殊全集》。

③ 柳亚子（1886—1958），初名慰高，更名弃疾，字安如，后改字亚子，江苏吴江人。诗人、学者。同盟会员，南社社长。“四·一二”事变后被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抗战时期，从事抗日民主活动，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著有《磨剑室诗集、词集、文集》等。

④ 日语，风雅的趣味。

⑤ 即石川啄木（1886—1912），又名木名一，别号白苹，日本作家。著有《笛子与口哨》、《病院的窗》等。

早饭是吃稀饭。××（陈诚）劝我们夜间走，说：如遇着轰炸，遭了损失，那关系未免太大。

但我们说，和××（薛岳）有约。于是在吃了早饭之后，××（陈诚）便命人为我们备了一部汽车。

汽车身上是已经涂了泥的，头上又蒙上好些竹枝，但竹枝是已经枯槁了。

杜君在上车之前，便要向汽车夫说出去向。话头刚说到一半，立刻被旁边的××（陈诚）阻止着了。

——你上车去说吧。××（陈诚）这样说。

地点是须得保密的，在上车之前便说出地点，如旁边有间谍，岂不糟糕？

然而那地点，却真有点象桃源一样，难于找寻。

昨晚，××（陈诚）只把桥的号数告诉了杜君，说在某号桥与某号桥之间，但没有说明是那条公路，也没有说明是那个地方。临行仓卒，杜君也忘记了向××（陈诚）问明，结果就为找那某号桥便找了半天。天是很晴朗的，在郊原里坐着汽车，跑来跑去地兜风，倒也满惬意。但如我们是带有重要消息的，岂不会误了戎机？

——今天真好，没有飞机。我对杜君说。

——中午飞机是不大出动的，因为地上反光。杜君在这儿发挥了他的军事知识。接着他又说：就有飞机，敌人也不会轰炸，因为敌人知道，要人们是不会在白天里奔驰的。我们也要算是出其不意。

好容易找到了，经了些有趣的曲折——这曲折可惜都不

好明写出来——到了××(薛岳)住的地方。看见了×××(黄琪翔)、×××①,据说×××②已经在早晨回南京去了。

一〇

午饭是早已开过了的,司令部里又专为我们开了一餐午饭。

说了不少的话,照了不少的相,得了不少的消息。

有一个消息是最好的宣传资料,那是××(薛岳)告诉我的。

他说,我们的前线兵士从一位敌人的阵亡者身上搜出了一封未寄出的家信来,写得相当凄惨。那信里说,他们一登岸,便和我军接触,我军的勇敢善战是完全出乎他们意外。

他们的大队长阵亡了,中队长阵亡了,小队长也阵亡了两个。他本人是一位中队长,但不料到他自己的信写好还未寄出,连他自己也阵亡了。

——把这信给我,让我拿回上海去发表。

——等我叫人去清查一下吧。

清查一下的结果,据说已经寄往南京去了。

黄琪翔要到嘉定前线去指挥,在三点钟时分我们便同他一道出发。到了车辆处,司交通的人说已专备了一部汽车送我们回上海,但同时在那儿服务的童子军也有车要回上海,争

①② 作者原注:这些人都记不出。

着要把我们载去。我们觉得搭童子军的车更方便些，省得司令部的专车把我们送去又空车回来，徒作无谓的消耗，于是也就把专车谢绝了。

童子军的奥士丁车颇有童子军的风味，小巧而玲珑。司机的是战时服务团的副团长倪××君，据说今天是来战地检查团员的工作的。另外还有一位陈××君，异常殷勤。他说，他每天要到司令部去一次，以后凡有需要他做的事情，他随时可以做。

公路两旁受过轰炸的痕迹很多。飞机之投炸弹，要想准确，似乎很难。我跑过的公路已经不少，凡有被炸的地方都是在道旁田地里，炸到了公路本身的实在很少见。

北伐时我在南昌曾乘过飞机散传单，眼底分明是南昌市的一片瓦屋，然而传单投下去，被风一吹，却都飞到赣江里或田地里去了。

炸弹虽比传单重，但公路却比南昌城窄，道旁的田地真是无辜受累。不过我觉得敌人也替我们的农民在施行方便。因为那些大炸坑将来是可以利用来作为粪坑的，省得好些老百姓去流汗挖土。

童子军的陈君又谈到他们在路上每每遇着汉奸或别动队，他们每在晚上活动，有开枪射击的事情。

我卖弄了一下聪明，我说，做汉奸的拿了敌人的钱不必去做破坏的事情，岂不是可以吗？

陈君说，那是不行的。小汉奸一次所得的钱有限，吃完了为生活所迫，又不能不做二次。汉奸有汉奸头，就和包工头一

样：据说，汉奸头拿了敌人一笔钱，敌人要给他注射一药针，限一星期后是要他的命的，如不再去打一次解毒针。因此汉奸拿钱都不大敢逃跑。

这打药针的话，听起来有点象神话。我自己是学过医的人，这样的事情在医学书上不曾见过，论理也不会有。结局怕是敌人的欺骗而已。人民无智，敌人的毒针真是无孔不入的。我希望做汉奸头的人聪明一点，再聪明一点。

小巧的汽车跑得很快，毕竟又回到了上海。

1937年9月中旬

希望不要下雨

上海自战事发动以来，救济难民的事便成了严重的问题。开首的几天，租界上的街头巷口，遍地都是扶老携幼的同胞，看起来真正是有点令人流泪。近来经各种社团的收容、遣发，流离的现象渐渐和我们的目前离远了。

法租界马斯南路的国际救济会第一收容所，听说是救济难民最有成绩的地方。因为有几位朋友在那儿办事，在二十九号的上午，我便起了心，到那儿去看看。

迎头是一片空地上的四个大厂棚，入门在左侧一个小棚内看见了好些年青的男女同志，围坐在一条长桌的周围，似乎在开会。大家都呈着一个愉快的面孔。

Y君①看见了我，便把我向各位介绍了一下，跟着他便把我领着去观察收容所的内部。

厂棚顶是篾席面的，罅穴颇多，漏着天光。草地上铺着木板，难民们有的就在木板上睡着，有的荐以草席。这情形顿时使我生出了一种忧虑：万一天下雨，却怎么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上海《救亡日报》。

① 指姚潜修(1902—1953)，又名尔觉，江苏睢宁人。曾任《留东新闻》、《质文》编辑。

据Y君说，所收容难民约一千四五百人，大都来自杨树浦和虹口方面。小孩、壮丁、妇女，在分组训导。小孩最好，教他们唱歌，他们是非常愉快的。医药方面有天主教的女教士在所内从事看护。病人由广慈及圣心两医院收容。圣心每日下午还要派三位医师来诊察，病人和婴儿每日上、下午要给一次新鲜的牛奶。伙食、扫除等都是由难民分组轮流担任。

难民虽然多是偃卧在地上，但的确相当有秩序。厂中贴有字条，凡向来客索讨钱物者，一经发觉即行逐出。足见初开所时难民有索讨钱物之举，但在我巡行的途中，大家以种种意义的眼光看我，却没有向我伸手。

所中的臭气颇猛烈。的确有天主教的女士数人在勤黾地服务，她们那清洁的黑衣、雪白的衣领，的确有点象是天国中的东西。有的见着我，在脸上显着欢迎的微笑，无言的目礼。

厨房也是厂棚，十几位轮值者在三口大锅里搅着饭，在一架木台上切着冬瓜。在另一平列的厂棚里有好些人正在用砖砌灶头。Y君说，那砌灶的人也是难民。我觉得这些现象最好。

在一处草地上看见一位中年的母亲，用一个土盆在替她的四岁光景的儿子洗头。大家都拥挤在自来水的龙头边，胡乱绞洗，她却远远离开了一群人，把她儿子的头，洗了又洗。这母性爱，使我涔出了眼泪。

走到有好些马桶的地方。Y君说，洗马桶也是全所人轮流担任；开头的几天，男子们多说闲话，渐渐也就好了。

所中的壮丁究竟占少数，据说，多遭了日本兵的惨杀。日

本兵在杨树浦、虹口搜索居民，凡壮丁则枪决之；妇孺老弱则驱逐出境。那吗，幼儿而丧失父亲，老母而丧失壮子的悲剧，我相信一定是很多的了。

匆匆地在所里巡视了一遍，在要走到门口的时候，有一位童子军摊开手本来要我签名。我突然想到了《易经》的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便把这来写在他的手本上了。

我自己本来是不信宗教的，但不知怎的，突然想到了"天"来。

我在要走出门时，对Y君注意过一下：厂棚那样稀疏，如一下雨，收容所中的难民岂不会是更加遭难吗？

Y君说，目前正在尽力在厂棚四围挖濠沟。

但这，我觉得是不能满足的。因为那棚顶的篾席只能遮日，不能遮雨。

——用些帆布来盖上，怎么样呢？

但我这个建议不见得会生效力，因为Y君是从日本回来的高等难民，在那儿只是替人服务而已。

门侧又有几位女教士在那儿调制药品，她们的衣冠愈见搅动了我的宗教情绪。我在离开收容所的时候，否，就在我目前运着笔追记这回视察的时候，在我的心里时时返复着这样的一个祈祷：

——天老爷，希望你不要下雨。

1937年9月2日

在轰炸中来去

一

二十号傍晚离开上海，到达某地。正拟往访陈诚时，陈诚偕某部长迎头而来，言将往前方对某师作训话。于是又被邀约上车，向某地出发。

车中陈诚告我，某师战绩最佳，现整理完备又将加入前线，集合班长以上的人训话。

在敌前集合全师官长作训话，虽在夜间，我是感觉着有点冒险的。

这冒险，陈诚也有点耽心。他在一次长时间的沉默之后，突然对我这样说：今晚要托你的洪福才好。

这意思，我没有懂得。

陈诚又才加以说明，他说，你自己的文章上不是说过，说你今年交大运？

这一说，我便恍然大悟了，原来他读过《由日本回来了》的我那篇文章，那儿是写着我四十六岁交大运的。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抗战出版部出版的《在轰炸中来去》。

夜是朦胧的夜，月光藏在云中，但隐隐可辨其所在。达到目的地时，正面的空中有红绿各色的光球升上，是汉奸放的信号。接着便有飞机的拍音，但机影不可见。

士官们集合在一处草坪上，早就在等待着了。

陈诚约某部长和我一同去训话，但我们辞谢了，立在路傍听候。

训话在一小时以上，因为在陈诚之后，尚继之以军长、师长。

正在训话途中，轰然一声落下了一个炸弹，离集合处不远，自然是敌机投下的。但士官们屹立着，连头也没有掉动。

训话毕又登车就归途，途中，陈诚又对我说：今晚真是托了你的洪福，假使那个炸弹投在队伍的正中，岂不是一场大祸？

是的，我自己近来都有点相信命运了，就是我自己托福的事实在很多，这怕是托的国家民族的福吧？所谓“国家将兴，必有祯祥”①，我看，似乎是有些道理，但这道理，我现在还没有功夫去参透。

在某处与某部长相别，他是要往苏州去的。他说，他明天下午要回南京，我便想揩他的油，搭他的汽车同去，约好了明天往苏州访他。

到达司令部时已夜半二时过，是夜宿陈诚室中。

---

① 语见《礼记·中庸》。

二

二十一日傍晚抵苏州，用电话叩问某部长，某部长已去矣。当夜决于吴县留宿。

宿处有桂花，在暗中吐放着浓重甜蜜的香气。时有飞机来的警报，但我处之泰然。睡眠甚安稳，因一切行装乃来时在上海所新制者，颇觉舒适宜人。

次日，因须等汽车从前方开来，使得到了充分的闲暇，午前在苏州市上观光了一遍。市民尚镇静，但商店多关门，这心理觉得有些可笑。关门大约是防御轰炸吧，然而飞机的炸弹如投不中你的店铺，你何须乎关门？如投中了你的店铺，关门又有何益？这与其说太不够勇敢，宁可说太不够聪明。

想起了苏州有两位老人值得去拜访的。一位是李根源①，一位是张一麐②。这张、李二老，在抗战坚决上，值得称为“天下之大老”③。

李老是在一座小小的农人家里遇着的，穿着异常朴素，一见便令人联想到《三国志演义》上的关壮缪。

---

① 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云南腾越（今腾冲）人。“七·七”事变后在苏州与张一麐等创议组织“老子军”赴前线抗日。著有《曲石文录》、《曲石诗录》等。

② 张一麐（1867—1943），名仲仁，江苏吴县人。一九一五年任教育总长，不久辞职。“七·七”事变后，主张坚决抗战。著有《现代兵事集》、《古红梅阁别集》等。

③ 语见《孟子·离娄》。

李老精神甚好，但右颈上有某种皮肤病，皮呈古铜色的鳞片状，因而右颚下的淋巴腺浮肿。李老雄于谈，音调甚激烈，犹有当年叱咤三军之概。

李老说，他的主张是"内王外霸"，他主张中国的动向只宜注重国防，一切粉饰太平的建设都不需要，这次淞沪抗战的结果便证明了。

李老又说，他对于蒋介石，在十三号以前，他也不很佩服，但自十三号以后，他可以向他叩头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很认真，炯炯的眼光似乎有润意，脸上也浮出了细密的汗珠。

苏州的美国教士对救护伤兵事很热心，士兵以入苏州病院为乐，盖外科手术既佳，而待遇又好。美使詹森①曾命教士们退出中国，而教士们不肯。——这消息也是李老告诉我的。

李老的印象既象关羽；张老的印象则颇类诸葛孔明。张老人不甚高，颜面作三角形，无髯，白皙，虽无纶巾羽扇，然其清明之气蔼如也。

张老便是在最近报章上传播一时的"老子军"的组织者。他的组织遭到蒋介石的电阻，自然中止了，但他有一通复电，报上却尚未传播。张老把那电稿取了出来给我看，稿子是用墨笔写在几张大型壁历的废纸背上的。文辞恳切动人，我要

---

① 詹森(N.T.Johnson, 1887—1954)，又译约翰逊，美国外交官。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五年任驻华公使。

求拿到《救亡日报》① 上发表，张老同意了。

老人说，他前几天在某处遇见冯焕章，冯说他精神很好。他说："我平常并不好，时常生病，但自'八一三'以来，我的精神便百倍起来，什么病都没有了。"

老人又说，我们中国人素来是伸不起腰的，但是我们这次却伸起腰来了。我们中国人平常打死一两个日本人，立刻就要赔款两三万，但这次我们已经打死了他两三万人。这如在平时，不知道又该要赔多少款。老人叫我"统计"一下，说"怕有很多的零吧"？

张老书案上正写就了一张短轴，是临的苏长公的《天际帖》②，"中秋后二日"所书。中秋后二日就是我抵苏州的九月二十一日。我顺便求他的墨宝，老人说：就把这张送你作为纪念吧，不过没有上款，不要紧吧？我说：没有上款正好，省得客气啦。

于是老人便连忙去取了张报纸来，把字条卷好，递了给我。

三

拜访了张、李二老回寓之后，陈诚派来跟我的一个人走来报告，汽车已经开来了，正在上油。

---

①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创刊于上海，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停刊；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在广州复刊，广州沦陷后停刊；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又于桂林复刊，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被国民党封禁。作者任社长，夏衍任主编。

② 苏长公，即苏轼；《天际帖》，全名《天际乌云帖》。

发车时是傍晚六点钟。雨在微微地下着。走到一处有两架大卡车停止着的地方，我们的车也停止了。前车的司机者来告诉我们，有敌机空袭。谛听时，在朦胧的夜空中果然有拍音，但不知究竟是我机，抑系敌机。

拍音消逝了，车又开动起来。

整整走了一个通夜，直到二十二日的清晨五时，才到了南京，据说，夜里所走的公路是绕过了××的。

到了南京，最初是拜访第××军驻京办事处的赵处长。由赵作向导，接着便去访问了周至柔①。和军事上的朋友们谈话，我觉得是有趣味的一件事，因为他们的态度直爽，抗战意志也很坚决。

是在周至柔那里讲的话。我的估计是苏联的加入战争，或许会由日本先行着手的形势而发动。原因是日本所最恐怖的是苏联东方军的空袭。苏联由海参威发动空军力量，可以炸毁日本的心脏地带，如东京、横滨、大阪、神户等地，而且飞机的飞程可以来而复返，返而复来。日本的空军固然也可以炸毁海参威或更进炸毁贝加尔湖南之重工业地带，但此等地带并无关于苏联之生死存亡。日本的空军要想炸到莫斯科或列宁格勒，那等于是一种梦想。我们的对日抗战，日本人是在求其速战速决的；然而我们的抗战意志日益坚固，速战速决已经势不可能，这使得日本人发生了焦躁。抗战愈持久，日本人的焦躁愈亢进，因而对于苏联的恐怖也就会愈见激增。为要解

① 周至柔（1898—1986），浙江临海人。曾任黄埔军校教官。抗战时任空军前敌总指挥。

除自己的恐怖，我觉得日本人有先下手袭击苏联的可能。

周至柔不甚同意我这个意见，他说，日本人是应该先以全力对付着我们的，一面敷衍苏联，不让他卷入漩涡，方为得计。一时要对付两国，他是不会那样愚蠢的。并且苏联的战备，他也袭击不了。

周至柔的见解本来是经常的道理，站在理智的立场上来说，自然是应该先以全力来对付我们为得计。然而日本军部早是把理智丧失了的。他们如还为理智的活动，第一他们就应该觉察到对华侵略只是增长他们的亡国的危机；其次至少也应该觉察到既在华北作战，便不应该再到南方来生衅。然而关于这两层他们都死不觉悟，我们可以揣想到：他们自己会是以袭击苏联为得计的，盖兵法所谓"先发制人"也。

不过这些都是估计，究竟事实会怎样，只有等待时间来解答。①

四

一口皮箱，一囊被卷，被赵处长命人搬进了首都饭店。于是暂时便把自己的身子寄顿在那儿的二百十四号室里。饭店纯系西式经营，室内亦相当洁净。有浴室，这正投我所好，便入浴一次，扫荡我两三日来身上所积蓄的尘垢。

在洁白的磁盆中想到了古人所说的"斋戒沐浴可以祀上

---

① 作者原注：日本军阀后来曾在张鼓峰向苏联挑衅，遭到痛击，知难而退了。但它掉换了"先发制人"的方向，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帝”，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古时候应该是最爱洁净、最重视沐浴的民族，对于沐浴一事竟赋予了宗教的情操。曾点的“浴乎沂，风乎舞雩”①，深得了孔夫子的赞奖，大约也就是出于这同一的情操吧。但这在印度和欧洲的中世纪却是两样，尽管宗教仪节异常严重，而沐浴却是被视为罪恶的。据说浴时和浴后都发动人的淫思。这心理和我们的民族心理似乎有点两样。不过我们的民族后来也不爱洁净了，同样也有以沐浴为拨发淫兴的习气，不知是否受到西方的影响。

不管它，我究竟是中国人，重视沐浴的遗传因子仍然在我的血液中流着，我是喜欢沐浴的。据我自己的经验，沐浴之后尽可以减少人的杂念，使自己的身心都振作起来，不好放肆。就譬如一张洁白的手巾吧，你自己初拿到手时，总是不好随便污秽它的。故尔沐浴之后，必然地伴以心斋，我是这样地感觉着。有了这样的感觉，就要和“上帝”见面，似乎真可以泰然，虽则我自己并不相信有什么“上帝”。

浴后，坐就南窗下的书案，给上海的友人写了两封信。雨是早住了，但天气是昏蒙的。起伏着的紫金山在西首静峙着，有一高峰突出尖锐，颇类日本的富士山，略略动了一下登临的兴趣。但也想到应该做的事体还多，这种闲情，仅如微风一抹而已。

肠胃仍然不甚舒服，早食既未用，中饭也不想进，便索性实行了断食的斋戒。

室中是有双人床的，我占领了一张，倒上床去略略休息了

① 语见《论语·先进》。

几刻钟，醒来时已快午后一时了。早上由赵处长早已约定，在午后一时当去访钱大钧，不一会，赵也就坐着汽车来了。

钱是第一侍从室的主任，我们的见面这回还是第一次。第一次见面，觉得他的身体很魁梧。我把陈诚写的介绍信交给了他，同时也把由上海来时何香凝① 先生所委托的慰劳品一大包绒线编物也点交了。彼此略略谈了一些客气话，于是便告辞了出来。

五

回到首都饭店，和赵分了手，我自己便往第八路军后方办事处去访问叶剑英②。叶是北伐时代的老友，我和他的契阔也整整地十年了。最后一次聚首，记得是民十六年八月初头的一夜，是在九江的一只湖船上。湖，大约是甘棠湖吧，因为是没有月的夜，四面都很朦胧。我只记得湖中四处有菱浮泛，我自己还把菱拔起来，剥食过几粒新鲜的菱角。同船的，有阳翰笙、李德谟，似乎还有梅龚彬，但当夜所谈的话已就和那夜景一样，完全朦胧了。

在一间陈设很简单的狭小的会客室里会见了剑英，他的

---

① 何香凝（1879—1972），原名谏，又名瑞谏，广东南海（今属广州）人。廖仲恺夫人。早年参加同盟会。一九二四年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妇女部部长。抗战中从事抗日民主运动。

② 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曾任黄埔军校教官。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与张太雷、叶挺等领导广州起义。抗战时期任八路军参谋长、八路军驻南京代表等职。

面貌仍和十年前相差不远，只是眼睛更有光彩，但不知怎的，总觉得表情有点寂寞。这大约是由于他是善战的勇将，他的背境应该是几十万大兵，而不应该是几张沙发吧？

问了些陕北方面的朋友们的消息，也问了些住在首都的朋友们的地址，接着我又分头去开始了我的个别访问。

最先去访问了陈立夫① 和邵力子。陈立夫不在，邵力子也不在。我晓得他们是很忙的，便各留了一张字条，告诉了我住的地方，并请求指定时间和地点，以便再往候教。

其次是访问了李任公，这次是会着了。由任公的转告，才知道陈真如也住在首都饭店。因此我从任公那儿告辞了出来之后，便连忙赶回旅馆。

但是，真如出去了。

我踌躇了起来，想去访问多年不见的田汉。但我不知道他住的地方。我知道只要打电话到新民报馆去探问便可以问明，但那报馆里面我有很多的熟人，假如他们一知道我到了南京，立刻便会在报上登出来，却是使我有点踌蹰了。在报上看见自己的名字时，不知怎的，连自己都觉得有几分憎恨。这怕是在日本过了十年的退撄生活所养出的情绪吧。日本的新闻记者，他们实在是做到了"无冕王"的地位，他们的一枝笔充分地可以生杀人。连日本人也都害怕他们，觉得他们比"刑士"（包探）还要可怕。

---

① 陈立夫，一八九九年生，浙江吴兴人。一九二八年起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长、中央组织部长等职。

又想到傅抱石①。这是一位擅场篆刻的名手，他能刻细字，于方寸之内刻列万言；国画也相当出色。我是在日本认识的。他有一个时期在留学生监督处充书记，月领薪水六十元，一面工作，一面苦读，而且还要寄钱回国养家。他那勤工俭学的精神我也是佩服的。我知道他在中央大学艺术科担任教职，便叫人打电话去问，但却没有问出一个结果。

怎么办呢？正在踌躇的时候，电话来了，是真如打来的。他又得到任公的转告，知道了我住的地方。他约我到某处去和他同吃晚饭。

——是的，这倒是一件大问题，吃晚饭！我的断了食一整天的肚子，这样告诉我说。

真如比北伐时更健康了。

六

在夜色苍茫的园子中，真如告诉了我一段故事。

"'一二八'的炮手"——吴××②，和他的日本夫人离了婚，上华北的前线去了。

这，我觉得，是很好的一项戏剧材料，我现在略略提供一些素材出来，希望在闹剧本荒的戏剧界能够有人把它剧化。

---

① 傅抱石（1904—1965），江西新喻人。画家、美术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攻东方美术史学。曾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作有《傅抱石画集》等，著有《中国绘画变迁史》、《中国绘画理论》等。

② 即吴履逊。

吴××是日本的士官学校毕业生，广东人，身体魁梧，年纪只有三十左右。“一二八”时是旧十九路军的团长，在“一二八”的当晚，他的日本夫人替他生出第一个男孩的时候，他在闸北向日本军人放出第一发大炮。

旧十九路军云散后，他游历过欧洲，在前年，又重到日本，我是那时和他相识的，也和他的夫人见过几次面。他的夫人很爱他，他也很爱他的夫人。不久他们便回广东去了。

今年我回上海，吴刚好由庐山下来要回广州，在上海又曾经聚首过一次。那时他告诉我，说他很关心他的夫人，又说他的夫人要有第三次的分娩了。回广州后曾来一信，报告那第三次的分娩又是一个男孩。

相别不久，全面抗战的局面便展开了。没想出仅仅两个月的光景，他竟和他的夫人离了婚，跑上了华北的最前线去。

离婚，据真如说，是双方合意的。在他们的离婚席上，真如曾为他们作证人。二男一女是由他的夫人带去了。

吴夫人在当席说过这样的话：吴，你是军人，处在国难严重的时候，正是你应该效命疆场的时候，请你不要顾虑我。我虽然是生在日本的女子，但日本军部的侵略兽行，我是彻底反对的。你的儿女我要尽心抚育，要使他们承继着你的志气，使他们永远是中国的儿女。

这，可不是一场悲壮剧吗？

吴××尽可以留在广州尽他的职守，然而他却上了华北的最前线，这心情是值得称赞的。

在夜色苍茫的园子中听到真如告诉我这段故事，我自已

一面感觉兴奋，但一面也感觉会心的微笑……

——中国有这样的军人，中国不会亡！

七

九时顷，已经换上寝衣，在室中写着日记的时候，邵力子来了。

邵老的态度较诸从前更显得有醇醇儒者之风。十几年不见，我觉得他比从前是要老些，胖些，但他却说我比从前更年青了。有好些朋友在这样说，我自已倒有点不知其所以然。我想，大约也就由于这次抗战的原故吧。这次抗战的结果把我们的民族精神振作了起来，把罩在我们民族头上的陈陈相因的耻辱、悲愁、焦躁、愤懑，一扫而空了。我自己的额上的皱纹，眉间的郁浪，也应该是随着这民族觉醒的机运而消逝了的。

是的，我们整个的民族，都应该是比从前更年青了。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民国十五年四月在广东的时候，那时广州的血花剧社在青年会表演我的《棠棣之花》，我们一道看戏。戏演完之后，我还是搭着你的汽车回广东大学的。你该还记得？

这往事我回溯了一遍，邵老也说他记得很清晰。

邵老问了我回国时的光景，又谈了些宣传工作的情形，谈了有一个钟头的光景，才起身作别。我送他下楼时，他看我穿的是寝衣，怕我着凉，向我关照了好儿次。我觉得就好象见到了一位长兄。

南京第一夜的睡眠是很恬适的。

八

二十四号了。天色仍然是昏蒙的。一大清早便有好几位朋友来访，直到九点钟的时候才空闲了下来。我觉得仍然有到新民报馆去找田汉的必要，我到了南京已经有不少人知道，早迟免不得要见报，我也就用不着多所顾虑了。

新民报馆是四川同乡陈铭德①经营的。铭德的夫人邓季惺②是一位律师，去年春天到日本东京治病，我曾经照拂过她，因此认识了铭德。田汉是时常在《新民报》的副刊上写文章的，向铭德和季惺探问当然可以知道他的住处。

上新民报馆的二楼时，劈头碰着铭德。他惊异了，大叫着：哦哦哦，你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我看见季惺在室底的南窗下和一位女客谈话，但她看见我进房，听见她丈夫大叫，她都没有动。

铭德连忙向她报告：季惺，你不认得了吗？郭先生来了！

季惺到这时候才惊喜着，跑到身边来，连忙说：骤看，简直认不出了，你比在日本看见的时候年青得许多。

——因为你改了装，铭德解释着，——在日本的时候看见你穿的是和服，你现在穿西装，实在年青得很多。

---

① 陈铭德(1897—1989)，四川长寿人。《新民报》创办人。

② 邓季惺，一九〇七年生，四川奉节人。一九三七年入《新民报》社，历任该报南京版副经理、重庆版经理。

是的，这怕也是一种理由，不过在没有看过我的和服装束的人也同样说我年青了，这理由又象有些不充分。

——师母呢？有信来吗？师弟、师妹们呢？好吗？季惺殷勤地问着，——我们实在关心，前几天田寿昌先生到上海去，我们特别拜托了他，要他定要来向你致意。

——寿昌已经到上海去了吗？

不用说我们是在路上错过了的。

接着问到了我的住处，他们定要我搬进他们的公馆里去，说旅馆太贵，吃食也不方便。

——你搬到我们那里去，一定搬，每天有四川菜好吃呢！铭德这样说着，自己又大笑起来。

——好的，我会搬，我会替你收拾，我帮你搬好了。季惺坚决地撇开我就要走。

我看他们太殷勤了，实在撇不过他们的厚意，于是也就答应搬，答应和季惺一道回到旅馆里去。

回到旅馆，叫听差的把账开来的时候，他说账房里已经有人关照过，凡是我的账都不要自己给。这，使我有点出乎意外，我一时想不出这关照者是谁。离开旅馆时，即问账房，账房也弄不清楚，据说是接头的人因事出外去了。

九

季惺的家在P路某号，是一座二层楼的洋房。前庭的一片草坪里已经掘出两个防空壕；但当她带我上楼时，还指着屋外

正对面的一个土丘，高与楼窗齐平，对我说：我们在那土山下，还因山掘了一个土壕，上面的浮土有两丈多厚，一有警报来，我们便跑进那儿去躲避。

接着又把警报的方式告诉我，据说是用哨子。当有敌机来时有第一次的预行警报；敌机逼近了，有第二次的紧急警报。第一次警报时便当作避难准备；第二次警报时便一律都进防空壕。等到敌机走远了，又来一次哨子是警报解除的表示。

听着这些话觉得有点象童话般的滋味，因为住在租界里的人是从没有经受过这样的训练的。

把住处搬定了，为接见朋友，访问朋友，便忙了一天。有一位同乡夸讲我，说我的成绩很好，别的人就费十天工夫都怕把“关系”打不好的，我一天工夫就打好了。这夸讲，不知道是该我接受，还是该朋友们接受。

午后四点钟的时候，打电话给张群，他在电话里请我到他的公馆里去谈话。

我去了，被引进一间客厅。

张群穿着蓝色的缎袍子走出，彼此拉了手。

——十年不见了，整整十年啦。……马伯援① 以前常见面，谈起你，说你的生活很清苦。……又曾提起，想约朋友们多量地赠送些书籍给你，供你的研究。但我是担心，恐怕你不肯接受。……宝眷怎样呢？近来有消息吗？

---

① 马伯援（1873—1939），又名季阶、发祥，湖北枣阳人。辛亥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内务部总务司长，不久辞职，从事基督教社会服务事业。二、三十年代任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本会总干事。抗战时任武汉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没有十分改尽的四川乡音，娓娓地谈着。

——今年五月，在庐山，和慕尹、公洽、淬廉诸位谈起了你，大家都想把你请回来。但关于取消通缉的事情，不免踌躇了一下：因为如果取消了，恐怕你不能离开日本吧。

听着这些开心见肠的话，使我也开了心，我没有想出有这么多的人会关切我。不过关心者似乎把我估计得太高，其实我的生活虽"苦"，并不怎么"清"，苦得实在是有点焦头烂额的。已经是过往的事了，不妨在这儿说一说。

记得在八年前中国钱最贱的时候，有一个时期，三块大洋勉强可以换得日本钱一圆。在那时尽管运着一枝笔，从早写到晚，寄回中国去卖的中国钱仅仅只能掉换得少数的日本老头票。一家六口一月靠着四五十圆的老头票（约当留东学生的一个人的平均生活费）过活下去的，也有好几个月。

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我的一部《两周金文辞大系》，费了两年的工夫研究出来的成果，写信给商务印书馆求售，遭了拒绝。没有办法，只好去求日本东京的一家书店，书店老板却只肯给我三百圆的版税。我嫌少了一点，因为那种书是很难望再版的。老板说：要晓得啦，三百圆等于中国钱九百多块啦。这话虽然有点伤我的尊严，然而却也刺中了我自己的最软弱的要害。自己虽然迟疑了半个月，然而毕竟还是抱了那部书去换了三百圆老头票到手。从此，我的关于考古一方面的著作也就接一连二地在日本印出了。于是西园寺公望① 对我怎

① 西园寺公望（1849—1940），日本政界元老。历任枢密院议长、政友会总裁。曾两次组阁任首相。

样怎样，日本政府又对我怎样怎样的谣诼便在国内传播了起来，险些儿没有把我定成“汉奸”。

仅仅隔着一个东中国海，我们对于日本的认识，不知道何以竟隔膜得那样。我可以坦白地再说几句话：西园寺公望看过我的书是事实，看后向人称赞过也是事实，但他和我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直接关系。我不愿意借他来抬高我的身价，我也不愿意拿我去抬高他的身价。他固然是日本元老，而且是值得尊敬的一位国际政治家，然而说到古器物学的研究上，他究竟只是我的一名爱读者而已。

说到日本的官吏、日本的学者们，他们最初只把我看成落水鸡，把我的著作看成水中的鸡粪；然而待到他们的元老称赞，西欧的学术界也生出了反响的时候，他们便刮目相看了。真正是透顶的势利。

势利的民族，我怕日本人要算是世界第一。一些研究中国学问的所谓“支那学者”，连中国文都还读不断句，而他们的心目中却彻底地藐视中国人。但一遇着西方“支那学者”的横行文字的著作时，却奉若拱璧、五体投地，不是“马斯伯乐(Maspero)①曰”，便是“卡尔格伦(Karlgren)②云”，这和日本军部在上海散传单，声明要打中国共产党，而同时日本的天皇却在欢宴苏联大使，不正是同一国民性的表现吗？

---

① 马斯伯乐(Maspero，1883—1945)，又译马伯乐，法国历史学家、汉学家。著有《古代中国》、《中国宗教·历史杂考》等。

② 卡尔格伦(B.Karlgren，1889—1978)，又译高本汉，瑞典汉学家。著有《中国音韵学研究》、《汉语中古音与上古音概要》等。

——我近来简直专门在做秘书长了。仍然是张群在对我说。

——怎的？

——啃，政治会议的秘书长是我，国民政府的秘书长是我，军事委员会的秘书长又是我。一个人兼任三个秘书长。

我觉得中国的人才太少，能者太多劳了。听了张群的话，我这样想，但没有说出口来。

一〇

从张群那里刚好回到居停处，赵处长有电话来了，说蒋先生叫我去谈话，立刻就去，有汽车派来接我。不一会汽车也果然来了。

天在下雨，一个人坐在很宏大的一架汽车里面，觉得有点兴奋。汽车夫是用不着关照的，他只是开着车在走。

走了一些转折，到了一个地方，又被人引导着步行了一段路，到了一处朴素的住处。

刚进厅堂门，穿着深灰色的中国袍子的蒋介石远远由左首走出，呈着满脸的笑容，眼睛分外的亮。

——你来了。你的精神比从前更好。蒋一面和蔼地说着，一面和我握手。

厅堂相当宽敞。当门不远处，横放着一张条桌，蒋背着门在正中的一把大椅上坐着，叫我到桌对面的正首就座。我说，我的听觉不灵敏，希望能够坐近得一点。于是我便在左侧的

一个沙发椅上坐下了。

——你的神采比从前更好，蒋又这样向我说了一遍。看来比从前更年青了，贵庚是？

——是壬辰年生的，今年四十六岁。

蒋的态度是号称有威可畏的，有好些人立在他的面前不知不觉地手足便要战栗，但他对我照例是格外的和蔼。北伐时是这样，十年来的今日第一次见面也依然是这样。这使我感到轻松。

我也感觉到蒋的精神似乎比从前更好，眼睛分外有神，脸色异常红润而焕发着光彩，这神彩就是在北伐当时都是没有见过的。我见过些西安事变后的蒋的像，觉得憔悴不堪。抗战以来的局面的确是使所有的人都年青了。

“目系而道存”①，储蓄在脑子里所想说的话顿时感觉着丝毫也没有说的必要了。因为我感觉着蒋的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只要有这一决心就好，就能保证抗战的持久性。抗战既坚决而能持久，民族的幸福还能有超过这一点的吗？自然，我并不是素朴的唯心论者，以为精神超过一切。但我们目前的中国是当以精神奋励为前提的，因为物质的供应虽然不周到，但已相当有了一些准备，如果大无畏的精神力毫不发动，则一切物质上的储备只是死物，而且会成为自己的累赘。现在，我们最高尚的精神力活动了起来，一切物质上的工具都赋予了新鲜的生命。生命是联绵继续的不断的流。生命诞生

---

① 语见《庄子·田方子》。

生命，要保持着它的不断的永续，那是物理的必然的趋势。所以我们精神力一发动了，必然地进求物质的充实，以维持活动力的持久。

蒋问到了我关于甲骨和金文的研究上来，问我今后是否尚有继续研究下去的兴趣。我说，只要有材料和时间，是仍然可以研究下去的；关于那类古器物学的材料，散在欧美各国的很多，将来如有机会时很想把它们收集起来。蒋说，将来可以设法。

又问到我有没有朋友可以做宣传工作的。我对于这个问题却答得很含糊：因为我以前的朋友大抵分散了，有的也改变了兴趣，回国以来虽然知道一些从事宣传的人，但不必是我的朋友。因此，蒋接连问了两次，我于咄嗟之间，终没有可能提出任何人来。

蒋又说，希望我留在南京，希望我多多做些文章，要给我一个相当的职务。

我自己也感觉着，我的工作是以做文章为最适宜的。我因为耳朵聋，没有可能参加任何的机构。别人的议论我既不能听取，自己的意见也就无从交流。我把这个情形直率地说出了，我说，文章我一定做，但名义我不敢接受。

蒋说，一切会议你都不必出席，你只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学问好了。

我没有再多说话了。

蒋又问了我的家眷，又问到了我为什么到了日本。

关于到日本去了十年的一层，我也回答得很直率。我说，

我没有钱，在国内不能生活，又不能到欧美去，所以只好朝日本跑。

此外还问了些我个人的私事，最后是说，我们改天再来详细的谈。于是我便告辞起身，蒋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

二

晚饭应了周至柔的邀约，有赵处长同座。

周和我才见两次面，他的体魄很魁梧，他对于文学也有趣味。他谈到了郁达夫，谈到了茅盾，更谈到了恽代英。他说代英不仅长于演说，而且会做文章，可惜他死早了，不然在现在又是该他活跃的时候。

讲到了敌人的轰炸南京上来。敌人早就宣言过，二十一号的正午以后要大规模地轰炸南京，请各国的外交人员和居留民一律退出。这种拙劣的暴戾的宣言，表示透了日本人的夜郎自大，欺软怕硬。中国人是好惹的，打死几十百万都不要紧，外国人却不好惹呵！日本人在外国人面前是侏儒，在中国人面前是"哼哈"。这就是他们的"武士道"。狗屁！

——但是敌人的飞机多多飞来袭击后方，倒是我们所欢迎的，因为那样可以减少我们前敌将士的痛苦，增加我们全面抗战的敌忾。这是周所表示的意见。

平型关的胜利也由周口中报告了出来。这消息在中午时早就听见人说，但大家都还在半信半疑，这次是证实了。但作战的情形和参加作战的部队，还没有得到明确的报告。

饭后我向赵说：我打算在一两天之内回上海，因为还有些要紧的工作非去处理不可。

赵说：汽车是方便的，随时可以动身。又说他也想到前方去视察，已有电向前方请示，大约明天便可以有回电。

于是我们便约定明天下午三四时左右离开南京，假如一切的情形是许可的时候。

既决定要赶回上海，有向蒋交代的必要。从周的公馆退出之后，我便再去访问张群，托他为我转达。同时也把蒋和我的谈话对他说了，重申了我自己的不敢接受名义的意见。

张群都回答了，要一一为我转达。他问我：是不是还想见见汪先生？

我说：只要他方便，我可以去。

张便去打电话给汪，约定了明天上午九点钟在某处会面。我把平型关胜利的消息告诉了他，他还向有关方面把情形问清楚了。

胜利的确是大规模的，毙敌三千，俘虏二千，虏获敌人军实辎重无算。敌方是精锐部队板垣师团，我方部队是八路军。作战的情形是先以一营人扰敌后方，诱至有埋伏的山谷一举而歼灭之。

真是愉快，假使是在十年前，听到这样的消息，一定又牛饮了一大瓶白兰地。

一二

二十五日的南京特别晴朗。一大清早起来便有人在说，今天恐怕有敌机来袭。果然，在九点钟左右，我正要乘汽车去访汪的时候，同居的人说，警报来了。——这警报在我半聋的耳里，实在什么也没有听见。

不一会又是紧急警报，于是同居的人都一齐跑向对山下的土壕里去躲避。他们都很关切我，叫我进最深处去坐。壕是因山凿成的，除有进口外，没有通气的气孔，坐在壕里做了一会两脚老鼠，实在有点气闷，我又移到近口处来。高射炮在轰隆地响。

季惺和铭德是上报馆去了。季惺有一位兄弟叫友海，还在高中读书。这位小朋友很活泼，穿着一套黄色帆布中山装，戴着一副黑色的羔羊角般的扩音器，站在进口的阶段上了望空中的情形，一一向壕里的人报告。壕里有一人向我说：友海是我们的哨兵。

——他很有趣，等我也来替你们当个哨兵。我说着也就索性站上阶段上去了。

——郭先生，你下来，危险。壕里的人在说。

——郭先生，你下去，危险。壕外的友海在说。

——把你那听器给我好了。我没有听从他们，只向友海要他那对羔羊角。

友海把听器替我套上了，声音是要听得大一些。

高射炮和敌机的角逐真是可观。

据我所看见的说，开始是有十一架敌机飞来，由南转向东城去预备散开，四处埋伏的高射炮一时震天价响亮，炮烟在敌机的队中穿插。烟云和机影密接着，不易辨别清楚。

忽然有一声炮响得特别着实，敌机队中的第十架带着一股黑烟，象彗星一样坠落了。

——打得好，真打得好！敌机坠落了一架。友海满高兴地向壕里报告。

敌机被打中了一架之后，其余的散开了，高射炮烟和它们角逐了一会，它们又各自逃窜了。

空中的音乐告了一次中休。我和友海，索性离开了土壕，踞在土丘上了望。街道上除掉警卫的士兵之外，一个行人也没有。一切的交通机关早已绝迹。

寂静的街，万籁无声的海，但在这无声之中有意志力的波涛澎湃。

不一会又有一队敌机飞来了。这次是十五架，依然是由南而来，却转向城西北去散开。高射炮烟更加肩摩踵接地和它们角逐。忽然又是一声特别着实的炮响，敌机中的一架发出一朵红光，红光上冒着黑烟，又象一颗彗星一样，坠下了。

打得好，真打得好！敌机又打落了一架！友海跳起来了，比刚才更加高兴地向壕里报告。

怎么会放红光呢？我怀疑着问。

——那一定是打中了汽油槽。友海很内行地向我说。

被打落了的敌机落在城西北区去还冒起了一阵火烟。

其它的敌机慌慌忙忙地敌飞了一阵，又逃窜了。

很有好一会，上天下地都凝寂着，没有声响。

——真是痛快，到了一次南京，亲眼看见我们的空中战，并亲眼看见我们的高射炮打落了两架敌机，真是痛快。我自己对友海述怀着。

——高射炮打中飞机是不容易的事，我也是今天才亲眼看见。

——怎么不看见我们的飞机来呢？

——我们的飞机是在城外和敌作战，堵截敌机。如敌机窜入了城空，便用高射炮射击。在城空作战，弄得流弹横飞，对于市民是相当危险的。

友海好象是很明白作战过程的一样，确否不得而知，好在是年青人随便的谈话，姑且把它纪录在这儿。

警报期间特别长，太阳把头晒得有点痛，我弄得有点不能忍耐了。

——我看警报是快要解除的，我们回去吧。我向友海催促着。

——好的，大概是快会解除了。

友海陪着我刚好回到门口，他说：哦，你有先见之明，警报解除了。

他是听见了解除警报的哨声的，但我依然什么也没有听见。

不一会壕里的人也回来了，大家都笑逐颜开地十分高兴。

接着又是新民报馆铭德来电话，这电话中所报告的消息，

更于大家的高兴之中又增加了高兴。

据说，这次的敌机来袭，我机在城外和它堵截了好一会，窜进了城空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又说我们的高射炮，在浦口一炮连中了三机。怎么连中了呢？是因为一炮打中了敌机的炸弹，炸弹爆炸了，自行打伤了两架，一并坠落了下来。

一炮中三机！这在将来恐怕要成为谚语。这比旧时的“一箭射双雕”更来得摩登而可纪念。

敌人宣言，要把南京化为灰烬。

我却亲眼看见，敌人在南京化为了灰烬。

一三

警报解除后，汽车又开来了。汽车夫异常的高兴，在车里连连地向我说，我们的高射炮真打得好，真打得好！城里所打落了的两架飞机，他也看见了。

一街的人都是笑逐颜开的，那笑中自然有从恐怖里解放出来的安心，而更加不用说的是含有真打得好、真打得好的欢喜。这欢喜把我们民族的感情打成了一片，我们要把这民族的欢喜汇成哄笑，轰落下敌人的一切的飞机！视死如归的欢笑的轰炸，这是我们的至精锐的武器，敌人，你尽量地来吧！

到了约定地，因时间已过，汪留下了一位秘书，告诉汽车夫更开到某地去。

在客厅里坐候得没有一分钟光景，汪进门来了，老远开着

跑步，跑来和我握手，几几乎要把我拥抱着的一样。

汪的精神很好，但比武汉时代是消瘦得多了。

汪说，大家晓得你来了，都很高兴。刚才在开会议，大家都期待着会开完后可以和你见面，但可惜警报的时候太长，所以都散了。

汪又说到我要回上海的话来，于是我便知道，张群把我要走的消息报告了他。

谈了将近一个钟头，汪问我，已经见过陈公博没有？我说，还不曾见过，正想和他见面。

汪说：那吗好，你就留在我这儿吃午饭，我打电话去叫公博来，我们一道再谈。

我说：已经和孙哲生约过，要在午前去看他。午饭也有先约。

汪说：那吗好，我打电话去问公博，让他约定一个时间和地点。

汪进去打电话去了，起初转来说，公博要来看我，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了。但汪再转来时，却说，公博约我三点钟到他住的地方去。

离开十二时已经不远了，我便告辞了，去访问孙哲生。

孙科也问到了我的关于甲骨和金文的研究上来。在上海曾经听见吴经熊① 说过，孙科曾买过我的《殷契粹编》来送他，

---

① 吴经熊，字德生，一八九九年生，浙江鄞县人。曾任东吴法学院法学教授。一九三三年起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著有《法律哲学研究》等。

他却把我的《屈原研究》和《浮士德》来转赠了。古器物学的研究，在中国似乎有成为一般趣味的倾向，但我自己回到中国来仅仅两月，对于那些研究就好象隔了两个世纪。沉潜在那些研究里，在我自已看来倒是一种危机。

在陈设中看见有一个青铜器，是有盖的匜。把盖揭开来看，盖顶和器底都有铭，作器者是"浮公之孙公父宅"(公父是字，宅乃名)。这个器皿，记得在《宁寿鉴古》①或《西清古鉴》②上纪录过。器之如匜而有盖者，王国维以为是饮酒的兕觥。但这个公父宅匜既大而有盖。铭文也明明说是匜，而且器和铭都不会是赝品，足见王国维的兕觥说也有点靠不住。古者匜与盘必相将，匜是盛水的器皿，无论盛热水或冷水，都不妨有盖。匜不当有盖，我看是说不过去的。大约有盖而小的匜也可以盛酒，古人则称之为兕觥吧。

因为警报的频繁，在孙科那儿竟由十二点钟挺到了三点过钟。谈了不少的话，会了不少的人，陈公博也是在这儿会着的。

一四

离开南京已是二十六号的清晨。真是凑巧，今天又是雨天。敌机在雨天是很少出动的，大约我真是在走运吧？

---

① 清王杰等编，十六卷。著录清宫所藏彝器六百件、镜鉴一百零一件。

② 清乾隆年间梁诗正等编著的有关铜器汇集的著作，四十卷。编纂时间在《宁寿鉴古》之前。

途中在某处吃中饭时，遇过一次警报，但没有听见有什么轰炸的声音。又到陈诚那里去，把去南京后的情形向他报告了。仅仅作了二十分钟的逗留。

同行的赵处长，他的想早入上海的心似乎比我还要切。他很想在戒严时间以前赶进租界。他说，早点进租界，到四川菜馆去吃顿夜饭，再进旅馆去洗一次澡，可以舒服地睡他一夜。这，并不能说是怎样的奢望：因为汽车上的一个整天实在是足以使人劳瘁。而且公路又不平，汽车总爱跳，在有一次过桥的时候，跳得很高，把两人的头都碰伤了。

但我自己是未敢乐观的。上海附近的公路，我往返过多少遍，不平的程度更厉害，我不敢相信在戒严时间前便赶得进租界去。但我也不好说出来以败坏别人的希望。人在有希望的时候，虽然吃苦总还有几分甜头。待到希望毁灭了，那纯粹的苦会加倍地令人难受。

果不出我所料，车到某处附近的时候，公路烂得真有点荒唐。接联着有好几架卡车陷在泥里不能动。我在心里祈祷着：希望我们的车不要也陷没了。然而，这祈祷终竟不灵。仅仅开过了两三架陷没着的卡车，车轮也同样地陷没了。糟糕，怎么办呢？雨仍然在下着，泥里的辙迹有一尺来往深。前也是陷没着的卡车和汽车，后也是陷没着的卡车和汽车，一连怕有十几架。幸好是在晚上，而又在下雨！但到了明天清早，这十几架车子，岂不是敌机的极显著的目标？糟糕，怎么办呢？赵的忧虑已经早把他的希望打碎了，时间已经是夜里十点钟。

赵和跟来的公役都下了车，从前后陷没着的卡车中找了

些人来，想把车子推动。我也下了车去推，但泥是那么烂，不让你有站脚的地方。司机尽管鼓动着发动机，汽车本身也好象在大冒真火，满焦躁地象狂牛一样吐着气，焦躁到它的轮蹄发出了橡皮臭，然而一动也不能动。

——糟糕，怎么办呢！赵也焦躁起来了。

我想到了离薛岳的住处不远，我向赵说：我们只好去找他，可能时请他派部汽车送我们，陷着的车子让他叫人设法。

找着一位伕子让他引路，冒着雨，在泥滑的路上走。费了好些周折，走到的却是一处前敌指挥站。在这儿和负责的商量好了，请为我们备十名伕子，去推动。据说坏路是只有一短截的，只消把那一截推过了，便没有问题。赵也给薛岳打了电话去，但已经有办法了，便没有再麻烦他。

伕子们都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穿着草鞋，要征服雨和泥，似乎只有这种才是最好的武装。

回到公路，在雨中立在一架陷没的卡车旁边等待。这等待怕有点象立在法庭上等待着受生或死的宣判那样，虽然自己还不曾有过等候那样的宣判的经验。

伕子们去了不一会，前头有头灯光闪动了。再不一会，喇叭发着欢喜的声音向我们的身边咆哮了来，正是我们乘来的草色的尚未流线型化的轿车。我们和汽车同样，获得了再生的欢喜。

把车停着，等待伕子们的转来。赵付了十块钱犒劳他们，向他们致谢，他们也都十分欢喜。“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在这儿怕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示例吧。

车又开动了起来，到这时赵才告诉了我那汽车的来历。

原来那架汽车是陈诚夫人的嫁奁，本是红色的轿车。因为前方车辆缺乏，陈夫人自己捐廉，把车皮改漆了一遍，送到前方来使用。我们要算是获得了这出征车的第一次乘车的光荣。

听了这汽车的来历，不禁肃然生出敬意。难怪赵处长刚才要那样的焦躁，而汽车本身也要那样的焦躁了。如果陷没在那儿不能动，或者遭了敌人的轰炸使这车子成了废车，岂不是辜负了别人的一片爱国至诚，而增加了我自己的罪过吗？

知道了汽车的来历，在车里坐着却有点不大安稳起来。这样私人献给公家的车子，实在不是我这拖着泥脚的闲人所应该坐的，象我这样的人只应该拖着泥脚在泥里面拖着这车子走。不知怎的，坐在车里感觉得快要流眼泪——就是目前写到这儿来的时候，眼泪也总是在眼眶里涌。

南京来的司机不识路，在公路上逢人必问，过岔必停，因此到达真茹时已经两点过钟了。肚子很饿，道旁有一家卖烧饼油条的在赶夜工，公役和司机买了烧饼油条来吃，我也吃了一些。

赵处长说：你回国来，吃烧饼油条怕是第一次吧？

我说：不，前回我到××（昆山），冯焕章先生已经请我吃过一次。

赵又说，四川菜没吃成，来吃油条烧饼。说了，自己笑着。笑了，又继续着说：你这一次一定有好文章写，写的时候，这油条烧饼的一节，断不要忘记。

是的，我把一节琐事也就记录在这儿，所谓"苍蝇之微"也。

三点钟光景到达徐家汇，不用说无法进租界。四个人同在一架小汽车里过夜，但我自己是睡得很舒服的。

二十七日的清早，在晴朗的曙辉中，车至枫林桥，费了相当的周折才得入租界。我是七月二十七日由日本回到上海的，九月二十七日又由南京回到上海，刚好满了双月。

1937年9月下旬

〔本卷注释者：孙　昌　周凡英〕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十三卷 沫若自传 第三卷 革命春秋
作者=BEXP
SS号=
加密地址=
页数=492
下载位置=http://book4.5read.com/300-38/diskeah/eah83/09/!00001.pdg

第十三卷目录

革命春秋（沫若自传·第三卷）